

ON THE ROAD

在路上

[美] 杰克·凯鲁亚克 著 巫昂 译

Jack Kerouac

传奇女诗人巫昂 全译本终于来了

—— 传奇作家凯鲁亚克的传奇杰作 ——

7年在路上的传奇经历 3个星期的传奇创作
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 已突破300多个版本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识世界，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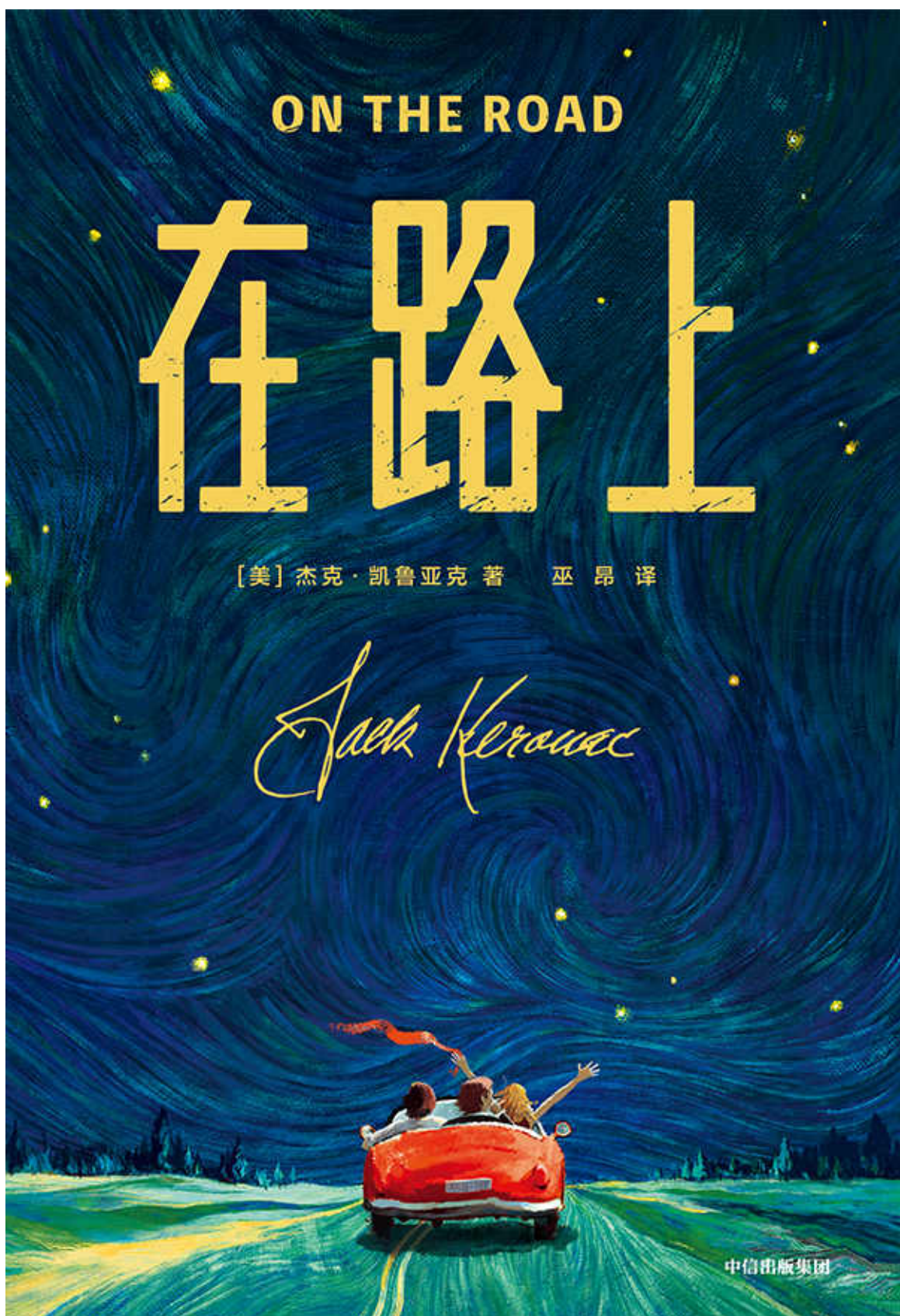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集团

ON THE ROAD

在路上

[美] 杰克·凯鲁亚克 著 巫昂 译

Jack Kerouac



中信出版集团



ON THE ROAD

在路上

[美] 杰克·凯鲁亚克 著 巫昂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版权信息

书 名：在路上

丛书名：作家榜经典文库

作家榜阅读 APP 电子版制作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Jack Karonac On The Rooftop
by John Cohen 1959



Life is holy and every moment is precious.

I wanted to pursue my star furt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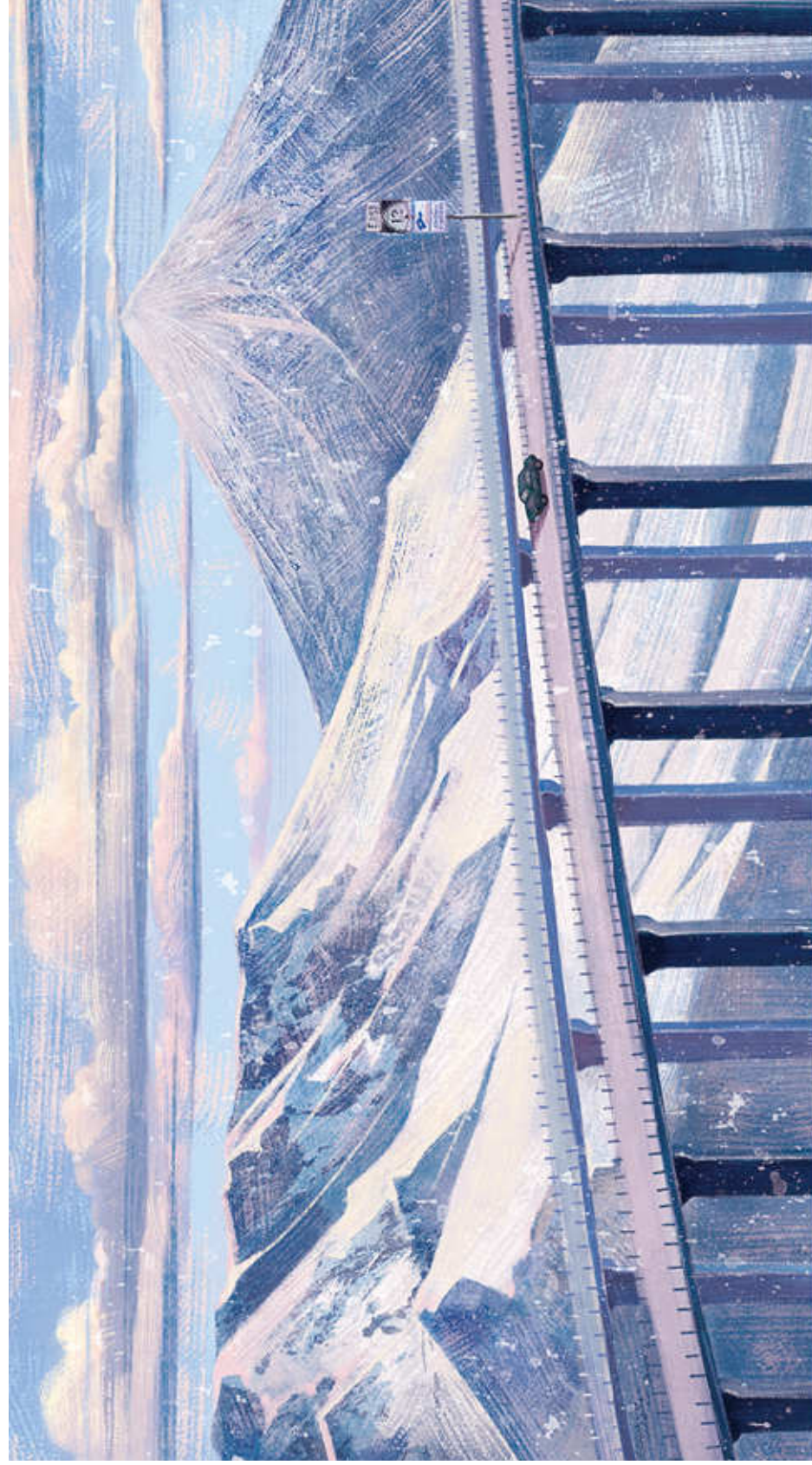
生命是神圣的，

每一分钟都值得珍惜。

我想继续追寻我的星辰。

Jack Kerouac





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但没关系，道路就是生活。





对于我来说，唯有疯癫的家伙才有意思，他们热火朝天地生活，随时随地高谈阔论，渴望被救赎，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他们从未懈怠，或者沉迷于一些平庸的话题，他们燃烧，燃烧，燃烧……





今晚，金星将会低垂，将它璀璨的祝福降落在大草原上，在整个夜晚真正降临之前，祝福大地，让所有的河流变得暗淡无光，罩住整座山峰，掩盖住遥远的海岸，没有人知道所有其他人将要遭际什么，除了垂垂老矣。





与其到天堂去光辉闪耀，不如寂寂无闻地待在人间做个普通人，什么是天堂？什么又是人世？不过在一念之间。





我看到他那张大脸上疯狂、瘦削的深情，还有闪闪发光的眼神，我看到了他的翅膀，我看到了他那辆正发射出千万道光芒的破旧的车子，我看到一路燃烧过后的道路。





我对任何人都给不出什么，除了我的困惑。



目 录

第一部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第二部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第三部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第四部分

1

2

3

4

5

第五部分

凯鲁亚克大事记

译后记

PART 1

1948 年 · 春 *ON THE ROAD*

1

我头回遇到迪安是在我和我老婆散伙之后不久，那时我病了一场，但这场病我也不想再提及了，生病确实与那场悲催、令人疲倦的离婚有关，那时我觉得一切都完蛋了。随着迪安的出现，我的生命进入了一段堪称“在路上”的历程。在那之前，我确实常常琢磨着能否去西部看看这个国家，总是漫无目的地计划着却从未真正付诸行动。迪安是个为上路而生的完美旅伴，他自己就是在路上出生的，那是1926年，他父母开着一辆老爷车从盐湖城去往洛杉矶的路上。我最初知道这人是从查德·金的嘴里，他给我看了几封从新墨西哥州劳教所寄来的信。那些信让我来了兴致，因为他在信里天真而又甜蜜地请求查德教给他关于尼采的一切知识，以及其他查德懂得的那些奇妙的知识。我和卡罗一度聊到过那些信，想着有一天我们能否见到这个怪咖迪安·莫里亚蒂。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时的迪安和今时今日的他不一样，那时他还是个笼罩于神秘感

之中的年轻囚徒。然后他离开劳教所的消息传来，说是正在初次来纽约的路上，还说他和一个叫玛丽露的姑娘结婚了。

有一天，我正在校园闲逛，查德和提姆·格雷跟我说迪安住在东哈莱姆的一所冬天不带暖气的破公寓里，西班牙语区的哈莱姆。迪安头天晚上刚到纽约，带着他俊俏泼辣的小女人玛丽露。他们从五十大道的灰狗车下来后，立马拐过街角去找口吃的，正好撞入赫克特咖啡馆。从那以后赫克特咖啡馆在迪安眼里就变成纽约的一大标志。他们买了漂亮而又美味的糖浆大蛋糕，以及奶油泡芙吃。

那段时间迪安总是这样对玛丽露说：“从现在起亲爱的，我们就在纽约了，尽管我还没怎么跟你好好说说在我们渡过密苏里河，尤其是离开波恩维亚劳教所之后，我想的一些事儿。那个劳教所让我总是想起坐牢期间的那些事儿，但现在，我们绝对应该撂开一切我们个人的喜好恩怨，来尽快好好地规划一下未来了……”他在那段时间总是说些诸如此类的话。

我和几个哥们去了那间不带暖气的公寓，迪安穿着短裤出来开门，玛丽露也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迪安指使公寓的主人去厨房，给大家准备点咖啡。而后他开始絮叨他的性问题，对他来说，性是生活中唯一圣洁而紧要的事情，即便他不得不汗流浹背、骂骂咧咧地为生活而打拼。你看他站在那里，用手指头敲敲自己的脑瓜，低头看着地，不住地点着头，正像个接受训练中的年轻拳击手，会让你觉得他把你的每句话都听进去了，还三不两时地扔出个“是的是的”或者“没错儿”来。迪安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吉恩·奥特里：修长、瘦臀、蓝眼睛，带着

正宗的俄克拉荷马口音，是多雪的西部那种留着大鬓角的美男子。事实上，迪安在和玛丽露结婚并且来到东部之前，他还在科罗拉多州一家叫艾德·沃尔的农场干过活。玛丽露是个漂亮的金发女郎，顶着带有大大波浪卷儿的长发，如同顶着一片金色海洋。她坐在沙发边上，两只手搁在大腿上，用她那双雾气蒙蒙、有点土气的蓝眼睛警觉地盯着周遭的一切，现如今她得住在这个简陋暗淡的纽约公寓里，这种公寓她在西部老家时也曾听说过的。她如同莫迪利亚尼画中一个庄重的房间里身量修长、形容憔悴的超现实主义女子一样，待在这么个说不上正经八百的屋子里。当然，表面上她像个傻白甜，其实也有不爱做声的小城府，绝对能干出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来。那个晚上，我们喝啤酒，掰手腕，彻夜聊天到天亮时分。早上，我们在清晨的灰色光线照射中默默无言地围坐一处，迪安从烟灰缸里挑烟蒂抽，然后焦躁地站起身来，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着事儿，他决定先让玛丽露去做早餐、拖拖地。“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用心些亲爱的，就像我说的，如果我们对自已的计划没有真知灼见就会产生动摇情绪。”而后我就走了。

接下来的那周，迪安跟查德·金说自己一定要从他那儿学到怎么写作。可查德说我才是个作家，他应该来请教我。那会儿，迪安刚从个停车场找到一份工作，他和玛丽露在哈波肯公寓干了一架，天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搬到那里去，她疯狂之极，不惜用一些在歇斯底里状态中捏造出来的谎话向警察报警，用于报复，迪安只好从哈波肯公寓逃出来了。他无处可住，径直到了我和我姨妈居住的新泽西的帕特森。一天晚上，我正在读书，一阵敲门声响起，是他弓着身子，在黑暗的门厅处恭恭敬

敬地站着，对我谄笑道：“你……好，你记得我吗——迪安·莫里亚蒂？我来请教你如何写作。”

“那玛丽露呢？”我问，迪安说她做了几天婊子弄了点钱就回丹佛去了——“那婊子！”于是我们外出喝点啤酒，因为我姨妈坐在起居室看报，在她面前我们无法畅所欲言。她只看了一眼，就认定他是个疯子。

在酒吧我跟迪安说：“嗨，哥们，我很清楚你来找我不仅是为了成为一个写东西的，当然我对此也知之甚少，只知道你得像个瘾君子一样执着，紧盯着去写。”他说：“是的，我当然懂你的意思，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冲着我来了，但我想用叔本华的二分辩证法去真真切切、彻彻底底地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他说了一堆诸如此类我听不懂、他自己也未必了然的车轱辘话。那些日子他确实不知所云，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痴心妄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少年犯。他从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那里听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如你所知，他在别的事情上也不是那么全然幼稚。之后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卡罗·马克斯混熟了那些学术术语和行话。即便如此，我们在某些层面上依然达到了疯狂的一致，于是我答应他住在我家，直到找到一份工作。另外，我们还想着找个时间结伴去西部，那是1947年的冬天。

一天晚上，迪安在我家吃了晚饭——他已经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停车场的活儿——我飞速地打字时他探过我的肩膀催促说：“快点儿哥们，那些妞等不及了，快点写。”

我说：“等几分钟，我写完这章就跟你去。”那是那本书最棒的章节之一，而后我换上衣服冲到纽约去跟一些妞碰面。我们坐在公交车上，车子穿行过像磷光一样空空荡荡的林肯隧道，我们靠在一起手舞足蹈，大声说话，我察觉到自己开始染上的臭德性了。他不过是个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年轻人，虽然也是个骗子，他搞欺骗是为了活得更尽兴，并引起那些压根不屑他的人们的注意。我知道他也骗了我（为了找个住处搭个伙，和诸如“如何写作”，等等），他也知道我知道（这一条是我们关系的基础），但我压根不在乎，因为我们挺合得来的。我们既不相互打扰，也不互相承让，我们混在一处像一对习于心碎的新朋友。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向他取经，犹如也许他也能从我这里学到些什么。跟我工作有关的方面，他总是说：“加油干，你做的每样事都很伟大。”我写小说时，他从我肩后探过脑袋来看，大叫：“真棒！就是这样！哇！哥们！”或者“哇啊”一声，用手帕捂住脸：“哥们，哇，有那么多可干的事情，有那么多可写的东西！要把它们统统写下来，没有那么多束手束脚的臭规矩，没有那么多文学禁忌或者语法约束该有多好……”

“对啊，哥们，你算说对了。”从他的兴奋与幻想中，我看到了某种灵光闪现。他是那么滔滔不绝地讲着，引起公车上乘客们的侧目，大家都在找那个“兴奋过头的傻叉”。在西部，他把三分之一的生命消磨在台球厅，三分之一在监狱，三分之一在公共图书馆。人们常常看到他在大冬天光着脑袋，从街上蹿出来，抱着书去台球厅，或者爬上树，藏在朋友的树屋里。他整日在那里读书，或躲开警察。

我们去了纽约——具体情形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原本要来一起吃晚饭的一帮女孩并没有如约出现，只来了两个黑姑娘。我们还去了他工作的停车场，他在那儿还有点琐事要照料一下——他躲到后边的小屋里换了衣服，在一面破镜子跟前打扮停当，然后我们就出发了。也就在那天晚上，迪安和卡罗·马克斯碰上了，他们的碰面宛如天雷勾地火，彼此眼神触碰之处，滋滋冒出火花。两个惺惺相惜的灵魂撞到一处，凑成一对。迪安是圣洁的、金光闪闪的骗子，卡罗·马克斯则是在暗处显得忧伤而诗意的骗子。从那以后，我就很少碰到迪安了，我也觉得有些遗憾。他们两个旗鼓相当，我无法匹敌，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从那以后，一切就开始乱套了，我所有的朋友，我仅存的亲属，统统被搅和成美利坚夜空中一大块布满尘埃的乌云。卡罗跟他讲老布尔·李，埃尔默·哈塞尔，还有简。李在得克萨斯种大麻，哈塞尔在里克岛的事情，简则在安非他命幻觉控制下，抱着自己的女儿晃悠于时代广场，最终进了贝尔维尤精神病院。迪安给卡罗讲他不熟的西部人，诸如汤米·斯纳克，那个跛脚的台球厅老手、一流牌手和古怪的圣徒。还给他讲罗伊·约翰逊，大块头艾德·邓克尔，他的发小，他在街头混的老友，他数不清的姑娘、性派对和色情影片，他喜欢的男女英雄，他的历险记。他们一起冲到街上去寻找那些开始时让他们兴致勃勃的东西，后来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空洞无聊了。而后他们蹦蹦跳跳地在街上满场飞，我总是在后边亦步亦趋，这辈子对于我感兴趣的人，我总是习惯于做个跟屁虫。对于我来说，唯有疯疯癫癫的家伙才有意思，他们热火朝天地生活，随时随地高谈阔论，渴望被救赎，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他们从未倦怠，或者沉迷于一些平庸的话题，他们燃烧、燃烧、

燃烧，如同巨大的黄色罗马火药筒，像在行星撞击中爆开的蜘蛛，在正中间你会看到灼热的火光，而后所有人发出一声“哇呜”！在歌德的故乡德国，人们如何称呼这种年轻人呢？首先，为了学会像卡罗一样写作，迪安想方设法靠近他，只有彻头彻尾的骗子才能做到这一点。“听着，卡罗，我说——这是我想说的……”我大概有两个礼拜没见过他们，他们在夜以继日的神聊中，把关系搞得牢靠之极。

春天来了，正是出行的好时节，人们开始准备三三两两地出门远行。我手头正忙着写一部小说，大概写了一半。在陪姨妈去南方探望过我的兄弟罗科之后，我打算破天荒地去趟西部。

迪安已经先行一步，卡罗和我到三十四大道的灰狗车站送别他。车站二楼有个地方，你花二十五美分就能拍些照片。卡罗摘掉眼镜看起来有点儿邪门，迪安拍了张看起来有些腼腆的证件照。我拍了一张古怪的照片，看着像那种三十来岁、随时打算把跟他妈顶嘴的人弄死的意大利佬。卡罗和迪安把他俩的合照整整齐齐地用刀片从中间切割开，收入各自的钱夹。迪安穿着一套正经八百的西部商务套装回丹佛，他结束了自己在纽约的第一段飘荡生涯——无非就是在停车场像条狗一样干活儿。他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停车场管理员，他能将车子以每小时四十迈的速度倒入一个犄角旮旯，靠墙停下，然后蹦出来，越过众多障碍，跳进另外一辆车，将之以每小时五十迈的速度盘旋在一小块空地上，再把它塞进一个屁大的地方，咣当，在危急之中你可以看到他来个急刹车，那辆车还震了几下。而后他

像田径明星一样冲向开票处，把票开好，再冲向另外刚刚开来的车，没等车主人下车，他已经钻进驾驶室，等不及车门关紧，他已然呼啸着把车停入下一个合适的车位。启动、冒进、急刹、出来、进去，每个晚上就那样马不停蹄地干够八个小时，夜间高峰期或者剧场散场时分，他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套着一条油腻腻的工装裤，上身则是一件磨旧了的毛皮衬里夹克，趿拉着一双烂鞋。而今他可算买了套崭新行头衣锦还乡，带条纹的蓝外套，背心，全是第三大道上“一律十一美元”的货色，还买了块手表外加一根表带，一台便携式的打印机则是为了回丹佛后开始写作用的，一旦他在那里找到工作，就会租个单间。我们在十七大道的瑞克餐馆，吃了顿包含法兰克福香肠和豆子的告别饭。而后踏上前往芝加哥的灰狗班车的迪安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我们与牛仔哥就此别过，我对自己发誓等春天真正来临，大地上万物苏醒之时，我也将同样踏上这条道路远行。

我后来整个“在路上”的生涯就是这么开始的，之后发生的一切简直匪夷所思。

当然，我之所以要进一步了解迪安，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个作家，需要更好地了解补充新经验，也因为我在校园里闲逛的生活已经进入了死胡同。它让我昏昏沉沉，而且因为迪安，除去我们之间的个性差异，他总是让我感觉他像我失散多年的亲兄弟，留着大鬓角的大瘦脸，紧绷绷又汗津津的脖子，总让我回想起自己在帕特森和帕塞伊克的垃圾场、水泡子以及河边度过的少年时光。他那套脏兮兮的工作服显得如此得体熨帖，你

无法从服装裁缝那里买到更加合宜的衣服，而迪安却能克服重重困难，以大自然的喜乐做大自然的裁缝。从他神采飞扬的讲谈之中，我再度听到自己那些伙伴们和兄弟们的谈话声，在桥下，在摩托车车阵当中，在社区的晾衣绳下，在午后昏昏沉沉的门前台阶上，那些小伙子们弹起了吉他，而他们的兄长正在厂里干活儿。我当下其他的朋友都是“知识分子”——研究尼采的人类学家查德，卡罗·马克斯是古里古怪的超现实主义疯子，说话时嗓音很低，神情严肃、目不转睛地盯着你，老布尔·李讲话时总是慢条斯理地拖长声，批判一切——或者他们和埃尔默·哈塞尔一样，是个鬼鬼祟祟的罪犯，随时冷嘲热讽，简·李也是一个德性，瘫在她东方情调的沙发套上，说说《纽约客》的风凉话。而迪安的智慧在任何意义上都要更加正规、闪耀和完整，没有乏味的学院腔，他的“犯罪行为”也不是那种怒气冲冲和尖酸刻薄的，那是一种从美国式的喜悦当中脱胎出来的积极上进，是西部的，像西部之风，从平原上异军突起，某种新鲜的、可以长期预见的、连绵不绝的东西（他偷车只为了找乐子）。另外，我所有纽约的朋友们都处于一种悲观厌世的、噩梦般的处境之中，他们愤世嫉俗不说，还总是搬弄他们奄奄一息、学究气十足的借口，不管政治的还是精神分析学的。而迪安在俗世之中行走，渴望面包和爱情，他没有那么多顾忌。“只要我能让那个小妞儿乖乖地张开她的双腿，哥们。”或者：“只要有吃的，听到没有？我饿了，我饿死了，我们这就去吃！”——然后我们就去吃了，这就像《传道书》中所说的：“阳光之下，人各有分。”

迪安乃阳光的西部亲戚，尽管我姨妈警告过我他会给我带来麻烦，我却能够听到一种崭新的召唤、看到一条新鲜的地平线，在我年轻的时代我对此深信不疑。有点儿麻烦或者最终迪安也没有把我当哥们，任凭我在路边饿死，或者病死在病床上——那又有什么所谓？我是个年轻作家，我需要上路。

这一路上，我知道会有姑娘、幻象、各种可能，沿路前行，我终将获得珍珠。

2

1947年7月，揣着从老兵福利金当中攒下的五十美元，我准备去西岸。我的朋友雷米·博古尔从旧金山给我来了封信，让我去找他，然后和他一起乘着海轮环球旅行。他发誓他能把我弄进轮机舱。我给他回了信说，只要我能在太平洋航线那些老货船上来几回旅行，还可省下继续我在姨妈家把那本书写完的钱就行了。他说他在米尔市有座小木屋，在我们等待办理繁琐的上船手续时，我可以一直住在那儿写作。他说他和一个叫李·安的姑娘住在一起，她的厨艺一流，一切都很不错。雷米是我在学校预科班认识的朋友，一个在巴黎长大的法国人，也是个真正的疯子。我不知道这回他疯的程度，他让我十天之内抵达。我姨妈支持我去西部转转，她觉得这对我有好处，我整个冬天都宅在家里使劲干活儿，甚至在我跟她说我可能有时候得搭便车，她也没抱怨什么，她只希望我保个全尸回来。有天早上，我把那一大沓写了一半的手稿放在桌上，最后一回叠好我

舒适的床单，背着一只装着日常用品的帆布袋，带着兜里的五十美元，朝着太平洋的方向出发了。

我在帕特森已经琢磨了好几个月美国地图，甚至读了一些跟西部拓荒者有关的书，那些别有风味的名字，诸如帕拉特或者西马龙之类。在公路地图上有一条叫作六号公路的漫长的红线，从科特角的顶端，延伸至内华达州的伊利，然后从那里斜穿至洛杉矶。我将一直沿着六号公路前往伊利，我对自己信誓旦旦。为了去六号公路，我得先上贝尔山。带着要去芝加哥、丹佛和旧金山干点什么的念头，我在第七大道坐上地铁，到二四二大道的终点站，而后坐无轨电车到扬基斯，在扬基斯转车去往远郊的无轨电车，抵达哈德逊河东岸的一座小城。如果你向哈德逊河位于阿迪朗达克山脉的神秘源头扔下一朵玫瑰，想想它到达海洋之前路过的那些地方——想想美妙的哈德逊山谷，我开始搭便车，分成五小段终于抵达想去的贝尔山桥，六号公路在那里向新泽西拐了个弯。我下车时大雨如注，山路险峻，六号公路跨过河，在一处交通枢纽上绕了一圈，然后消失于旷野。不单是那里没车可搭，雨下得还相当吓人，而我无处可躲。我不得不跑到几棵松树底下想躲躲雨，后来发现这样无济于事，我开始哭着喊着，骂自己怎么长了这么个猪脑子。我在纽约以北四十英里处，在我郑重其事的旅行之初始阶段，向北折腾了一整天，而不是向西。而今我像鬼打墙一样陷在向北走的滞留地，我跑了四分之一英里，到了一个英式风格、小巧玲珑的废弃加油站，在滴水檐下躲雨。在我眼前是高耸入云的贝尔山，山上电闪雷鸣，令人畏惧神力。我目力所及唯有烟雾蒙蒙的树丛和与天空交接的惨淡荒野。“我他妈的在这里干

吗？”我咒骂着，为芝加哥哭泣：“此时此刻他们肯定玩嗨了，他们肯定正这么干，我不在那儿，我什么时候才能到那儿！”——就在此时，一辆车终于停在这空荡荡的加油站，车上的一男两女正打算停下来看看地图，我站了出去，摆出搭车的手势，他们商议了一下。当然了，我看起来像个傻子，湿漉漉的头发，鞋子也进水了，看起来正是傻头傻脑的。我穿着一双墨西哥平底皮凉鞋，鞋上全是洞，压根不适合在美国的雨夜和泥路上穿。那些人让我上了车，把我带回北面的纽堡，比起在贝尔山的荒郊野外过夜，这已经算是不错的选择了。“另外，”那男的说，“六号公路上没什么车，如果你想去芝加哥，最好在纽约穿过荷兰隧道，然后去匹兹堡。”我知道他说得没错，这都源自我傻呵呵的想法，想沿着这根红线穿行美国，而不是试不同路线和途径。

在匹兹堡，雨终于停了，我沿着河溜达了一会儿，不得不重新坐车回纽约，跟一群刚从山里度完周末的教师们一起——他们叽叽喳喳聒噪不已，我一直在愧疚自己浪费这么多时间和钱，并跟自己发重誓，我要去西部，而不是在这里瞎折腾，花了一整天上上下下，忽南忽北，就跟撞了鬼一样。我向自己发誓明天自己必须在芝加哥，一定要坐着车去芝加哥，哪怕花掉我大部分的钱，只要明天能到芝加哥，怎么都行。

3

那是一次很没劲的公共汽车之旅，车内婴儿的哭闹声此起彼伏，阳光灼热，在宾夕法尼亚沿路的村镇，总有农民上车下车，直到我们抵达俄亥俄的平原地带，车子才开始疾驰，夜间经过阿什塔比拉，直接穿过印第安纳州。我一大早到达了芝加哥，在基督教青年会住了个单间，带着兜里所剩无几的钱上了床。我美美地睡了一整天，才出去对芝加哥探个究竟。

有密歇根湖吹来的风，卢普区的波普爵士乐，我可在南哈尔斯特德和北克拉克闲逛许久，午夜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了丛林，竟被一辆巡逻的警车当成可疑分子盯上了。1947年那会儿，波普爵士乐正火遍全美，卢普区的那帮家伙吹得半死不活的，因为波普爵士乐正处于查理·帕克学鸟叫和迈尔斯·戴维斯初期的过渡阶段。那天晚上我坐在那里听着为我们这些人代言的波普爵士乐，想起了我遍布全国的朋友们，他们实际上处于同一块空荡荡的后院里，做着同样令人热血沸腾的事。我生

平第一遭，在接下来的那个下午，进入了西部。那是个温暖美好的下午，搭便车正合适。为了躲开芝加哥拥堵的交通，我坐了公交车到伊利诺伊州的乔伊特，途经乔伊特监狱，徒步从一条飘满落叶的破落街道上走过，我在郊外开始搭车，指着我想去的方向。从纽约到乔伊特一路坐车过来，我已经花光了兜里大半的钱。

我第一段搭的是一辆插着红旗标志的装炸药的卡车，在旷阔而又绿油油的伊利诺伊州行驶了三十英里之后，司机帮我指了指我们正在飞驰其上的六号公路和六十六号公路交接的地点，它们之后都通向一望无际的大西部。下午三点许，我在路边小店吃完一个苹果馅饼和一只冰淇淋之后，一位开着双门小车的女人为我停了下来，我追着那辆车跑的时候确实大喜过望，她是个中年妇女，实际上是个儿子已有我这么大年纪的当妈的，她想让人帮她把车开到艾奥瓦，我再合适不过了。艾奥瓦！离丹佛不远了，一旦我到达丹佛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开始她开了几小时车，在某个地方坚持下来要去参观一个教堂，好像我们是游客似的。之后我掌控了方向盘，虽然我车开得不咋的，但我还是把从伊利诺伊到艾奥瓦的戴维波特余下的路都开完了，路上还经过了岩岛。在那儿，我平生头一回见到了亲爱的密西西比河，它在夏天的雾霭当中看起来干干的，水位很低，而且散发着一股臭味，这是因为它冲刷了美国的肌体而染上的气味。岩岛——铁路的轨道，棚户区，小城区，过了桥就到了戴维波特，大同小异的镇子，在温暖的中西部阳光下散发着锯末的气味。在那儿，那位女士要从另外一条路上回她艾奥瓦的老家，我便下了车。

太阳即将下山，我一边走一边喝了几罐冰啤酒，走到了城边上，那是一段很长的路。男人们正开车下班回家，戴着铁路工的帽子，棒球帽，各种各样的帽子，与其他任何镇子男人下班后的情形无异。这其中一位让我搭车到山顶，在一个孤零零的、大草原边上的岔路口把我放了下来。那里的景色优美。过路的唯有农用车，他们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他们一路叮叮当当前行，牛群正去往回家的路上，一辆过路的卡车也没有。几辆车飞速开过，一个开着改装车的小伙儿脖子上戴的围脖在风中飞扬。太阳正在下山，我站在近乎深紫的暮霭之中，开始感到害怕，在艾奥瓦乡下一盏路灯都没有，很快谁也看不到我了，幸好一个回戴维波特的男人带了我一程，让我回到城里，但我也就回到了起点。

我坐在公交车站，琢磨着这件事，我又吃了一个苹果馅饼和一只冰淇淋，这差不多是在路上最常吃的两样东西，我知道它们营养丰富而且相当可口，当然了，我打算赌一把，在汽车咖啡馆花了半个小时花痴一位女招待之后，我坐上了去戴维波特城里的公交车，我坐到了城边上，在一家加油站跟前下了车。在那里，各种大卡车轰鸣着路过，嗯，不出两分钟，其中一辆大卡晃悠着为我停下。我欣喜若狂地奔将过去。那是个怎样的司机啊——一个大粗胖子，眼球突出，嗓音嘶哑又刺耳，他重重地关上车门，四下乱踢了一阵，便轰隆隆地启动了卡车前行，几乎就不搭理我。因此我可以歇息一下我疲惫的灵魂，搭便车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你得跟数不清的人说话，让他们觉得自己搭上你不是个错误，至少你可以让他们开心一下。当你忙着赶路以至于都顾不上住店时，那更是个麻烦事。那司机为

了压住引擎的轰隆声，扯开嗓子跟我嚷嚷，我也不得不嚷嚷了回去，一来一往，我们都放松了下来。他就这样一路吵吵着到达艾奥瓦，嘶吼着跟我说他是怎么在那些制定了不合理的限速规则的地方，巧妙地逃脱了。“那些该死的警察没法在我屁股上贴条儿！”当我们即将到达艾奥瓦市时，因为他得拐入艾奥瓦，他就向跟在他后头的卡车闪了几下尾灯，把车速慢下来好让我跳出车去，后边那辆卡车心领神会，就这样近乎无缝对接，我坐到了另外一辆高高的卡车上，继续赶几百英里的夜路，真是令人心花怒放！这个接手的卡车司机跟刚才那个一样疯狂，也是大声地嚷嚷着，我也不得不继续大声地嚷嚷回去。现在，我能看到丹佛在眼前像应许之地一样出现了，在星空之下延伸的这些路途，穿过艾奥瓦的大草原和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块块平原，我也能看到旧金山更为开阔的景象，就像夜幕中的珠宝。他一面疾驰一面讲了好几个小时的故事，然后在艾奥瓦一个小镇——那地方多年后迪安和我曾经被警察拦下盘查，因为怀疑我们开的凯迪拉克是偷来的。他在驾驶座上睡了大约几个小时。我也睡了会儿，然后沿着孤零零的、被一盏灯照亮的红砖墙又溜达了一会儿，那里每一条小路的尽头都通向了沉静的草原，飘散在夜空中玉米的味道闻起来像露珠。

黎明时分，司机突然惊醒，又轰隆隆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得梅因市的雾气就在前方绿油油的玉米地上空出现，他说想慢慢悠悠地吃顿早餐，于是我独自一人进入了得梅因，搭上了两个艾奥瓦大学学生的车，走了大概四英里，坐在他们崭新舒适的车里，听着他们谈论考试的事情，和缓地开入城区的感觉有点儿古怪。现在我想睡够一整天，于是我去往基督教青年会想要

个房间，他们已经客满了，于是我凭着直觉沿着铁轨走——得梅因的铁道有的是——最后在一间机车库房附近找到了个昏暗又窄小的小客栈，是平原区装修风格。我躺在一张硬邦邦的干净雪白的床上睡了整整一天，我的枕头后方，前任的房客在墙上刻满了下流字句，明黄窗帘将铁道站上灰蒙蒙的景象隔绝在外。我醒来的时候，太阳红红地挂在外头，那是我生命中不同寻常的奇妙时刻之一，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远离家乡，在旅途中精疲力竭，住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廉价旅馆里头，听着外边的水流哗哗作响，旅馆的旧木地板嘎吱作响，楼上有脚步声和各种各样惨兮兮的声响，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大概有奇怪的十五秒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我不感到害怕，我不过是另外一个人，一个陌生人，我穿行在整个美国的半路途中，我处于我少年时代的东部和我未来西部的分界线上，这也许就是让我感到神奇的火红下午的来由吧。

但我得继续前行，少说废话，我收拾好自己的行装，跟坐在痰盂边上的旅店老板道别，出去找吃的。我吃了苹果馅饼和冰淇淋——深入艾奥瓦后，我发现这两样吃的的变化，仿佛是渐入佳境——馅饼个头变大，而冰淇淋比别处更甜。那天下午，我在得梅因所见的一群群姑娘们是最美的——但我无暇执着于这个念头，在丹佛，有一场舞会正等着我。卡罗·马克斯已经在丹佛了，迪安也在，查德·金和提姆·格雷也在，那是他们的老家；玛丽露在那儿，还听他们提及可能还有另外一大票人，包括雷·罗林斯和他漂亮的金发妹妹贝比·罗林斯，迪安认识的两个侍女贝腾库特姐妹，甚至还有罗兰·梅杰，他是我大学写作课上的好哥们。我对于见到他们充满了期待和热

望。于是我抛下了那些漂亮的姑娘们——世上最美丽动人的姑娘都住在得梅因。

有个家伙开着一辆装满工具的卡车，活像移动的工具棚，他站着驾驶，又活像现代的送奶工，他送了我一程上坡的路，而后我又搭上了一对农民父子的车，他们正打算去艾奥瓦州的艾德，在这个镇子的加油站边上的一棵大榆树下，我认识了另外一个搭便车的，一个典型的纽约人，一个在邮局多年来以开卡车为主要工作的爱尔兰人，他打算去丹佛见个姑娘，开始一段新生活。我感觉他在逃离纽约的某样东西，也许是犯事儿了。他是个三十岁左右地道的红鼻子酒鬼，通常我不太爱搭理这号人，我对于友情有着敏锐的嗅觉。他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毛衣，一条兜里塞满东西的裤子，他除了一只袋子啥也没有——里面只装着把牙刷和几条手帕。他说我们应该合伙搭车，我本该一口回绝，因为他在路上看起来实在太邋遢了，但我们站在一起，搭着一个沉默寡言的司机的车到了艾奥瓦的斯图亚特，我们滞留在那个镇子里无计可施，站在斯图亚特火车售票处门口，等着西去的便车直到太阳下山，为了打发这长达五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是讲各自的事儿，然后他讲了些黄段子，我们踢着小石子儿，让它们发出各种傻透了的噪音。我们很无聊，我打算花一块钱买啤酒喝，我们去了斯图亚特一家老酒馆，喝了一些。他很快喝得跟他在纽约第九大道的家里一个德性，在我耳边兴高采烈地叫嚣着他一生中做过的各种下作的梦，我开始变得有些喜欢他，不是因为像他后来证明的那样是个好人，而是他对一切都充满了热情。我们回到黑漆漆的路上，当然了没人停车，也没多少车路过。直到凌晨三点依然一

无所获，我们试着在售票处的长椅上打个盹儿，但电报机整晚滴滴答答地吵着，实在无法入睡，外加外边那些哐当作响的火车货车，以前我们没扒过货车，不知道怎么干，不知道它们往东还是往西，也不知道应该选择带棚子的、平板的还是冷藏车，诸如此类的麻烦事儿。天亮前，当奥马哈的公交车开来的时候，我们就跳了上去，汇入了昏昏欲睡的乘客之中——我付了我和他的车票，他的名字叫埃德，他让我想起了布朗克斯来的表弟。这就是我为何和他形影不离，就像一路有个老朋友同行，一个有说有笑的好脾气的旅伴。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康瑟尔布拉夫斯，我向窗外看。整个冬天，我都在读那些伟大的拓荒者和货车党的书，他们在被驱送往俄勒冈和圣菲之前，会在那里聚合一段时间。当然了，现在那里只有一些小巧玲珑的乡间木屋，待在惨淡灰暗的黄昏之中。然后是奥马哈，天哪，我第一次见到的牛仔，正沿着肉类批发仓库的红砖墙边上溜达，他戴着阔檐帽，脚蹬得克萨斯靴，除去这身行头外，他看起来和东部任何一个在墙边沮丧行走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下了公交车，在小山上攀爬行走，这一大片山丘也许都是密苏里河千百年来冲刷而成的，沿着河建成了奥马哈，我们走到乡间，竖起了拇指想继续搭车，一个戴着阔檐高帽的有钱的农场主搭了我们一程，他说普拉特河流域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样伟大，他这么说的时候，我看着远处那些高大的树木，与河床一同蛇行，以及周边那些绿油油的田地，几乎就同意了他的说法。随后，我们在另外一个十字路口搭车，天开始阴下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六英尺高的、戴着半高帽的牛仔招呼我们过去，他想知道我们俩谁会开车。当然

了，埃德和我都会开车，他有驾照我没有。那位牛仔要开两辆车回蒙大拿，他老婆在大岛，他想让我们开着其中一辆车去那里，然后让她接手。那会儿他正往北去，他只能搭我们一小段路。但是要去内布拉斯加还有足足一百英里的路要走，我们毫不迟疑地上车了。埃德独自开着一辆车，牛仔和我开着另外一辆车跟在后面，我们一旦开出城，埃德就使劲把车提速到九十迈每小时，“该死的，那哥们想干吗？”那位牛仔叫嚷道，而后紧追不舍，很快就像是在路上赛车。有一瞬间我想埃德也许想驾车逃逸——以我所知，那是极有可能的。但是那牛仔也不是怂包，他没跟丢，终于追上了埃德，使劲地按喇叭。埃德的车速慢了下来，牛仔按着喇叭让他停下来：“靠，哥们，你开那么快是会爆胎的，你能开慢点儿吗？”

“我晕了，我真的开到九十迈了？”埃德说，“这路太好了，我压根没意识到。”

“悠着点儿开，这样我们能顺顺当当地开到大岛。”

“没问题。”我们重新开始了旅程，埃德消停了下来，也许差点睡着了。于是我们开了一百英里，穿行过内布拉斯加，沿着风中的普拉特河和广袤无际的田野。

“不景气的时候，”那牛仔跟我说，“我每个月至少扒一次火车，那些日子，你能看到一辆平板车或带棚车上挤着几百号人，他们不单是流浪汉，他们是形形色色失业的男人，从一个地方晃到另一个地方，有些人不过是在瞎晃悠。那时候整个西部充斥着这种情况，火车司闸工从不干预你。现在我就不知

道了。内布拉斯加是个我特别瞧不上的地方，三十年代中期，这里触目所及不过是一片漫漫黄沙，你无法呼吸。地是黑乎乎的，那些年我在这里，他们尽管把内布拉斯加还给印第安人好了，我才不稀罕呢，我讨厌这个地方，胜过世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蒙大拿现在是我安家的地方，密苏里，你没事儿可以去转转，那才叫上帝的国度。”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聊烦了，我也就睡了，他是个挺有意思的聊伴儿。

我们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吃口饭，那牛仔跑去补胎，埃德和我坐在一家家庭风味餐厅。我听到一阵狂笑声，是世上最粗犷的大笑，进来了个老派打扮的粗鲁的内布拉斯加农民，他带着一帮小伙儿来吃饭，你可以听到他震翻平原的刺耳嗓音，响彻他们灰蒙蒙的世界。每个人都跟着他一起大笑，他在这世上无所顾忌，对所有人照顾备至。我对自己说，嗨，听那人的大笑，这就是西部，我在西部。他径直进了餐馆，一路喊着莫的名字，说她做的樱桃馅饼是内布拉斯加最好吃的。我分到了一块，上面还浇了一大勺冰淇淋。“莫，快给我整点吃的，否则我就要吞了自己了，我可免不了有诸如此类的傻念头。”然后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呼哧带喘地笑个不停。“别忘了在里边搁点豆子。”我身边这位就是西部精神的化身，我想知道他整个的狂野人生，我想知道他除了那么大笑大嚷之外，所有的年月里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真带劲，我心想，而后那牛仔回来了，带我们前往大岛。

须臾之间，我们就到了，他先去接上自家老婆，然后去往他不知如何的命运，而埃德和我则继续上路了。我们搭上了两

个年轻人的车——牧马人，不满二十岁，开着一辆勉强拼起来的破车的乡下小伙儿——他们在某个道边把我们放下来，天还下着小雨。而后一个一言不发老头儿——天知道他为什么带上我们——把我们带到了谢尔顿，埃德孤零零地站在路上，面对着一群又矮小又粗壮的奥马哈印第安人，这些人看着既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做。马路那头是铁轨和写着大写“谢尔顿”的水塔。“他妈的，”埃德兴奋不已，“我来过这个镇子，多年以前，战争期间，那是夜里，所有人都睡着的深夜，我下了站台去抽口烟，我们身处地狱般黑暗的不知道是哪儿的鬼地方，我向上看然后看到了这个水塔上写着的‘谢尔顿’，列车开往太平洋海岸，所有人都在打呼噜，每个都是傻蛋！我们只待了几分钟，补给了点什么，然后就开走了。他妈的，就这个谢尔顿，从那以后我恨死这个地方了！”我们又给困在谢尔顿了，如同在艾奥瓦州的达文波特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来来往往的都是农用车，偶尔来辆游客的车，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老头儿开车，老太太对着外边的景色指指点点，或者不停地查看地图，对所有的东西都抱着狐疑的态度。

雨逐渐下大了，埃德浑身发冷，他穿得不够厚，我从包里翻出来一件格子花呢衬衫，他穿上了，觉得略微好些了。我却感冒了，我从一家晃晃悠悠的印第安小店里买了点咳嗽药，又去了个二乘以四英尺见方的小邮局，给我姨妈寄了张明信片。我们重新回到灰蒙蒙的路上，写在水塔上的“谢尔顿”就在我们跟前。岩岛过去了，我们看到列车上普尔曼的乘客在一片模糊中呼啸而过。列车呼啸着穿过平原，去往我们想去的地方。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一个瘦高个，戴着宽边呢帽的家伙从公路逆行的方向，朝我们走来，他看着像个警长。我们赶紧在心里编故事打腹稿好对付他，他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你俩打算去哪儿，还是随便转转？”我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那他妈的真是个好问题。

“什么意思？”我们问。

“哦，我拥有一个小游乐场，离这里只有几英里，我想找想挣点钱的大小伙子干活儿，我拿到了轮盘赌的许可证，还有套木圈的许可证，你懂的，就是那种靠运气套住娃娃的东西。如果你俩为我工作，可以拿到百分之三十的利。”

“住宿和伙食呢？”

“你们可以有床位但是没伙食，你们得去镇上吃，有时候我们会去别处巡回。”我们想着这主意。“这是个好机会。”他说，很有耐心地等着我们的决定。我们觉得有点傻，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当然不想待在一个游乐场里。我想尽快地去丹佛和我的朋友们会合。

我说：“我不知道，我正迫不及待地赶路呢，我想我没那时间。”埃德说了差不多的意思，那哥们摆了摆手，不急不忙地退回到车里，开车走了。这事儿就这样了，我们为此大笑了一会儿，想着如果那样的话是个什么情形。我眼前浮现出黑漆漆、尘埃漫天的平原之夜，到处晃悠的内布拉斯加来的一家人的脸蛋，那些孩子们看到什么都新奇不已，我知道如果我用游乐场那些鬼把戏去骗他们几个钱，我肯定会挺有罪恶感的，还

有摩天轮在大平原的黑夜中静静地转着，还有，全能的上帝啊，旋转木马上哀怨的音乐，但我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行——我想睡在镀金马车的粗麻布床上。

事实证明，在路上，埃德是个不怎么有心眼儿的旅伴。一个老头开着一辆奇怪的破烂车经过，它是用铝板做成的，像个方方的盒子——毫无疑问，这也是辆拖车，但是个古怪的、内布拉斯加家庭自制的拖车。他开得很慢，停了下来，我们追了上去，他说他只能带一个人，埃德二话不说跳了上去，然后就从我眼前慢慢消失了，穿着我的格子花呢衬衫，好吧，呜呼哀哉，我和我的衬衫吻别。它仅仅具有感情上的价值而已。我在令人恶心的谢尔顿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好几个小时，我总觉得天快黑了，实际上那只是中午过后不久，但是天很阴沉啊，丹佛，丹佛，我怎么才能到达丹佛？我差不多快绝望了，正打算找个地方喝杯咖啡，一辆崭新的车停了下来，一个特别年轻的人开着那车，我疯狂地冲向它。

“你去哪儿？”

“丹佛。”

“行啊，我可以带你一百英里的路途。”

“太棒了，太棒了，你救了我的命。”

“过去我也常搭便车，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总让人搭我的车。”

“如果我有一辆车，我也会的。”而后我们聊起天来，他跟我说了他的生活，听起来有点闷，我开始打起盹来，醒来的时候正好到达哥德堡，他让我下车了。

4

我平生最伟大的一段旅程即将到来，一辆卡车，后边拖着个平板车，有差不多六七的小伙子趴在上面，司机是两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金发年轻农民，他们一路把所有孤零零的人都弄到车上——去哪里找这么两个笑眯眯、兴高采烈又英俊的乡下人呢？他们都穿着棉衬衫和工装裤，没别的，都有健壮的胳膊，实诚的态度，对经过他们的任何人任何事物总是带着那种“你好啊”的笑容。我跑了上去，问：“还有地儿吗？”他们说：“当然，上来！人人都有地方。”

卡车快要开了我都还没能上去，我踉踉跄跄地被车上一个人伸手拉了上去，我坐下来，有人递给我一瓶劣质酒，只剩下个瓶底儿了，我在内布拉斯加狂野、诗意而又细雨缠绵的空气中使劲喝了一大口，“哇哦，走啦！”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孩喊道，他们把马力开到七十迈每小时，超过了路上的任何一辆车。“从得梅因开始我们就搭这狗娘养的车了，这帮家伙从来

不停车，你要尿尿的话得使劲儿喊，不然你只能从车上往外撒尿了，扶稳，哥们，扶稳。”

我环视着车上的人们。有两个北达科他州来的戴红色棒球帽的年轻农民，戴着典型的北达科他州青年农民样式的帽子，他们在找收割季的零工打，他们的老爹们允许他们在夏天四处逛逛。还有两个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年轻的城里男孩，他们是高中橄榄球队队员，他们一边眨着眼睛一边嚼着口香糖，在风中歌唱，他们说要乘着暑假在全美搭便车晃一圈，“我们要去洛杉矶！”他们叫嚷着。

“你们去那儿干吗？”

“嗨，不知道，管他呢！”

还有一个身量细长的家伙看起来鬼鬼祟祟的。“你从哪儿来？”我问。我在平板车上挨着他躺着，因为车上没有栏杆，你无法坐着，那样随时可能掉出去。他缓缓地转向我，张开嘴，说：“蒙一大一拿。”

最后是密西西比的吉恩和他的小跟班。密西西比的吉恩是个总扒拉货火车车厢全国乱跑的黑瘦小子，说是有三十岁了但看起来要年轻一些，所以你无法断定他到底多大。他盘着腿坐在平板车上，能好几百英里一直盯着田野一言不发，最后在某个时间点他终于扭头问我：“你去哪儿？”

我说丹佛。

“我有个姐姐在丹佛，但我好多年没见过她了。”他的话语充满韵律，语速和缓。他很有耐心。他的小跟班是个十六岁的高个儿金发男孩，也穿得跟个流浪汉似的，也就是说，他们原本就破旧的衣服，被铁道上的煤烟，厢式车上的灰和随地而睡的习惯给弄得更加不堪了。那个金发男孩也是沉默寡言的样子，看起来像在躲开什么，从他前倾的脑袋、忧心忡忡地咬湿嘴唇来看，他要逃开的也许是法律问题。蒙大拿那个瘦子时不时地带着讥讽而曲意奉承的笑脸，跟他们搭讪。他们几乎不搭理他。瘦子实在太谄媚了，我有点担心他总是直愣愣地冲着你，长时间露齿傻笑，看着有点疹人。

“你有钱吗？”他问我。

“哪有，也许到丹佛之前，我的钱只够买一品脱威士忌，你呢？”

“我知道去哪儿弄点钱。”

“哪儿？”

“随便哪儿，你在小巷子总能把别人撂倒，对吧？”

“对啊，我猜你行。”

“我实在缺钱的时候，也不是干不出来的。我去蒙大拿看我爸，我到夏延后必须脱掉这身破烂，换上一身齐整点的衣服。这些疯疯癫癫的男孩是去洛杉矶的。”

“直接去？”

“没错——如果你想去洛杉矶，你可以搭他们的车。”

我想了想，彻夜赶路穿过内布拉斯加和怀俄明，次日一早可以到达犹他沙漠，下午可望抵达内华达沙漠，实打实地在可以预见的时间之内到达洛杉矶，几乎就要改变我通盘的计划。但我必须去丹佛，而且必须在夏延下车，向南再走九十英里到丹佛。

我很高兴那两个开大卡车的明尼苏达农家小伙子打算在北普拉特逗留片刻，吃点东西，我想看看他们。他们从驾驶室出来，对每个人微笑。“嘘嘘时间！”其中一个说。“吃饭时间！”另外一个说。只有他俩是这伙人里面有钱买东西吃的。我们尾随着他们进入一家一个胖女人经营的餐馆，坐在汉堡和咖啡跟前，他们席卷了一大堆食物，就跟回到了自己妈妈的厨房似的。他们是亲兄弟，他们把农业机械从洛杉矶贩运到明尼苏达，没少挣钱。所以在他们空车去往东岸时，路上就会把所有能遇到的人搭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差不多五次了，乐此不疲，他们什么都喜欢，从未停止微笑。我试着和他们聊天——一种冒冒失失的想要和我们船的船长示好的念头——我得到的回报唯有两张灿烂的笑脸和嚼惯玉米的雪白的大板牙。

所有人都跟他们进了餐馆，除了那两个流浪汉，吉恩和他的小跟班。当我们回来时，他们还是坐在卡车上，看起来既凄凉又惆怅。天将黑下来，司机们在抽烟，我想抓紧时间去买瓶

威士忌好在夜里的冷空气中抵御寒冷，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笑着说：“去吧，快去快回。”

“你们也可以喝两口！”我许诺他们。

“哦不，我们从不喝酒，你去吧。”

蒙大拿那个细高个儿和两个中学生，陪着我在北普拉特的街上闲逛，直到找到了一家卖威士忌的小卖店。两个中学生出了点钱，高个儿也出了点，我买了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威士忌。一些高大而面色阴沉的男人从我们身边路过，主街上布满了方方正正的建筑物，面上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在每条忧郁的街道后头，都通向了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我觉得北普拉特的空气中有不同寻常的气息，开头的时候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五分钟后才恍然大悟。我们回到大卡车那儿，车很快启动了。天迅速黑了下来，我们大家轮流喝了口酒，我再抬头一看，普拉特旷阔的农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你一眼望不到头的、平坦的荒地和杂草，我很惊讶。

“这是怎么回事？”我冲大高个儿嚷嚷。

“这是牧场，哥们，给我再来一口酒。”

“哇哈哈！”两个中学生大声叫唤，“哥伦布，再见啦！如果斯帕基和他的那帮哥们在这里的话，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耶！”

前面的司机调换了位置，新手司机兄弟把油门飙到头。道路也有了变化，中间隆起，两头松软凹陷，两边各有一条四英尺深的沟，卡车弹了起来，从路这侧蹦到另外一侧——神奇的是那时正好没有车从对面开来——我感觉我们都在翻筋斗。但他们是了不起的司机。他们开着车对付内布拉斯加树桩的能耐不小——这类树桩蔚为壮观地散布在科罗拉多！很快我意识到我们可能已经在科罗拉多境内，虽然并非正经八百地进入，但向着西南方向望去，丹佛仅在几百英里之外。我开心地叫嚷着。我们轮流传着威士忌酒瓶。天上的繁星闪现，不停后退的沙地逐渐模糊。我感觉自己像一支离弦之箭。

而后，密西西比来的吉恩突然从他盘腿冥想当中醒来，扭头凑近我，对我说：“这些平原让我想起了得克萨斯。”

“你是得克萨斯来的吗？”

“不，先生，我来自密西——西比，格林——威尔。”他说话的风格就是如此。

“那个男孩哪儿来的？”

“他在密西西比惹了点麻烦事，我帮了他一把。这孩子从没自己出过远门。我尽量去照顾照顾他，他毕竟只是个孩子。”吉恩虽然是个白种人，却有着见过世面的黑人的某些智慧，这部分很像纽约的瘾君子埃尔默·哈塞尔，只不过是个铁道上的哈塞尔，漂泊无定的史诗般的哈塞尔，每年横穿两次这个国家，冬天在南方，夏天在北方，因为他没有定居之所，他

才不感厌倦，因为无处可去就等于去哪儿都行，他总是在星空下行进，往往是西部的星空。

“我去过几次奥格登，如果你想去奥格登，我在那儿有几个朋友，可以找到住的地方。”

“我要从夏延去丹佛。”

“嗨，不如直接去奥格登啊，你不是每天都有机会搭上这样的顺风车的。”

这也是个不错的诱惑，奥格登有什么？“奥格登怎么样？”我问。

“那是个大部分哥们必经之地，他们在那儿见人，你可以在那里见到任何人。”

早年间，我曾经和一个家伙，一个叫哈泽德的瘦高个儿去过海边，威廉·霍姆斯·哈泽德，他选择做一名流浪汉。他还是个小男孩儿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流浪汉来和他的母亲要一小块馅饼，她给了他，当那个流浪汉往街上走去时，这个小男孩问：“妈，这家伙是干吗的？”“哦，他是个流浪汉。”“妈，有一天我也要当流浪汉。”“闭嘴，这不是哈泽德家的人该干的事儿。”但他再也忘不了那天，长大后，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打了一段时间橄榄球之后，他成了个流浪汉。瘦高个儿哈泽德和我厮混了好几个晚上，讲故事，把烟叶嚼烂了之后，吐到纸叠的小容器里。密西西比吉恩身上有好多

东西让我唤起了对瘦高个儿哈泽德的回忆，于是我问他：“你会不会凑巧在哪儿见过一个瘦高个儿叫哈泽德的家伙？”

他说：“你是说有个喜欢哈哈大笑的高个子？”

“对哦，这听起来像是他，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斯顿。”

“没错，他有时候被喊成路易斯安那瘦子，对的先生，我肯定见过瘦高个儿。”

“他在东得克萨斯油田干过活儿？”

“东得克萨斯没错了，他现在在看奶牛。”

看起来真是凑巧极了，我还不相信吉恩真的认识瘦高个儿，这个多年来我一直在打听他下落的人。“他是不是还曾在纽约的拖轮上干过活儿？”

“哦，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猜你只在西部见过他。”

“差不多，我还从没去过纽约呢。”

“好吧，该死的，你认识他真让我惊讶。这么大个国家，好吧我知道你肯定认识他。”

“是的，先生，我跟瘦高个儿还挺熟的。他有钱的时候总是出手大方，但也是个难搞的家伙；我见过他在夏延把一个警察一拳打倒在地，就一拳。”那听起来确实像瘦高个儿的做派；他总是冲着空气练习打拳；他看着像杰克·邓普西，年轻、爱喝酒的邓普西。

“妈的！”我迎风大叫，我又喝了一口酒，迄今为止，我感觉特别好。每一口酒都有被迎面而来的敞篷卡车上的风吹散，吹掉了坏感觉，把好感觉留在我胃里。“夏延，我来啦！”我叫道：“丹佛，等着吧。”

蒙大拿瘦子扭头看向我，指着我的鞋，评论道：“信不信你把那东西埋到土里，它会发芽？”——当然了，他面无表情地那么说的，其他人见状大笑。那确实是全美最傻气的一双鞋，我买它只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在炎热的路上冒脚汗，特别是在多雨的比尔山一带，那确实是我在旅途中鞋子方面的最佳选择。于是我和他们一起凑趣大笑，这双鞋已然破烂不堪，小块小块的染色牛皮已经像新鲜菠萝一样竖起，我的脚趾头从里边露出来，好吧，我们又喝了一轮又爆笑了一会儿。如同做梦一般，我们穿行过了镇上黑暗中的十字路口，从一群群行走在夜路中的农忙帮手和牛仔边上路过，他们对匆匆而过的我们惊鸿一瞥，而后我们听到他们从镇子另一头，茫茫的黑夜中传来拍大腿的声音——我们是多么可笑的一群人啊。

有不少人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到这一片来找活儿，这是农忙季节。达科他来的两个小伙儿坐不住了：“等下次嘘嘘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下车去，看来这一带有不少活儿可以干。”

“你们需要做的只是等到这里的活儿干完后，向北移动，”蒙大拿瘦子提议说，“你们可以追随着收割季一直到加拿大。”两个小伙儿迷迷糊糊地点点头，他们对于他的提议有点模棱两可。

那时，那个年轻的金发流亡者始终保持着同一坐姿，吉恩则时不时地在迅速转向黑暗的平原，从恍恍惚惚的冥想状态中跳脱出来，对他身边的男孩温柔地耳语几句。那男孩一边听一边点头。吉恩照料着他的情绪与恐惧，我想知道他们他妈的到底要去哪里，以及去干什么。他们没烟，我给他们散了一整盒，我太喜欢他们了。他们既开心又感激，即便他们从不开口要烟，我也不住地给。蒙大拿瘦子有烟，但他从不分发给大家。我们经过了又一些镇上的十字路口，又从一群高高瘦瘦、牛仔打扮的男人边上路过，在微光中，他们如同沙漠中的蛾子一般聚在一起。再说那无边无际的暗夜，头顶上的星星既纯洁又明亮，据说是空气稀薄的缘故，我们行进在西部的高地上，差不多每多开一英里，地势就升高一英尺，而且四周没有任何树木会掩盖住低处的星星。有一回，我看到了一张神情忧郁的白脸奶牛的脸，从路边飞驰而过的鼠尾草丛中闪现。那感觉就像在坐火车，一样的平稳，一样的直接向前。

渐渐地我们进入了一个镇子，车速慢了下来，蒙大拿瘦子说：“哈，嘘嘘时间，”但那两个明尼苏达人置若罔闻，他们停也不停，继续往前开。“他妈的，我得去尿尿，”瘦子喊道。

“到一边去尿吧。”有人说。

“是的，我会的。”他说，慢慢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挪到了平板车的后部，尽量稳住，直到他的两只脚在空中晃来荡去。有人敲了敲驾驶室的窗门，让那两兄弟留意一下这个情形。他们转过头来，大笑的脸僵住了。正当瘦子打算开始尿尿，身体已经失去了平衡，他们猛地把卡车提速到每小时七十迈，还歪歪扭扭地蛇行着。他向后摔了个大马哈，我们看到空中有一道鲸鱼喷水的痕迹，他挣扎着坐下。他们又晃了一下卡车，哇哦，他侧身倒下，全尿到自己身上了。在排山倒海的哄笑中，我们听到他小声咒骂，像山的另一头传来的一个男人嘟嘟囔囔的低语：“妈的……妈的……”他压根不知道我们是故意找他麻烦，只是像《圣经》中的约伯一样隐忍而继续奋争。当他完事之后，全身都湿透了，他还得晃晃悠悠地回到原先的位置上，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又惹来众人一通哄笑，除了那位忧伤的金发少年，明尼苏达的两个哥们儿在驾驶室笑得打滚。我递给他酒瓶子让他舒服点儿。

“这他妈咋回事？”他说，“他们是故意的吗？”

“那还用说。”

“好吧，该死的，我不知道，我过去在内布拉斯加这么干过，没费这么大的劲儿。”

我们猛地进入了奥加拉拉镇，于是驾驶室内的两个家伙兴高采烈地喊道：“尿尿时间！”瘦子愠怒地站在卡车边，后悔错过了这么个机会。那两个达科他少年和众人告别，说他们打算从这里开始打收割的零工。我们目送他们消失在夜色之中，

去往镇子尽头亮着灯光的棚屋那头，一个牛仔打扮的守夜人说那里有人在招工。我不得不去买更多的香烟，吉恩和金发少年跟我一道去，顺道舒展舒展筋骨。我走入了世上最不堪的一个破地儿，荒僻的大草原上，一个专门卖给当地年轻人饮料的一间小卖店。他们当中的几个正在跳舞，就着投币点唱机的音乐声。我们进去时，里面安静了片刻，吉恩和金发少年只是站在那里，两眼放空，他们只想要香烟。那里也有些漂亮姑娘，其中一个盯着金发少年但他浑然不觉，他是那么忧伤而心不在焉。

我给他俩各买了包烟，他们向我道了谢。卡车就要开了，这已经是半夜三更了，很冷。吉恩，他横穿这个国家的次数他用手指头加脚趾头也未必能数完，他说这时候我们最好所有人都一起躲在那张大防水油布下，否则都要冻僵了。我们依计而行，加上剩下的酒，在气温降到零下，耳朵开始刺疼的情况下，保暖工作做得挺不错。随着海拔的增高，星星越发显得明亮。我们到达怀俄明境内了。我躺在平板车上，仰头望着璀璨的夜空，为自己度过的这段时间庆幸不已，我从比尔山跑到这里途经了那么漫长的一段路，我也为即将在丹佛遇到的不管什么情况而激动不已——管他呢，不管会是什么。而后密西西比的吉恩开始唱歌，用他悦耳、沉静的嗓音，带着大河流域的口音，歌词相当简单，诸如“我得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正当十六岁的豆蔻年华，她是你见过的最漂亮的小东西”。而后重复唱着这段话，里边还插入了一些词句，都是关于他如何远行，以及他是多么想回到她身边，然而还是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我说：“吉恩，这是首最美的歌。”

“我所知道的最美妙的一首。”他微笑着说。

“愿你去往你想去的地方，并一切如意。”

“我一直四处奔波，从没停下来过。”

蒙大拿瘦子睡着了，他醒来后跟我说：“嘿，老黑，我们一起去夏延转转怎么样？在你去丹佛之前。”

“没问题啊。”我喝得够多了，去哪儿都行。

卡车开进夏延郊外时，我们看到当地电台高高亮起的灯所发射出来的红光线，我们突然闯入了一群从人行道上涌现的人们当中。“见了鬼了，这是狂野西部周，”瘦子说。一大票生意人，肥胖的生意人穿着靴子和高顶阔檐呢帽，带着他们牛仔女工打扮的健硕的妻子们，在夏延木制栈道的人行道上欢腾奔忙；之后可以看到夏延新城区的长街上的路灯，但庆祝活动主要集中在旧城区。有人向天上放空枪，人群从酒吧到街上，拥簇得满满当当。我深感讶异，同时觉得挺荒唐的，我到西部后的第一眼，就看到了人们用如此荒谬的手法去保存他们引以为豪的传统。我们不得不跳下卡车，向大家道别；明尼苏达两小伙儿好像对在这里晃悠没啥兴趣。看到他们离去挺伤感的，我意识到再也不会见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但不就是这样吗？“你们今晚会上冻屁股的，”我警告说，“但明天下午进入沙漠，屁股又会被烤焦。”

“只要我们能平安度过寒冷的今夜，就没问题了。”吉恩说。卡车继续往前开，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没人留意到防水油布下这群滑稽模样的年轻人，他们像婴儿一样从襁褓之中望着镇子。我眼望着它离去。

5

我和蒙大拿瘦子开始去逛酒吧。我兜里还有差不多七美元，其中五美元被我在那天晚上傻乎乎地花光了。开头的时候，我们和一帮牛仔打扮的游客、油井工人和牧场主一起在酒吧、门道和人行道上瞎晃悠；而后我得顾着瘦子，他因为喝多了威士忌和啤酒，开始兴高采烈地乱跑：他是那样的酒鬼，喝多了两眼开始发直，然后随便跟一个过路的陌生人夸夸其谈。我进入了一家辣味馆子，女招待是墨西哥人，长得挺漂亮的。我吃了点东西，然后在账单后面给她写了首情诗。辣味小馆里一个顾客也没有，所有人都在别处喝酒，我让她把账单翻过来看一眼，她读了它并哈哈大笑。那是一首小诗，说的是我如何希望她跟我一道去看看夜晚的景致。

“我想去，小伙儿，但是我和我男朋友有约在先了。”

“你就不能甩了他吗？”

“不不，我不能，”她忧伤地说。我喜欢她那么说的样子。

“下回我还会再来，”我说。而后她说：“任何时候，孩子。”我继续待在那里，就为了看着她，然后又喝了一杯咖啡。她的男友阴沉着脸进来了，想知道她什么时候能下班。她蹦起来飞速地开始关门，我不得不离开了那地方。我离开时冲她笑了一下。外边的情形和先前一样乱糟糟，除了那些肥仔喝得比刚才更醉了，并开始大声嚷嚷，这挺滑稽的。人群中有戴着夸张帽饰的印第安酋长，他们在一帮喝得红通通的脸蛋当中严肃地行进。我看到瘦子踉踉跄跄地在那里走着，就过去找他。

他说：“我刚刚给我在蒙大拿的老爹写了张明信片。你能帮我找个邮筒，把它扔进去吗？”这是个奇怪的请求，他给了我明信片，而后继续踉踉跄跄地步入酒吧的旋转门。我拿着明信片，走向邮筒，飞快地看了一眼明信片上的字样：“亲爱的老爹，我周三回家，我一切都挺好的，希望你也如此。理查德。”这让我刷新了对他的印象，在他爹面前，他是多么柔和礼貌啊。我进了酒吧，跟他会合。我们挑了两个妞，一个年轻的金发美女和一个黑头发的胖妹。她们又笨又闷，但我们就是想泡她们。我们带着她们去了一家破破烂烂的正在打烊的夜总会，在那里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两美元，请她们喝威士忌，外加我们自己喝的啤酒。我越来越醉，啥也顾不上了，一切都美妙无比。我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那位金发小美女身上，我想方设法想搞定她。我搂住她，和她说话。那家夜总会关门了，我们

回到破落、尘埃满天的街上。我抬头望着天空，那些纯净、梦幻般的星星还在天上熠熠生辉。那两个姑娘要去公交车站，我们就都跟着去了。但她们显然是为了去见在车站等着她们的几个水手，其中一个是胖妞的堂兄，另外几个是他的朋友们。我对金发小美女说：“怎么样？”她说她想回家，她家在科罗拉多，挨着夏延南边。“我可以坐车陪你去。”我说。

“不，那辆车会停在高速边，然后我还得自己一个走过那片该死的草原，我整个下午都在盯着那片该死的地方看，夜里我不想再回到那里了。”

“哈，听着，我们可以在草原的野花间漫步。”

“那儿才没什么所谓的野花呢，”她说，“我要去纽约，我已经对这里恶心厌恶爆了，除了夏延没什么地方可去的，夏延什么都没有。”

“纽约也什么都没有。”

“纽约才不会呢。”她瘪了瘪嘴说。

公交车站的人多到排队到门口，各种各样的人等着车或者只是站在边上；包括很多印第安人，他们冷冷地看着所有的一切。金发小美女不跟我聊了，跑去和水手及其他人说话。瘦子坐在长椅上打瞌睡。我也坐在椅子上。这个公交车站的地板和这个国家任何其他地方都一样，满地都是烟蒂和痰迹，让这里展现着公交车站特有的忧郁气质。有一瞬间，这里看起来和纽约别无二致，除了它旷阔的外延，我喜欢死那里了。我后悔自

己没能让整个的旅程保持纯净，没能省下每分钱，并且磨磨蹭蹭，没有抓紧时间赶路。傻呵呵地腻着这个阴着脸的姑娘，花光了自己的钱，这让我恶心。我太久没有好好睡一觉了，连诅咒和骂骂咧咧的力气都没有；我把自己的帆布包当成枕头，躺在长椅上大睡。我在那儿一直睡到次日早上八点钟，就在梦游般的琐碎声响中、车站的嘈杂声中和几百号人来来往往的环境下。

我醒来后头疼得要死。瘦子跑了一一去蒙大拿，我猜。我到镇子外边去，那里有我从未见过的蓝色空气，远远地，落基山脉顶着落雪的山尖。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得火速赶往丹佛。首先，我吃了早饭，非常简朴的吐司、咖啡和一个蛋，然后我离开镇子到了高速路边上。狂野西部节还在进行中，他们开始了骑术表演，而后欢呼雀跃声又将席卷这里。我把它扔在脑后，我想快点儿去和我丹佛的小伙伴们会合。我穿过铁路线，到了两条去丹佛的高速路会合的一片棚户区。我选了靠近山区的那条路线，好沿路欣赏美景，就那么往前走。我搭上了康涅狄格州一个小伙子的老爷车，他正驾车旅行全国，沿途写生；他是东部一个编辑的儿子。他一路上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我因为喝酒和海拔而感到恶心，有一会儿我差点不得不把脑袋探出到车窗外去呕吐会儿。但他让我在科罗拉多的朗蒙特下车时，我已经恢复了正常，已经可以把我沿路的所见所闻说给他听，他祝我好运。

朗蒙特很美，在一大片古老的林木下，是一家加油站的绿油油的草地。我问加油站的员工我可不可可以在草地上睡一觉，

他说没问题。于是我把一件羊毛衫铺在地上，把脸贴了上去躺着，弯着一只胳膊，有那么一会儿，用一只眼睛遥望着阳光下落雪的落基山脉，我美滋滋地睡了两个小时，唯一不爽的是偶尔会有科罗拉多的蚂蚁前来骚扰。现在我在科罗拉多了！我开心无比地想着。妈的！妈的！妈的！我做到了！梦到了好多我在东部生活时的乱七八糟的梦，我从美妙无比的睡梦中醒来，在加油站的男洗手间洗了把脸，然后精神抖擞地走了出来，又在路边餐馆给自己要了一杯黏稠的冰奶昔，好让我热乎乎、备受折磨的胃降降温。

顺便说一下，一个非常漂亮的科罗拉多小姐给我打了奶昔，而且全程笑容满面，我十分感激，这多多少少弥补了我前一晚的遗憾，我对自己说，哦！丹佛将会怎么样呢！我踏上了那条滚烫的路，搭上了一辆由一位差不多三十五岁的丹佛生意人开的簇新的车。他将车速提到七十迈每小时，我一路上激动不已，我计算着每分每秒和余下的路程。就在前方，就在埃斯蒂斯雪山下的滚滚金色麦田之后，我终于看到了老丹佛。我在心里谋划着当夜在丹佛酒吧的场景，和我的老伙计们，在他们眼里，我会是相当陌生且一身破烂的，像那种不辞万里翻山越岭的先知，带来了黑暗的词句，而我带来的唯一一个字眼是：“哦！”那生意人和我进行了一段漫长而亲切的交谈，关于我们各自生活的愿景，不知不觉，我们经过了丹佛城外的水果批发市场，那儿有烟囱、飘起的烟、铁路货运场、红砖楼，我到了丹佛。他让我在拉里默街下了车。我带着世界上最诡异的笑容，在拉里默街上和那些老流浪汉、沮丧无比的牛仔们一起慢慢前行。

6

那时候，我和迪安没有现在那么熟，所以我先去找查德·金，我就是那么做的。我去了他家，和他妈妈聊天——她问我：“嘿，萨尔，你来丹佛干吗？”查德是个身量修长的金发小伙儿，长着一张巫医一样奇怪的脸，很像一个对人类学和史前印第安人感兴趣的人。他的鹰钩鼻线条柔和，在他金色卷发下显得十分温柔；他有着在路边餐厅表演舞蹈、偶尔打打橄榄球的西部艺人一样的俊朗优雅的气质，他说话带着颤抖的鼻音。“我永远感兴趣的事情是，萨尔，大平原印第安人总是在他们吹嘘自己剥过多少张带发头皮后，还感到不好意思。在罗克斯顿写的《大西部生活》一书中提到一个印第安人因为自己剥了太多带发头皮，觉得羞愧难当，以至于羞红了脸，他不得不跑到大平原里躲起来，在那儿偷偷地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暗自喝彩。他妈的，这让我觉得太逗了！”

查德的妈妈得知了查德的去向，在丹佛令人昏昏欲睡的下午，他跑到博物馆去研究印第安人的编筐技艺。我打电话到博物馆找他，他开着他那辆总是开去山区调研印第安人课题的老福特车来接我，他穿着牛仔装，笑眯眯地出现在公交车站。我坐在自己放在地上的包上，和那个在夏延车站见过的水手很相像的人搭讪，打听那个金发小美女的消息。他厌烦无比，几乎不搭理我。查德和我坐上他的小车，他干的第一件事儿是去州政府大厦取了一张地图，然后他还得去看他的一位老师，诸如此类，而我只想喝啤酒。我总是惦记着一件事，迪安在哪里，他这会儿在干吗？因为某个奇怪的缘由，查德已经不再视迪安为朋友，他甚至不知道迪安住在哪里。

“卡罗·马克斯在城里吗？”

“是的。”但他也再不和卡罗来往。这是查德·金慢慢地从我的朋友圈撤离的开始。那天下午，我想去他家里打个盹儿。他却说提姆·格雷在科尔法克斯大街上给我弄了套公寓，罗纳德·梅杰已经先行住了进去，等我去跟他会合。我感受到空气中有个微妙的阴谋，这个阴谋在我的朋友们当中画了一道拉帮结派的线：一边是查德·金、提姆·格雷和罗纳德·梅杰，另外还有罗林斯一家。他们心照不宣地打算孤立迪安·莫里亚蒂和卡罗·马克斯。我成了这场有趣的战争当中的磨子芯。

这场战争还有着社会问题的弦外之音。迪安是个酒鬼的儿子，他爹是拉里默大街上混得最惨的流浪汉，实际上迪安是拉里默大街的街坊邻居帮着抚养长大的。他年仅六岁时，就得去

法院申请让他父亲获释。他过去常常在拉里默大街的街上乞讨，弄点钱回去给他老爹，他爹则和一个老伙计一起坐在一堆空酒瓶当中，等着儿子回来。后来，迪安长大后，就开始厮混于格兰姆的台球厅当中；他创下了丹佛偷车和进劳教所次数最多的纪录，从十一岁到十七岁，他总是在少管所待着，他的特长是偷车，下午的时候追求从高中放学的女孩们，带着她们去山里兜风，搞定她们，然后回到城里任何一家能入住的旅馆浴缸里睡觉。他爸，一度是个备受人尊重且勤勉的铁匠，如今变成了个红酒酒鬼，这比威士忌酒鬼更糟糕，后来沦落成了一个冬天去田纳西、夏天回到丹佛的卡车司机。在他死去的妈妈这边有兄弟们——她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但她的兄弟们不喜欢他，迪安的好朋友都是他在台球厅结交下的哥们。具有新式美国圣徒的浩大能量，而卡罗是那个季节丹佛地下室的巨大怪兽，他们和迪安的台球厅哥们一起，这其中最美妙的象征是，卡罗在格兰格大街上租了个地下室，我们常常彻夜在那里聚会到天明——卡罗，迪安，我，提姆·斯纳克，埃德·邓克尔，还有罗伊·杰克逊，这些人容我慢慢说。

我在丹佛的第一个下午是在查德·金家里睡午觉，他妈妈在楼下操持家务事，他则在书房工作。那是高原炎热七月的下午，如果不是查德·金的父亲的发明，我恐怕没法睡着。查德·金的父亲是个很和善的好男人，七十多岁了，又老又虚弱，瘦瘦高高，说起故事来语气和缓、慢条斯理；挺好玩儿的故事，是关于他八十年代在北达科他平原如何度过自己童年的往事，那些年他骑在不带马鞍的小马身上，挥舞着棍棒追逐郊狼。之后，他就在俄克拉荷马的狭长地带，变成了一位乡村教

师，最后在丹佛成了个无所不能的商人。他至今在丹佛街上一个车库上头保存着自己的办公室——可翻盖的办公桌还摆在那里，连带着过往的兴奋和挣钱时期的蒙尘的文件。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空调，他把一台普通的风扇嵌在窗框里边，然后让冷水进入飞速旋转的风叶前的线圈内，效果相当不错——在风扇跟前四英尺的范围内——在热天里，显然变成了蒸汽，而房子楼下的部分依然和平常一样热。但我睡在正对着风扇的查德的床上，一尊巨大的歌德半身雕像盯着我，我无比舒服地入睡，但是二十分钟后生生冻醒了，我盖上一条毯子但还是觉得冷。最后，实在太冷了，我无法再睡，只好下了楼。那老头问我他的发明管不管用，我说太他妈棒了，我说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喜欢那老头儿，他全靠回忆活着：“我做过一种去污剂，后来被东部的大公司疯狂仿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收集收集证据，只要我能拿出足够的钱，供得起一位厉害的律师……”但是，已经来不及供得起一位厉害的律师了，他只好沮丧地坐在自己的房子里。当晚，我们在一起吃了极好的一餐，他妈妈做的，包括查德的叔叔在山里猎得的鹿排，但是迪安在哪儿呢？

7

接下来的十天，正如W.C. 菲尔兹所说的：“充满了明显的危险”——而且疯狂。我和罗纳德·梅杰搬进了属于提姆·格雷的亲戚的一个堪称时髦的公寓。我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卫生间，公寓厨房里有个装着食物的冰箱。在巨大的起居室，梅杰披着自己的丝绸晨衣，埋头创作自己新近写的海明威式的短篇——一个暴脾气、红脸蛋、胖乎乎、嫉恨一切的人，但当真实生活在深夜甜美地待他时，他也会立刻流露出最温暖最有魅力的微笑。他整日坐在他的桌前，我则在又厚又软的地毯上蹦来蹦去，仅穿着我的斜条纹短裤。他刚写完一篇一个第一次到丹佛的人的小说，他的名字叫菲尔。他的旅伴是个神秘、寡言少语的家伙，叫山姆。菲尔外出周旋于丹佛一帮附庸风雅的人堆里，他回到旅馆房间，闷闷不乐地说：“山姆，这儿也有这号人。”山姆只是忧郁地望着窗外，“是的，”山姆说，“我知道。”重点是山姆无须外出，去了解他们。假装文艺范儿的人

在美国比比皆是，吸干净了他的血。梅杰和我是好哥们，他认为我绝对不是个附庸风雅之辈。梅杰热爱好红酒，就像海明威。他回顾自己最近的法国之旅，“哈，萨尔，如果你能和我一起高高地坐在巴斯克乡村，手拿一瓶冰镇的普瓦尼翁十九，你就会知道世上除了厢式货车，还有别的一些什么”。

“我知道，只是我热爱厢式货车，我喜欢上面写的字眼儿，诸如‘密苏里太平洋’‘大北方’‘岩岛线’。苍天作证，梅杰，如果我能告诉你我一路上搭车时遇到的所有事情的话。”

罗林斯兄弟住在几个街区开外。那是个欢乐的家庭——一位年轻的母亲，一个破旧不堪、鬼镇似的旅馆的部分所有者，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最难管教的儿子是雷·罗林斯——提姆·格雷的发小，雷嚷嚷着进屋，我们第一眼就对彼此有了好感。我们一起到科尔法克斯酒吧去喝酒，雷有个妹妹是个叫贝比的金发美女——她打网球，玩冲浪，是西部女郎无疑。她曾是提姆·格雷的女朋友。而梅杰只是途经丹佛，气派十足地住在公寓里头，和提姆·格雷的妹妹贝蒂一起出去玩儿。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女孩的人，我问每个人：“迪安在哪里？”他们全都笑称不知道。

终于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是卡罗·马克斯打来的。他给了我他地下室住处的地址。我问他：“你在丹佛干吗？我的意思是你正在做些什么？一切如何？”

“哦，等着我来告诉你吧。”

我飞速地跑去见他，他在梅斯百货公司上夜班；疯狂的雷·罗林斯从一个酒吧给他打电话，让酒吧看门人追着卡罗说有个人死了。卡罗第一时间觉得死的人是我。而后罗林斯在电话里说：“萨尔在丹佛呢。”然后给了他我的地址和电话。

“迪安人呢？”

“在丹佛啊，让我告诉你吧。”然后他告诉我迪安同时和两个女孩做爱，一个是玛丽露，即将成为他的前妻，她在一个旅馆房间里等他，另外一个年卡米尔，一个新认识的女孩，她也在一个旅馆房间等着他。“在这两个女人的间隙，他抽空来看我，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那是个什么事业？”

“和我一起进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阶段，我们试着以绝对的诚实和绝对巨细无遗地将彼此脑子里的念头，相互沟通。我们为此不得不服用了安非他命。我们坐在床上，盘着腿，面对面。我最终教会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成为丹佛的市长，和一个大富婆结婚，或者成为兰波之后最伟大的诗人。但他还总是喜欢蹿出去看小型赛车比赛，我也和他一起去了，他又蹦又嚷嚷，兴奋无比。你知道的，萨尔，迪安总是喜欢凑那类热闹。”马克斯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陷入了对这件事的沉思之中。

“他有些什么安排？”我问，迪安的生活中永远有些具体的安排。

“是这样的：半个小时前我下班了，那会儿迪安正在旅馆里和玛丽露搞搞，给了我换衣服的时间。一点整，他从玛丽露那里跑到卡米尔那里——当然了，这两个女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和她来一发，给了我一点半到那儿的时间。然后他和我一起出门了——开头的时候他得求着卡米尔，她已经开始恨我了——然后我们一起跑到这里聊到早上六点。我们通常待得比那样还久，但实在太尴尬而复杂了，他的时间总是那么紧迫——明天他得四处跑上一天，为他们的离婚准备资料。玛丽露就等着离婚这一出了，但她还是坚持在此期间，他们继续啪啪，她说她爱他——卡米尔也这么说。”

他告诉我是如何遇上卡米尔的，罗恩·杰克逊，台球厅小子，在一家酒吧发现了她并把她带去个旅馆；他为此扬扬自得，请这一大票人去看她。所有人都围坐在那里和卡米尔说话。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窗外。当大家离开房间后，迪安只盯着卡米尔看，并伸手摆出一个“四”的手势（意思是他四点后回来），然后就走了。三点钟，门为罗恩·杰克逊紧闭，四点一到，她为迪安开了门。我想赶紧出门去和那个疯子碰面。而且他许诺会为我安排妥当，他认识丹佛所有的女孩。

卡罗和我走在丹佛夜里惨淡的街道上。空气柔软，星光璀璨，鹅卵石铺就的地面看起来如此入眼，让我恍若梦中。我们去了迪安正和卡米尔厮混的寄宿房。那是一座古老的红砖建筑，环绕着木制车库的栅栏后露出老树。我们走上铺了地毯的楼梯。卡罗敲了门，然后躲到后面，他不想让卡米尔看到他。我站在门前，迪安开了门，浑身上下光溜溜的，我看到床上有

个黑发美人儿，雪白光滑的大腿上穿着黑色网眼袜，她用带着野性的眼神看着我们。

“噉，萨——尔。”迪安说，“好吧现在——啊——啊哈——对哦，当然了，你来了——你这个狗娘养的终于走上了这条老路。好吧，现在，看看这儿——我们必须——对的，对的，尽快——我们必须，我们真的必须！现在，卡米尔——”他转身对她说：“萨尔来了，这是我从纽——约来的哥们，这是他来丹佛的第一个晚上，我绝对必须带他出门，给他安排个姑娘。”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现在是，”他看了看手表，“正好一点十四分，我应该是正好三点十四回来，我们要在一起回忆回忆往事，过去的美妙时光，亲爱的，然后，你知道的，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们也谈妥了，我得去见见那个一条腿的律师，关于那些文件——大半夜的，听起来有点儿怪，但我已经完全解释清楚了。”（这是为了让他去见还躲着的卡罗打掩护用的。）“现在这分钟我得换衣服，穿上我的裤子，回到生活当中去，外边的生活，街上还有别的什么，正如我们谈妥的，现在是一点十五分，时间一直在奔跑，奔跑——”

“好吧，好吧，但请务必三点回来。”

“就像我说的，亲爱的，但记着不是三点是三点十四分。我们直接到达了彼此灵魂的最深处，最奇妙的部分，不是

吗？亲爱的。”他贴了过去，亲了她好几下。墙上挂着一张裸体画，包括他胯下耷拉着的大器物什么的，卡米尔画的，我很惊讶，所有的一切都这么疯狂。

我们迅速地进入夜色之中，卡罗在一个小巷子里和我们会合，我们路过了平生仅见的最为窄小、奇怪和弯弯绕绕的城市小巷，是在丹佛墨西哥区。在像人们一样熟睡的静寂街道，我们大声喧哗。“萨尔，”迪安说，“我让个姑娘在这会儿等着你——如果她已经下班了的话。”（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一个女招待，丽塔·贝腾库特，是个好娘们，只是在性上头过去有点儿小障碍，我试图帮她正一正，但我想你是可以搞定的。你是个中高手啊。所以我们快点过去吧！我们应该带点啤酒，不，他们自己有啤酒，妈的！”他一边说一边跟自己击掌。“正好我今晚还要去会会她的姐姐玛丽。”

“什么？”卡罗问，“我还以为我们要去聊聊天呢。”

“是的，是的，在这之后。”

“哦，你们这些丹佛的闷蛋！”卡罗向着天空嘶吼。

“他是不是世上最棒、最好的哥——们？”迪安说，暗暗戳了几下我的肋骨，“看看他，看看他！”而卡罗开始在街上跳起了猴子舞，我在纽约其他地方见他跳过好多次。

我能说的仅有：“好吧，那我们他妈的在丹佛到底要干什么？”

“明天，萨尔，我知道我能在哪儿帮你找份工作，”迪安说，又把舌头撸成商务范儿，“我会去找你，一旦我能从玛丽露那里逃开一个小时，我就会直奔你住的地方，跟梅杰打个招呼，带你坐上电车（靠，我没车）去卡玛戈市场，在那儿你可以立马开始工作，周五就能拿到一张薪资支票。咱这些人都穷得叮当响，我好几个礼拜都没空工作。周五晚上咱仨——我们三个老伙计卡罗、迪安和萨尔——铁定要去看场小型赛车，城里有个哥们可以让我们搭车去干那件事儿……”就这样，我们一直聊到了深夜。

我们去了那对女招待姐妹住的房子，给我准备的那妞还在工作；迪安要的姐姐在。我们坐在她的沙发上，我早就计划好了这个时间点要给雷·罗林斯打电话，我就打了。他火速出现了，进了门，脱掉了衬衣和背心，就开始搂着那个纯粹的陌生人——玛丽·贝腾库特。酒瓶子在地上滚来滚去。三点到了，迪安冲出去和卡米尔厮混了一个小时。他按时回来。另外一个妞准时出现了。我们现在需要一辆车，我们制造了太多的噪音。雷·罗林斯喊了一个有车的哥们。他来了。我们都挤进了车里；卡罗在后座上想如约和迪安聊一聊，但是车里乱糟糟的。“咱们都去我那儿吧！”我喊道。大家同意去了；车子一停，我就跳出来，在草地上来了个倒立。我所有的钥匙都掉了出来，我找不到它们了。我们奔跑着，嚷嚷着，进入楼里。罗兰·梅杰穿着他的丝绸晨衣，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不能让你们在提姆·格雷的公寓里瞎胡闹！”

“什么？”我们一起叫嚷起来。一片闹哄哄的。罗林斯和其中一个女招待在草地上翻滚。梅杰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本该给提姆·格雷打个电话，跟他确认这个派对，也喊他过来。但我们没有那样，又全都跑回丹佛的大街上瞎晃悠。我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了，兜里一分钱也没有。我的最后一美元也花掉了。我从科尔法克斯走了五英里，回到公寓舒适的床上。梅杰只能让我进去。我想知道迪安和卡罗是不是在继续玩他们“心心相印”的游戏。我回头会知道的。丹佛的夜里很冷，我睡得跟一段木头似的。

8

然后每个人都开始计划到山里长途徒步旅行一次。这是早上开始的，与此同时来了个意外的电话，把事情搞复杂了——我在路上的老友埃德，他误打误撞地来了个电话；他还记得我曾经提到过的几个名字。现在我有机会把我的衬衫要回来了。埃德和他的女朋友一起住在科尔法克斯郊外的一处房子里。他想问问我是否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工作，我让他过来，看看迪安知不知道。迪安行色匆匆地到了，正赶上我和梅杰草率了事地吃着早餐。他坐都不愿坐。“我有一千件事要去做，其实基本上没时间带你们去卡玛戈，但我们还是去吧，哥们。”

“等会儿我在路上认识的伙计埃德。”

梅杰看着我们这副猴子烧屁股的样子，觉得很逗乐。他来丹佛是为了慢悠悠地写作。他对迪安的态度十分与众不同，就是不屌他，梅杰对迪安这么说：“莫里亚蒂，听说你同时和三

个女孩上床？”迪安在地毯上一边拖着脚走路，一边说：“哦对啊，对啊，就是这样的，”他看着自己的手表，梅杰吸了吸鼻子。我觉得自己看起来心慌意乱，像个笨羊。梅杰总认为迪安是个白痴加笨蛋，他当然不是，我任何时候都想向所有人证明这一点。

我们和埃德碰了面，迪安不屑他，我们一起坐着电车，头顶着丹佛正午的炎炎烈日出去找工作，光是想想找工作这件事我都烦，埃德一如既往地喋喋不休。我们在市场见到个男人，答应雇佣我俩，工作是从早上四点钟开始一直干到下午六点。那男的说：“我喜欢敬业的男孩儿。”

“你得偿所愿了，”埃德说，但我对自己没啥信心。“我只能不睡觉了。”我说。可是还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要做。

埃德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我没去，我赖床了，梅杰买了许多吃的放进冰箱，作为交换，我得做饭和洗碗。那天晚上，因为罗林斯的妈妈出门去旅行，一个盛大的派对就在罗林斯家举办了。雷·罗林斯给他认识的所有人打电话，还让他们都带上威士忌；他又开始就着通讯录，给女孩们打电话。他让我负责和这些妞寒暄。来了一大票女孩。我给卡罗打电话打听迪安在干吗。凌晨三点迪安总会去找卡罗，我在派对之后也去了。

卡罗的地下室公寓在格兰特街一处教堂附近的红砖寄宿楼里，你从一条巷子走进去，走下几级石头台阶，穿过一个地窖似的所在，才会来到他的木板门前。那房间就像俄国圣徒的住所：一张床，点着根蜡烛，石头墙上渗着水珠，还有一尊他自

己胡乱做的圣像。他给我读了他写的诗，题目叫作“丹佛的闷蛋们”。卡罗早上醒来听到外边街上有几只“粗俗的鸽子”正咕噜咕噜地叫着；他看到“悲伤的夜莺”在树枝上打瞌睡，这让他想起了他妈。像有一块灰蒙蒙的裹尸布笼罩着整座城市。那些山脉，你从西部任何城镇都能看到的雄伟的落基山脉，就像“纸糊的”。整个宇宙看着只有疯狂、荒谬和透顶的古怪。他把迪安写成“彩虹之子”，一个将烦恼倾注于痛苦的鸡巴的人。他将自己夸大成“俄狄浦斯·埃德”，一个将“口香糖从窗玻璃上铲掉”的神。他在地下室主要就是在一大本日记前苦思冥想，把每天发生的每件事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把迪安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也都写了进去。

迪安还在履行自己的日程表。“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他宣布，“我将和玛丽露离婚，跟卡米尔结婚，然后和她一起住到旧金山去。但这只会在你和我，亲爱的卡罗，去了得克萨斯之后，我们去会会老布尔·李，那只我从未见过的失踪的猫，你们说了太多关于他的事儿了，然后我再去旧金山。”

而后他们开始干正事儿，他们盘腿坐在床上，直愣愣地盯着对方。我蜷在附近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们。他们从一个抽象的念头说起，讨论它；从彼此淡忘的过往事件中再提炼出另外一个抽象的念头；迪安为此道了歉，但他发誓他还会回到这个抽象的念头上来，把它安排妥帖，他还举了个例子。卡罗说“就像我们有一回穿过瓦泽大街，我想跟你聊聊我对你沉迷于小型赛车的看法，就那样，你还记得吧？你指着个穿着大裤兜裤子的哥们说他看起来就像你爸。”

“是啊，是啊，我当然记得；不单是那样，那还让我想到了一大坨别的事情，一些我必须告诉你的非常狂野的想法，我已经忘掉了，现在你提醒了我……”两个新的念头冒出来了，他们又开始讨论，而后卡罗问他是否诚实，是否从灵魂深处对他是彻头彻尾的诚实。

“你干吗又问这个问题？”

“那是我想知道的终极问题了——”

“但是，亲爱的萨尔，你在听，你坐在那儿，我们可以问问萨尔，看看他会怎么说？”

于是我说：“没有人能够抓到终极问题，卡罗，终极问题是无人能及的。我们总是满怀希望地活下去，想要抓住它一小会儿。”

“不，不，不，你说的完全是屁话，是沃尔夫式的浪漫时髦！”卡罗说。

迪安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我们应该让萨尔有他自己的见解，事实上，你不觉得，卡罗，他坐在那里探究我们的样子，带着某种威严吗？这只疯猫跨过整个国家来到这里——老萨尔不会说的，老萨尔不会说的。”

“这不是我会不会说的的问题，”我反唇相讥，“我只是不知道你俩在琢磨啥，没法知道个究竟。但我知道你们的要求没人能够办到。”

“你说的一切都是消极的。”

“那你们想干吗？”

“告诉他。”

“不，你告诉他。”

“没什么可说的，”我大笑着说。我戴着卡罗的帽子，拽下帽檐遮住眼睛。“我想睡一觉，”我说。

“可怜的萨尔总是想睡觉。”我默不作声，他们又开始了。“那回你找我借了五美分，好凑够买炸鸡排的钱——”

“不，哥们，是辣子鸡！你记得吗？在得克萨斯之星。”

“我把它和礼拜二的事情搞混了。当你跟我借那五美分的时候，你现在给我听着，你说，‘卡罗，这是我最后一次麻烦你了，’就像是，跟真的似的，你说得好像我和你谈清楚了你再也不麻烦我了似的。”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再好好回顾一下，我亲爱的伙计，玛丽露在房间里哭的那一晚，我转向你，用我装模作样做出来的真诚语调跟你说话，我们都知道那是假的，但非得那样不可，那就是，我用我的演技表明——慢着，不是那样的。”

“当然不是那样了，因为你忘光了——但我不想再指责你了，是的，我就是那么说的……”他们就这么扯着车轱辘话直

到深夜。大早上我抬起头，看到他们正商议早上要干吗。“当我跟你说我得睡一觉，因为玛丽露，今天早上十点钟我得去跟她见一面，我并没有非跟你说的大可不必睡觉对着干，但是只是，只是，你知道的，因为我确实绝对、仅仅、单纯地、无论如何都得睡了现在，我是说，哥们，我的眼睛困得睁不开了，它们又红又涨，酸疼，疲倦，直跳……”

“啊，孩子，”卡罗说。

“我们现在必须得睡了。我们歇了吧。”

“不许歇！”卡罗尖声嚷嚷。最早起床的鸟儿开始叫了。

“现在，我一旦抬起手，”迪安说，“我们就别再说话了，我们都全然知道、毫无障碍地知道我们只是不再说话了，我们只是去睡觉。”

“你不可以就这样歇了去。”

“别再折腾了，”我说，他们看着我。

“他一直醒着呢，听着呢，你怎么想，萨尔？”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真是匪夷所思的疯子，我花了整个晚上听他们胡言乱语，就跟看着一座像伯绍德山口那么高的钟表，但那是用最精细的工艺制作出来的，世界上最精确的钟表。他们笑了，我拿自己的指头指着他们说：“如果你们这么干下去，你们都要疯了，到时候记得告诉我。”

我走了出来，坐上一辆电车回我的公寓，而卡罗所说的“纸糊的”山脉，在打东边平原升起的大太阳照耀下，变得红彤彤的。

9

当晚，我参加了去山里的徒步旅行，整整五天没再见到迪安或者卡罗。贝比·罗林斯那个周末管她老板借了车。我们带着正装挂在车窗上，一路去往中部市，雷·罗林斯负责开车，提姆·格雷瘫在后座上，贝比坐在前头。那是我第一次进入落基山脉深处游览，中部市是个老矿镇，一度被称为世界上每平方英里的富饶之最，在山中闲逛的老暴发户在山中发现了一大片银矿。他们一夜暴富，在陡峭的山崖上，他们的棚屋当中盖了一座漂亮、小巧的歌剧院。莉莲·罗素去过那儿，还有欧洲来的歌剧明星。而后中部市成了鬼镇，直到新西部精力充沛的商会机构，打算重振这一带的雄风。他们将歌剧院修葺一新，每年夏天，大都会的明星们便前来演出。那成了所有人的度假胜地，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甚至包含了好莱坞明星。我们开着车上山，发现那些窄小街道上挤满了赶时髦的游客。我想起了梅杰提到过的山姆，梅杰说得没错。梅杰本人也来了，他对

所有人展露社交笑，对所有事情都报以“哦啊”“哈啊”之类的由衷赞叹。“萨尔，”他喊道，拽住我的胳膊，“看看这座古老的镇子，想想一百年前——他妈的，不过八十年、六十年前，他们居然有个歌剧院！”

“可不，”我说，模仿着他写过的一个人物的口气，“但他们就在这里。”

“混蛋，”他咒骂，而后他去找自己的乐子去了，贝蒂·格雷挽着他的胳膊。

贝比·罗林斯是个伶俐的金发美人儿。她知道城边上有个老矿主的房子，我们这些人夜里可以住进去，度过这个周末；我们只需将它打扫干净。我们还可以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派对。那是个破旧不堪的、堆了有一英寸厚灰的老房子；但它有回廊，后院还有一口井。提姆·格雷和雷·罗林斯撸起袖子，开始打扫起来，这让他们忙乎了整整一个下午外加晚上一段时间。但他们有一篮子啤酒，所以一切都相当不赖。

我呢，那天下午我去了歌剧院，贝比挽着我的胳膊。我穿着提姆的衣服，不过是几天之前，我衣衫褴褛来到丹佛；而今我穿戴得人模狗样，还带着个衣着光鲜的金发美人儿，冲着达官贵人弯腰示意，在水晶吊灯照耀下的休息室和人侃侃而谈。我想知道密西西比的吉恩看到我这般光景，会说些什么。歌剧的剧目是《费德里奥》，“多暗淡啊！”剧中的男中音唱道，从嘎吱作响的岩石地牢中缓缓升起。我为之落泪。这也是我感受到的生活，我对这个戏很是感兴趣，有那么一瞬间，我忘掉

了自己疯狂的生活环境，仅仅迷失在贝多芬创作的伟大而悲壮的声响，以及那伦勃朗般丰腴浑厚的色调中。“对了，萨尔，你喜欢今年的剧目吗？”丹佛·D·多尔在外边街上，骄傲地问我。他和歌剧圈子有些交集。

“多暗淡啊，多暗淡啊，”我说，“这绝对太棒了。”

“接下来你必须得干的一件事是去见见演员们。”他打着官腔说，但幸好他被其他事情席卷着，很快忘了这件事，人和事都消失了。

贝比和我回到矿工棚屋，我脱掉了外套，和小伙子们一起打扫卫生。工作量巨大。罗纳德·梅杰坐在前屋打扫干净的一块地方，袖手旁观。他跟前放着张小桌子，桌子上摆着他的一瓶啤酒和杯子。当我们在边上提着水桶、拿着扫把时，他正回忆往事。“啊，如果你们有朝一日能跟我一起一边喝着沁扎诺牌苦艾酒，一边听着班多尔乐师的乐曲，那才是生活应有的样子。然后是夏日的诺曼底，穿着木头鞋，喝着上好的陈年苹果白兰地。来吧，山姆，”他冲着他幻想出来的朋友喊道，“把泡在水里的酒拿出来，看看是不是足够冰了，我们钓鱼的时候可以喝。”看着像十足的海明威架势。

我们招呼着街上路过的姑娘们。“进来帮我们打扫卫生吧，晚上欢迎你们通通来参加我们的派对。”她们加入了我们。我们还有了一大帮帮着干活儿的人。最后，歌剧院合唱团的团员们，大部分是小孩儿，也跑来帮忙。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

我们一天的活儿差不多干完了，提姆、罗林斯兄妹们，还有我打算为了这盛大的夜晚要打扮一番。我们穿过镇子，跑到歌剧明星们居住的寄宿房。夜空中已经可以听到夜间表演开始了。“正好，”罗林斯说，“去搞点剃须刀和毛巾，我们也稍微收拾收拾自己。”我们还拿了梳子、古龙水和须后水，径直进入了浴室。我们全都一边洗澡一边唱着歌儿。“这可够棒的，”提姆不停地说，“用着歌剧明星们的浴室、毛巾、须后水，还有电动剃须刀。”

那是个无与伦比的晚上，中部市海拔高达两英里；开头的时候，你因为这个海拔迅速喝醉，而后开始感到疲乏，你的灵魂开始发烫。我们沿着暗暗的窄道，朝着歌剧院周边的灯光处走去；而后向右猛地拐个弯，进入了几家带着旋转门的老酒馆。大部分游客都听歌剧去了，我们要了几个特大号的啤酒。那里有一架自动钢琴，后门正冲着月光下的山景，我冲着那里大喊一声，夜幕徐徐展开。

我们回到自己的矿工棚屋，为了盛大派对所做的一切正井然有序地展开。女孩们，贝比和贝蒂，做了豆子和热狗当零食，我们疯狂跳舞，大灌啤酒。歌剧结束后，一大票年轻女孩涌入我们的地方。罗林斯和提姆还有我忍不住直舔嘴唇，我们抓住姑娘们开始热舞。那里没有伴乐，只有跳舞。那里挤满了人。开始有人带着酒瓶子进来。我们跑进酒吧买酒，又跑出来。夜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我希望迪安和卡罗也在——而后我意识到他们可能会与此格格不入，很不开心。他们像是那种

从嘎吱作响的地底下的石头里挣扎出来、阴郁的、卑微的美国人，我正逐渐融入人们所谓的垮掉的一代。

合唱团的男孩们出现了，他们开始唱起《甜蜜的阿德琳》，他们同时唱着诸如“递给我啤酒”和“你伸出脑袋来干吗”这类句子，他们当中的男中音发出了“菲——德——里——奥”的嚎叫。“啊，多么暗淡！”我唱道。女孩们相当出色，她们跑到后院，和我们耳鬓厮磨。在其他房间还有一些空床，那些尚未打扫、落满了灰尘的房间，我和一个女孩坐在床上，跟她说说着话，突然，歌剧院的一帮引座员闯了进来，他们抓住姑娘们就挨个儿亲嘴，粗鲁至极。青少年，喝多了酒，衣冠不整，兴奋异常——他们毁了我们的派对。五分钟之内，所有的女孩都跑光了，余下的时间更像是一个大学联谊会类型的派对，到处都是酒瓶子，人声鼎沸。

雷和提姆还有我打算去酒吧。梅杰走了，贝比和贝蒂也走了。我们踉踉跄跄地步入夜色之中。从歌剧院散场出来的人们将酒吧挤得水泄不通。梅杰站在人群当中大声嘶喊。那位热情万状、戴着眼镜儿的丹佛·D·多尔和每个人握手，并说：“下午好，你好吗？”到了深更半夜他依然说：“下午好，你好吗？”有一阵子，他和一位官员跑到外边去了；下一分钟他出现时，带着一位中年妇女；再下一分钟，他在街上和两位年轻的引座员聊天儿。过了一分钟他握着我的手，没认出我是谁，又说：“新年好，哥们！”他不因酒精而醉倒，他迷醉的乃是他最喜欢的这些——人潮如涌，所有人都认识他。“新年

好，”他叫道，有时候是“圣诞快乐”。他一直这么颠三倒四地说话。圣诞节一到，他会说“万圣节快乐”。

酒吧里有个受众人尊敬的男高音，丹佛·多尔总想让我去见他，我却总是退避三舍；他似乎叫邓南遮或别的什么。他老婆和他在一起。他们孤僻地坐在一张桌子边上。酒吧里还有一个阿根廷游客，罗林斯推搡了他一下，让他腾出点地方，他扭过头来，咆哮着像打雷。罗林斯把他的杯子递给我，给那家伙来了一拳，登时让他趴倒在吧台的黄铜扶手上。那哥们还没反应过来，人群呼叫声响动。提姆和我拉上罗林斯跑了出去。那里一派混乱，治安官甚至没法拨开拥挤的人群，自然没法进去查看受害人。没人能够指认罗林斯。我们去了其他酒吧。梅杰从黑暗的道路中颠出来。“他妈的怎么回事儿？要打架吗？喊上我呀。”四下里响起了哄笑声。我想知道山之精灵正在想什么，抬头望月，月亮之中有短叶松，我还看到了老矿工的幽灵，我想分辨他们的虚实。在整个东边暗黑的墙这侧，夜晚的分割线清晰可辨，除了山谷里我们这些人的喧闹声之外，还有静寂之声以及风的低语；在分界线的另一侧则是大西坡，广阔的平原一直延伸到沸腾泉边上，从那里就进入了一片低地，也将引领你到东科罗拉多沙漠和犹他沙漠；我们在山脚下大喊大叫的时候，对面是一片黑暗，疯狂而酒醉的美国人如同在乌有之乡。我们登上了美国的屋顶，我猜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叫嚷——穿过一片夜色，朝着大平原的东边，某处也许正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拿着福音书向我们走来，他随时可能出现，让我们闭嘴。

罗林斯坚持要回到他刚刚干了一架的酒吧去，提姆和我不想去但也只好紧随着他。他朝着邓南遮走去，那个男高音，将手里一高脚杯酒泼到了对方脸上。我们把他拽了出来。一位合唱团的男中音加入了我们，我们去了一家中规中矩的中部市酒吧。在这儿，雷称呼女招待为婊子，一群阴着脸的当地男人排成一列坐在吧台前；他们讨厌游客。其中一个说：“我数到十，你们有多远滚多远。”我们只好滚了，蹒跚着走向棚屋，上床睡觉。

大早上，我醒了过来，翻了个身；床垫上扬起厚厚的一层灰。我试着打开窗户，窗户被钉死了。提姆·格雷也还在床上，我们又咳嗽又擤鼻子。我们把隔了夜的啤酒当早餐。贝比从她的旅馆回来，我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去。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黯淡无光，我们上车途中，贝比摔了一跤，当空来个狗吃屎，可怜的女孩疲劳过度。她的哥哥和提姆还有我赶紧把她扶起来。我们坐上车，梅杰和贝蒂也来了。回丹佛的悲伤归途开始了。

突然间我们已下了山，俯视着丹佛辽阔的海蚀平原，热气像是反复从炉子中升起的。我们开始唱歌。我开始热切期待能去旧金山。

10

那天晚上，我碰到了卡罗，让我惊诧的是，他告诉我，他和迪安也去了中部市。

“你们在那儿干吗？”

“哦，我们就在各个酒吧中穿梭，然后迪安偷了一辆车，我们就以每小时九十迈的速度，从弯弯绕绕的山道上冲下来。”

“我们没见着你们。”

“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在那儿。”

“好吧，哥们，我要去旧金山了。”

“迪安给你安排了和丽塔今晚的约会呢。”

“好吧，那我过几天再去旧金山。”我没钱了，我给姨妈寄了封航空信，管她要五十美元，并说这将是我最最后一回管她要钱，从这以后，我会把钱逐步还给她，一旦我上了船之后。

而后，我去见了丽塔·贝腾库特，把她带回了家里。我在黑乎乎的前屋和她聊了很长时间后，把她弄进了卧室。她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单纯又真实，对性爱噤若寒蝉。我告诉她性很美好。我想证明给她看。她也让我证明了，但我心急火燎的，什么也没证明成。她在黑暗中叹了一口气。“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我问她，这是我常常用来问女孩们的问题。

“我不知道，”她说，“只是伺候人吃饭，想办法打发时间吧。”她叹了口气。我用手遮住她的嘴巴，告诉她别叹气。我试着告诉她我对生活有多热爱还有我们可以一起做的所有事情；我这么说着，计划两天之内离开丹佛。她倦怠地转过身去。我们仰头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想着上帝把生活搞得这么悲催，他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们初步打算将来在旧金山碰面。

我在丹佛的日子到头了，我陪她走回家时能感觉到这一点。回来的路上，我跑到一个旧教堂的草地上，和一帮流浪汉躺在一起，而他们的谈话让我想要回到路上。每过一会儿，总有人站起来，跟过路人要上一点钱，他们在说着自己的收获。天气温暖宜人，软绵绵的。我想再度去找丽塔，跟她说更多的话，而且这回真的跟她做次爱，平息她对于男人的恐惧。美国的男孩和女孩在一起时，总有那么些悲伤的时刻，风俗习惯是说他们可以不需要经过预热和交谈，便火速地上床，没有像样

的交谈——一直抵灵魂的交流，因为生命是神圣的，每一分钟都值得珍惜。我听到丹佛和里奥格兰德的机车呼啸着冲到山上。我想继续追寻我的星辰。

梅杰和我深夜坐在一起，忧伤地聊着天。“你读过《非洲的青山》没有？它是海明威最好的作品。”我们希望彼此好运，约定在旧金山见面。我看到罗林斯在街上一棵黑漆漆的树下。“再见，雷，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我去找卡罗和迪安——但哪儿都找不着。提姆·格雷高扬起他的手，说：“你要走了，哟。”我们称呼彼此“哟”。“是的，”我说。接下来的数日，我在丹佛城里瞎晃悠。对我来说，每个在拉默尔大街上的流浪汉都可能是迪安·莫里亚蒂的父亲。老莫里亚蒂，他们叫他，那个铁匠。我去了温莎旅馆，他们父子俩曾经一起住在那里，也是有一天大半夜被一个固定在滑板上、没有脚的男人吓醒的地方，他想来跟他们父子合住，他风驰电掣地过来，坐在他恐怖的轮椅上，去摸这个男孩儿。我看到柯蒂斯街和第十五街拐角处，那个卖小型赛车报纸的、短腿的女人。我在柯蒂斯街上那些忧郁的夜总会附近闲逛；年轻人穿着牛仔和红衬衫；街上有花生壳等垃圾，还有许多电影院的大帐篷和射击馆。在璀璨的灯光之外就是黑暗，在黑暗之外就是西部，我必须得走。

凌晨时分，我去见卡罗，读了他几本浩浩万言的日记，并睡在他家。次日清晨，下着小雨，天空灰蒙蒙的，人高马大、六英尺的埃德·邓克尔来了，还有罗伊·约翰逊，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还有汤姆·斯奈克，那个足部畸形的老赌客。他们围

坐在那里，不尴不尬地微笑着，听着卡罗·马克斯给他们读着自己启示录式的疯狂诗句。我深陷在扶手椅内。“哦，你们这些丹佛笨鸟！”卡罗嚷嚷道。之后我们大家鱼贯而出，穿过一条两边有炊烟冒出的、铺着鹅卵石的小巷子。“我小时候在这条巷子里滚铁环，”查德·金告诉我。我很想看他那时的样子；还想看看十年前的丹佛是什么模样的，当他们还都是孩子的时候，在阳光灿烂、樱花盛开的清晨，落基山区的春天里，在充满希望的小巷子里，开开心心地滚铁环——所有这票人。衣衫褴褛、脏兮兮的迪安，独自一人穿过欢腾的人群。

罗伊·约翰逊和我在细雨中漫步；我去埃德的女友家，取回了我的那件花格子羊毛衬衫，也可以说是内布拉斯加的谢尔顿的衬衫。它就在那儿，包扎得好好的，一件衬衫所有的悲伤附加其上。罗伊·约翰逊说他会跟我在旧金山碰头。所有人都要去旧金山。临行前我发现我的钱寄到了。太阳出来了，提姆·格雷和我一起坐着电车去了汽车站。我给自己买了到旧金山的车票，花了五十美金的一半儿，下午两点上了车。提姆·格雷挥着手向我道别。公交车驶离了有故事的、热切的丹佛。“我的上帝，我还会回来，看看还会发生些什么！”我暗暗发誓。在最后一分钟迪安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和卡罗会和我在西海岸会合；我默默回忆了一下，发现这段日子以来，我和他之间的交谈，加起来不超过五分钟。

两周之后，我和雷米·博古尔见了面。从丹佛到旧金山的公交车之旅没什么出奇之处，不一样的只是越靠近旧金山，我的整个灵魂就越向它扑去。我再度路过夏延，这一回是下午，而后朝西横跨山脉，夜半在克莱斯顿途经分水岭，天亮时抵达盐湖城——一个密布洒水器的城市，最不像迪安这号人会出生的地方；而后在炎炎烈日下抵达内华达，暮色苍茫时进入雷诺，它有灯光闪耀的中国城；然后登上了内华达的齿状山脊，松树、星星、象征着旧金山式的浪漫的山区小屋——后座上有个小女孩，冲她妈妈哭闹道：“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特拉基的家呀？”特拉基很快就到了，温馨如家的特拉基，而后从山区下行到平原区的萨克拉门托。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在加利福尼亚了。温暖如春、处处棕榈香的空气——你可以亲吻的空气——和棕榈。沿着有故事的萨克拉门托河畔的高速公路，再度进入山区。上升，下降，突然出现了一大片海湾（在天蒙蒙亮

时），旧金山睡意蒙眬的灯光就在那一带。当汽车经过奥克兰湾桥时，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离开丹佛后头一回睡得这么香。在市场和第四大道交界的公交车站，我被人粗鲁地叫醒，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远离在新泽西州波特兰的姨妈家有三千二百英里了。我像一个神情憔悴的鬼一样在外边晃悠，旧金山就在那里——在那些漫长而凄凉的街上，有着在重重的白色浓雾中若隐若现的电车电线。我磕磕绊绊地走了几个街区。行踪诡异的流浪汉（教会街和第三大道交界处）天蒙蒙亮就管我要了几毛钱。我听到音乐声从不知道哪里传来。“老天，我回头再来摸索这些地方！现在我要去找雷米·博古尔。”

米尔市，雷米的住处，乃是山谷里头的一排棚屋组合，本是战争期间为海军船坞建造工人修建的棚屋项目；它在峡谷之中，深深的峡谷，所有的山坡上密布了林木，还散布着一些特殊的商店，有理发馆和裁缝店，都是为了住在棚屋区的居民开的。那是他们说的，美国唯一白人和黑人出于自愿原则混居的唯一社区；确实如此，我再也没见过那么旷达欢乐的地方了。在雷米家门上，贴着一张他三个礼拜前贴着的便条。

萨尔·帕拉迪斯！（巨大的打印体）如果没人在家，从窗户爬进去。

签名：

雷米·博古尔

这张便签历经风吹日晒，已经褪色。

我从窗户爬了进去，他在家，正和女友李·安睡觉——他们睡在一张他从货船上偷来的床上，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请脑补下一位甲板工程师大半夜偷偷摸摸地扛着一张床，从船舷一侧下了海，在海浪中奋力划桨，向岸边划去。这压根也不足以说明全部的雷米·博古尔。我之所以把在旧金山发生的一切都说出来，是因为这和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有些瓜葛。雷米·博古尔和我多年前相识于预备学校，但真正把我们牵扯在一起的是我的前妻。雷米先发现的她。有一天晚上他跑到我宿舍说：“起来，帕拉迪斯，本大师瞧你来了。”我慌慌张张地起床穿裤子的时候，有几毛钱从裤兜里掉出来了，掉在地上。那是下午四点，大学的时候我通常那个点儿都在睡觉。“行啦，行啦，别把你的金币扔得哪儿哪儿都是。我发现了世上最棒的小妞，今晚我要带她去狮子洞夜总会。”而后他硬拉着我去见她。一周之后，她跟我好上了。雷米是个高大、黝黑、英俊的法国男人（他看起来像个二十岁的马赛黑市混混），因为他是法国人，他说英语就带着美国式的爵士腔，他的英语很棒，他的法语地道。他喜欢衣着夸张，有点儿像个大学生，出门喜欢带着漂亮的金发女郎，花钱如流水。他从没怪罪过我抢走了他的女朋友，那只是把我俩牵扯到一起的一个原因，那家伙对我忠心耿耿，发自内心地喜欢我，天知道为什么。

我在米尔市找到他的那天早上，他正处于沮丧期，就像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该有的样子。他晃晃悠悠地等着一辆船到来，为了养家糊口，他在峡谷对面的工人营地找了份保安工作。他的女朋友李·安牙尖嘴利，每天都要损贬他一番。他们一礼拜处心积虑地积攒每分钱，到了周六出去玩，三个小时内能花掉五十美元。雷米在棚屋区穿着短裤，戴着疯疯癫癫的军帽。李·安带着卷发器到处乱转。就那个德行，他们整个礼拜互相嘶吼。我平生就没听过那么多吵吵嚷嚷。但是周六晚上，他们彼此相视而笑，他们打扮得就像一对好莱坞明星夫妇，到镇里去。

那天，雷米醒来，知道我从窗户那儿爬进来。他哈哈大笑，世上最震耳欲聋的笑声，震得我耳根子都软了。“啊哈哈，帕拉迪斯，他从窗户爬进来了，他像个巴儿狗一样听话。你哪儿去了，你迟到了两个礼拜！”他拍打着我的后背，他胳膊着李·安的肋骨，靠在墙上又喊又叫，他捶着桌子，那动静整个米尔市都听得到，而那声拖长音的“啊哈哈”在峡谷中盘旋。“帕拉迪斯！”他吼道，“唯一的、不可或缺的帕拉迪斯。”

我刚刚经过了一个叫索萨利托的小渔村，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索萨利托一定有很多意大利人。”

“索萨利托一定有很多意大利人！”他撕心裂肺地大叫。“啊哈哈！”他捶着自己的胸口倒在床上，他差点儿滚到地上。“你听到帕拉迪斯说什么了吗？索萨利托一定有很多意大利人？啊哈哈！哦！喔！嚯！”他脸红得跟棵甜菜一般，

大笑不已。“哦，你逗死我了，帕拉迪斯，你是世上最搞笑的人，你来了，你终于来了，他爬窗户进来了，你看看他，李·安，他听从了指示从窗户爬进来了。啊哈！嚯嚯！”

古怪的是，雷米隔壁住了个黑人，叫斯诺先生，他的笑声，我敢对着《圣经》发誓，绝对是、无可辩驳的是世界上最骇人的笑声。斯诺先生从餐桌边站了起来，开始笑，因为他老婆不小心说了点什么；他站了起来，差点噎着，靠着墙，望着天，然后开始笑；他跌跌撞撞地跑出门外，靠在邻居家墙上，他醉汉一般，踉踉跄跄地在米尔市的阴影中行走，以胜利者的呼号向刺激他那么干的古怪上帝那么嚷嚷。我搞不清楚他吃完晚饭了没有。有一种可能性是雷米，在他自己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从那位仁兄，也就是斯诺先生那里，染上了这个毛病。虽然雷米在职场上有些麻烦要去应付，还和一个尖酸刻薄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他至少学会了比世上所有的人笑得更爽利，我也就看到了我在旧金山即将到来的美妙生活。

我们是这么睡的：雷米和李·安睡在屋子最里头的床上，我睡在窗边的小床上。我不能碰李·安一下，雷米早就表明了姿态：“我可不想看到你俩乘我不注意，翻滚在一起。你不能让个老歌手唱新鲜的曲子。这是我自创的说法。”我偷眼看了下李·安，她是个迷人的娘们，一个蜂蜜色的小动物，但她看我俩的时候，眼睛里跟有仇似的。她的野心是要嫁给一个有钱男人。她是从俄勒冈州来的小地方人，她对于自己跟了雷米的事情总是悔恨莫及。在某个他成心显摆的周末，他在她身上花了上百美元，于是她以为自己遇到了富二代。她待在这个棚屋

的唯一缘由是自己一穷二白。她在旧金山有份工作，每天得去岔路口坐上灰狗去上班。她因此永远也不能原谅雷米。

我待在棚户区，因为想要写个精彩绝伦的原创小说，给好莱坞片厂看看。雷米想夹着把竖琴沿着平流层下层航线飞行，好让我们所有人都富起来。李·安和他一道去，他想把她介绍给一位老友的父亲，一位著名的导演，和W.C.菲尔兹过从甚密。所以第一个礼拜，我待在米尔市的这个棚屋里头，勤奋地写着一个关于纽约的悲惨小说，我想着这个东西可以取悦某个好莱坞大导，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过悲惨了。雷米几乎没法把它读完，他唯一能干的就是在几个礼拜之后，把它带去了好莱坞。李·安快烦死我们了，对我们厌恶已极，她也读不下去。我花费了无数雨中的光景，喝着咖啡，推敲字句。最后我跟雷米说这样下去不行的；我得找份工作；我至少得有钱买得起烟。雷米皱起眉头，对我大失所望——他总是对没干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失望，他有颗金子般的心。

他给我找了份和他差不多的工作，在工人营地做保安。我走过了必需的流程，让我惊诧的是，那些混蛋居然雇用了我。我在当地一位警长跟前宣了誓，他给了我一枚徽章，配备了警棍，而后我成了个特警。我想知道迪安和卡罗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我穿上海军蓝裤子，配衬我的黑夹克和警帽；开头两周，我不得不穿着雷米的裤子；由于他长得高头大马，而且因为烦闷无聊吃得脑满肠肥，顶着个大肚子，我第一天晚上去上班的时候，那垮垮的样子就跟查理·卓别林一样样的。雷米给了我一支手电筒和一把点32口径的自动手枪。

“你从哪儿搞来的这把枪？”我问。

“去年夏天我去西海岸路上，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北普拉特下了车，本来只是为了活动活动腿脚，但我就在那橱窗内看到了这把独一无二的小手枪，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了下来，因为这我差点没赶上火车。”

我试图告诉他北普拉特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和那些男孩们一起去买威士忌，他拍打着我的后背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玩儿的人。

手电筒帮我照亮了路，我爬上了南边峡谷陡峭的崖壁，又爬上了有着络绎不绝地驶往旧金山的车流的公路，跌跌撞撞地从另外一头下了公路，差点摔了下去，而后到了矗立着一栋农舍的峡谷底部，在溪流边上，在那儿每晚冲我吠叫的都是同一条狗。那里有条近道，沿着加利福尼亚式的一些黑乎乎的树边，有一条银色的、布满尘埃的路——那条路就像在电影《佐罗的印记》里出现过的，也像那些你在西部B级片中看到过的路。我在黑暗中摸出自己的枪，逞强扮演牛仔。而后我爬上另外一个山头，然后抵达了工人营地。这些工人营地是为漂洋过海的工人搭建的临时住所，有些过路人也住在这里，等着他们的船。他们当中大部分是要去冲绳群岛，也是为了逃避点什么——通常是法律的制裁。他们当中有阿拉巴马州的混混，纽约来的混球，来自各处的形形色色的家伙。他们深知一整年都在冲绳群岛务工有多可怕，他们狂喝烂醉。特警的任务就是看住他们别把工人营地的天花板掀翻了。我们在主楼设置了总部，只是木隔断造就的几个办公空间。我们坐在一张卷盖书桌边

上，把枪从屁兜内取出来，打着呵欠，老警察们不着边际地扯闲篇。

那是一群可怕的男人，有着警察灵魂的男人们，除了雷米和我。雷米只是想讨口饭吃，我也差不多，但这些男人是要抓人的，好从镇上的警长那里得到表扬。他们甚至说，如果你不是每个月至少抓到一个人，你都会被解雇。我一想到别人对我有抓人的期许就发怵。事实上，每个夜晚工人营地闹闹腾腾的时候，我也喝得跟他们差不多了。

那晚是这样排班的：我要独自一人值班六个小时——我是唯一一个留守营地的警察；而那晚营地里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喝醉了。因为他们的船只将在此日大早启航，他们就像即将起锚的船员那般疯狂喝酒。我在办公室，把脚翘在桌子上，读着一本叫作《蓝皮书》的关于俄勒冈和北境的探险故事，我突然意识到平时静悄悄的夜晚当中，有纷纷扰扰的响动。我走了出去，每间棚屋都灯火通明。人们大喊大叫，摔着酒瓶子。对我来说这就是干或者死的问题。我拿上我的手电筒，跑到最为吵闹的房间，大力地捶门。有个男人开了门，开了六英寸那么宽。

“你想干吗？”

我说：“我是今晚工坊的值守，你们这些家伙得尽可能保持安静！”——或者类似的傻告示，他们当着我的面，把门砸上。我站在那里，盯着几乎够着我鼻尖的门板。正如一部西部片，显示我孔武有力的时机到了。我再度敲门。他们把门打得

比先前开了些。“听着，”我说，“我不想总来打扰你们这些家伙，但是如果你们总是这么吵的话，我会被炒鱿鱼的。”

“你谁啊？”

“我是这儿的一个警卫。”

“以前没见过你。”

“好吧，这是我的警徽。”

“你屁兜上的枪干吗用的？”

“那不是我的，”我表示歉意，“是我借的。”

“喝杯酒吧，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如果开喝了我丝毫也不介意，我喝了两杯。

我说：“行了，哥们？你们会安安静静的吧，哥们？否则我就完蛋了，你们知道。”

“行啦，孩子，”他们说，“继续去巡逻吧。想喝酒的时候再回来喝一杯。”

我去敲所有的门，以这样的态度，没多会儿，我就喝得跟其他人差不多了。我的职责是把美国国旗升到六十英尺高的旗杆上，但那天早上，我把国旗倒着升了上去就回家睡觉了。当我夜里回去时，那些正式工警察正阴着脸坐在办公室里。

“说吧，哥们，昨晚这里怎么那么吵闹？峡谷那头住的居民都来跟我们抱怨。”

“我不知道啊，”我说，“现在听起来不是挺安静的吗？”

“那票人通通滚蛋了。你昨晚本来应该维持这周边区域的秩序的——长官正冲着你嚷嚷呢。还有件事——你知道你把国旗倒挂在官方的旗杆上是要坐牢的吗？”

“倒挂了？”我吓了一跳；当然了我没意识到，我每天早上都机械地升国旗。

“是的先生，”一个在阿尔卡特拉斯做了二十二年狱警的胖警察说，“你干了这种事情足够去坐牢了。”其他人阴着脸点着头。他们总是坐在自己的肥屁股上，他们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他们拿着自己的枪每每谈论着这把枪。他们心里痒痒想要射杀某些人：雷米和我。

那个在阿尔卡特拉斯做过狱警的家伙已经大腹便便，他年近六十，即便退休了，仍无力摆脱那种滋润了他一辈子枯燥灵魂的氛围。每天晚上，他开着自己三五年款的福特来上班，踩着点儿来的，在卷盖式书桌跟前正襟危坐。他吃力地填写着我们每晚必须填的表格——巡逻路线，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诸如此类。而后他往后一靠，开始侃大山：“你两个月前要是来了就好了，那会儿我和斯莱德（另外一个警察，一位想当得克萨斯骑警的年轻人，被迫满足于现状）在G营房逮了个醉鬼，

哥们，你应该看看那只血肉模糊的苍蝇。今晚我会带你去看看那墙面上的血污。我们把他从一面墙上摔到另外一面墙上。先是斯莱德胖揍他，然后是我，他被揍得服服帖帖，安静得跟什么似的。那个混蛋发毒誓，将来出狱非得弄死我们不可——他被判了三十天，现在已经六十天过去了，他还没露脸。”这就是整件事的重点所在。他们把他吓得不轻，他已经没种回来找他们了，更别提弄死他们。

那个老警察继续沉溺于恐怖的阿尔卡特拉斯岛的回忆之中。“我们过去让他们像一列士兵那样去吃早餐。没有一个人敢造次，出了队列。每件事都像钟表一样精确无比。你应该看看那景象，我在那里做了二十二年的狱警，从没出过乱子。那些家伙知道我们都不是好惹的。很多囚徒就知道在狱警当中找软柿子捏，那都是些善于惹是生非的人。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从我对你的了解看来，对我来说，你就是对那些家伙太慈悲了。”他举起他的烟斗，死命地盯住我。“知道不，他们就会借机获利。”

我知道这一点，我跟他说，我压根就不是当警察的料。

“是的，但这是你自己想干的活儿。你就得死马当活马医，否则就会一事无成。这是你的职责，你宣过誓的。你责无旁贷啊，法律与秩序到底得维护才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是对的；但我想干的是乘夜黑天高偷偷地溜出去，消失在某处，到处去看看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在干些什么。

另外一个警察，斯莱德，高大，肌肉发达，黑发剪成寸儿头，脖子上时不时地抽搐一下——像一个总是用自己的左手打右手的拳击手。他把自己收拾得就像得克萨斯州老派的骑警。他把左轮手枪和弹夹都挂得低低的，还带着一根马鞭，各式各样的皮制配件，就像一个移动的审讯室：亮晃晃的皮鞋，敞着前胸的衬衫，公鸡式的帽子，就是少了双靴子。他经常给我一个下马威——猛地扎到我裆下，一下把我扛起来。就力气而言，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法把他一把甩到天花板上，我知道那很简单；但我生怕他因此跟我来一场肉搏。和这么一个家伙肉搏的结果，最后肯定是拔枪相向。我知道他是个更好的枪手，而我一生中连把枪都没有。我给枪上子弹都哆哆嗦嗦。他每天铆足劲儿就想多逮几个人。有一天晚上，我俩单独值班，他气冲冲、红着脸回来了。

“我跟一些哥们说安静点儿他们依旧吵吵嚷嚷。我跟他们说了两回，我从来不给一个人两次机会，更不要说三次了。你跟我一起去，我要回到那儿把他们通通抓起来。”

“好吧，我去给他们第三次机会，”我说，“我去跟他们说。”

“不，先生，我从不给任何人超过两次机会。”我叹了口气，跟他一起去了。我们赶到了那个沸反盈天的屋子，斯莱德打开门，让所有人列队出来。场面有些尴尬。每个人都涨红了脸，这就是美国式的故事，每个人都干着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一票人深夜聚在一起喝喝酒，喧哗喧哗有何不可？但斯莱德想要证明点儿什么。他一定要带着我，是为了防止他

们反攻他。他们说不准儿会。他们都是兄弟群，都来自阿拉巴马州。我们晃悠着带着他们回到局子里，斯莱德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其中一个男孩跟我说：“跟那个耳朵长在裤裆里的倔驴说一下，别跟我们过意不去了。我们说不定会因此被解雇，再也去不了冲绳了。”

“我会跟他说的。”

在局子里，我让斯莱德算了吧。他冲着众人，涨红着脸说：“我不会给任何人第二次机会的。”

“咋回事儿，”阿拉巴马人说，“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会因此丢了差事的。”斯莱德一言不发，开始填写拘捕令。他只抓了他们当中一个人，他喊来了镇子里的巡逻车。他们来了，把他带走了。其他弟兄阴沉着脸散去。“咱妈会怎么说呢？”他们说。他们当中一个人跑回来跟我说：“你去告诉你们那个得克萨斯狗娘养的，如果我们兄弟明晚出不来，他就完蛋了。”我告诉了斯莱德，和和气气地跟他说的，他啥也没说。那哥们就被放出来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那票人乘船离去，来了一票更粗野的。如果不是为了雷米·博古尔，那个活儿我两个钟头都坚持不了。

雷米·博古尔和我多次一道值夜班，一切就都一塌糊涂。我们晃晃悠悠兜了当夜的第一圈，雷米试着去检查每扇门，看看有没有一扇没关上的。他说：“我好多年一直有个念头，想

养条狗把它训练成超级小偷，跑到那些家伙的屋子里，从他们兜里偷钱出来。我只会训练它偷美元，其他的通通不要；我会让它夜以继日地闻钱，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就让它只偷二十元的大钞票。”雷米脑袋里充满疯狂的念头，他念叨了那条狗好几个星期。只有一次，他发现了一扇没上锁的门。我对他的这些念头一点儿也不感冒，所以我沿着过道往前走。雷米偷偷摸摸地打开了那扇门，迎面而来的居然是营房管理员。雷米讨厌那人的脸，他问我：“你经常提起的那位俄国作家叫啥——那个把报纸塞进鞋子里，头上戴着他从垃圾堆捡来的大礼帽晃来晃去的家伙？”那是我对雷米夸大其词地描述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啊哈，就是他——多斯托夫斯基。那个长着这种脸的人就得叫这名字，多斯托夫斯基。”他唯一发现的未上锁的门就属于多斯托夫斯基。多斯托夫斯基在睡梦中听到有人在摆弄他的门把手。他穿着睡袍就起来开门了，那张脸比平日丑两倍。雷米一打开门，就看到他那张因为怒气冲冲而扭曲的脸。

“这啥意思？”

“我只是试试这门关着没有，我以为这是——啊——放拖把的屋子。我在找个拖把。”

“你说你在找个拖把是啥意思？”

“哦——呃。”

我上前去说：“有个家伙在楼上过道里吐了一地，我们得去拖干净它。”

“这不是搁拖把的屋子，这是我的屋子，这种事情再来一次，我就得审查审查你俩，开了你们！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有人在楼上吐了一地。”我又说了一遍。

“放拖把的房间在过道另一头，那边。”他指着那里，等着我们离去，拿那个拖把，我们真那么干了，还傻乎乎地举着它上了楼。

我说：“狗日的，雷米，你总是给我们造麻烦，你干吗不辞职了事？你干吗总要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这个世界欠我些什么，就那么回事。你不能教一个老手任何新本事。你如果总是那么说话我就要开始叫你多斯托夫斯基了。”

雷米就像一个小男孩儿。在他的往昔岁月里，他孤独地在法国上学的年头，他们拿走了他身上的一切，他的继父母把他扔进学校，让他就那么待着。他是被吓大的，从一个学校辗转 to 另外一个。他深夜走在法兰西的小路上，用他仅有的词汇拼凑着骂人的话。他一门心思想要弄回他失去的一切。而他的失去永无止境，这种状况没个尽头。

营房区的自助餐厅是我们吃白食的地方。我们在附近埋伏，观察好周围没什么人留意着这里，特别是我们的同行朋友

们不在附近巡查。而后我俯下身去，雷米两只脚踩在我肩膀上，爬了进去。他打开窗户，窗户没锁上，他头天夜里就打开了，他翻过窗子，踩在做面食的桌子上。我比他要灵巧些，轻松地爬将进去。我们冲向饮品区。在这里，实现了我一贯的幻想，我打开一桶巧克力冰淇淋的盖子，将我的手插到齐手腕那么深，从中挖出一大坨冰淇淋，就手开始舔。然后我们拿了一些装冰淇淋的纸盒，把它们塞满，在上面淋了巧克力糖浆，或者草莓糖浆，而后在厨房巡视，打开冰箱，看看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装在兜里带回家的。我时不时地扯下一片烤牛肉，把它们裹在纸巾里。“你知道杜鲁门总统怎么说的，”雷米说，“我们必须缩减自己的生活开支。”

有一天晚上，我等了好一会儿，让他把一大堆吃的装到一只巨大的纸箱内。而后我们没法把它从窗户那儿弄出去。雷米只好把纸箱清空，将东西放回原处。那天深夜，他下了班，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守着营房，有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沿着那条峡谷里的老路溜达，想要遇到一头鹿（雷米曾经在那一带遇到过鹿，即便在1947年，这里依然一派荒芜），而后我听到黑暗中传来一阵恐怖的声响。喘着粗气、呼哧呼哧的声音。我以为是头犀牛要从背后袭击我。我抓紧我的枪把儿。在峡谷的阴暗面，出现了一个高大的影子，顶着巨大的一个脑壳。突然，我意识到那是在肩上扛着装满了吃食的大纸箱子的雷米。他被那堆重物压得呼哧直喘。他从某个地方找到了自助餐厅的钥匙，从前门把纸箱搬了出来。我说：“雷米，我以为你回家了呢，你他妈的干吗呢？”

他说：“帕拉迪斯，我跟你说过好多次，杜鲁门总统说过，我们必须缩减自己的生活开支。”我听到他喘着粗气隐入黑暗之中，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们回棚屋那条路，上坡下坡特别难走。他把纸箱藏在深草当中，然后来找我：“萨尔，我一个人搞不定。我得把它分成两箱，你得帮帮我。”

“但我在值班啊。”

“你走开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看着。时局越来越艰难了，我们得好好渡过难关，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他擦着脸上的汗。“哦呜！我给你说了一遍又一遍，萨尔，咱是兄弟，这是我们一道干的。没有第二种选择了。那些多斯托夫斯基们，那些条子，那些李·安们，那些混球们，都想剥了咱的皮。我们得留意别让他们得逞。他们除了胳膊脏，袖子也干净不到哪儿去。记着这个，你教不会一个老手任何新本事。”

我最后问：“那我们什么时候金盆洗手呢？”我们已经这么干了十个星期了。我每个礼拜挣五十五美元，寄给我姨妈差不多四十美元。那段时间，我只去旧金山待了一晚上。我的生活基本上都在棚屋内厮混，在雷米和李·安的争吵声中度过的，还有午夜在营房做没意义的工作。

雷米进入夜色之中，又去取另外一只箱子。我陪着他在那条崎岖小道上艰难地行进。我们把食物堆在李·安的厨房台面上，堆得像座小山一样高，她醒来后，揉了揉眼睛。

“你知道杜鲁门总统怎么说的吗？”她很高兴。我突然意识到美利坚的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小偷。我自己也掌握了这门技艺。我甚至开始留意观察那些门是否锁上了。其他警察开始怀疑我们，他们从我们的眼神中猜出了一二，他们凭着直觉开始揣测我们的想法。年复一年的职业经验让他们很容易辨识出我和雷米这号人。

大白天，雷米和我揣着枪到山野里打鹌鹑。雷米悄无声息地靠近了那些咕咕叫的鸟儿，离它们只有三英尺远，用那只点32口径的左轮手枪发射，结果没打中一只，他的狂笑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林地、甚或美利坚的上空回旋。“咱该去看望一下香蕉大王了。”

那是周六，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往十字路口的公交车站。我们搭车去往旧金山，在街上瞎逛。雷米的笑声紧跟着我们去的每个地方。“你应该写个香蕉大王的短篇小说，”他跟我说，“别糊弄我这个老手，别写别的，就写香蕉大王。”香蕉大王是街角上买香蕉的老头儿。我已经厌烦透了，但是雷米不停地戳着我的肋骨，拽着我的衣领让我去看他。“当你写香蕉大王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写人类生活中很好玩的事情。”我跟他说我对香蕉大王没有一毛钱兴趣。“直到你认识到香蕉大王的重要性之后，你不会认为世上还有什么关于人的事情，是绝对有意思的。”雷米不厌其烦地说。

港湾当中停泊着一艘锈迹斑斑的货船，过去当作浮标用的。雷米总是蠢蠢欲动想去那儿，于是有一天下午，李·安给我们准备了午饭，我们租了一条船就出发了。雷米带了一些工

具。李·安赤身裸体地躺在浮桥上晒太阳。我从船尾那儿盯着她看。雷米跑到底层到处都是耗子爬来爬去的船舱内，开始敲敲打打，想要从那上面拆下来一些黄铜管子。我坐在昔日高层船员破旧不堪的食堂内。那是一艘老得不能再老的货船，过去也曾光彩照人过。木头上雕着蔓叶花样，以及步入式的水手柜。那是杰克·伦敦笔下旧金山的幻影幽灵。我在阳光灿烂的食堂里浮想联翩。耗子们在储物间内奔忙。很久很久以前，有位蓝眼睛的船长在这里温文尔雅地用餐。

我跑到最底层去找雷米。他正在扳动任何松动的东西。“屁也没有，我还以为会有铜件儿，我还以为至少得有一两把扳手。这艘船历经了好多个小偷了。”它在港湾中停泊了好多年。那些铜件儿早就被不知所踪的盗贼之手偷没了。

我对雷米说：“改天夜里起雾的时候，我想睡在这艘老破船上，躺在这里摇来晃去的，听着那些浮标的咔嚓声。”

雷米十分吃惊，他对我的崇拜之情增加了一倍。“萨尔，如果你有种这么干，我会给你五美元。你没觉得这里可能缠绕着老船长的鬼魂吗？我不只要给你五美元，还会送你上这儿来，给你带顿饭，给你送毯子和蜡烛。”

“成交！”我说。雷米跑去告诉李·安。我真心想从桅杆上蹦下去，叠在她身上，但我信守着我与雷米的承诺。我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

从那以后，我更加频繁地跑去旧金山。我试遍了书上的法子去搞定一个姑娘。我甚至和一位姑娘整夜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直至天亮都没个下文。她是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金发美女。那里有很多同性恋，有几次我带着我的枪去了旧金山，当一位基佬在酒吧里靠近我时，我拔出枪说：“呃？呃？这是你想说的吗？”他吓坏了。我搞不懂自己干吗要那么干，可能仅仅因为旧金山太寂寞而我又正好有把枪。我总得把它亮给别人看看。我路过一家珠宝店时，突然内心涌起了一股冲动，想要砸开玻璃窗，拿走那些最漂亮的戒指和手镯，拿着它们跑去献给李·安。而后我们可以一起私奔去内华达，我离开旧金山的时候到了，否则我要发疯了。

我给迪安和卡罗写了一封长信，他们正待在得克萨斯州河口，老布尔的棚屋里。他们说一旦他们手头的事情处理停当后，他们就要来旧金山跟我会合，与此同时，雷米、李·安和我开始无精打采起来。九月的雨水来了，在他们的劝说之下，雷米带着我那可怜巴巴的几页剧本，和李·安去往好莱坞，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有位名导演喝得醉醺醺的，压根儿对他们不理不睬，他们晃悠在导演位于马里布海滩的别墅附近。他们开始在其他客人跟前大吵大闹，于是他们又飞回来了。

压在我们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去赛马场。雷米省下了他所有的钱，大概有一百美元，给我穿上了他比较体面的几件衣服，让李·安挽着他的手，我们去往湾区对面里士满附近的金门赛马场。雷米这哥们的心地很善良，他把我们偷来的一半的食物放在一只巨大的牛皮纸袋里，带着它们送给他在里士满认

识的一个穷寡妇，那寡妇也住在一个像我们那样的贫民小区内，她晾晒的衣物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下飘扬。我们和他一起去了。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看起来很可怜。那位妇人感谢了雷米。他是他隐约认识的一位水手的姐姐。“别介意，卡特太太，”雷米用他最和气、最礼貌的口吻说。“还有好多吃的东西呢，从我们拿来的地方。”

我们去了赛马场。他令人难以置信地下了二十美元赌注，在第七次赛跑之后，他已经输得一塌糊涂。他拿出我们打算买吃的两块钱再度下注，再度输光。我们不得不搭便车回旧金山，我再度上路了。一位绅士用他时髦的车子让我们搭了一程，我和他一起坐在前座。雷米又想胡诌他把钱包丢在赛马场的大看台后头。“事实是，”我说，“我们所有的钱都赌马赌输了，下次要想不再触这样的霉头，我们得找个赌注登记经纪人，对吧，雷米？”雷米的脸唰地红了，那车主最后跟我们交底他是金马赛马场的高层。他让我们在金碧辉煌的皇宫酒店下了车，我们目送他消失于酒店的枝形水晶灯的交错之中，他兜里塞满了钱，脑袋高高上扬。

“哇哈！哇唔！”雷米在旧金山深夜的路上大喊大叫。“帕拉迪斯跟赛马场老板坐了同一辆车，就发誓将来要找赌注登记经纪人。李·安，李·安！”他捅捅她拍打她。“绝对是世上最搞笑的一个人！索萨利托一定有很多意大利人。啊哈！”他绕着一根柱子狂笑不已。

那天晚上，开始下雨，李·安对我俩没有好脸色。家里一毛钱也不剩。雨点又暴击着屋顶。“这得持续一周。”雷米

说。他脱下他漂亮的外套，又穿回他可怜巴巴的短裤、军帽和T恤。他拿自己忧心忡忡的大褐眼睛盯着地板上的木条儿。枪摆在桌面上。我们似乎从雨夜的深处，听到了斯诺先生几乎快要笑断脖子的笑声。

“那个狗娘养的让我又恶心又厌烦透了，”李·安突然一声大喝。她正在通往找茬的进程之中，她开始膈应雷米。他却正忙着翻阅他的小黑本本，那上面写着欠他债的人名，大部分是水手。在他们的名字边上，他拿红笔写上了咒骂之词。我担心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也会被弄到那个小本子上。最近我把多数钱都寄给我姨妈，以至于一个礼拜我只买了四五美元的吃的。遵奉杜鲁门总统的意思，我又加了几美元。但雷米依然觉得我没给够我应当的份子钱。于是他把购物账目单，用打印机打出来，带着单品详细价目的，挂在卫生间，好让我看到并领会到。李·安一直怀疑雷米藏了私房钱，甚至觉得我也藏了，因此，她威胁要离开他。

雷米撇了撇他的嘴。“你觉得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吉米。”

“吉米？就那个马场出纳？你听到了没有，萨尔，李·安要跑去和马场出纳私奔了。记得带好你的扫帚哦，亲爱的，那些马这礼拜会吃掉很多很多燕麦，因为我付了那一百美元。”

情况往更糟的方向发展，雨也越下越大。这地方先前是李·安先入住的，于是她让雷米收拾好东西滚蛋。他果真开始收

拾了。我设身处地想象自己要是这样暴雨如注的夜里，和一个粗野的小婊子独自待在一个屋子里会是怎么一种情形。我得出面劝架。雷米推了一把李·安。她跳起来够那把枪。雷米一把抢过枪递给我，让我把它藏起来。这枪的弹夹里装着八颗子弹。李·安开始大喊大叫，最后她披上雨衣，跑到泥污地里，打算去找个警察，这警察又是谁呢？——极有可能是我们那位在阿尔卡特拉斯当过差的老朋友。好在他没在家。她湿漉漉地回来了。我躲在屋里一角，把脑袋埋在两膝之间。老天爷，我离家两千英里在这里干吗？我干吗来这里？我开往中国的慢船又在哪里呢？

“还有一件事，你这个烂渣，”李·安破口大骂，“今晚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做你那脏兮兮的猪脑炒蛋，还有你那恶心想吧唧的咖喱羊肉，好让你填饱你那恶心人的肚子，在我跟前变成一个死胖子。”

“得了得了，”雷米平静地回答，“一点问题都没有。当初我跟你在一起，我不指望玫瑰和月光，但我也没料到像今天这样。我总在为你做点什么事情——我为了你们两个尽了最大努力，你们却让我很不爽，你们两个让我太失望了。”他继续掏心掏肺地说：“我一直以为能盼来好日子，能有些又美好又能长久的事情发生，我试过，我飞去好莱坞，我给萨尔整个好工作，我给你买一堆漂亮的裙子，我试过把你介绍给旧金山最好的那票人。你不干，你们压根儿就不听我的。我不求你们什么回报。现在我提出我最后一个请求，让我再也不求着你们干吗了。我继父下周六晚上来旧金山。我就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

见他，看着就像我在信里头跟他描述的那样。也就是说，你，李·安，是我的女朋友，还有你，萨尔，我哥们。我已经安排好找人借一百美元，为了礼拜六晚上。我得让我继父好好玩一晚上，然后对我放心地离去，再也用不着担心。”

这让我很吃惊，雷米的继父是个有名的医师，他在维也纳、巴黎和伦敦都有自己的诊所。我说：“你跟我说的意思是打算借一百块钱招待你继父？他比你可有钱多了！你会因此负债的，哥们！”

“没错，”雷米平静地说，他的声音却有点矬，“我只求你们再和我待一晚上——你们至少得装得像那么回事，给他留个好印象。我爱我的继父，也敬重他。他要和他的年轻老婆一起来。我们得让他感觉舒舒坦坦的。”在很多时候，雷米确实是世上最具绅士风度的人。李·安被他打动了，很期待见到他的继父，她觉得那继父没准儿是个好靶子，尽管儿子不尽然。

周六晚上很快就到了。我已经从警局辞了职，就在我即将被开除的前夕，因为没抓够那么多人，而这也将成为我的最后一个周六晚上。雷米和李·安先去酒店房间见了他的继父，我已经有了旅费，在楼下酒吧里喝了个烂醉。而后我上去找他们，已经很晚了。他继父开了门，一位戴着夹鼻眼镜看起来气宇轩昂的大个子。“哈，”我一看到他就说。“邦库尔先生，你好吗？je suis haut！”我嚷嚷道，这句话本来是法语里头的“我喝多了，我喝嗨了”，但我最后说出来的，在法语里啥也不是。那医生一脸懵逼。我已经吓着雷米了，他红着脸盯着我。

我们一起去了一家高级餐馆儿——北沙滩的艾尔弗雷德餐厅，在那里我们五个人吃饭，花了可怜的雷米足足五十美元，包括吃的喝的。而后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那位坐在艾尔弗雷德吧台的不就是我的老友罗兰德·梅杰吗？他刚刚离开丹佛抵达旧金山，在一家报馆找到了份工作。他也喝得差不多了。他甚至连胡子也没刮。正当我把一支高脚酒杯贴到唇边时，他从后边过来，猛地捶了一下我的后背。他就在邦库尔先生边上毫不客气地坐下，并隔着人家的汤碟和我说话。雷米的脸红得跟甜菜头似的。

“干吗不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呢，萨尔？”他虚弱地微笑着说。

“罗兰德·梅杰，旧金山《阿格斯报》的。”我直愣愣地说。李·安恼怒地看着我。

梅杰开始在邦库尔先生耳边大放厥词。“你看着怎么像是在高中教法语的？”

“不好意思，但我不是在高中教法语的。”

“哦，我以为你是在高中教法语的。”他故意粗野地那么说。我记得我们在丹佛那天晚上，他在我们的派对上捣乱，但我已经原谅他了。

我原谅了所有人，我妥协了，我喝多了。我开始向医生年轻的妻子谈论月光与玫瑰。我喝得那么多，以至于不得不每两分钟上一趟厕所，而要那么干，我又不得不跨过邦库尔先生的

膝盖。一切都完蛋了，我在旧金山的生涯即将结束。雷米将和我一拍两散。糟糕的是，我真的非常爱雷米，我肯定是世上为数不多的、意识到他是如此真诚而伟大的人之一。他花了好些年才让这件事过去。比起当初我在帕特森给他写信，告诉他我即将横穿六号公路，这一切真是一次灾难。我已经到了美国的尽头——前路孤绝了——现在除了走回头路真是无处可去了。我决定至少我得去拐个弯，跑去好莱坞，然后回到得克萨斯去看看我住在河口的朋友们，其余的事情见鬼去吧。

梅杰被从艾尔弗雷德餐厅赶了出去。无论如何，晚餐已告终。我就跟着梅杰一道走了，也就是说，雷米提议我这么干的，于是我跟着梅杰继续去找酒喝。我们坐在铁壶酒吧的一张桌子前，梅杰说：“山姆，我不喜欢酒吧那哥们。”他的声音特别大。

“啊，杰克？”我说。

“山姆，”他说，“我想我得过去胖揍他一顿。”

“不，杰克，”我用海明威式的语气说，“待着别动，看看会发生些什么。”我们最终踉踉跄跄地走上街头。

大早上，雷米和李·安还在呼呼大睡，我悲哀地看着那一大堆该洗的衣服，那是我和雷米本来打算拿到棚屋后头的本迪克斯洗衣机那儿洗的（在那儿和一大帮黑女人，以及快要笑断脖子的斯诺先生待在一起，总是件开心的事情），我决定离开，我已经走到门廊那块儿了。“不，该死的，”我对自己

说，“我给自己发过誓，没爬过那座山，绝不离开。”那座山的山谷一侧，通往神秘莫测的太平洋。

于是我又待了一天。那是星期天。热浪来袭，那是美妙的一天，午后三点，太阳转为红色。我开始爬山，四点钟就到山顶了。那些可爱的加利福尼亚三叶杨和桉树在另外一侧沉默不语。接近山顶的地方就没什么树了，仅有岩石和草。几只牛正在那里吃着草。那就是太平洋，除了一些小山丘之外。蔚蓝、广袤无际，从那些种土豆的地里升腾起白雾之墙，那就是旧金山雾气的源起。再过一个小时，雾气便会缓缓前行，穿过金门，将那座浪漫之都慢慢掩盖住，一位年轻人一手拉着女朋友，兜里装着一瓶托卡伊葡萄酒，沿着一条白色步行道慢慢往上爬。那就是旧金山，妙曼女郎在门洞那里站着，等待她们的男人；还有科伊特塔、内河码头、市场街以及举目皆是的十一座山头。

我晃悠到头脑发昏，我想我像是在梦中跌落，从悬崖峭壁边上。我亲爱的姑娘在哪里？我想，到处去找，正如我已经在下面那个迷你的世界里找寻过了一样。而我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美利坚大陆。更远的地方，在云雾和灰色烟尘当中的是阴暗疯狂的纽约。东岸给人的感觉总是棕色而神圣的，而加州则像白色的洗涤线，头脑空洞无物——至少我当时那么认为。

12

那天早上雷米和李·安还在睡觉，我悄悄地收拾停当，从窗户爬了出去，就像当初进来的时候一样。带上我的帆布口袋离开了米尔市。我从未在那艘老鬼船上过过夜——它叫福雷比海军上将号——从此我和雷米相忘于江湖。

在奥克兰，有一间门口放着大篷车轮子的酒吧，我混在一帮流浪汉当中喝了杯啤酒，然后我再度上路了，穿行过奥克兰，抵达弗雷斯诺公路。我搭了两程车才到达贝尔斯菲尔德，它在南边四百英里的地方。第一辆车挺疯的，开车的是个结实金发小伙儿，他开着辆改装车。“看到那脚趾头没有？”他一边说一边加速到八十迈，超过了路上的每一辆车。“看看那儿。”他脚趾头上缠着绷带。“我今天早上才切掉了那玩意儿，那些狗娘养的想让我待在医院里。我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医院，不就是个脚趾头吗？”是的，事实上，我对自己说，我得小心留意，抓紧扶手。你从未见过开车开得这么疯狂的蠢货。

他一眨眼就开到了特雷西，特雷西是个在铁路边上的小镇子，铁道上的司闸员在铁道边的餐馆吃着些恶心人的东西。火车呼啸着经过山谷。太阳缓缓下沉，霞彩绯红。铁道沿线的地名都很诡异——曼迪卡、马德拉，诸如此类。天色在迅速暗淡下来，葡萄紫的、紫色的暗淡，弥漫在那一片片橘林和长长的瓜地中，太阳就像挤过汁的葡萄，夹杂着一丝暗红，那些田野是爱情与西班牙神秘戏剧的颜色。我把脑袋伸出车窗，深深地呼吸着外边那芬芳扑鼻的空气。这是所有时刻中最美妙绝伦的。那个神经病是个住在旧金山的司闸员，就职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他爸也是个司闸员，他在奥克兰的车场调度时，弄断了一根脚趾头，我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把我带到吵吵嚷嚷的弗雷斯诺，让我在镇子南边下了车。我在铁道边的一家小卖店，买了杯方便可乐喝，迎面走来穿行在红色大篷车周边的愁眉苦脸的美国少年，与此同时，机车鸣起了喇叭，我对自己说，是啊，是啊，萨拉杨的镇子。

我得往南走，继续上路。一位开着崭新皮卡的男人让我搭上了他的车。他是来自得克萨斯的卢博克，是个做挂车生意的人。“你想买辆挂车吗？”他问我，“任何时候，找我就对了。”他跟我说了他那住在卢博克的爸爸的故事。“有一天晚上，我家老头儿把当天收来的货款搁在保险箱上面，完全忘掉了。你猜怎么着？——当天晚上来了个贼，带着电焊切割机什么的，打开了保险柜，翻出来几张破纸头，踢翻了几把椅子就走了。而那几千美元就妥妥地放在保险柜上头，你能想象这等怪事吗？”

他让我在贝克斯菲尔德南边下车，而后我的奇遇就开始了。天气转冷，我身披在奥克兰花了三美元买的薄薄的军用雨衣，在路上打着寒战。我站在一栋西班牙风格、灯火通明如同珠宝一般的汽车旅馆跟前。那些车呼啸而过，开往洛杉矶。我坚持摆出搭车的手势，天气太冷了。我在那里待到半夜，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不停地咒骂，咒骂。这就像是在艾奥瓦斯图尔特的噩梦重现。我无计可施，只能花两美元多，买张公交车票走完余下去往洛杉矶的路。沿着高速公路走向贝克斯菲尔德，走进车站，坐在长椅上。

我已经买好了车票，等着开往洛杉矶的公交车，而后，不经意间，我看到了那位穿着长裤的、极其玲珑可爱的墨西哥女孩，她就那么闯入我的视线当中。她坐在一辆刚刚进站的公交车里，那辆车的空气刹车闸喘着粗气，是一辆过路车，乘客中途下来休息休息的。她的乳房高耸，修长的大腿看起来秀色可餐；长发又黑又亮，大蓝眼睛里带着羞涩的光芒。我希望我在她那辆车上。我胸口那里感到一阵刺痛，在这个大得过分的世界上，我所心仪的女孩总是去往其他方向。站台工作人员大声叫着洛杉矶的车要开了。我拿上我的行李上了车，而独自坐在那辆车里的恰好就是那个墨西哥女孩。我毫不犹豫地坐在她对面，脑海中杂念纷飞。我是如此的孤独，如此的忧伤，如此的疲惫，如此地打着寒战，如此的消沉，如此的心灰意冷，这都是向一个陌生女孩搭讪的必要驱动力。即便如此，当车开上路后，我在暗处拍打着自己的大腿足足五分钟，也不敢有所行动。

你得去，你得去，否则你就死定了！傻蛋，跟她说话！你出什么问题了？你难道不是对自己厌倦透了吗？在我清楚自己该怎么办之前，我已经穿过过道向她靠近了（她试着在椅子上睡一觉），我说：“小姐，你愿不愿意拿我的雨衣当个枕头？”

她抬眼带着微笑说：“不用了，非常感谢。”

我坐了回来，浑身发抖，我点了一支烟。我等着她又看了我一眼，带着小小的忧郁的情意，我再度上前，靠近她。“我能挨着你坐吗，小姐？”

“你愿意的话。”

我也就坐过去了。“你去哪儿？”

“洛杉矶。”我喜欢她说“洛杉矶”的样子。我热爱西岸每个人说“洛杉矶”的样子，它也是他们这儿唯一像模像样的城市了。

“那也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叫道，“我很开心你让我跟你坐在一起，我太孤单了，我已经独自旅行了太他妈久了。”而后我们坐在一起说着各自的故事。她的是这样的：她有个丈夫有个孩子。丈夫打她，于是她离开了他，回到弗雷斯诺南边的萨比纳尔，现正打算去洛杉矶和她姐姐住上一段时间。她的孩子搁在娘家了，她的娘家人都是葡萄采摘工人，他们住在葡萄园的棚屋里。她无所事事，只会在那里想东想西，也快要疯了。我觉得我很想一把把她搂在怀里。我们说了又

说。她说她喜欢和我说话。很快，她说她也希望自己也能去纽约。“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我大笑。公交车费劲巴拉地攀上葡萄藤口岸，而后我们进入了阳光密布的所在。未经任何特别的协定，我们开始握着对方的手，与此同时，我们默然而又美妙并且纯粹地决定，当我入住我在洛杉矶的旅馆时，她就躺在我身边。我渴望与她融合，把我的脑袋靠在她漂亮的头发上。她小巧的肩膀让我疯狂，我不停地搂她，搂她，而她喜欢这样。

“我热爱爱情，”她说，闭着眼睛。我允诺她美妙的爱情。我如饥似渴地看着她。我们倾吐着彼此的故事。我们也会陷入沉默之中，但是怀着甜美的期待，就是那么简单。你可以拥有这世上所有的皮齐、贝蒂、玛丽露、里塔斯、卡米尔和伊内斯。这就是我的女孩儿，我的梦中情人，我告诉她了。她坦承她在车站就看到我在看着她。“我以为你是个彬彬有礼的大学生。”

“哦，我就是个大学生。”我向她打包票。车子到达好莱坞了。在灰蒙蒙、肮脏的拂晓，就像《沙利文的旅行》一片中乔尔·麦克雷在餐厅邂逅维洛妮可·雷克的那个拂晓一样样的。她趴在我膝上睡着了，我贪婪地望着窗外：刷着灰泥的房子，棕榈树，可开车取餐的餐厅，所有这些疯狂的事物，这稀巴烂的应许之地，美洲荒谬绝伦的尽头。我们在主干道上下了车，这地方看起来和你在堪萨斯、芝加哥或者波士顿没有任何区别——红砖墙、垃圾、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在绝望的拂晓驶入站点的电车、大城市淫荡的气息。

我脑海中杂念丛生，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产生了某种神经质的幻觉，觉得这位特丽莎，或者特雷——她的名字——是个在公交车上行骗的寻常的小骗子，专门哄骗人家兜里的钱，像我们这样相约在洛杉矶约会，首先她会带这个二货去一个吃早饭的地方，她的皮条客等在那里，而后去某个特定的旅馆，他会带着他的枪或者别的什么。我没向她坦白这个念头。我们在一起吃了早餐，附近有个家伙总是偷看我嘛，我幻想特雷也在跟他使眼色。我因此精疲力竭，感觉诡异，似乎迷失在一个遥远而令人作呕的地方。莫名的恐惧控制了我的头脑，让我做出了抠抠搜搜而廉价的举动。“你认识那人吗？”我问。

“你指的是哪个，亲——爱的？”我没往下说。她做什么都慢条斯理的：她花了好长时间吃东西；她慢腾腾地咀嚼，望着空无一物的某处，而后抽了一支烟，并且不停地说话，我则像一个神经兮兮的幽灵，揣测她的每一个动作，想着她可能在拖延时间。这全然都是有病的。我们在街上手拉手溜达着的时候，我浑身冒汗。我们去的第一家旅馆正好有间空房，在我的反应到来之前，我已经锁上了房间的门，而她已然坐在床上脱鞋。我温柔地亲吻着她，最好她别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想要放松我们的神经的话，我知道我们需要威士忌，特别是我。我跑了出去，狂奔十二个街区，终于在一家报刊亭找到了一品脱打折的威士忌。我干劲十足地又跑回来。特雷在浴室里，修整她的脸。我往一只玻璃杯里倒了一大杯酒，而后我们大喝特喝。哦，这是多么甜蜜美妙的时刻，值得我此前为之奔忙半天。在镜子前，我站在她身后，而后我们在卫生间搂着跳舞。我开始谈论我在东部的朋友们。

我说：“你应该见见我认识的一个叫多丽的朋友，她是个六英尺高的红发女人。如果你去了纽约，她会让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工作。”

“这个六英尺高的红头发是谁啊？”她犯疑地追问，“你干吗跟我提起她？”她那简单的小脑壳不可能理解我这种善意而神经质的谈话风格。我只好不再谈论这个话题。她在浴室里开始有了醉意。

“上床吧！”我不停地说。

“六英尺高的红头发，嘿？我还以为你是个很好的大学生呢，我看着你穿着那件可爱的T恤我就跟自己说，嗯，他不是挺好的嘛？不！不是的！不是的！你就跟他们所有人似的不过是个他妈的皮条客！”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别站在那儿跟我说这个六英尺高的红头发不是个妈妈桑，我一听到这个说法就知道是个妈妈桑，而你，你就像我遇到的其他那些皮条客一样样的，所有人都是皮条客。”

“听着，特雷，我不是个皮条客。我向《圣经》发誓我不是个皮条客。为什么我会是个皮条客呢？我感兴趣的只有你。”

“我一直以为我遇到的是个好男孩儿。我多开心啊，我搂着自己说，嗯，一个真正的好男孩儿而不是个皮条客。”

“特雷，”我用我的整个灵魂恳求她，“请听我说并好好理解一下，我不是个皮条客。”一个小时之前，我以为她是个骗子。多悲哀啊。我们脑子里这些货色，这些疯狂的念头，已经跑偏了，哦，可悲的生活，我不停地喃喃自语，不停地哀求，而后我发现我在向一个装聋作哑的墨西哥小婊子哀求着什么，我就这么跟她说了。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就拿起她的红鞋子，扔到浴室门口，并让她滚蛋。“走吧，赶紧的。”我得去睡觉，忘掉这一切。我有自己的生活，我自己永远可怜而又烂糟糟的生活。浴室里一片死寂，我脱掉自己的衣服，上床睡觉。

特雷从浴室出来，眼睛里含着不好意思的泪水。在她简单而又搞笑的小脑瓜里，已经断定一个皮条客不会把一个女人的鞋子扔出门并让她滚蛋。她安安静静地脱光了她全部的衣服，把她小巧玲珑的身体钻到被单里和我贴在一起。她的肤色是葡萄那样的红棕色。我看到她瘦巴巴的腹部，有剖腹产的刀疤。她的胯太窄小了，不划拉开根本无法生出个孩子来。她的腿就像芦柴棒儿。她只有四英尺十英寸那么高。我在清晨沉闷的甜美中和她做爱。而后，两个疲惫天使，有点像在洛杉矶这个收容所盘桓数日的模样，一起发现了生活中最亲密儿美妙的东西，我们一起睡觉，一直睡到下午。

接下来的十五天，我们好也好歹也罢都待在一起。我们睡醒后当即决定一起搭便车去纽约，她在那里将成为我的女朋友。我已经可以想象到迪安以及玛丽露惊诧莫名、复杂无比的狂野表情——一个季节，新一季开始了。首先，我们得去找点儿活，挣够路上要花的钱。特雷想着赶紧开始，因为我兜里只剩二十美元了。我不喜欢那样急吼吼地，而且，就像一个傻子，我花了两天时间琢磨这件事，我们破天荒地读着洛杉矶报纸上的招聘启事，那些咖啡馆和酒吧，直到我的二十美元缩减为十块出头。我们在我们的小破旅馆里待得很开心。大半夜的，我睡不着起来，把床单拉到宝贝儿裸露着的棕色肩膀上，然后凝视着外边洛杉矶的夜色。很粗鲁、闷热、此起彼伏的报警器声音传来。就在街对面出了点什么事，一座破破烂烂的寄宿楼兴许就是某个灾难的发生现场。一辆巡逻车就停在下面，几个警察正在盘问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儿。里边还传来了哭泣

声。我听到了所有的声响，包括我们旅馆霓虹灯发出的嗡嗡声。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这么悲哀。洛杉矶是美国城市当中最寂寞、最粗鲁的一个。纽约的冬天虽然能冻死狗，但在它的某些街头还能透露出一些暖心的情谊。洛杉矶就是个原始丛林。



主干道的南边，我和特雷一边啃着热狗一边瞎溜达，那是个灯光璀璨、嘈杂喧嚣的嘉年华，穿着靴子的警察在每个角落搜查行人。全国最衣衫褴褛的人簇拥在人行道上——这一切都发生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星空之下，掩盖了洛杉矶作为一个大规模沙漠露营地的现实。你可以闻到茶、叶子，我指的是大麻叶子，在空气中飘浮，混合着辣椒煮豆子和啤酒的味道。波普爵士乐喧嚣狂野的声音从啤酒屋里飘散出来，混合着各色牛仔音乐和布基伍基音乐的曲调，在美国的夜空中。每个人看上去都像哈塞尔。粗野的黑人戴着波普帽，留着山羊胡子大笑着涌进来；再然后是留着长头发，来自纽约，直接从六十六号公路下来的潮人；然后是沙漠上的耗子，背着包，打算在广场的公园椅上占个位置。以及袖管条分缕析的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以及留着大胡子、穿着凉皮鞋的“自然之子”教派的年轻信徒。我想和他们相识，跟他们每个人说话，然而特雷和我得忙于生计大事，我们想一道弄些钱。

我们跑去好莱坞，想在日落大道和葡萄藤大街交汇处的药店找份工作。这真是个奇妙的街角！常常有人拖家带口从偏僻地区专程坐车过来，站在街上想看一些电影明星，但电影明星从未露面。每次开来一辆豪车，他们都急慌慌地一拥而上，站

在道边想要一探究竟：一个戴着墨镜的家伙，边上坐着个金发女郎。“唐·阿米切！唐·阿米切！”“不！是乔治·墨菲！乔治·墨菲！”他们蜂拥而至一哄而散，互相张望。漂亮的牛仔男孩来到好莱坞想演个牛仔在周边晃悠，他们神气活现地用手指头把眉毛濡湿，那些世界上最漂亮的小姐穿着长裤招摇过市。她们本想跑到这里做明星，不料落魄潦倒于快餐厅。特雷和我也想在快餐厅找份工作。哪儿都不容易找口饭吃。好莱坞大道上车辆呼啸，成群的车辆喇叭齐鸣，每分钟都要引发一次小事故。每个人都往距离最远的那棵棕榈树奔去——除此之外尽是荒漠，别无他物。好莱坞的山姆大叔们站在摩登餐厅的门口，争辩不休，恰如百老汇的山姆们站在纽约的雅各海滩上那样吵闹，只不过在这里，他们没穿得那么多，口气也要粗鲁一些。高大而消瘦的牧师蹒跚着路过。肥胖而躁动不安的妇女横穿马路，排到一列参与智力竞赛的队列里。我看到杰里·科隆纳在别克汽车公司买了一辆轿车。他站在巨大的玻璃橱窗内，抚弄着自己的八字胡。特雷和我在城里一家装修得像岩洞的自助餐厅吃了饭，墙上装饰着金属乳头，以及神灵和周身泡沫的海神尼普顿的石头打造的臀部。人们在瀑布周边郁郁寡欢地吃着东西，他们发绿的脸上带着海洋的忧郁。所有在洛杉矶的警察看起来都像是富婆包养的情夫，所有人来此地的初衷都是当电影明星，甚至于我。特雷和我越混越差，最后不得不跑到南大街去找份营生，在那些侍者和女收银员之间，他们在挫败当中毫无骨气，他们对此无动于衷。我们还有十美元。

“哥们，我打算去我姐姐那儿拿上衣服然后我们搭车去纽约，”特雷说。“来吧哥们，我们就这么办。‘如果你不会跳

摇摆舞，我会教你怎么跳。’ ”最后两句话是她时常挂在嘴上的歌词。我们慌慌张张地去往她姐姐位于阿拉美达大道墨西哥人棚户区的家。我等在墨西哥人厨房后头一条黑乎乎的小道上，因为她姐姐不应该看到我。边上有狗跑过，小巷道里灯光忽明忽暗，暧昧不清。我可以听到特雷和她姐姐在这么个柔和、温暖的夜晚争吵，我等着任何坏消息。

特雷出来了，拉上我的手走向中央大道，这是洛杉矶有色人种最多的地方。这是个多么混乱的地方，鸡窝大小的棚屋恨不得连个自动唱机都放不下，而自动唱机播放的无外乎布鲁斯、波普爵士和节奏爵士。我们沿着廉租公寓肮脏的楼梯上楼，来到了特雷的朋友玛格丽娜家。他们那儿有特雷的一件衬衫和一双鞋。玛格丽娜是个可爱的黑白混血儿，她老公却像纸牌上的黑桃一样黑咕隆咚，但人挺和善的。他为了招待我特地跑出去买了一品脱威士忌。我想帮着付一部分账，他却说不要了。他们有两个孩子。孩子们在床上蹦来蹦去，那是他们玩耍的地方。他们用胳膊缠着我，好奇地看着我。伴随着中央大道夜晚的嗡嗡吵闹的声音——那正是汉普在《坍塌的中央大道》所唱的夜晚——嘶吼声、尖叫声不绝于耳。他们在门口唱歌，站在他们的窗口唱歌，谁都不在乎被人看到或者咒骂。特雷拿上衣物，我们就告辞了。我们再度来到鸡窝棚屋，在电唱机上点了一首歌。好几个黑人在我耳边窃窃私语，说着什么茶的，只要一美元。我说好的，给我吧。中间人跑过来，让我去地下室的厕所，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捡起来，哥们，捡起来。”

“捡什么？”我问。

他已经拿到了我的一美元。他不断指向地板，实际上地下室只有泥地，没有地板。地上有块看起来像是褐色小土块的东西。他真的是小心翼翼。“我得小心点儿，上个礼拜局势可不消停了。”我捡起那个土块儿，其实是棕色纸的卷烟，我回去找特雷，而后我们回到旅馆房间，想要嗨一下。但啥也没发生，那只不过是布尔·达勒姆的香烟。我猜我白花了那一美元。

特雷和我打定主意立刻就办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决定马上搭顺风车去纽约，拿着我们仅有的钱。那天晚上，她从她姐姐那儿拿到了五美元。我们差不多拥有十三美元也许更少。在那间房屋的租金再度到期之前，我们收拾好了东西，搭着一辆红色的车子去了加州的阿卡迪亚，在那儿，圣桑塔爱尼塔赛马场就坐落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之下。夜色降临，我们手拉手朝着美洲大陆前行。我们走了好几英里，离开了人口聚居的区域。那是个周六的晚上，我们站在一盏路灯之下，摆出搭车的手势，突然好几车满载着手持三角小旗的孩子们的车呼啸而过。“哦耶！哦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他们叫喊道。看到路边有一男一女站着，他们还挺兴奋的，朝着我们大喊大叫。经过了好几十辆这样的车，装满了年轻的脸蛋儿和俗话说的“刺耳的变声嗓音”。我讨厌他们每一个。他们以为自个儿是谁呀，朝着路边的人瞎嚷嚷，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是些中学里的小混蛋，爹妈能在周日下午吃吃烤牛肉？他们是些什么东西？取笑一个穷困潦倒的姑娘和她想要被爱的男人？我们只想

干好自己想干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没搭到便车，只好走回镇上。更糟糕的是，我们想喝杯咖啡，就去仍然在营业的咖啡馆，那是一所中学的饮品店，所有的小孩都在那里，而且还记得我们。而今他们认为特雷是个墨西哥人，一只无所事事的小野猫，而她的男友更糟。

她感觉到那里的气氛很不好就走了出来，在黑暗中，我们一起沿着高速公路的水沟往前走。我拿着所有的包，我们在寒冷的夜色中呼吸着雾气。我决定和她一起，从现实世界中再逃避一晚，等到天亮再说其他。我们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住进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小套房——有淋浴、浴巾、收音机等等。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相拥着进行了一次漫长、严肃的交谈，然后洗了澡，又开着灯讨论了一些事情，而后关上灯又在谈。一些事情都谈明白了，我和她确认了一些事，她能接受的，我们在黑暗中达成一致，屏住呼吸，就像两只脆弱的羔羊。

第二天早上，我们大胆地执行新的计划。我们搭了一辆公交车去往贝克斯菲尔德，在那里干采摘葡萄的活儿。干了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就走正道去了纽约，坐巴士。那是个美妙的下午，和特雷一起坐车去往贝克斯菲尔德：我们坐在那里，十分放松，聊着天，看着窗外乡村的景致掠过，啥也不用担心。我们在下午早些时候到了贝克斯菲尔德。我们的计划是到每个水果批发市场看一看。特雷说我们可以在工作中住在帐篷里。住在帐篷里，在加利福尼亚凉快的清晨摘葡萄的想法甚合我意。但工作没有那么容易找着，还有很多疑惑。大家给我们出了无

数的点子，而工作的事情还是一无所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吃了顿中餐，抖擞精神再度出发。

跨过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抵达墨西哥镇。特雷嘀嘀咕咕地和她的老乡聊天，打听工作的事情。夜幕低垂，那个墨西哥小镇上到处挂满了明晃晃的电灯泡，看电影的大帐篷，水果摊，游乐场，便宜的小卖店，几百辆摇摇晃晃的卡车和沾满泥点点的破烂车子到处停着。全家都出来采摘水果的墨西哥人一边闲逛一边吃爆米花。特雷和每个人说话，我已经绝望透顶。我需要的只是一——也是特雷需要的一——来点喝的，于是我们花了三十五美分买了一夸脱加利福尼亚红葡萄酒，跑到铁道调度车场去喝。我们找到一个地方，那里有流浪汉堆起的板条箱，他们围在边上烤火。我们坐在那里喝酒。我们的左手边是一些货车，在月下，它们涂成忧郁而肮脏的红色。正前方是贝克斯菲尔德的灯光和机场的地勤柱，我们右边是一座巨大的铝制昆斯特仓库。啊，那是个美妙的夜晚，暖和的夜晚，有酒喝的夜晚，有月亮的夜晚，一个可以让你搂着姑娘，聊聊天，吐吐口水，快活似神仙的夜晚。我们就是那么干的，她是个小酒鬼，很能喝，快赶上我了，甚至比我还能喝，我们一直聊到半夜。我们一直就在板条箱附近，偶尔地，有流浪汉路过，还有带着孩子的墨西哥母亲路过，巡逻车路过，警察下来嘘嘘，但大部分时间我们不受打扰，我们的灵魂越来越融合，直到很难说再见。午夜，我们站了起来，晃晃悠悠地向高速路走去。特雷有了个新主意，她觉得我们应该搭车去撒比纳尔，她老家，住在她哥哥的车库里头。任何安排对我来说都是可以的。在路边，我让特雷坐在我的行李上，她看着像个绝望的女子，一旦

有辆车停下来，我们就赶紧奔过去，一边吱吱咯咯地傻笑。这个开车的是个好人，虽然车很烂。他轰轰隆隆地把车开过了山谷。

我们在天快亮之前抵达了撒比纳尔。特雷睡着了，我喝光了所有的酒，喝得快要石化了。下了车，走在安静、洒满落叶的加利福尼亚小镇的广场上，它是南太平洋铁路公司铁路边上的一个小站。我们跑去找她哥哥的哥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她哥哥住在哪儿。却没人在家，天开始亮了起来，我躺在镇上广场的草坪上，不停地说着同一句话：“你不会告诉我他在韦德干什么，你会告诉我他在韦德干什么吗？你不会说的对吧？他到底在韦德干什么？”这段对白来自电影《人鼠之间》，里面布尔戈斯·麦雷迪斯和牧场工头说的，特雷咯咯直笑，我做任何事对她来说都没问题，我可以一直躺在那里那么犯傻，直到那些妇女走出教堂，她才不在乎呢。但我最后决定我们得收拾收拾好去见她哥哥，于是我带她去了铁道边的一家老旅馆，我们舒舒服服地躺到了床上。

天一亮，阳光灿烂的清晨，特雷早早起床去找她哥哥。我一直睡到中午，当我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货车从窗前经过，数百个流浪汉躺在平板车上，拿行李当枕头，读着搞笑报纸，拿一些从路边摘来的加利福尼亚品质优良的葡萄悠哉悠哉地吃着。“他妈的！”我嚷嚷，“嚯！这就是应许之地。”他们都来自弗雷斯诺，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就会照着老样子回去。

特雷和她哥哥，他哥哥的哥们，还有她的孩子一起回来了。她的哥哥是个墨西哥粗野健壮的小子，一副见了酒就不要命的样子。他哥们是个大块头、松松垮垮的墨西哥人，说的英语没什么口音，但说话很大声，总想讨好人。我能看出他对特雷有那种意思。她的儿子叫约翰尼，七岁了，大眼睛，很萌。好吧，我们聚齐了，疯狂的一天又开始了。

她哥哥名叫里基，他有一辆三八年产的雪佛兰。我们一拥而上，他开始胡开。“我们去哪儿？”我问。那哥们不给予任何解释——他叫庞佐，所有人都那么叫他。他闻起来臭臭的。我发现了其中的缘由。他靠把粪肥卖给农民谋生；他有一辆皮卡。庞佐口袋里总有那么三四美元，对所有事情都保持乐天的态度，“是的，哥们，就那么办——哒哒，走吧，哒哒，走吧！”他就那么走了，他把那辆破车开出了每小时七十迈的速度，我们去比弗雷斯诺更远些的马德拉，去和一些农民接洽粪肥生意。里基手持一只酒瓶。“今天我们喝酒，明天我们劳作，来来来，哥们——喝一口！”特雷和她的孩子一起坐在后排，我回头望望她，看到她脸上飞红，因为回家的开心。加利福尼亚美妙的绿油油的十月的乡村，呼啦啦向后退去。我又鼓足勇气准备上路了。

“我们现在去哪儿，哥们？”

“我们去找有些粪肥存着的农民。明天我们开着皮卡回来，拉走它们。哥们，我们会挣一大笔钱，别再为任何事担心。”

“我们人人有份！”庞佐喊道。我发现确实如此——无论我们去哪里，都见者有份。我们从弗雷斯诺聒噪的街市上穿行而过，到后边的街上找那些农民。庞佐下了车，去和一些老墨西哥农民大声地不知道聊些什么。当然，我是听不懂的。

“我们需要喝一杯去！”里基大喊大叫，于是我们下车去了十字路口的一家小馆子。美国人常常在周日下午在十字路口的小馆子喝酒。他们带着孩子们，一边东拉西扯一边为啤酒而争执，每个人都好聊天。夜幕降临时，孩子们开始苦恼，父母们都喝多了。他们踉踉跄跄地回到家里。在我去过的美国各处的十字路口小馆子，总能遇到人们拖家带口地出来喝酒。孩子们在后边一边吃着爆米花和炸薯条，一边玩耍。我们也是如此。里基、我、庞佐还有特雷坐在那儿大喝特喝，对抗着喧嚣的音乐狂聊。小宝贝儿约翰尼和其他孩子在自动点唱机边上玩儿。太阳慢慢变红。不需要完成任何事情。有什么事值得去完成呢？“明儿，”里基说，“明儿，哥们，我们将来有一天会成事的，再来杯啤酒，哥们，哇哇，你来啊，哇哇，你来啊！”

我们晃荡着离开那里，晃上了车，而后我们去往高速路边上的酒吧。庞佐是个吵吵嚷嚷的大块头，在圣华金山谷无人不识。我和他单独离开那个酒吧去找个农民，然后我们又跑去马德拉的墨西哥镇子，招揽一些姑娘，想给他和里基带回去。而后，当泛紫的暮色弥漫在葡萄园山谷之际，我哑口无言地坐在车里，而他正在和一位墨西哥老者讨价还价，为了买他在自家后院种的瓜。我们买了瓜，当场吃掉并把瓜皮扔在老头子家边

上泥泞的过道上。各种各样的漂亮女孩在渐渐暗下来的街上出现。我说：“我们他妈的到底在哪里？”

“别担心，哥们，”大块头庞佐说，“明天我们会大挣一笔，今晚我们不要操心。”我们回去，带上特雷和她的哥哥还有那个孩子，在高速公路的夜灯下开回弗雷斯诺。我们都饿极了。穿行过弗雷斯诺的铁轨，我们来到弗雷斯诺嘈杂的墨西哥小镇的街上。模样古怪的中国人从窗户探出头来，探视着周日夜里的街道；穿着时髦长裤的墨西哥小妞招摇过市；自动点唱机播放着吵闹无比的曼波舞曲；周边的灯光璀璨斑斓，好似万圣节。我们去了一家墨西哥餐厅，吃了玉米饼和裹在里边捣得稀巴烂的彩豆，都挺好吃的。我拿出最后一张挺括括的五美元的钞票，这本来是维系我和新泽西州之间路途的钱，我用它付了我和特雷的账单。现在我剩下四美元。特雷和我面面相觑。

“咱俩今晚睡哪儿，宝贝？”

“我不知道。”

里基喝醉了，现在他说的就是，“哇哇，你来，哥们——哇哇，你来，哥们，”用那温和而疲惫不堪的音调。这是漫长的一天。我们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或者上帝是如何安排的。可怜的小约翰尼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们开车回到撒比纳尔，在路上，我们在九十九高速的一家路边店猛地刹车。里基想喝最后一杯啤酒。小卖店后院停着拖车、有些帐篷，还有一些破破烂烂的汽车旅馆模样的房间。我问了一下价格，两美元。我问了特雷怎么样，她说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带着孩子，

得让他舒服点儿。我们在这个小馆子又喝了几瓶啤酒，一些脸色阴沉的流浪雇工在牛仔乐队的伴奏下扭着身体，特雷、我和约翰尼进入汽车旅馆的房间，准备睡觉。庞佐一直在周边晃悠，他没地方睡觉。里基回到他爸爸在葡萄园的棚屋去睡了。

“你住哪儿，庞佐？”我问。

“没地儿住，哥们，我应该和大露西住，但她昨晚把我轰出来了。我会去开我的皮卡，然后今晚就睡在里边。”

有人拨弄着吉他。特雷和我遥望着星空而后亲吻。“明天，”她说，“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觉得吗，萨尔宝贝，哥们？”

“当然啦，宝贝，明天。”总是明天，接下来一礼拜我还总是听到——明天，一个可爱的字眼，它也许意味着天堂。

约翰尼蹦上床，穿着衣服什么的睡着了，有沙子从他鞋里倒出来。特雷和我半夜起床，把床单上的沙子清理干净。早上我起床洗了洗，在周边溜达了一圈。我们离撒比纳尔五英里，在一片棉花田和葡萄园里。我问管理营地的胖女人有没有帐篷是空着的。有最便宜的那种，一美元一天。我给了她一美元搬了进去。那里边有张床，一个炉子，杆子上垂下来一面裂了的镜子，感觉还不错。我进去的时候得弯腰，我就那么做了，然后我的宝贝和我宝贝的男孩也是如此。我们等着里基和庞佐开着皮卡过来。他们带着啤酒来了，然后我们就在帐篷里开喝。

“粪肥怎么办？”

“今天太晚了，明天，哥们，明天我们挣大钱，今天我们喝点啤酒。你觉得怎么样，哥们？”我压根不需要别人催。“哇哇你来——哇哇你来！”里基嚷嚷道。我开始意识到，我们靠倒腾粪肥弄钱的计划是永远不会实现的。那辆皮卡停在帐篷外，那臭味儿闻起来和庞佐有一拼。

那天晚上，特雷和我钻进我们沾满露水的帐篷，里边空气闻起来甜滋滋的。我差不多要睡着的时候她说：“你想和我做爱吗现在？”

我说：“约翰尼怎么办？”

“他不在乎，他睡了。”但约翰尼没睡，他只是不吭声。

那两个人第二天又开来了粪肥卡车，又出去找威士忌。他们回来后，还是在帐篷里痛痛快快地喝了起来。那天晚上，庞佐说天太冷了，非要睡在我们帐篷里的地上，裹着他那张散发着牛皮味儿的防水油布。特雷烦他，她说他围着她哥哥团团转就是为了找机会靠近她。

我和特雷除了饥肠辘辘，看起来也没什么好事儿能发生了，于是大早上，我在乡下一路溜达，打听有没有摘棉花的活计。所有人都告诉我从营地沿着高速公路走出去，到农场打听打听。我去了，那农夫正和老婆一起待在厨房里。他出来，听我说了我的想法，提醒我说每摘一百磅棉花他只能付给我三块钱。我寻思自己每天大概能摘三百磅棉花，就接了这个活儿。他从谷仓里翻出来几个长条形的帆布口袋，告诉我天亮时分就

开始干活儿。我开开心心地跑回去找特雷。半路上，一辆运送葡萄的大卡车在路上颠了几下，几串巨大的葡萄掉到热滚滚的柏油路上。我捡起它们带了回家。特雷很高兴。“约翰尼和我会跟你一道去，打打下手。”

“呸！”我说，“少来这一套！”

“你看，你看，摘棉花是个苦力活儿，我摘给你看看。”

我们吃着葡萄，当晚，里基出现了，带来了一条大面包和一磅汉堡，我们在一起吃了野餐。我们隔壁的大帐篷里住着一整家子流动摘棉花的，老爷子整天坐在一张椅子上，他太老了干不动活儿了，他的儿子和女儿，还有儿女的孩子们，每天天蒙蒙亮就穿过高速公路，去我干活儿的那家农夫家摘棉花。第二天拂晓，我和他们一道去。他们说大早上的棉花因为带着露水，会比下午的重，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无论如何，他们从早干到晚。老爷子是三十年代闹灾荒时，从内布拉斯加迁移过来的。

那灾荒就是我蒙大拿的牛仔朋友告诉过我的沙尘暴——全家人坐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卡车风尘仆仆而来。从那以后，他们就待在加利福尼亚。他们热爱劳动。在十年间，那老头子的儿子将孩子的数目增加到了四个，他们当中有一些已经足够应付摘棉花的工作了。在此期间，他们的境况也从在西蒙·列格里压榨下的一贫如洗，到能够住进一顶比较受人敬重的体面帐篷。他们都很为自己的帐篷自豪。

“还想回内布拉斯加吗？”

“呸，那里啥也不剩了。我们现在想着要买一辆拖车。”

我们弯下腰开始摘棉花。四周景致优美。越过田野就是帐篷区，再往那头是枯黄的棉花田，它们一直绵延到褐色而干涸的小山丘，而后是在蓝天下顶着雪帽子的内华达山脉。这境况要比在南大街洗盘子好多了。而我丝毫也不懂得如何摘棉花。我花了太多时间把白棉花球从它们微脆的底座上取下来，别人好像做得轻而易举。而且，我的手指头开始流血了，我需要一副手套，或者更多的经验。有一对黑人老两口和我们在一块棉花地里。他们摘棉花时的从容好似战前他们的祖辈在阿拉巴马干活时一般。他们沿着棉花丛移动，忧郁地弯着腰，他们的口袋就慢慢地鼓了起来。我的腰开始酸疼。但是跪下来躲在棉花地里的感觉相当美妙。如果我想休息我就只管休息，枕着湿润的褐色土地。小鸟作为背景音乐鸣唱。我感觉自己找到了终生的事业。约翰尼和特雷在正午烈日当空的田野那头像我招手，并跑了过来，和我一起干活儿。见鬼，如果小约翰尼摘棉花的速度还没我快就好了！——当然了，特雷的速度是我的两倍。他们渐渐把我落在了后头，给我留下了一堆堆干净的棉花让我装到口袋里去——特雷是男人一般的一大堆，约翰尼是孩子般的一小堆。我伤感地把它们塞进口袋里去。我算哪号爷们，连自己的生计都搞不定，何况是养活他们？他们整个下午都跟我耗在一起。太阳转红时，我们一起拖着大口袋往回走。在田地尽头，我在秤上卸下了担子，它们称起来是五十磅，我拿到了一个半美元。而后我从那群移动摘棉花的小伙子那儿借了一辆

自行车，穿过九十九号公路到路边的杂货店买了煮熟的意大利面条罐头和肉丸子、面包、奶油、咖啡还有蛋糕，把这些吃的挂在自行车把上回家了。去往洛杉矶的车辆迎面而来，去往旧金山的在屁股后边催我。我不停嘴地咒骂它们。我仰望着黑黑的天空，向上帝祈祷给予我的生命这样一个更好的阶段，能给我一个更好的机会让我能够为我爱的这两个小家伙做点什么。在这里，谁也没拿我当回事。我应该早就明白了。是特雷将我的灵魂挽救了回来。在帐篷的炉子上，她热了吃的，那是我一生中吃过最盛大的一餐，我是那么地饥肠辘辘而且疲惫不堪。像一个老黑人棉花工一样叹着气，我歪躺在床上，抽着烟。狗们在寒冷的夜晚吠叫。里基和庞佐不再在夜里来我们的帐篷串门。我对此很满意。特雷蜷缩在我身旁，约翰尼坐在我胸口上，他们在我的笔记本上画着小动物。在令人恐惧的旷野当中，我们的帐篷亮着温暖的灯光。路边小店里播放的牛仔音乐从田野那头传来，有些凄怆。一切都很好，我亲吻了我的宝贝而后我们熄灭了灯。

清晨的时候，露水使帐篷耷拉下来了。我起床后拿着毛巾和牙刷，到旅馆的公共卫生间去洗漱，然后我回去穿上了我的裤子，头天因为跪在地上，裤子破了，特雷在夜里帮我缝补好了。我带上了那顶破破烂烂的草帽，它曾经是约翰尼的玩具，而后带着我的帆布棉花口袋穿过高速公路。

每天，我大概能挣个一块五美元。这刚好够夜里骑着车去杂货店买吃的东西。时间飞逝如电，我忘掉了东部，和所有关于迪安和卡罗还有该死的公路的事情。约翰尼和我总是在一起

玩耍，他喜欢我把他高高地抛向天空，并扔到床上。特雷坐在那里缝缝补补。我是世上的一个男人，一个像我在帕特森曾经幻想过的那种男人。听说特雷的老公已经回到了撒比纳尔还扬言要找我算账，我时刻准备着应对他。有一天晚上，那些移动棉花工在路边店发起了疯，把一个男人捆在树上，用棍子把他打得半死。我当时已经睡着了，是后来才听说的。从那以后，我总是在自己的帐篷里备着一根棍子，以免他们认为我们这些墨西哥人会在他们的营地搞七搞八。他们认为我是墨西哥人，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是。

但现在已经是十月，夜里比往常更冷了一些。那个移动棉花工家庭备好了一个烧木头的炉子，打算在这里过冬。我们啥也没有，而且帐篷的租期快要到了。特雷和我不得不决计离开。“回你家去吧，”我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不能带着约翰尼这样的小孩儿在帐篷区瞎晃悠，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会冻坏的。”特雷哭了，她觉得我在指责她的母性本能。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庞佐开着卡车来了，我们决定去看看她娘家的情况。但我不能被人看到，只能躲在葡萄园里。我们去往撒比纳尔，卡车抛锚了，与此同时，天降滂沱大雨。我们坐在破败的车上，咒骂着。庞佐下了车，在大雨中修车。他到底是个老派的好人。我们承诺彼此要好好地喝一顿。我们在撒比纳尔的墨西哥小镇，走进一家破烂不堪的小酒吧，足足喝了一个小时。我打算完结自己摘棉花的生活。我能感受到我自己的生活在召唤我回去。我给在大陆另一头的姨妈寄了张明信片，管她再要五十美元。

我们开车去了特雷家的窝棚。它们位于葡萄园之间的一条老路上。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把我放在离她家还有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灯光从门缝中发散出来，特雷的另外六个兄弟在弹着吉他唱着歌。她老爸正在喝酒。我听到了压过歌声的咒骂和争吵。他们骂她是个婊子，因为她离开她那不怎么样的丈夫，去了洛杉矶，并把约翰尼扔给了他们照顾。那老头儿不住声地叫喊。而那个忧伤的、胖胖的、棕色皮肤的老妈声音更大，她的风头总是能够盖过哪些干粗活的男人们。最后特雷被允许回归家庭，兄弟们很快开始唱起了快乐的歌曲。我蜷缩在十月山谷当中凄风苦雨的葡萄园内，远远地观望着这一切。我脑海中充斥着比莉·哈乐黛那首伟大的歌曲《情人》，我在灌木丛中举办了自己的小型音乐会。“有一天我们将重逢，你将擦干我的全部眼泪，在我耳边甜蜜私语，拥抱我亲吻我，哦，我们失去的那一切啊，情人，哦，你去了哪里……”歌词虽然没有旋律那么棒，但比莉唱得摄人魂魄，像一个女人在柔和的灯光下摩挲着自己男人的头发。风声呼啸，我冻坏了。

特雷和庞佐回来了，我们开着那辆咔咔作响的卡车去找里基。里基现在和庞佐的女人大罗塞住在一起。我们在破破烂烂的巷道口使劲地按喇叭。大罗塞把他赶了出来。一切都一塌糊涂。那天晚上我们睡在卡车上。特雷紧紧地抱住我，当然了，哀求我不要离去。她说她会去干摘葡萄的活儿，足以养活我们俩，而我可以住在她家路尽头的另外一个农夫赫弗尔芬格家的谷仓里。我可以整天什么也不干，就坐在草地上吃葡萄。“你喜欢那样吗？”

一大早她的表兄弟们开着另外一辆卡车来接走我们。我突然意识到整个乡下、数以千计的墨西哥人都知道特雷和我的关系，对他们来说，那会是个很有嚼头的、罗曼蒂克的八卦话题。表兄弟们彬彬有礼，甚至是很有魅力的。我坐在卡车里谈笑风生，聊着战争期间我们都在什么地方，干着些什么事情。表兄弟们有五个，每一个都很不错。他们不像特雷的亲兄弟那么大惊小怪。但我喜欢疯狂的里基。他发誓说要去纽约跟我会合。我可以想象他在纽约会是个什么德行，凡事拖到明天再说。那天，他正躲在田里某个地方喝酒呢。

我在十字路口处下了卡车，表兄弟们把特雷带回家。他们到了家门口后给了我一个明显的手势，父母亲都不在家，他们出去摘葡萄了。于是我整个下午就可以在房子里为所欲为。那是个有四间屋子的窝棚，我无法想象整个家庭如何在里边安居乐业。苍蝇在水槽上飞来飞去。他们甚至没安纱窗，正如歌中所唱的：“窗儿破了，雨儿飘了进来。”特雷在家了现在，在锅碗瓢盆当中收拾。她那两个小妹妹冲我吃吃地笑。外边路上，小孩们在尖叫。

当太阳红通通地从云中出现时，那是我在山谷的最后一个下午，特雷带我去农夫赫弗尔芬格的谷仓。农夫赫弗尔芬格在那一带开的农场经营得很红火。我们把板条箱拼到一起，她从家里拿来一些毯子，我感觉一切都安置停当了，除了在仓库屋顶上方正有只毛茸茸的大蜘蛛对我虎视眈眈。特雷说如果我不去招惹它，它是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直挺挺地躺下盯着它。我跑出去在一片墓地里，爬上了一棵树。在树上我唱起了《蓝

天》。特雷和约翰尼坐在草地上，我们吃起了葡萄。在加利福尼亚，你会仅仅吸出葡萄的汁液，而把皮儿吐掉，真是奢侈。夜幕降临，特雷回家做饭，九点许她带着香喷喷的玉米饼和捣碎的豆子来了谷仓。我在谷仓的水泥地面上燃起了篝火照明。我们在板条箱上做爱。特雷随后站了起来，直接回去他们的窝棚。她爸爸在冲她嘶吼，我从谷仓都能听到他的嘶吼声。她给我留了条披肩保暖，我把它披在身上，穿过月光照耀的葡萄园，去看看她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一条小路上匍匐前进，跪在暖和的土地上。她的五个兄弟正用西班牙语唱着美妙的歌。小屋的屋顶上星光灿烂，他们家炉灶的烟囱冒出了烟。我闻到捣碎的豆子和辣椒的香味。老头子一直在唠叨。她的兄弟们一直在用真假嗓音变换着唱歌。老母亲沉默不语。约翰尼和其他孩子们在卧室里嬉闹。一个加利福尼亚家庭，我躲在葡萄园内，看着这一切。我感觉自己像是拥有百万美元那样满足，我在美利坚疯狂的夜晚冒险。

特雷又出来了，把门从在她身后狠狠地带上。我在黑乎乎的路上陪她说话：“怎么回事儿？”

“哦，我们一直在吵架。他想让我明天就去干活儿。他说他不喜欢看到我无所事事地闲逛。萨利，我想和你一起去纽约。”

“怎么去？”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会想你，我爱你。”

“但我必须得走了。”

“是的，是的，我们再睡一觉，然后你走。”我们回到谷仓，我在大蜘蛛底下和她做爱，大蜘蛛在干吗呢？我们在板条箱上睡了一会儿，篝火就灭了。她半夜里回去了，她老爸喝多了，我能听到他在大喊大叫，他入睡后一切都静悄悄的了。星星们在入睡后的村子上空慢慢暗淡下来。

大早上，农夫赫弗尔芬格从马厩的门那头探进来脑袋，“感觉怎么样，年轻人？”

“挺好的，希望我待在这里没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没什么麻烦。你还跟那个墨西哥小骚货在一起吗？”

“她是个很好的女孩。”

“也挺漂亮的，我想是公牛跳过了围栏，搞杂了种系，她长着一双蓝眼睛。”我们聊了聊他的农场。

特雷给我带来了早餐。我收拾好了自己的帆布包，打算回纽约，一旦我到撒比纳尔拿到那笔钱。我知道那笔钱一定已经在那儿等我了。我告诉特雷我要走了。她整个晚上辗转反侧都在想着这件事，但也无计可施。她在葡萄园里不动声色地亲吻了我，我们沿着葡萄树往那边走。走了不多远又停下了脚步，因为爱就是决斗，我们最后一次深切地对望。

“纽约见，特雷，”我说，她想着一个月后和她哥哥一起开车去纽约。但我们都知道她办不到。她走回了窝棚，一只手里拿着我的早餐碟。我低下头望着她，再度上路了。

我沿着高速公路去往撒比纳尔，吃着核桃树上摘下来的黑核桃。我走在南太平洋铁路线上，在铁轨上保持着平衡。我经过一个水塔和一座工厂。这是某处的尽头。我去往铁路电报局看看我来自纽约的汇票来了没有。电报局关门了。我骂了句娘，坐在台阶上等候。票务负责人回来了，邀请我进屋。钱到了；我姨妈再度救了我一命。“谁会获得明年世界联赛的冠军？”瘦骨嶙峋的票务负责人问我。我突然意识到秋天已经到了，我正在回到纽约的路上。

我在忧郁的十月的山谷阳光下，沿着铁路线前行，希望有一辆南太平洋公司的车开过来，好让我加入那些吃葡萄的流浪汉群体里，和他们一起读漫画书。没有任何车开来。我上了高速公路，很快搭到了一辆车。那是我一生中搭过的最快、最吵闹的一次车了。司机是加利福尼亚牛仔乐团的小提琴手。他拥有一辆崭新的车，每小时开八十迈。“我开车的时候不喝酒，”他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我一品脱的酒。我喝了一口，还给他。“向什么致意呢？”他说着，喝了一口。我们一马平川地从撒比纳尔一路狂奔到洛杉矶，二百五十英里的路。他把我在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制片公司门前放下，我正好有时间跑进去，拿走我被拒的剧本稿子。而后我买了去匹兹堡的车票。我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一口气买票到纽约。我等到了匹兹堡再去发愁这件事吧。

车将在十点出发，我有四个小时可以在好莱坞晃悠一下。首先，我买了一大块面包和萨拉米香肠，打算给自己做十个三明治，好穿越这个国家。我还剩了一个美元，我一边坐在好莱坞停车场后边的水泥矮墙上，一边做着三明治。当我正认真地干着这件荒唐事时，好莱坞一部新片首映式的射灯刺穿了天空，西海岸闹腾的天空。环绕着我的是疯狂的黄金海岸的喧嚣——那是我在好莱坞的最后一夜，而我正在停车场后边的厕所后头往膝上的三明治抹芥末酱。

拂晓时分，我坐的公交车疾驰过亚利桑那沙漠——印第安、布莱斯、萨尔美（她跳舞的地方）。那一大片干燥的区域通向南边的墨西哥山脉。而后我们向北拐向亚利桑那山地，弗拉格斯塔夫，悬崖镇。我手头有一本从好莱坞书摊顺来的书，《大个儿莫纳》，阿兰·富尼埃写的，但我宁可饱览沿途美国的风光：每一处隆起，起伏，和开阔地都激发起我莫名的渴望。在黑漆漆的夜里，我们穿过了新墨西哥，在阴郁的黄昏抵达了得克萨斯州的达尔哈特。在凄凉的周日下午，我们经过了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又一个平坦的小镇，夜里到达了堪萨斯。汽车呼啸而行。我在十月回家，所有人都在十月回家。

我们在中午到达了圣路易斯。我沿着密西西比河沿岸散步，看到从北部蒙大拿漂流而下的原木——我们新大陆梦中的奥德赛大原木。带涡轮装置的老破轮船在风吹雨打中愈发破败，俨然成了耗子窝。午后盖顶的乌云压着密西西比河谷。当

夜，汽车呼啸着路过印第安纳州的玉米地，月光朗照的玉米叶宛如鬼魅，万圣节也快到了。我结识了一个女孩，在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路上，我们一直互相搂着脖子。她是个近视眼儿，当我们到一个地方下车吃东西的时候，我不得不拉着她的手，带她到午餐柜台那边。她买东西给我吃，我的三明治通通吃光了。作为交换，我给她讲长长的故事。她来自华盛顿州，在那里她整个夏天都在摘苹果。她的家在纽约附近的一个农场里，她邀请我去那儿玩。无论如何，我们相约在纽约的某个旅馆见面。她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下了车，而后我一路睡到了匹兹堡，我比过去多少年来都要感到疲惫。我还有三百六十五英里的路途需要搭车到纽约，但我兜里只有一毛钱。我走了五英里才走出匹兹堡，搭了两次车，一辆运苹果的车和一辆大拖车，它们在印度式夏季的雨夜，把我送到了哈里斯堡。我不断前行，归心似箭。

那是萨斯奎汉纳河的“幽灵之夜”。所谓幽灵，是一位自称要去“卡纳迪”的背着纸挎包的干瘪老头儿。他走得相当快，让我跟上，还说前面有座桥，我们可以跨过去的。他差不多六十来岁，一路不停地唠叨着他吃过的东西，他们给了他多少抹在松饼里的黄油，以及多少片多给的面包；马里兰一所收容所门洞里的那个老头如何热情地招呼他，让他一起过周末，他走之前如何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他是怎样在弗吉尼亚路边发现了一顶新崭崭的帽子，现在就戴在他脑袋上；他如何到每个镇上的红十字会串门儿，给他们看自己的一战参战证书；哈里斯堡的红十字会如何对不起它的名头；他如何在艰难时世当中走到今时今日。而我所见到的他，不过是个不怎么受尊敬的

流浪汉，靠着步行，走遍了整个东部荒野，造访每个红十字会，有时在一些主干道上跟人讨要一毛钱。我们一道乞讨，一起沿着忧伤的萨斯奎汉纳河边走了七英里。那是条可怕的河。它两侧悬崖上长出来的灌木丛，犹如幽灵的须发，探视着不可知的河水。黑漆漆的夜晚笼罩着所有。有时候，从河对岸的火车调度场亮起了一大片红光，照亮了那一片恐怖的悬崖。那个小老头儿说他的纸挎包里有条漂亮的腰带，于是我们停下来让他拿出来。“我在这附近弄到了一条好腰带——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弄到的。见鬼，我把那条腰带落在弗雷德里斯堡的柜台上了吗？”

“你是说弗雷德里克？”

“不，不，弗雷德里克斯堡，弗吉尼亚州的！”他总是谈及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和弗吉尼亚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他坐在大马路上，身处凶险的车流，好几次差点被撞到。我在沟里踉踉跄跄地走着，随时随地，我都觉得那个可怜的小疯老儿会在夜里被撞飞，然后死掉。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一座桥。我在铁道地下通道处和他道别，因为搭车搭得我一身臭汗，我换下了衬衫，穿上了两件T恤，路边店的灯光照亮了我这可怜兮兮的举动。有一家子人从黑乎乎的路上特地跑过来，看我到底在干嘛。最神奇的是，有位萨克斯管手居然在这个宾夕法尼亚的小路边店里，吹着美妙的布鲁斯。我一边听一边暗自抽泣。雨开始下大了，有个男人让我搭他的车去往哈里斯堡，并告诉我我走错路了。我突然看到先前那位流浪老儿正站在悲催的路灯下，竖起拇指——可怜的家伙，可怜的风光不再的家伙，现在

宛若孤魂野鬼流落荒郊野外。我告诉司机关于他的故事，司机于是停车和他说话。

“看这个，伙计，你现在冲着西边去的，不是东边。”

“哈？”那个小瘦鬼说，“你在告诉我我不识道是吗？我可是在这附近晃悠了好几年了，我要去加拿地。”

“但这条道不是去加拿大的，这条道是去匹兹堡和芝加哥的。”那瘦小老儿懒得理我们，走开了。我最后看到的是他背着小小的白色小包，在阿勒格尼山凄怆的暗夜里，上下晃动着。

我原本以为，美国所有的荒野都在西部，直到萨斯奎汉纳河的幽灵向我展示了不一样的东西。不，东部也有荒凉不堪的地方。那种荒凉和本·富兰克林当邮政局长时候，坐着牛车蹒跚而行的时期一模一样，也跟乔治·华盛顿是个印第安人表现出的野性一样，和丹尼尔·布恩在宾夕法尼亚油灯下信誓旦旦要找到通道时一样，与布拉德福修好了他的铁道，人们在小木屋里为之欢呼的时期一样。那不是为小人物提供的亚利桑那的广阔天地，只是东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荒草丛生的荒野之路，是类似于萨斯奎汉纳、莫农加赫拉、老波托马克和莫诺卡西那类河流边上，那些小暗道和黑柏油路。

当晚，在哈里斯堡，我不得不睡在火车站的一只长椅上。天蒙蒙亮，站长就把我扔了出来。当你刚刚开始你的生活时，你还是个在父亲屋檐下享受着甜美时光的孩子，而后世道沧桑

就如期光临了，你知道自己潦倒又悲惨，穷困又无助，衣不蔽体，就像个可怕而又悲痛的鬼魂，过着惨兮兮的噩梦般的生活。我踉踉跄跄地走出车站，已经不能自己了。我所能见到的清晨的白色只是坟墓的白色。我差不多就要饿死了，仅剩的还能带给我一点儿热量的东西，是几个月前我在内布拉斯加的谢尔顿买的止咳药了，我含着它们，获取其中的糖分。我不知道如何乞讨，只能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城，走到郊外时几乎没有多余的力气。我知道如果在哈里斯堡再待一晚上，我很可能就要被抓了。真是该死的城市！之后的那段路，我搭上了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的车，他相信控制饮食是有益健康的事情。当我们向东部行进时，我告诉他我快饿死了，他说：“好事儿，好事儿，对你来说没什么比这更好的，我自己已经三天三夜不吃东西了，我会活到一百五十岁。”他就是一把骨头，一只松松垮垮的玩偶，一碰就碎的枝条儿，一个神经病。也许我应该搭个胖子的车，他会跟我说：“让我们在这餐馆停下来，吃点猪排和豆子吧。”没办法，我不得不搭上了一个相信节食有利于身体健康的神经病的车。开了一百英里后，他突然发了善心，从车后备箱里取出面包黄油三明治。它们藏在他推销的样品当中。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内推销水暖管配件。我吞咽着面包和黄油。不由自主地开始大笑。我独自一人等在车里，他去阿伦敦打商务电话，我不停地笑啊笑。上帝啊，我多么恶心与厌倦生活。但这个疯子把我运送回了纽约，回家了。

突然，我发觉自己身处时代广场。我在全美旅行了八千英里而后又回到了时代广场，而且恰逢它的交通高峰期，以我懵懂上路的眼光看来，纽约有着绝对疯狂而又奇幻的氛围，数以

百万计的人们在其中争夺着钱财，做着疯狂的梦——抢夺、攫取、给予、叹息、垂死。只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埋葬在长岛外那些憋屈的墓地里。这片土地的高楼——另外一片土地的尽头，也就是美利坚诞生的地方。我站在地铁入口处，想要鼓足勇气在地上捡一根足够长足够好看的烟蒂，每次我冲过去弯下腰时，滚滚人潮就把我的视线阻隔开来，而后它就被踩烂了。我没有坐公交车回家的钱。帕特森离时代广场仅有几英里远。你能想象我最后走那几英里，穿过林肯隧道，或者跨过华盛顿桥，而后进入新泽西吗？天已经黑了。哈塞尔在哪儿呢？我在广场上到处找哈塞尔，不见他的踪迹，他在瑞克斯岛，在酒吧后头。迪安又在哪儿？大家都在哪儿呢？生活在哪儿？我有自己的家要回，有我可以把脑袋搁下来躺着的地方，在那儿我可以好好估摸一下得失。我得讨要到可以坐上公交车的两毛五分钱。我终于逮着一位站在街角的希腊神父。他给了我两毛五，而后神经兮兮地走开了。我立刻撒丫子向公交车奔去。

我回家后，吃光了冰箱里所有的东西。我姨妈站起身来看着我。“可怜的小萨尔瓦托，”她用意大利语说，“你这么瘦，你这么瘦，这些日子你都跑哪儿去了？”我穿着两件衬衫两件汗衫，我的帆布包里装着在棉花田里跪烂了的裤子和那双破破烂烂的皮凉鞋。我姨妈和我打算用我从加州给她寄的钱，买个冰箱，这还是家里的第一台冰箱呢。她上床睡觉去了，深夜我还无法入睡，躺在床上抽烟。我写了一半儿的手稿还放在桌上。就在十月，我回了家，继续开始工作。第一阵凉风吹得窗户哐当作响，我可算按时回来了。迪安来过我家，在这里睡了几个晚上，等我回来，而下午就用来陪着我姨妈聊天儿。姨

妈把家里这些年的旧衣服拆出来，织成了一块巨大的碎步地毯，这地毯已经完工了，就铺在我卧室的地板上，是那样的丰美多彩，犹如过去的时光本身。就在我回到家之前的两天，他走了，去了旧金山，我们可能在宾夕法尼亚或者俄亥俄的某个地方交汇过。他在旧金山有自己的生活，卡蜜儿在那儿弄到了一套新公寓。我在米尔市的时候，从未想过要去看她一眼，但现在已经太晚了，而我也想念迪安。

PART 2

1948 年 · 冬 *ON THE ROAD*

1

我再度见到迪安是在过了一年多之后。那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家里，写完了我的书，并依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开始上学。1948年圣诞期间，姨妈和我一起去弗吉尼亚探望我哥哥，带着一大堆礼物。在那之前，我给迪安写了信，他说他正往东部来呢。我告诉他，如果这样的话，他可以来弗吉尼亚州的特斯塔门特找到我，就在圣诞节和元旦节之间。一天，当我们所有南部的亲戚们团团围坐在特斯塔门特的客厅里时，那些眼角还带着老南方的泥土、疲惫不堪的亲戚们，用低沉、嘟囔囔的声音谈论着天气收成还有那些老掉牙的话题，诸如谁家又生了个孩子，谁家又买了个新房子，这时候，一辆溅满泥点的四九年款哈德逊汽车停在门前的泥路上。我不知道谁来了。一个疲惫不堪的小伙子，肌肉袒露，穿着件破T恤，胡子拉碴，红着眼睛，走进门廊，按响了门铃。我打开门，瞬间醒悟过来那是迪安。他不远万里从旧金山一路开到我在弗吉尼亚的哥哥罗科的

家门前，在如此奇妙而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他来了，就因为我刚刚写了告诉他我在哪儿的信。我看到车里还有两个人在睡觉。“真他妈的见鬼，迪安！谁在车里呢？”

“哈——喽，哈——喽，哥们，是玛丽露，还有埃德·邓克尔，我们得马上找个地方洗洗，我们都累成狗了。”

“但你怎么能这么快就来了这儿？”

“哈，哥们，这可是哈德逊！”

“你在哪儿弄的？”

“我用积蓄买的。我在铁道上打工，一个月挣四百美元。”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屋里乱糟糟的。我的南方亲戚们搞不清楚状况，谁是迪安、玛丽露和埃德·邓克尔，他们简直一头雾水。我姨妈和我哥罗科到厨房去商议。统共有十一个人挤在这个窄小的南方屋子里，得亏我哥哥刚刚决定从这房子里搬走，已经搬走了一半家具。他和他的老婆孩子要搬到挨近特斯塔门特的镇上去。他们已经买了一套新的客厅家具，老的那套盘算着要搬到我姨妈在帕特森的家里去，虽然还没商定到底怎么搬。迪安一听到这事儿，立刻提出用他的哈德逊来帮着搬。他和我可以带着家具跑两趟帕特森，最后一趟可以把我姨妈带回那里。这将省掉我们好多钱和麻烦。我嫂子做了一桌子饭菜，那三个筋疲力尽的人坐下来开吃。玛丽露从丹佛到现在就没睡过。我感觉她看起来变老了一些，但是更好看了。

我获悉迪安从1947年秋天开始，就跟卡蜜儿一起开开心心地住在旧金山。他在铁道上找到了一份工作，挣了好多钱。他成为一个漂亮小女孩儿的父亲，艾米·莫里亚蒂。毫无征兆，一天他走在街上，突然鬼上身了似的，他看到了那辆四九年款的哈德逊在打折，于是飞奔到银行拿出他所有的存款。他第一时间买下了那辆车，埃德·邓克尔和他一起。而后他们就破产了。迪安让卡蜜儿别担心，说他一个月后会回来。“我要去纽约把萨尔弄回来。”她听到这个事情并没有多高兴。

“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你干吗这么对我？”

“没什么，没什么，亲爱的——啊——嗯——萨尔哀求我、请求我去一趟把他带回来，我当然必须那么去做——但我们不必为此多做解释了——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不，听着，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他告诉了她为什么，当然了，也就是那么一说。

大块头埃德·邓克尔也在铁道上干活儿。他和迪安在一次裁员风暴中被开掉了，因为他们没啥资历。埃德遇到了一个名叫加拉提亚的女孩，她靠着一些积蓄住在旧金山。这两个没头脑的无赖打算把那个女孩带到东部，让她沿途买单。埃德百般哄骗和哀求她，她全然不为所动，除非他能和她结婚。在旋风般的数日内，埃德·邓克尔和加拉提亚结婚了，迪安跑前跑后帮着张罗那些文件，就在圣诞节前几天，他们以每小时七十迈的速度飞离旧金山，前往洛杉矶和那些无雪的南方公路。在旧金山，他们在一家旅行社带上了个水手，挣到了十五美元的汽油钱。那哥们要去印第安纳州。他们还让一位妇女和她的白痴

女儿搭上车，还让她出四美元的汽油钱，把她们带到亚利桑那州。迪安和白痴女孩一起坐在前排，他叨叨着：“这一路啊，哥们！这么个甜蜜可爱的小东西。哦，我们聊天吧，我们聊聊火焰，和变成天堂的沙漠，还有她那用西班牙语诅咒的鸚鵡。”等这些搭顺风车的乘客下车后，他们继续前往图森。加拉提亚·邓克尔，埃德的新老婆，一直抱怨她好累，想睡到汽车旅馆去。可是如果这么着的话，没等到弗吉尼亚，他们就得把她的钱花光了。其中两个晚上，她迫使他们停下来，在汽车旅馆浪费了几十块钱。他们到达图森的时候，她就没钱了。迪安和埃德在一家旅馆大堂把她扔在那儿了，带着水手继续他们的旅程，他们丝毫也不觉得有愧。

埃德·邓克尔是个高大、冷静、不好思考的家伙，永远百分百地对迪安言听计从，让他干吗就干吗，迪安总是很忙，对任何事都缺乏顾忌。正当他紧赶慢赶地穿过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时，他突然又萌生了一种炸裂的欲求，要再去看一眼他甜美的第一任妻子玛丽露。她住在北边的丹佛，他扭头向北行进，完全不顾那位水手软绵绵的抗议，当晚就潜入了丹佛。他四处奔波，在一家旅馆里找到了玛丽露。他们做了长达十个小时的疯狂的爱。一切事情又重新调整了，他们打算继续厮混在一起。玛丽露是迪安唯一真正爱过的女孩。当他再度看到她的脸时，他已经厌烦了悔恨，于是，他抱住她的膝盖哀求她，一如既往。她理解迪安，摩挲着他的头发，她知道他疯了。为了让那位水手好受点儿，迪安给他在旅馆房间安排了个妞，那是他从过去那帮老友经常喝酒的台球厅找到的。但是水手不要

这妞，当夜就消失了，他们再也没有见到他，他也许坐了公交车去了印第安纳。

迪安、玛丽露和埃德·邓克尔沿着科尔法克斯呼啸向东，进入了堪萨斯平原。当晚在密苏里州，暴风雪袭击了他们，迪安不得不用围巾厚厚地裹住脑袋，把头伸出车窗外那么开着车，他带着雪地墨镜，看起来活像一位把雪当一部书来读的苦修士，因为汽车的挡风玻璃上结了厚达一英寸的雪。在他祖先的出生地，他开起车来不假思索驾轻就熟。大早上，那车在一座小雪丘上直打滑，掉到沟里去了。一位农民帮他们弄了出来。他们遇到一位搭车人，答应到孟菲斯给他们一块钱。到了孟菲斯，那哥们一头扎回家，埋头找那一块钱，他喝多了，说他找不到。然后他们穿过田纳西州，经过这番折腾之后，大家精疲力竭。迪安先前把车开到九十迈，他这会儿不得不稳定地把车速控制在七十迈，否则整辆车都可能从山的一侧翻滚下去。他们在最冷的冬季翻越了大烟山。当他们抵达我哥哥家门时，他们已经三十个小时没吃东西了——除了点糖果和奶酪饼干。

他们开始狂吃，正当迪安手里抓着个三明治，弯腰站着，在那台大留声机跟前不停地蹦着，他在听的是我刚买的狂野的波普唱片《狩猎》，戴克斯特·戈登和瓦德尔·格雷在一大帮高声尖叫的观众面前吹着他们的萨克斯，造就了这张唱片疯狂、夸张至极的音量。那些南方亲戚们则面面相觑，惊讶地摇摇头。“萨尔都交往的是些什么狐朋狗友啊？”他们问我哥。我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南方人不喜欢装妖作怪的疯狂，就是迪

安这样的。而迪安对于他们压根就置若罔闻。迪安式的疯狂开成了一朵诡异的花儿，我认识到了他的这一点是在有一天他和我、玛丽露、邓克尔离开我哥哥家出去遛遛车时，那回我们才算是第一次有了在一起的机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机会。迪安握住方向盘，将车拨到二档，他沉思了一会儿，车开始发动前行，突然，好像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决定一样，他一踩油门，让车猛地加速。

“好了，孩子们。”他说，然后擦了擦鼻子，弯下身探了一下紧急刹车闸，从储物格里取出烟，他灵活地前后移动身体，一边继续开车。“下周我们要干什么，这会儿就该决定了，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哦耶！”他灵活地避开了一辆骡车，一位老黑人不紧不慢地驾驶着它。“是的！”迪安大喊大叫。“是的！琢磨琢磨他！现在研究一下他的灵魂——停一会儿，好好思考一下。”于是他慢下车速，好让我们所有人可以扭头看那个嘴巴里嘟嘟囔囔的老头儿。“哦是的，琢磨琢磨他亲爱的，现在我愿意好生去琢磨一下他的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我真想爬进他的脑袋里看看，除了今年的甜菜收成和火腿，还有些什么。萨尔，你是不会知道的，我十一岁的时候曾经在阿肯色州和一帮农民过了整整一年。我什么都干过，我还曾经撕下来过一张死马的皮。1943年圣诞节之后，我再也没去过阿肯色州，那年我和本·加文打算偷一个车上有枪的男人的车，结果被他一路追杀。我跟你讲这些是要说明，对于南方我绝对不是门外汉。我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儿——我是说，哥们，我深挖过南方，里里外外，我还仔细琢磨过你写给我的关于它们的信。哦，就是这样，哦，就是这样，”他说着说着，

车越开越慢近乎停下，又猛地加速回七十迈，他整个人都俯在方向盘上，眼睛盯着前方。玛丽露若无其事地面露笑容。这是一位崭新的、完整的、成熟的迪安。我对自己说，我的天，他变了。当他提及自己讨厌的事情时，他的眼睛里会喷出怒火；而当他突然感到快乐的时，巨大的喜悦又会席卷而来；他脸上的每块肌肉都在灵活地伸展收缩。“哦，哥们，我要跟你说的是，”他说，捅捅我，“哦，哥们，我们绝对必须找时间聊聊——卡罗尔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明天一大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卡罗尔。现在，玛丽露，我们得整些面包和肉，在回纽约的路上当午饭吃。你身上有多少钱，萨尔？我们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车后座上，P太太的家具什么的，我们所有人都挤一挤坐在前面，一路上讲讲故事，很快就到纽约了。玛丽露，心肝，你挨着我坐，然后是萨尔，埃德坐在车窗边，大埃德坐在窗边可以挡挡风，这下他终于可以用上他的盖毯了。而后，我们奔向我们美好甜蜜的生活，因为现在正是时候，而我们都知正是时候。”他恼怒地搓了搓自己的下巴，猛踩油门，超过了三辆卡车，他呼啸着把车开入了特斯塔蒙德的镇中心，他看向各个方向，而他丝毫不必转动脑袋就可以看到眼球覆盖一百八十度范围内的视野。砰！他瞬间发现了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于是我们停好了车。他跳下了车子，心急火燎地走进火车站。我们乖乖地跟着他。他买了包烟，从他的一举一动看来，他已经彻头彻尾地疯了，似乎在同一时间做了所有的事情。左右摇着头，上下点着头，侧着走，忽快忽慢地前进，充满活力的手势；急慌慌地走，坐下，架起二郎腿，放下二郎腿，站起来，搓搓手，拉拉前挡，提提裤子，抬起头

说“嗯”，瞬间又把眼睛转到一边看别的地方；与此同时，他一直提溜着我的裤带，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

特斯塔蒙德很冷，还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雪。他站在漫长而空寂的主干道上，这条路跟铁道平行，除了一件T恤，一条皮带都没扣上的松松垮垮的裤子，他好像随时要把裤子脱掉。他把脑袋扎到玛丽露跟前说话，又闪到一边，手舞足蹈地对她说。“哦，是的，我知道！我懂你，我懂你，亲爱的！”他的笑声颇为神经质，开始的时候低低的，最后十分高亢，活像电台里的神经病人，只不过更快更近乎犯傻。而后他又迅速地恢复到公事公办的口气。我们漫无目的地到了镇上，但他找到了目标。他让我们全部手足无措，派玛丽露去杂货店买午饭，派我去买份报纸看看天气预报，埃德则去买雪茄。迪安喜欢抽雪茄，他抽着雪茄翻着报纸说着话。“我们神圣美国在华盛顿的那些大佬们又在谋划新伎俩了——啊哼！——噉——嗨皮！嗨皮！”而后他猛地冲出门去，去看一个正好路过火车站门外的黑姑娘。“瞧瞧她！”他说，站着用小指头指着人家，又嘎嘎乱笑指着自己，“那走掉的可爱的小黑妞。哈！嗯！”我们上了车，飞速地开回我哥哥家。

我在乡下度过了一个安宁的圣诞节。我们回到家里时，看到了圣诞树，礼物，闻到了烤火鸡的香气，听着亲戚们的唠嗑，我意识到躁动再度降临了我，那躁动的名字就是迪安·莫里亚蒂，我又一次向路上进发。

2

我们把我哥哥的家具装在汽车后半截，天还黑着的时候就出发了，发誓要在三十小时之内回来——三十小时南北往返驾驶一千英里。但这就是迪安要干的。那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但我们谁也没发觉。车内暖气坏了，挡风玻璃上总是结满了雾气和冰。迪安不停地拿着块抹布去擦那块玻璃，像要创造性擦出一个窟窿来看清道路。“哈，神圣的窟窿眼儿！”在这辆宽阔的哈德逊内，我们四个坐在前排也还绰绰有余。一条毯子盖着我们的膝盖，收音机罢工了。那是一辆五年前出的新牌子车，现在已经坏掉了。我们也只付了一期的钱。我们一路向前，在华盛顿北边儿的三〇一号公路，一条车辆稀少的两车道的笔直的高速公路。迪安还在唠叨，别人都闭嘴了，他夸张地比比划划，斜靠在我跟前，仅仅为了说道个什么，有时他的双手完全脱离了方向盘，而车子依然像离弦之箭一样笔直向前，一刻也没有偏离路中央的白色分隔线，我们的左前轮一直如此。

迪安的来临完全是无缘无故、毫无意义的状况，与此同时，我毫无道理地追随着他。在纽约上学的时候我和一个叫卢西安的女孩谈起了恋爱，一个漂亮的、有着蜜色头发的意大利姑娘，我确实很想和她结婚。那些年，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结婚的女人。每遇到一个女孩我就会忍住不问自己：她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妻子？我告诉了迪安和玛丽露关于卢西安的状况。玛丽露想知道关于卢西安的一切，她想和她碰面。我们一路经过里士满、华盛顿、巴尔的摩，在去往费城的乡村路上一边颠簸，一边聊着。“我想找个女孩结婚，”我告诉他们，“让我可以和她一起安顿自己的灵魂，白头到老。我不能总这么过——这么东奔西走、流离失所。我们总得去找个地方落脚，发现点什么。”

“哈对，哥们，”迪安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你身上关于家庭和婚姻等诸如此类的美好的与你的灵魂相关的事物。”那是个忧伤的夜晚，也充满了欢愉。在费城，我们走进一家吃午餐的馆子，花了我们最后一点钱吃了一顿汉堡。柜员，那是半夜三点，他听到我们在谈钱的事儿，便主动提出，如果我们愿意去后厨帮着洗洗碗，我们会得到免费的汉堡和更多的咖啡，因为帮他洗碗的人今天来不了。我们蹦跳着进了厨房。埃德·邓克尔说他很久以前就在餐馆里洗过碗，于是他将长长的胳膊伸到碗堆里，洗了起来。迪安拿着块毛巾到处晃悠，玛丽露也是如此。而后他们开始在锅碗瓢盆当中勾肩搭背，他们躲到餐具间一个黑暗的角落去了。只要我和埃德老老实实洗碗，柜员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十五分钟就洗完了碗。天蒙蒙亮时，我们穿过了新泽西，纽约在云端浮现，越过茫茫的

雪原。迪安把一件白T恤绕在耳朵上保暖。他说我们就像一伙要来炸掉纽约的阿拉伯人。我们风驰电掣地穿过林肯隧道，径直抵达时代广场，玛丽露想看看它。

“哦，老天，我希望我能找到哈塞尔。大家好好擦亮眼，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我们认真地巡视着人行道。“好哈塞尔，哦你早该在得克萨斯见着他。”

迪安从旧金山开始差不多跑了四千英里的路，经过亚利桑那，到过丹佛，在四天之内就经过了无数神奇的冒险，而这仅仅还是开始。

3

我们去了我在彼得森的家睡觉，我是第一个醒来的，在当天下午的早些时候。迪安和玛丽露睡在我的床上，埃德和我睡在我姨妈的床上。迪安破破烂烂的、掉了链子的旅行箱摊在地板上，一只袜子露在外头。有人从楼下药房打电话找我。我跑了下去，那是从新奥尔良打来的一通电话，是搬到新奥尔良的老布尔·李打来的。老布尔·李用他尖利的、拖着哭腔的嗓子抱怨说，有个叫拉迪雅·邓克尔的姑娘刚刚抵达他家，她要找埃德·邓克尔。老布尔·李搞不清楚这些人都是谁。拉迪雅·邓克尔是个倔强的家伙。我让布尔告诉她邓克尔和迪安跟我在一起，我们会在返程回西海岸的路上去新奥尔良接她。而后那姑娘自己来接听了电话。她想知道埃德怎么样了。她非常在意他是否开心。

“你是怎么从图森跑到新奥尔良的？”我问。她说她发电报给家里，让家人汇钱，她坐上了长途汽车。她已经下定决心

要追随埃德，因为她爱他。我回到楼上，跟大埃德说了这件事，他忧心忡忡地坐在椅子上，他可真是人群中的天使。

“好了，现在，”迪安突然醒来，从床上跳起来，当即发号施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吃东西，越快越好。玛丽露，快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可吃的。萨尔，你跟我一起去药房给卡罗打个电话。埃德，你在屋里看看有什么可干的活儿。”我尾随着迪安，慌慌张张地下了楼。

开药店的家伙说：“你们又来了一通电话——这次是从旧金山打来的——找一个叫迪安·莫里亚蒂的家伙。我跟对方说这里没人叫这个名字。”那是最最甜蜜的卡蜜儿给迪安打的电话。开药店的哥们，山姆，一个高大、冷静的哥们，我的朋友，看着我，挠着自己的头说。“我的天，你们经营的是什么勾当，国际妓院吗？”

迪安笑得像个傻子。“我懂你意思，哥们！”他钻进电话亭，要了个旧金山方面付费。而后，我们给家在长岛的卡罗打电话，让他过来。卡罗两个小时后就到了。与此同时，迪安和我打算再度开车回弗吉尼亚，去接余下的家具并把我的姨妈接回家。卡罗·马克斯出现了，腋下夹着本诗集，他在简易凳上坐了下来，两眼发光地看着我们。在最初的半个小时里，他啥也不想说，说什么也不表达自己。自从丹佛那段令人愁肠百结的日子以来，他变得沉默寡言，那缘起于达喀尔，在达喀尔，他留着络腮胡，他跟着一群小孩去到后街上，孩子把他带到了会看预言命运的巫医那儿。他拍了一些一次成像的照片，都是关于达喀尔那些疯狂街上的茅草屋，还有死胡同。他说他在返

程路上，差点儿像哈特·克莱恩那样从船上跳海。迪安坐在地上摆弄着一只八音盒，听着里面一首优美的曲子。《美妙绝伦的浪漫故事》“小铃铛，团团转。啊！听！我们聚在一起，弯下腰琢磨八音盒里边的奥妙——小铃铛，噢耶。”埃德·邓克尔也坐到了地板上，他拿着我的鼓槌，开始轻轻地敲起鼓点好配合八音盒。他敲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细听。“滴……嗒……滴滴……嗒嗒。”迪安将手掌在耳朵后面罩成杯子状，他的嘴巴大张；他说：“啊！噢耶！”

卡罗眯起眼睛，看着这傻乎乎的疯狂举动，最后他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膝盖说：“我有事要宣布。”

“什么？什么？”

“这次来纽约的旅行有什么意义？你们现在到底在搞什么鬼？我是说，哥们，你们到底要去哪里？你们要去美国哪里？夜里开着那么一辆金光闪闪的车子？”

“你要去哪里？”迪安张开嘴，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我们坐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再也没什么可聊的了。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出发。迪安猛然起身说我们该准备回弗吉尼亚了。他洗了个澡，我做了一大锅米饭，把家里剩下的吃的全部放进去，玛丽露补好了袜子，我们准备启程了。迪安和卡罗还有我驾车飞奔到纽约，我们承诺赶在新年之前三十个小时之内和卡罗见面。那是夜里，我们把他放在时代广场，返身穿过收费昂贵的隧道，奔赴新泽西上了路。我们俩轮番上阵开车，迪安和我仅仅花了十个小时就抵达了弗吉尼亚。

“现在是我们多年来头一回单独在一起，可以好好聊一聊了。”迪安说。而后他彻夜都在说话。我们梦游般地穿过了沉睡中的华盛顿，返回弗吉尼亚的荒野。天亮时分穿过了阿波马托斯克河，早上八点稳稳当当地把车停在了我哥哥家的门口。迪安高度亢奋，每一样他所见到的事物，每一个他所谈及的话题，过去的分分秒秒的每一点儿细节。他欣喜若狂，不知所以。“当然啦，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们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你记得吗，萨尔，当我头一回来纽约的时候，我请求查德·金给我讲讲尼采。你发现这是多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吧？一切都很好，上帝还好好好的，我们知道了时间。从古希腊人到现在，一切的预言都落空了。你别想用几何学或者几何学的思维方式去实现它。就这么回事儿！”他将每一根指头紧握成拳头，车子笔直无误地向前行进。“不仅如此，我们俩都知道我没时间去解释为什么上帝是存在的。”有些时候，我嘟嘟囔囔着生活中的麻烦事儿——我的家境如何清贫，我有多么想帮助卢西安，她也一样穷，还有个女儿。“麻烦事儿，你看，正是上帝之所以存在的依据词，重点是不能被麻烦纠缠上。我脑袋里嗡嗡响！”他叫道，抱紧他的脑袋。他就像格劳乔·马克斯一样冲出车门，去买香烟。那种急促的步态宛如燕尾服的下摆正随之飞舞，只是他没有燕尾服。“从丹佛到现在，萨尔，发生了太多事情了，哦，那些事——我反复想了又想。我曾经一直是个被关在感化院里的小流氓，是个年轻的朋克，为了显示自己，我把偷车当作显示自己心理优势的表达方式，总是想显摆。现在我在监狱中的问题基本上很清楚了，正如你所知，我不会再进监狱了。余下的也不是我的问题。”我们经过时一个小孩儿正往路边的车里扔石头。“想想

这个，”迪安说。“有一天他把一块石头扔进某个男人的挡风玻璃，那个男人被砸中了，死掉了——那都是那个男孩干的。你知道我说的意思了吗？上帝毫无疑问义是存在的，当我们行进在这路上的时候，我坚信关于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有了安排——即便是你，你开车的时候，那么害怕车轮子。”（我讨厌开车，总是开得小心翼翼。）“一切都恰如其分，你不会偏离路线，我可以睡大觉。另外，我嘛最了解美国，我们在自己家。在美国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得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因为在美国每个角落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知道这里的人们他们在干吗。我们给予，索取，在不可思议的、复杂的甜蜜中曲折前行。”他说的一切都不是那么清楚，但他想表达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却纯洁可辨，他大量地用“纯洁”这个词。我从未想过迪安会变成一个神秘主义者。这是他神秘主义的早期，之后会进入古怪而且落拓的W.C. 菲尔兹式的圣洁。

当天夜里，我们在车后边装上家具，连夜赶回纽约，即便是我姨妈都留着半只耳朵，听迪安的高谈阔论，这会儿因为姨妈也在车里，迪安开始脚踏实地地谈起他在旧金山的工作。我们没有错过任何一点儿关于铁路司闸员如何工作的细节，每次经过场院都要以此为例，在某个点上，他甚至跳下车，给我们示范司闸员如何在会车时候给出信号。我的姨妈退到后座，睡着了。半夜四点在华盛顿，迪安再度拨通了让卡蜜儿在旧金山付费的电话。之后不久，我们刚刚驶离华盛顿，一辆巡逻车拉响警报器追上我们，给我们开了一张超速罚单，尽管我们的速度不过三十迈。这都是加利福尼亚的牌照惹来的祸害。“你们

这些家伙以为在这儿可以爱开多快就开多快，就因为你们来自加州吗？”警察说。

我和迪安去了警察局，试图跟警察解释说我们没有钱。他们说如果拿不出罚金来，迪安将不得不在牢里过夜。当然了，我的姨妈有这笔钱，十五美金，她统共有二十美金，事情就变得好办了。事实上，当我们正跟警察大吵大闹的时候，有个警察跑去车里看了眼我的姨妈，她正裹着毯子坐在后座上，她也看到他了。

“别担心，我没枪。如果你来搜查车，尽管随意。我和我外甥一起回家，这些家具不是偷来的，是我外甥女的，她刚生了个宝宝，她正打算搬到她的新家。”这一连串话让警察哑口无言，只好缩回警察局。我的姨妈不得不帮迪安付了罚金，否则我们就得羁绊在华盛顿。我没有驾照。他答应还这笔钱，而他真的那么干了，就在一年半多点儿的时候，这给了我姨妈一个意外的惊喜。我的姨妈——是一个不幸沦落在这个悲哀世界的可敬的妇女，她懂得这个世界。她给我们讲了警察的事情。“他躲在树后头，想看看我长什么样儿。我告诉他——我告诉他想搜车的话悉听尊便。我没什么好羞愧的。”她知道迪安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也是，正因为我和迪安混在一起，迪安和我悲哀地接受了这一切。我姨妈有一回曾说，如果男人们不拜倒在女人足下请求原谅的话，这个世界永远得不到安宁。迪安知道这点，他提到过很多次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恳求玛丽露在我们纯洁的爱之间，建立起一种甜蜜的谅解，抛掉

一切的争吵，她能理解。但她还有别的心思——她追随我。她理解我有多爱她，她正在毁灭我。”

“事实上是我们不理解我们的女人；我们责怪她们，但其实过错在于我们。”我说。

“其实没那么简单，”迪安说，“和平会突然光临，但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对吧，哥们？”他阴着脸，一口气开过新泽西。傍晚时分，换我开到彼得森，而他在后排睡觉。早上八点，我们到地儿了，发现玛丽露和埃德·邓克尔正坐在烟灰缸跟前，从里面捡烟屁股抽，他们自打迪安和我离开后就没吃过东西。我姨妈买了吃的，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4

现在是西部三人特别行动小组在曼哈顿区找个新的落脚点的时候了。卡罗在纽约大道上有个公寓，他们当晚就要搬进去。我们整个白天都在睡觉，迪安和我，醒来时正逢一场大雪席卷了1948年的新年夜。埃德·邓克尔坐在我的简易凳上，絮叨着上一个新年的陈年往事。“我在芝加哥，一穷二白，我坐在北克拉克大街的旅馆房间窗边上，楼下面包房诱人的香气直往我鼻子里钻。我一毛钱也没有，但还是厚着脸皮下了楼，和那个女孩说话。她白给了我面包和咖啡蛋糕。我回到屋里吃了它们。我在房间里待了一整夜。在犹他州的法明顿，有一阵子，我和埃德·沃尔一起干活儿——你知道埃德·沃尔吧，丹佛那个农场主的儿子——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突然，我看到我那死去的妈浑身闪闪发光，站在屋子一角。我喊道：‘妈！’她消失了。我眼前总是出现幻觉。”埃德·邓克尔点点他的头说。

“你打算拿拉迪雅怎么办？”

“哦，走着瞧吧，等我们去了新奥尔良，你不这么认为吗，哈？”他开始扭头对着我寻求意见。光是一个迪安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但他已经爱上拉迪雅了，开始琢磨这件事。

“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埃德？”我问。

“我不知道，”他说。“我就这么走着看看，我在琢磨生活本身。”他重复了一遍，学着迪安的口气。他没有方向可言。他正回味在芝加哥的那夜——孤零零的房间里的热咖啡蛋糕。

大雪在窗外飞舞飘扬，纽约将召开一场盛大的派对，我们都要去。迪安把他的破旅行箱放到车上，我们一道出发前往的是个不同寻常的夜晚。我的姨妈正为我哥哥下周要来拜访高兴不已，她拿着报纸坐在那里，等着午夜时代广场传来的新年广播。我们的车轮子一路打着滑进入纽约。迪安开车的时候我从不担心害怕，他能在任何情况下把车开得好好的。收音机已经修理好了，这会儿他调到波普爵士，让我们嗨起来。我好像不知道要去哪里，也毫不在乎。

正当那时，一件诡异的事情开始困扰着我。那就是：我遗忘了一些什么。那是在迪安出现前，我下定决心要做的一个决定，而今它消失得一干二净，但依然悬挂在我意念的舌尖上。我不停地打起响指，想要回忆起来。我差不多要想起来了。但我深知不能记起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决定，还是一个我已忘记的

念头。它缠绕着我笼罩着我，让我惊诧莫名，让我感到悲伤。它好像跟裹尸布旅行者有点什么瓜葛。卡罗·马克斯和我曾经促膝长谈，面对面坐在两张椅子上，我告诉他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梦，一个古怪的阿拉伯人在大漠之中追杀我，我想挣脱他的追逐。就在我赶到安全的城市之前，他逮住了我。“这是谁呢？”卡罗问道，我们琢磨着。我认为那是我自己，裹着个裹尸布。然而并不是。某样东西、某人、某种神灵在我们穿过生命荒漠的过程中追杀着我们，并在我们抵达天堂之前得逞。自然地，现在我回想起来，这只是死亡：死亡会在我们到达天堂之前截住我们。那些我们活着的时候孜孜以求的东西，那些让我们叹息、呻吟、历经甜蜜与劫难的种种，那些我们曾在子宫内经历过的失去的狂喜，再度重现，并且可以借由死亡得以实现（尽管我们讨厌承认这一点）。但谁乐意去死呢？在倏忽而过的事物当中，我内心深处始终在想着这个问题。我跟迪安说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只是单纯地想要纯洁的死亡，而我们不会再活一次，他，当然与它毫无瓜葛，我对此深表同意。

我们跑去见我们在纽约的朋友们，疯狂之花也在那里开放。我们先去找汤姆·赛布鲁克。汤姆是个忧郁、帅气的家伙，甜蜜、慷慨有加、善解人意，只是偶尔他会突然被抑郁症袭击，一句话也不说地跑了出去。那天晚上他格外高兴。“萨尔，你从哪儿找到这些绝顶棒的人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

“我在西部发现了他们。”

迪安如鱼得水，他放上爵士乐，把玛丽露一把抓过来，紧紧搂住，随着音乐的节奏与她蹦跶起来。她也回应着，那是真爱的舞蹈。伊恩·麦克阿瑟也带来了一大票人。纽约的周末开始了，持续了有三天三夜。这一大帮子人挤进哈德逊轿车，在雪中的纽约，从一个派对辗转到另外一个。我带着卢西安和她妹妹去了最大的那场派对。当卢西安看到我和迪安以及玛丽露在一起时，脸色一沉，她感觉到他们把疯狂传染给了我。

“我不喜欢你和他们在一起。”

“哈，没关系啦，这只是玩玩，我们只活一次，我们得好好玩耍。”

“不，这太悲哀了，我不喜欢。”

而后玛丽露开始向我求欢，她说迪安将要和卡蜜儿待在一起，她想要我和她在一起。“和我们一起回旧金山吧，咱俩住在一起。我会做你的好女孩儿。”但我知道迪安爱玛丽露，我也知道玛丽露这么做只是为了勾起卢西安的嫉妒，我可不想变成这个局面。无论如何，我对这个金发女郎还是挺蠢蠢欲动的。当卢西安看到玛丽露把我推到角落里，跟我说着那些话，并强吻我时，她接受了迪安的邀请，跑到外边车里去了。但他们只是在那儿聊聊天，喝一喝我藏在车内储物格里的南方私酿酒。一切都搅和在一起，并且向下坠落。我知道我和卢西安长久不了。她想让我走她的路数。她嫁给了一个待她很差的码头工人。我想要接这个盘，娶了她，并接受她的女儿，如果她能离成婚的话。但他们连离婚的钱都没有，所以一切都毫无希

望，不仅如此，卢西安从不理解我，因为我喜欢那么多的东西，总是从一个堕落的星球奔向另一个，直到我自己也是直线下坠。我对任何人都给不出什么，除了我的困惑。

派对相当盛大，差不多有百来号人聚在西九十几号的地下公寓内。人们涌入暖气炉边上的地下室隔间内。每个角落，每张床，每只沙发上都正发生点什么——不是纵欲，而是纽约派对特有的尖叫和狂野的收音机音乐。甚至还来了个中国女孩。迪安像格劳乔·马克斯那样从一群人跑到另外一群里去，跟每个人攀谈结识。每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开车出去再接一拨人。达米恩来了，达米恩是我们纽约帮的英雄人物，正如迪安是西部的男主角一样。他们彼此很快看对方不爽。达米恩的女友突然挥起右拳打了他的下巴，他被打得都站不稳了。她把他弄回家了。我们一些疯狂的报社朋友们带着酒从办公室过来。外边暴雪连天。埃德·邓克尔和卢西安的妹妹一见如故，和她一起消失了。我忘了说埃德是个在女人跟前很得宠的家伙。他有六英尺四高，温和体贴，善解人意，总是和和气气的。女人们穿脱大衣的时候，他总会上前帮忙。就是这么回事儿。凌晨五点，我们从廉租公寓的后院穿过，从窗户爬进了正在进行大派对的一间公寓。到了傍晚，我们又回到汤姆·赛布鲁克那儿。人们在那儿画画，喝着走了气的啤酒。我搂着一个叫莫娜的女孩躺在沙发里，一票又一票人从老哥伦比亚大学酒吧向这里涌入。生活中的一切，生活的种种面孔，都塞在这个湿乎乎的房间内。伊恩·麦克阿瑟那个派对还在继续。伊恩·麦克阿瑟是个甜美可爱的家伙，戴着眼镜，镜片后发散着愉悦的眼神。他开始对所有事情都说：“好！”就像此时此刻的迪安一样。并且

再也停不下来了。在戴克斯特·戈登和瓦德尔·格雷吹奏的狂野的《狩猎》乐曲声中，迪安和我在沙发上和玛丽露玩接手球，她在这方面是个老手。迪安光着上身，穿着他的裤子，光着脚到处晃，随时打算开上车出去接来更多的人。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我们发现了狂野、喜庆的罗洛·格雷布，在他长岛的家里待了一晚上。罗洛和他姨妈住在一所豪宅里。等她死后，这房子就是他的了。在此之前，她拒绝配合他的任何愿望，厌恶他的朋友们。他把我们这票烂人带回家：迪安、玛丽露、埃德和我，在屋里造出巨大的动静。那老女人在楼上走来走去，扬言要报警。“哦，闭嘴，你这个老不死的！”格雷布嚷嚷道。我搞不明白他怎么和她住在一起。他有比我一辈子所见过的书还要多的书——两个图书馆，两个房间从地上到天花板，四壁都是书架。包括那种诸如十卷本的《伪经》之类的书。他演出威尔第的歌剧，穿着后背上有个大口子的睡袍来比划他们。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怨。他是个腋下夹着十七世纪乐谱原稿，穿过纽约码头区的大学者，大喊大叫着。他像只大蜘蛛一样爬行过街道。他的兴奋是从他发射出恐怖光芒的眼睛中投射出来的。他不停地扭动着脖子。他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他扭着，猛地坐下，嘟嘟囔囔，还嚎叫，他近乎绝望地往后一靠，几乎说不出一句话，竭尽了一生的兴奋。迪安垂着脑袋站在他跟前，不停地重复着，“对……对……是的。”他把我拉到一个角落。“这个罗洛·格雷布是所有人当中最了不起、最棒的。我想跟他一样。他永不止息，他去往任何方向，他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他审时度势，除了义无反顾地前进没有别的。天啊，他就是终极！你看，如果你以他为楷模，你最终也会得到。”

“得到什么？”

“那个！那个！我会告诉你的——但现在没时间了，我们现在没时间了。”迪安跑回去，要多看一会儿罗洛·格雷布。

乔治·西林，那位伟大的爵士钢琴家，迪安说，恰如罗洛·格雷布。一个漫长而疯狂的周末当中，迪安和我跑去鸟国酒吧看西林演奏。那地方还没啥人，十点钟，我们是第一波顾客。西林出来了，双目失明的他被人牵着手来到钢琴琴键跟前。他是个气宇轩昂的英国人，穿着纯白的硬领衬衫，微胖，金发，他周身弥漫着英国仲夏夜的气息。当大提琴手向他侧身，开始拨弄出乐音时，他手下开始弹奏出令人心旷神怡的曲调。那位鼓手，丹齐尔·贝斯特，一直安安静静地坐着，除了他的手腕转动着刷子。而西林开始晃动，他沉迷不已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开始的时候很轻柔，而后开始晃动着钢琴凳，向前向后，随着节奏的加快，他晃得越来越快，他的左脚随着每一个节奏打着拍子，他的脖子开始一伸一缩地摇晃，他把脸贴近琴键，他向后拨弄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原本梳得纹丝不乱的头发开始凌乱了，他开始流汗。音乐越来越轻盈。低音大提琴手弓着腰，专心致志地拉弦，越来越快，看起来越来越快。西林开始弹奏他的旋律，钢琴的乐声一泻而下，你感觉像是乐手没有时间将它们理顺。它们波涛汹涌宛如大海。乐迷们为他呐喊“加油！”迪安流着汗，汗水浸透了他的领子。“就是他！就是他！老天哪！老天啊西林！是的！是的！是的！”西林能感受到他背后的疯子，他能听到迪安的每一次呼吸声和咒骂，尽管看不到，他能感受到。“没错儿！”迪安喊道，“是

的！”西林微笑着，他摇晃着，从钢琴跟前站起来，大汗淋漓，那是他在1949年的伟大时光，在他一夜成名和商业化之前。他走后，迪安指着那张空荡荡的钢琴凳说。“上帝的空凳子。”他说，钢琴上放着一把小号，它身上金色的影子来自乐池后墙上画的沙漠驼队。上帝走了，那是他离去后的寂静。那是个雨夜。那是雨夜的奇迹。迪安满怀敬畏地瞪大了眼睛。这种疯狂不会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我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我突然意识到那是我们吸的大麻引起的，迪安从纽约带了一些过来。那让我感觉一切都将来临——那些当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注定发生的一切。

5

我丢下他们独自回家休息。我姨妈认为我和迪安这伙人厮混在一起就是浪费时间。我也知道那是不对的。生活就是生活，对错是对错。我想要的是再度去西海岸晃一圈儿，再回学校赶上春季开学。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趟旅行啊！我只是跟着大家搭搭顺风车，看看迪安还要干些什么，最后，我也知道了迪安要回旧金山和卡蜜儿待在一起，我想泡泡玛丽露。我们打算再次穿越艰难的大陆。我拿到了我的军人补贴，给了迪安十八美元让他寄给妻子，她等着他回家，已经等得一贫如洗了。玛丽露的心思是些什么，我不太清楚。埃德·邓克尔，一如既往，只是跟着我们。

那是一段漫长而好玩儿的时光，在我们离开之前，待在卡罗的公寓里。他穿着浴袍走来走去，发表一些愤世嫉俗的演说：“我不想把你们的扬扬自得破坏掉，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是时候决定你是什么人，你要做什么了。”卡罗那阵子在办公

室当打字员。“我想搞清楚像你们这样整天坐在屋里是怎么个意思。所有的这些夸夸其谈是在聊啥？你们到底要干吗？迪安，你干吗不离开卡蜜儿，选择玛丽露呢？”没人回应——有人窃笑。“玛丽露，你干吗也跟着这样浪迹全国？关于裹尸布，你的女性观点是什么？”没人吭声。“埃德·邓克尔，你干吗把你的新老婆扔在图森，你撅着你的大屁股在这里坐着干吗？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工作呢？”埃德·邓克尔莫名其妙地埋下脑袋。“萨尔——这么潮湿的天气你怎么会光临？你对卢西安干了些什么？”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睡袍，对着我们所有人坐下。“惩戒的那天即将来临，你们幻想的气球支撑不了太久了。不仅如此，这是个抽象的气球。你们都得飞回西海岸，再踉踉跄跄地回来，寻找你们的宝石。”

那些日子里，卡罗可以养成了一种他希望听起来像是他所说的岩石之声的声调，他想借此震慑众人，让大家意识到他岩石般的存在。“你们将一条龙钉在帽子上。”他警告我们，“你们将会和蝙蝠一起待在阁楼里。”他用某种疯狂的眼神瞪着我们。自从达喀尔的抑郁之后，他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日子，他称之为“神圣的抑郁期”，或者“哈莱姆的抑郁”。当时正逢盛夏，他住在哈姆莱区，半夜里他在那冷清的屋里醒来，听到“大机器”的轰鸣声自天而降；而他当时正在第一二五大街的“水底”和其他一些鱼类一起行走。各种纷至沓来的念头就点燃了他的大脑。他让玛丽露坐在他的膝盖上，安抚她平静下来。他跟迪安说，“你干吗不坐下，放松一下？你干吗满屋子蹦个不停？”迪安绕圈儿跑，把糖放到咖啡里，并说：“对！对！对！”当夜埃德·邓克尔睡在地上的垫子上，

迪安和玛丽露把卡罗推下床，他爬起来跑到厨房里炖腰子吃，含混不清地嘟囔着所谓岩石上的预言。我白天的时候去找他们，见到了这一切。

埃德·邓克尔跟我说：“昨晚我一路溜达到时代广场，当我到达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幽灵——那是我的幽灵走在人行道上。”他不带任何评论地跟我说着这些话，一边说一边重重地点头。十小时之后，在其他人交谈的中间，他又说：“是的，那是我的幽灵走在人行道上。”

突然间迪安靠近我，认真地跟我说，“萨尔，我有事儿要问你，对我很重要，我想知道你怎么想的，咱俩是哥们，对吧？”

“当然是啦，迪安。”他的脸红了起来。最后他终于和盘托出：他要我和玛丽露干。我没问他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只是想看看玛丽露和其他男人干那事是个什么样子。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正坐在里奇酒吧，我们在时代广场溜达了一个小时，找哈塞尔，里奇酒吧是时代广场周边几条街上的流氓地痞厮混的地方。它每年都得改店名。你走进去，一个姑娘也见不到，连火车座里也没有，只有一大帮年轻人穿着形形色色的小流氓衣服，从红衬衫到佐特套装。这也是男妓厮混的酒吧，他们就是那些在第八大道老同性恋当中混口饭吃的男孩们。迪安走进那里，眯缝起眼睛，盯着每个人的脸看。那儿有疯狂的黑娘炮，阴郁带枪的哥们，持刀的水手，枯瘦如柴的瘾君子，偶尔还有衣冠楚楚的中年私家侦探，装成赌场经纪人，半是带着任务来的，半是找乐子。这是典型的迪安最可心的地

方。各种阴谋诡计在里奇酒吧孕育着，你可以在空气中感受到，形形色色的性爱程序从这里启程。撬保险箱的贼不仅向男妓们提议去第十大街的某个阁楼，而且他们还睡在一起。性学家金赛在里奇酒吧待了好长时间，采访了一些男孩儿。有天晚上我在的时候，他的助手来了，在1945年，哈塞尔和卡罗也被他们采访了。

迪安和我开着车回公寓，看到玛丽露在床上待着。邓克尔带着他的幽灵在纽约各处晃悠。迪安告诉她我们的决定。她说她很乐意那么干。我还没怎么想清楚。我还得证明我真的能过了这一关。那张床曾经是个大块头死去的床，它在中间凹陷了下去。玛丽露睡在那里，迪安和我各睡在一头儿，压着翘起来的床垫两侧。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天哪，我办不到。”

“来吧，哥们，你答应过的。”迪安说。

“玛丽露怎么想的？”我说。“说吧，玛丽露，你怎么想的？”

“来吧。”她说。

她搂着我，我尽力忘掉老迪安也在一边。每次我意识到他也在黑暗之中，听着每一点儿声音。我啥也干不了，只会笑场。真够糟糕的。

“我们都得放松。”迪安说。

“我恐怕不行，你干吗不去厨房待会儿？”

迪安听从了我的安排。玛丽露很可爱，但我悄悄跟她说：“等到了旧金山我们再成一对儿，我现在不能专注投入。”我是对的，她能感觉到。这三个大地之子试图在夜里决定些什么，而过去几个世纪的黑暗中的气球却出现在他们面前。公寓里有着诡异的宁静。我去拍了拍迪安的肩头，让他去找玛丽露，我撤退到沙发上。我能听到迪安嘶喊着，扭动着，至欢至乐地翻滚着。只有在牢里待过五年的人才能到达这种迷醉的、无望的终极。在温柔之源的入口处哀求，对于生命福地的源头，疯狂地想要将它彻底地物欲化，盲目地想要走来时路。这是多年以来在酒吧后台偷看色情图片的结果；在流行杂志上看够了女人的大腿和乳房；评估过钢铁般的通道的硬度，和并不存在的女人的柔软。监狱是能让你承诺自己拥有活下去的权利的地方。迪安从未见过他母亲的脸。每一个新认识的女孩，每一个新媳妇，每一个新生儿都会增加他破碎的凄凉。他的父亲在哪里？——老流浪汉迪安·莫里亚蒂，那个白铁匠，扒货车，在铁道上的餐车帮厨，喝多了在夜晚的小黑巷子里跌跌撞撞，瘫倒在煤堆里，在西部的沟沟里磕掉了他一颗又一颗的黄牙。迪安完全有权在玛丽露全然彻底的爱当中死去。我不想介入，我只想跟着。

卡罗在傍晚的时候回来了，穿着他的浴袍。那些天他再也不睡觉了。“耶！”他尖叫。他无法把自己的念头从地板上的果酱瓶、裤子、到处扔的衣服、烟蒂、脏盘子、翻开的书挪开，我们每天都像是在召开论坛。每一天，世界嘟囔着归来，我们对夜晚进行了骇人听闻的研究。玛丽露因为什么事情被迪安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的脸也被抓破了。又是时候离开了。

我们开车去我家，统共有十个人，去拿我的帆布包。并在酒吧里给在新奥尔良的老布尔·李打电话，

那个酒吧正是多年前迪安来跟我探讨写作问题的时候，我们初会的地方。我们听到了一千八百英里之外的布尔的抽泣声。“萨尔，你们这些小伙子打算让我拿这个拉迪雅·邓克尔怎么办呢？她在我家待了两个礼拜了，她自己躲在房间里，不跟我或者简说话。你们那个埃德·邓克尔还跟你们在一起吗？看在主耶稣份上，让他过来把她弄走。她住在我们家最好的房间，钱都花光了。这可不是旅馆。”他向在电话那头又抽泣又哭泣的布尔保证。——这些人包括迪安、玛丽露、卡罗、邓克尔、我、伊恩·麦克阿瑟和他的老婆、汤姆·赛布鲁克，上帝知道还有谁，各个都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跟电话那头晕乎乎的布尔说话，他最讨厌一塌糊涂的状况。“好吧，”他说，“也许你们来了就有个概念了，如果你们真的来的话。”我和姨妈告了别，答应她两个礼拜之内回来，然后再度踏上去加利福尼亚的路途。

6

阴雨连绵，而且神秘，在我们的远行之初。我感觉这像是一大片迷雾之中的传奇旅程。“哦哈！”迪安叫道。“我们出发啦！”他趴在方向盘上，启动了车子，马上又回到了他最爽的状况，所有人都能看出来。我们都欢天喜地的，我们都意识到已经将所有的困惑与无聊抛在脑后，开始了我们在这个时代唯一的也是崇高无比的职能，行动，我们开始行动了！我们飞驰过新泽西某处一些神秘的白色路牌下，一个说是向南（带了箭头），一个说是向西（也带了箭头）。新奥尔良！它在我们脑海中熊熊燃烧。从“雾气蒙蒙阴郁的纽约”那遍地的脏雪，就像迪安说的，一路抵达郁郁葱葱、散发着河流气息的新奥尔良，它位于美利坚冲积平原的底端，然后是西部。埃德坐在后面，玛丽露和迪安还有我坐在前排，热气腾腾地谈论着生活的美妙与欢乐。迪安突然变得很柔软。“该死的，看着，你们所有人，我们必须得承认一切都很棒，世上压根没有什么值得去

担忧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应该理解我们并没有在担忧任何事情，对吧？”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出发了，我们都在一起，我们在纽约做了些什么？可以宽恕了。”我们再度表示赞成。“这些都翻篇了，只是里程和方向的问题。现在我们去新奥尔良找老布尔·李，那得有多带劲啊。你可以听这位昔日的男高音飙一段高音。”他把汽车音响的音量调到最高，整个车都在颤抖——“听他讲讲故事，可以得到真正的放松和知识。”

我们都听着音乐，很是同意他说的。道路相当平坦，路中央的白线始终贴着我们的左前轮，仿佛被胶水贴在我们的车辙上似的。迪安弓着他肌肉发达的脖子，在冬夜仅仅穿着一件T恤，狂加油门向前开。他坚持让我在穿过巴尔的摩市区之后再接手开车，好让自己多练练在交通拥堵时开车的技巧。这没什么问题，除了他和玛丽露一边接吻一边还要把着方向盘，确实挺扯的，真疯狂！收音机的音量是调到最大的。迪安在仪表盘的面板上敲着鼓点，直到面板瘪了下去，我也这么干。可怜的哈德逊，开往中国的慢船被我们糟蹋得够呛。

“哦天，真给力！”迪安嚷嚷道。“听着玛丽露，亲爱的，你知道我是个能在同一时间干很多事情的硬骨头，我有用不完的精力，到了旧金山之后，咱俩得继续住在一起。我知道有个地方给你住正好，就在那些囚犯要去的路的尽头，我两天不到的时间，也就是理个头的光景就会回家一趟，一次待够十二个小时，哦天，你知道我们在十二个小时之内能干些什么，亲爱的。与此同时，我会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住在卡

蜜儿那儿，看，她不会知道的。我们可以试试，我们以前也这么干过。”玛丽露没什么问题，她不过是要战胜卡蜜儿。此前我理解的是，玛丽露到旧金山后要跟我在一起，但我现在看出来他们还要厮混在一起，我会被孤零零地扔在大陆另外一侧。但当整个黄金般的大地展示在你跟前，并且各种尚未发生的事情等着让你惊喜，让你因为能活着见到它们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干吗去想那些丧气事？

我们傍晚的时候到达华盛顿，那天正好是哈里·杜鲁门第二次任期就职的日子。我们开着自己的破烂车途经宾夕法尼亚大道时，沿路正在大张旗鼓地展示战争武器，有B29轰炸机、鱼雷快艇、火炮，各种战争机器在雪地里显得充满杀气，最后是一辆看起来可怜又傻兮兮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常规救生艇。迪安慢下车速看着它，他不停地摇头，叹息着说。“这些人到底想干吗？哈里在这个城里某个地方睡着呢……好老哈里……来自密苏里州的家伙，跟我一样……这应该是他自己的小船儿。”

迪安到后座上去眯一会儿，邓克尔开车。我们还特意交代他说别慌。还没等我们的鼾声响起，他已经把车子加速到了八十，胆子真够肥的，而且他正好在一个警察与一位摩托车手争吵的地方加速——他在有着四个车道的第四个车道上开的车，还跑错了。当然，警察拉响了警报器追上了我们，我们被截住。他让我们跟着他去警察局。那儿有个挺难搞的警察，看到迪安第一眼就很不喜欢他，他能闻到他浑身上下的监狱气息。他让他的搭档到外头私下讯问我和玛丽露。他们想知道玛丽露几岁了，他们想看看我们是不是触犯了曼恩法案。但她有自己

的结婚证书。而后他们把我拉到一边想知道谁跟玛丽露睡觉。“她的丈夫，”我简单地回答。他们很好奇，总觉得有猫腻。他们像业余福尔摩斯一样，把同一个问题问了两遍，想让我们露出破绽。我说：“那两个家伙要回加州的铁路上工作，这是那个个儿矮些的老婆，我是他们的朋友，大学生，放两个礼拜的假。”

那警察微笑着问道：“哎呀？这真是你自己的钱包吗？”

最后，屋里那个难搞的警察要了迪安二十五美元的罚金。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统共只有四十美元，要供给这一路到西海岸的开销。他们说这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两样的。当迪安略表抗争时，那个难搞的警察扬言要把他弄回宾夕法尼亚，给他来个特别指控。

“什么指控？”

“不管什么指控，别操心，聪明人。”

我们必须给他们那二十五美元。但是埃德·邓克尔，那个罪魁祸首，提出他可以去坐牢。迪安觉得可以考虑。警察怒了，他说：“如果你让你的同伙去坐牢，我会立刻把你打回宾夕法尼亚。你听到没有？”我们就想赶紧离开。“再有一张在弗吉尼亚的超速罚单，你就保不住你的车了。”那个难搞的警察又上来补了一枪。迪安的脸涨得通红。我们不声不响地开上车。这就像是强行从我们这儿偷走我们的旅行资金。他们知道我们濒临破产，沿途没有亲友，也没什么人可以要求电汇给我

们钱。美国警察总是对那些不怕他们的美国人采取心理战，用格外的文件或者恐吓来行事。这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警察行径。他们躲在雾蒙蒙的玻璃窗后边窥视，什么都想知道，如果罪犯不如他们所愿，他们就炮制罪犯。“九列罪犯里，有一列是出于无聊。”路易·费迪南·塞利纳说过。迪安气急败坏地想一旦他拥有一把枪，就回到弗吉尼亚去射杀那票警察。

“宾夕法尼亚！”他叫嚣道。“我想我知道那些指控会是什么！也许是流浪罪！然后拿走我所有的钱，指控我流浪。这帮家伙这么干轻而易举。你如果敢吱一声，他们甚至会开枪打死你。”但是除了重新高兴起来，我们也没别的法子可想。当我们途经里士满时，就又忘了这件事，很快一切又都好了。

现在我们兜里只剩十五美元，要走完余下的路途。我们不得不带上搭车的人和流浪汉，补贴一些汽油钱。在弗吉尼亚的荒野中，我们突然看到一个流浪汉，正在路边慢慢走着。迪安猛地停下车，我回头看后说他只是个流浪汉，可能一文不名。

“我们带上他玩玩！”迪安笑道。那哥们是个一身破破烂烂、戴着副眼镜的疯子，一路走一路读着一本脏兮兮的软装书，书是他从公路边的涵洞里头发现的。他一上车就继续读着书，他有难以置信的肮脏，还长满了疮疤。他说他叫海曼·所罗门，还说他走遍美国，敲别人家的门，有时候敲犹太人家的门，乞讨：“给我钱买吃的，我是犹太人。”

他说这招很管用，钱就这样到了他手里。我们问他在读什么。他说他不知道，他懒得看扉页，他只管读内文。好似他在

荒漠中，找到了真正的摩西五经。

“看嘛？看嘛？看嘛？”迪安乱笑，一边戳戳我的肋骨。“我跟你说过会很逗，所有人都很逗，天！”我们一路把所罗门带到了特斯塔蒙特。我哥哥这会儿已经搬到了他在镇子另一头的新居。我们又回到了那条漫长、阴郁的街上，铁道从中央穿过，那些悲伤、沮丧的南方人从那些五金店和小卖店跟前跨过。

所罗门说：“我看出你们几个需要点钱继续你们的旅程。你们等等我，我去找几个犹太人家要几块钱，然后我会和你们一起到阿拉巴马州。”迪安喜出望外，他和我赶紧去买了些面包和奶酪，预备放在车里当作午饭吃。玛丽露和埃德等在车里。我们在特斯塔蒙特等了两个小时，等所罗门回来。他也许在镇上某处讨取面包，但我们看不见他。太阳开始变红，天色暗了。

所罗门始终没再现身，于是我们呼啸着离开了特斯塔蒙特。“现在你看出来了，萨尔，上帝确实存在，因为我们总是和他相伴相生，在这个镇上，不管我们做些什么。而且，你也注意到这么一个奇怪的圣经式的名字出现了，而一个圣经式的人物促使我们再度在此逗留，所有一切事物奇妙地联系在一起，正如雨水将世上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迪安不停地这么说着。他兴奋过度、兴高采烈。他和我突然感觉整个国家如同一只牡蛎等着我们去打开，而珍珠就在其中，珍珠就在其中！我们向南开去。我们让另外一个人搭上了我们的车，那是个愁眉苦脸的少年，自称有个姑妈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叫作邓

恩的地方，拥有一家杂货店，就在费耶特维尔附近。“当我们到那儿时，你能跟她去要一块钱吗？好的！不错！出发！”一个小时后我们抵达邓恩，天已经黑了。我们把车开到那孩子的姑妈开店的地方。那是一条残败的小街，杂货店在工厂围墙外的尽头。杂货店确实在，但姑妈并不存在。我们想知道那孩子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们想知道他到底跑得有多偏，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个大骗局，很久以前，也许在一次迷途中，他看到了邓恩的这家杂货店，那就成了他混乱、头脑发热的念头里的一个现成的故事。我们给他买了个热狗，但迪安说我们不能带着他了，因为我们需要空间睡大觉，或者给那些可以贴补我们点儿的搭车人。说起来挺凄惨，但确属实情，我们把他搁在了入夜的邓恩。

当迪安、玛丽露和埃德呼呼大睡的时候，我开着车经过了南卡罗来纳州，并经过了乔治亚州的梅肯。独自一人在夜里驾车，我自顾想着心事，将车子保持在神圣道路上的白线内侧。我在干什么？我要去哪里？我很快就会知道。过了梅肯，我累得跟死狗一样，于是把迪安叫醒了替班。我们到车外呼吸新鲜空气，两人突然欣喜地发现，在黑暗中，包围着我们的是芬芳的青草，新鲜的肥料和温暖的水流。“我们在南方了！离开了冬天！”蒙蒙亮的天光照亮了路边的青草嫩芽。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空气，一辆大机车在黑暗中呼啸而过，开往莫比尔的方向，跟我们一样。我欢天喜地地脱掉了T恤。开了约莫十英里后，迪安悄悄地把车开进一家加油站，关掉了引擎，发现加油站的员工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他跳下车，安安静静地给车加

满油，不让计数器的铃声响起，而后像个阿拉伯人一样开上车溜掉了，带着足足五美元的汽油，继续我们的行程。

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听到喧闹的音乐声，迪安和玛丽露聊得正欢，窗外绿色的风景席卷而过。“我们在哪儿？”

“刚刚经过佛罗里达的尖尖头，哥们——那个叫作弗洛马顿的地方。”佛罗里达！我们朝着海边的平原和莫比尔行进。前方是笼罩在墨西哥湾上空的大片乌云。从我们告别脏雪中的北方到现在，仅仅过了三十二个小时。我们停在一家加油站，迪安背着玛丽露在油柜周围晃悠着，埃德走进加油站，不假思索地偷了三包烟。我们的烟抽完了。在长长的潮汐高速上行进，开往莫比尔，我们全都脱掉了冬装，享受着南方的温暖。这时候迪安开始讲他的生平故事，与此同时，我们经过了莫比尔，他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了大塞车，他并没有从车辆一侧小心翼翼地开过去，而是径直开入加油站的行车道，保持着他一直稳定不懈的七十迈的速度。我们把那些目瞪口呆的脸甩在身后。迪安接着讲他的生平事迹。“我告诉你这是真的，我九岁就开始了，和一个叫作米莉·梅菲尔的女孩，在罗德汽修厂后头，格兰特大街上——跟卡罗在丹佛时住的同一条街上，那时候，我爸爸还在干一些白铁匠的活计。我记得我姑妈伸出窗口大喊大叫说，‘你在汽修厂后头干什么鬼？’哦，亲爱的玛丽露，如果我那时候就认识你！哦！九岁的你该有多可爱。”他笑得稀里哗啦，把他的一根指头伸到她嘴里，再舔了舔。他抓过她的手，在自己身上摩挲。她只是坐在那儿，心平气和地微笑着。

大高个儿埃德·邓克尔坐在那里，看着窗外，自言自语说：“是的，先生，那天晚上我确实是个幽灵。”他也想知道到新奥尔良后，拉迪雅·邓克尔会跟他说些什么。

迪安接着说：“有一次，我搭上大货车，从新墨西哥州去洛杉矶——我当时才十一岁，在支线上和我爸爸走散了，我们都身处一大帮流浪汉当中，我跟一个绰号‘大赤包’的人在一起。我爸爸喝多了，待在一辆厢车里，车开始启动了，大赤包和我错过了那辆车，我好几个月没见着我爸。我搭着大货车一路去了加利福尼亚，真是疾驰如飞，一流的大货车，沙漠之蛇。一路上，我一直待在车的挂钩上——你可以想象那有多冒险，我只是个孩子，我不知道——一只胳膊夹着一条面包，另外一只胳膊拉住车子的制动杆。这不是我编造的，这是真的。当我到了洛杉矶之后，我特别想喝牛奶，吃奶油，于是我到了一家乳品店找了一份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口气吃了两夸脱的厚奶油，然后吐得一塌糊涂。”

“可怜的迪安，”玛丽露说，她亲吻了他。他骄傲地目视前方。他爱她。

我们突然行进在港湾蓝色的水域边上，与此同时，收音机里播放着令人疯狂的音乐，那是新奥尔良冷爵士唱片骑师节目，全是疯狂的爵士录音，黑人音乐录音，伴随着唱片骑师说的：“什么也不必担心！”新奥尔良带着欣喜展现在我们面前。迪安在方向盘上兴奋地搓着手。“现在，我们就要找点儿乐子了。”在暮色中，我们进入了新奥尔良嘈杂的街道。“哦，闻闻那些人！”迪安伸出脑袋大喊大叫，吸着鼻

子。“啊哈！上帝！生活！”他开着车绕过了一辆电车。“是的！”他踩了一脚油门，四下里张望着找姑娘。“看看她！”新奥尔良的空气甜滋滋的，像是来自轻柔的纱巾。而且你可以闻到河流的气味，真的闻到人的味道，还有泥巴，还有糖蜜，各种各样热带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你的鼻子猛地从北方寒冷干燥的冰冻中扭转过来。我们从我们的位置上弹起来。“看看她！”迪安嚷嚷道，指着另外一个妇女。“哦，我爱，我爱，我爱女人！我觉得女人好棒！我爱女人！”他向车窗外吐了一口唾沫，接着喃喃自语，他抱住自己的脑袋。仅仅因为兴奋和昂扬，他的前额渗出了一些汗珠。

我们把车开上了阿尔及尔的轮渡，看着自己随车横渡密西西比河。“现在，我们得下车去闻闻河流和人们，还有这个世界的气息，”迪安说，他旋风般地戴上墨镜、香烟，蹦出车子如同弹出盒子的玩具。我们跟随着他，斜靠着船栏杆，看着那浩瀚浑黄的万水之父，从中部美利坚翻滚而下，恰如破碎灵魂的激浪——带着蒙大拿的圆木、达科他的泥浆、艾奥瓦的山谷，诸如此类隐藏在三江之源，隐匿于冰雪之中的食物。雾气弥漫的新奥尔良在一侧逐渐退下，古老的、昏昏欲睡的阿尔及尔带着满眼的郁郁葱葱的林木，在另一侧向我们靠近。黑人们在炎热的下午劳作，给渡船的锅炉加煤，炉火烧得通红，让我们的轮胎都烤出味儿来。迪安好奇心爆棚，不顾酷热，跳来跳去到处看。他在甲板和台阶上跑来跑去，多兜裤耷拉在肚皮下面。突然，我发现他站在船桥上大喊大叫，我希望他能有副翅膀好飞起来。我听到他的狂笑弥漫了整只船。——“嘿——嘿——嘿——嘿——嘿——嘿——嘿！”玛丽露和他在一起，他到各处走马观

花，然后给我们带回来了绘声绘色的故事，在众人按起喇叭时，他猛地钻到车子里，我们启动了车子，在一个窄小的空间超过了两三轮车，而后穿行过阿尔及尔。

“上哪儿？上哪儿？”迪安一路嚷嚷着。

我们决定先找个加油站收拾收拾自己，再打听打听布尔的住处。小孩们在日落的河边玩耍，姑娘们包着头巾，穿着棉上衣，光着腿走着。迪安跑到街上去看每样东西。他到处看，点着头摩挲着自己的肚皮。大埃德坐在车后座上，帽檐盖到眼睛上方，微笑着看着迪安。我坐在挡泥板上。玛丽露去了女厕所。那些长满灌木的河岸上，簇拥着用鱼竿钓鱼的人们，红色的河滩上，到处都是三角形的帐篷，汹涌的河流像一条蛇一样环绕着阿尔及尔，带着莫可名状的轰鸣声。昏昏欲睡、半岛形状的阿尔及尔，连同她嘈杂的嗡嗡声和窝棚区，似乎有一天会被水流席卷而去。暮色苍茫，昆虫四处奔波，可怖的河水奔流着。

我们去了镇外、河堤附近的老布尔的住处。就在穿越沼泽地的一条路边上。那是个破破烂烂的房子，走廊边的柱子歪歪斜斜，院子里有一些垂柳，杂草蹿得有一码高，旧围栏坍塌了，老谷仓垮掉了。目力所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把车开进院子里，看到后廊上有洗衣盆。我下了车，走到纱门跟前。简·李站在里边，手搭凉棚望向太阳的方向。“简，”我说。“是我，是我们。”

她知道。“是的，我知道。布尔不在家。那儿是不是着火了还是别的什么？”我们一起望向太阳的方向。

“你是说太阳？”

“我当然不是指太阳了——我听到那边传来警报声。你没发现那边亮得有点不对头吗？”那是新奥尔良的方向，云层确实有些怪怪的。

“我什么也看不到。”我说。

简吸了一下鼻子，“同样的旧天堂。”

那是我们在四年之后打的招呼。简过去跟我和我老婆一起住在纽约。“拉迪雅·邓克尔在吗？”我问。简还在看她的火光，那些日子，她每天得抽三根安非他命的纸烟。她的脸，过去是圆乎乎的，日耳曼式的，是美的，现在变得骨感而潮红。她在新奥尔良得过脊髓灰质炎，现在走路还有点儿瘸。昏昏欲睡的迪安他们下了车，让自己各自安生下来。拉迪雅·邓克尔从后屋她躲藏的地方走出来，来看她的冤家。拉迪雅是个神情严肃的女孩。她显得很苍白，像是终日以泪洗面的样子。大埃德用手捋一捋头发，打了声招呼。她死命地盯着他。

“你去哪儿了？你干吗那么对我？”她还给了迪安一个凶狠的眼神，她当然明白个中缘由。迪安压根不理睬她，他这会儿想要吃的，他问简家里有什么吃的。局面立马混乱了起来。

可怜的布尔开着他那辆得克萨斯牌照的雪佛兰回来，发现他家里已经被一帮野蛮人入侵，但他还是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这在他身上是从未有过的。他用他和他的大学老同学在得克萨斯种植黑眼豆挣到的钱，买了新奥尔良的这所房子。他同学的老爸，得了麻痹症死掉了，给他留了一些财产。布尔每个礼拜只能从他自己家里拿到五十美元，这本来是不错的一笔钱，只是他每个礼拜吸毒也差不多要花掉这么多钱——他老婆也是大手大脚的，每个礼拜在安非他命上差不多要花掉十几块。他们的伙食费很节俭，他们几乎不吃东西，孩子们也是如此，他们似乎也不太关心。他们有两个很不错的孩子：多迪，八岁；小雷，一岁。雷光着身子在院子里乱跑，彩虹里的小金发孩童。布尔学W.C.菲尔兹喊他“小畜生”。布尔把车开进院子里，步履蹒跚地从车上走下来，看起来疲惫不堪，戴着眼镜和一顶毡帽，衣着破旧，高高瘦瘦，诡异而简洁地说：“为什么，萨尔，你最终来了，让我们进屋喝一杯。”

得花一晚上的功夫去说一说老布尔·李，就这么说吧，他是个教师，必须承认他完全有资格执教，因为他花了他所有的时间去学习。他所学的是他认为和称之为“生活的真相”的东西，他学这些不但是因为需要，而且是他的意愿。他拖着他瘦长的身子环游全美、欧洲和北非的大部分，只为了看看那些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三十年代，他在南斯拉夫跟一位白俄女伯爵结婚，只为了让她逃离纳粹的压迫。他有三十年代和一些国际可卡因组织成员们一起拍的照片，那帮人留着老长的头发，互相歪歪斜斜地靠着。还有一些照片上，他戴着巴拿马草帽，晃荡在阿尔及尔的街上。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白俄女伯

爵。他在芝加哥是个灭鼠人，在纽约是个酒吧侍应，在纽瓦克是个法院传票送达人，在巴黎，他坐在咖啡馆的桌边，看着来来往往的阴郁的法国人的脸。在雅典，他从他的茴香烈酒当中抬起头来，看着他所谓的世界上最丑陋的人们。在伊斯坦布尔，他穿行在瘾君子 and 地毯贩子的人潮中，寻找事实。在英国的旅馆里，他读着斯宾格勒和萨德侯爵写的书。在芝加哥，他曾经打算抢劫土耳其浴室，却因贪杯误事，延迟了两分钟，只抢到了两块钱，最后不得不仓皇逃跑。他做这一切事情只是为了经历。现在，他最终的研究是毒瘾。他现在在新奥尔良，在街上转悠，和行色可疑的人在酒吧接头。

他的大学时代还有一个奇怪的故事，这也可以看出他的另外一些特点：有一天下午，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他装修得不错的房间里喝鸡尾酒，突然他的宠物雪貂跑出来了，咬了一位体面的基友的脚踝，所有的人尖叫着跑出门去。老布尔站起来，端起他的短枪说：“他又闻到那只老鼠了，”于是在墙上打了一个大洞，足够五十只老鼠出入。他的墙上挂着一张丑陋的老科德角的房子的照片。他的朋友说：“你干吗挂那么丑的东西？”布尔说：“我就喜欢那么丑丑的东西。”他所有的生活就是这种风格。有一回，我敲了他位于纽约第六十大道贫民窟的家门，他开了门，戴着一顶礼帽，穿了一件马甲，里面没穿别的，一条长条纹的摩登的裤子。手里端着个做饭的锅，锅里盛着鸟食，他打算把这锅鸟食捣碎了，做成卷烟。他还试验过把可卡因咳嗽糖浆煮成黑乎乎的粥——好像没什么用。他把莎士比亚的作品放在膝盖上阅读，耗费了很多时间，他称之为“不朽的吟游诗人”。在新奥尔良，他开始花费大量的时

间，把《玛雅法典》放在膝上，即便他一直在聊天，那本书也一直那么摊在膝盖上。我有一次问他：“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他说：“当你死了就是死了，就那么回事。”他的房间里有一套链子，据他说是他跟他的心理分析学家一起实验麻醉分析时候用的，因为他们发现老布尔有七重人格，一重人格比一重人格糟糕，最下面的最糟，最终他是个狂乱的白痴，得用铁链管束起来。第一重人格是个英国勋爵，最底下是那个白痴，中间层是个老黑人，站在队伍里，和其他人格一起等着，他说：“有一些是狗娘养的，有一些不是，就是这样。”

布尔对于过去的美国有一种伤感的情怀，特别是1910年代，那时候你不需要医生处方就可以在药房里买到吗啡，中国人坐在暮色中的窗下抽鸦片，整个国家狂野、喧闹而自由，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充分而丰富的自由。他最厌恶华盛顿的官僚主义，其次讨厌的是自由主义，最后是警察。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聊天和教导他人身上。简坐在他脚跟前，我也是，迪安也是，还有卡罗·马科斯。我们都听从他的教诲。他是个灰溜溜、毫无外貌特征可描述的家伙，在街上你压根就不会留意，直到你靠近了去观察他，留意到他那疯狂的、瘦骨嶙峋的、显得格外年轻的头颅——一位堪萨斯州牧师，有着异国情调，有着惊人的热情和神秘感。他在维也纳学过医，学过人类学，读各种各样的书，而今，他专门研究日常生活，研究街上的生活和夜晚。他坐在椅子上，简端来饮料还有马提尼酒。他椅子边上的遮光布不分昼夜地低垂，这是他在屋里的固定角落。在他膝上放着那本《玛雅法典》和一支气枪，他时不时地得端起气枪，把安非他命烟卷射出去给屋里的众人。我不停地跑来跑

去，给他填充上更多的烟卷。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抽烟卷。布尔很好奇我们这次旅行的缘由。他看着我们，不停地吸着鼻子，砰砰，如同敲打一只空桶的声音。

“现在，迪安，我希望你坐下消停会儿，告诉我你干吗在全国这样窜来窜去。”

迪安只会红着脸说：“哦，好吧，你知道为什么。”

“萨尔，你去西海岸干吗？”

“就去几天，我就要返校了。”

“这个埃德·邓克尔是干吗的？他的角色是什么？”那时，埃德正在卧室里跟拉迪雅起腻，他很快就得手了。我们不知道关于埃德·邓克尔要怎么跟布尔说。看到我们连自己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他就拿出了三捆大麻烟，让我们继续抽，晚饭很快就好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大麻更能调动胃口的了。有一回，我用大麻就着难吃的午餐汉堡一起吃，竟变成了世上最好吃的东西。上个礼拜我刚从休斯顿回来，去看看戴尔，聊聊我们的黑眼豆。有一天一大早，我正在汽车旅馆呼呼大睡。突然在床上被吓到跳起来。有个傻叉在我隔壁房间开枪射杀他老婆。所有人莫名其妙地在门外围观，那家伙跳上车逃走了，把他的短枪扔在地上，任由治安官处置。他们最终在霍玛把烂醉如泥的他给抓住了。任何男人在这个国家走动，随身不带把枪已经不安全了。”他把外套一翻，给我们看看他的左轮手枪。然后他打

开抽屉，让我们看看他余下的武器。“我现在有比这些更好的东西了——一只德国产的施因托特气枪，看看这美人儿，只有一只弹夹。我用它能干倒一百个男的，还有足够的时间跑路。但就一点不好，我只有一只弹夹。”

“我希望你使用那玩意儿的时候，我不在场。”简在厨房里说道。“你怎么知道那是只气枪弹夹？”布尔吸吸鼻子，他从未认真听过她的俏皮话，但他都能听到。他和他妻子的关联是很奇怪的：他们一直聊天到深夜，布尔喜欢占有主场优势，他总是沉闷又单调地滔滔不绝地说着，她想插句嘴，总也不成。到了黎明时分，他说累了，简接着说，他在边上听着，三不两时地吸吸鼻子。她疯狂地爱着那个男人，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程度。他们从不故作斯文，扭扭捏捏，只有谈话和我们很难搞懂的伴侣关系。他们用某种无情和冰冷，来继续他们内在的交流，这其实是某种幽默。爱才是一切。简从未离开布尔十步远，也从未遗漏他的任何一句话，而他说话的声音是很轻很低的。

迪安和我想在新奥尔良好好闹腾一晚，让布尔带我们出去玩。他扫兴地说。“新奥尔良是个特别无聊的地方，去有色人种居住区是违法的，而酒吧更是无聊得要死。”

我说：“城里总有些有意思的酒吧吧？”

“全美国都没有有意思的酒吧。有意思的酒吧在我们的目力范围之外。在1910年那会儿，酒吧是男人上班期间或者下班后聚会的地方，总是有长长的柜台，黄铜栏杆，痰盂，演奏音

乐的钢琴，一些镜子，装在大桶里的威士忌一小杯十美分，以及大桶的啤酒五美分一大杯。现在你能看到的只有明晃晃的东西，烂醉如泥的妇女，基佬们，暴脾气的招待，在酒吧里晃悠的焦虑的店主，担忧着他们的皮面桌椅，还有闹事的人，总是不合时宜地喧嚣无比，而当一个陌生人走进来的时候，立刻鸦雀无声。”

我们争论着酒吧的话题。“好吧，”他说，“我今晚就带你去新奥尔良逛逛，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属实。”然后他故意带我们去那些最无聊的酒吧。我们把简和孩子们留在家里。晚饭后，她在读新奥尔良时报的招聘版面。我问她是不是想找份工作，她只是说这是报纸上最有意思的版。布尔开上车，和我们一道进城，继续不停地说着。“别急，迪安，我们总会到那儿的，我希望，嗨，那是轮渡码头，你用不着把我们开到河里去吧。”他一再坚持，迪安一错再错，他悄悄跟我说：“我感觉他在朝着他自己理想的命运前行，这是一种混合着变态的不负责任和暴力倾向的强迫症。”他偷眼看着迪安。“如果你和这个疯子一起去加州，那就太糟糕了。你干吗不留在新奥尔良跟我待在一起？我们可以去格雷特纳骑马，在我的院子里放松消遣。我弄到了一套特别棒的刀，我正在搭建一个靶子。城里还有些个性感的妞，如果你喜欢的话。”他吸着鼻子说。我们抵达轮渡码头，迪安下了车，靠在轮渡的栏杆上，我跟着去了，但布尔坐在车里，吸着鼻子，瞎哼哼。那天晚上，深褐色的河上飘荡着神秘，漂浮着深色的圆木。而另外一头，新奥尔良闪现着橘色光芒，雾气缠绕当中，隐约可见几艘暗色的船，像是有着西班牙风格的甲板和带装饰的船尾楼的切诺里船，直到你

挨近了才发现，他们只是瑞典和巴拿马来的旧货运船，轮渡夜里的锅炉火光照耀，与此同时，黑人们一边加煤一边唱歌。老瘦高个儿哈泽尔曾经在阿尔及尔渡船上当过甲板水手，这也让我想起密西西比的吉恩。当河水从我所知道的美国中部星空下奔腾而来，我感觉我已然知道和即将知道的一切好像都是一样的，这让我感到疯狂。说来奇怪，那天晚上，我们和布尔·李坐上轮渡时，有个女孩从甲板上跳下去自杀了，就在我们上船之前或者之后。我们是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那则消息。

我们在法语区和老布尔转遍了所有沉闷的酒吧，半夜回到家。那天晚上，玛丽露使用了所有毒品，她吸了大麻，大麻丸，安非他命，酒，甚至让老布尔给她来针吗啡，当然了他没给她，他给了她一杯马提尼。她在体内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后，终于平静下来，和我一起傻呵呵地坐在回廊上。那是布尔拥有的美妙回廊。它环绕着整个屋子。在月光之下，柳树丛中，它看起来像是昔日体面的南方式的豪宅。在屋子里，简正在起居室里读着招聘版面，布尔在卫生间给自己注射毒品，用自己的牙齿咬着自己的黑领带，当作止血绷带，一边将针头扎入他那只千疮百孔、受尽折磨的胳膊。埃德·邓克尔和拉迪雅张开四肢，躺在那张老布尔和简从未用过的巨大的床上。迪安在卷大麻烟，玛丽露和我在学着南方老贵族的腔调。

“哦，露小姐，你今晚看起来如此可爱，如此迷人。”

“哦，谢谢你，克劳福德，我衷心地感谢你的赞美之词。”

弯曲回廊尽头的那扇门，三不两时地打开，我们悲哀美国之夜的成员不住地跑出来，看看其他人在哪里。最终，我独自一人走到堤岸上。我想坐在布满污泥的河岸上，近距离看一看密西西比河。结果不得不把鼻子贴在铁丝网上看。当你开始把人群隔绝于河流，你得到什么？“官僚主义！”老布尔说，他坐在那里，膝盖上放着卡夫卡的书，他的脑袋上方灯火通明，他吸着鼻子，哼哼着。他的老房子发出了咿咿呀呀的响声。蒙大拿漂下来的圆木在黑漆漆夜晚的河流中翻滚。“除了官僚主义没别的。还有工会！特别是工会！”但黑暗中的笑声不绝于耳。

7

一大早，我起了床，神清气爽，发现老布尔和迪安在后院里忙活。迪安穿着他在加油站的工装，帮布尔干活。布尔找到了一块又大又破旧的木头，正用锤子头将其中的小钉子起起来。我们看着那些小钉子，数百万个，密密麻麻的，看起来像虫子。

“等我把这些钉子起干净后，我要用它做一块千年老搁板。”布尔说，每根骨头都跟小男孩一样兴奋地抖动。“嗨，萨尔，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现如今做的搁板，哪怕上面只放一些小东西，用六个月之类的就会崩溃？房子也这样，衣服也这样。那些狗杂种发明了塑料，用它修建的房子可以永远不倒。还有轮胎。美国人每年杀死自己上百万人，就因为使用了那些烂轮胎，遇到热的路面就完蛋了。他们可以制造永不变形的轮胎。还有牙粉。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口香糖，他们从不示之于人，说是你打小嚼一嚼这种口香糖，可以保一辈子不会蛀牙。

衣服也一样，他们能制造出永不损坏的衣服。但他们宁可做一些便宜东西，让所有人不得不继续上班干活，打卡，给他们自己组织那些无聊透顶的工会，借机闹事。而那些大人物却待在华盛顿或者墨西哥，啥也不干。”他举起那块破烂木头。“你不觉得这可以做个完美的搁板吗？”

这是大早上，他的精力正处于巅峰状态。这个可怜的家伙在自己的系统里装了那么多垃圾，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只能点着灯坐在椅子上，但大早上他总是劲抖抖的。我们开始往靶子上投掷小刀。他说他在突尼斯见过一个阿拉伯人，能在四十英尺开外，将一把小刀飞到人的眼睛里去。这让他转而聊起自己的姨妈，三十年代她曾经去过卡斯巴。“她跟着一大票游客，被导游带着参观。她的小指头上戴着枚钻戒。她靠在墙上休息了一小会儿，这时一个阿拉伯人突然出现了，在她叫出来之前，割走了她戴着戒指的小指头，我的天哪。她突然发现自己没了小指头了。哈一哈一哈一哈一哈！”他笑起来的时候，两片嘴唇紧贴在一起，气息自丹田而起，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笑声，他把整个身体叠在膝盖上，就这么笑了老半天。“嗨，简！”他兴奋地喊道，“我正在告诉迪安和萨尔，关于我姨妈在卡斯巴的事情！”

“我听到啦，”她从厨房门那儿冲我们喊，声音穿过墨西哥湾温暖的清晨。巨大的浮云笼罩在头顶，空荡荡的云朵让你感受到古老残破而又圣洁的美利坚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空旷。精力充沛的布尔啊。“看，我跟你说过戴尔他爸的事情没有？他肯定会是你平生所见的最有趣的老头儿。他患有不完全

麻痹的病，导致大脑前端没啥用了，因此你也不用为进入你大脑的任何事情负责。他在得克萨斯有个房子，那阵子正喊来木匠们夜以继日地加盖侧翼厢房。他半夜突然坐起来说：‘我不想要那该死的厢房了，把它们弄一边儿去。’木匠们只好拆掉所有的一切，并在另外一处重起炉灶。但天蒙蒙亮，他们又在把新盖起来的这部分拆掉了。而后，老头突然对这一切都烦透了，说：‘滚他妈的，我要去缅因州！’而后他开上他的车子，以每小时一百迈的速度往外冲——他家的鸡毛跟着他的车轮子蹿出去，蔓延了数百英里。他在得克萨斯一个镇子的中央停下车子，只是为了出去买些威士忌。这造成了交通堵塞，那些车冲着他使劲按喇叭，他急忙跑出商店，嚷嚷道：‘你们这帮该死的北方人，你们这些杂种！’他说话含糊不清，当你得了不完全麻痹就会这样，说话含糊不清。有一天晚上，他跑去我辛辛那提的家门口，使劲按着车喇叭说：‘出来，我们去得克萨斯看戴尔。’他从缅因来。他号称自己卖了个房子——噢，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写了一个关于他的小说，在故事里有一次恐怖的海难，水中的人们围住救生艇，抓住船沿，那个死老头子在船上拿着砍刀，猛砍人们的手指头。‘滚开，你们这些杂种，放开我的船！’噢，他好可怕。我可以跟你讲上一整天他的事情。看，今天难道不是个好天气吗？”

天儿确实不错。河堤上吹来一阵阵凉爽的风，很值当的一次出行。我们跟着布尔进屋，去量安装隔板的墙面尺寸。他给我们看了他做的餐桌。那是用六英寸厚的木板做的。“这桌子能管用一千年！”布尔说着把他的大长脸向我们凑过来，还敲打着桌子。

他就坐在这张桌子吃晚饭，从他吃剩的东西里面挑出骨头来喂猫。他有七只猫。“我爱猫。我尤其喜欢那些我一把它们抱到浴缸边就吱哇乱叫的猫。”他坚持要演示一下，可惜有人霸着浴室。“好吧，”他说，“我们这会儿不能那么做。你看，近些日子我总是和隔壁邻居干仗。”那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有几个熊孩子有时候从烂围栏那边朝多迪和雷，有时候是布尔，扔石块儿。他让他们住手，那家老头子竟冲出来，用匈牙利语不知道嚷嚷着什么。布尔进屋片刻，扛着他的猎枪出来了，他一本正经地倚靠着那把枪，宽帽檐下，他的脸上露出了莫可名状的笑容，等候时机，他整个的身体蜷曲着，像一尾蛇，一个古怪的、细长的、孤独的小丑，在蓝天白云之下。他的那副嘴脸肯定让匈牙利老头儿想起他过去噩梦中的一些场景。

我们在院子里巡视，找事儿做。布尔正在修建一面高高的围墙，打算把自己和烦人的邻居隔开，但永远也完不成，任务太繁重了。他在那儿摇来晃去，以显示篱笆有多结实。突然，他看着疲惫了起来，一言不发进了屋子，躲到浴室里给自己来了午饭前的一发（毒品）。他出来的时候看起来萎靡不振，目光呆滞，坐在开着的灯下。黄昏的窗帘上透入了微弱的阳光。“对了，你们这些家伙干吗不去试试我的生命蓄电池？及时往你骨头里充点汁液。我经常急慌慌地、以每小时九十迈的速度驱车前往最近的妓院。吼一吼一吼！”这就是他独特的笑法——当他并不是真的要笑的时候。他那生命蓄电池不过是个可容一个人屁股坐在上面的，普通盒子大小的东西：一层木头，一层金属，最后又是一层木头，这样就能从空气中吸取生

命力，在它们当中储存足够长的时间，好让人们吸取，比平常吸收到的要多。根据赖克的说法，人是震动的空气中的生命元素。人们得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力耗光了。老布尔觉得如果他能弄到越是有机的木材，越是能把他的生命蓄电池弄得更好一些，因此他从沼泽地里找来了一些树枝，将它们紧紧地捆在他神秘的机器上头。那么个表面剥落斑驳的机器，放在燥热、平坦的院子里，像个丧心病狂的发明。老布尔脱掉衣服，坐在那上面，盯着自己的肚脐眼直晃神。“对了，萨尔，午饭后咱一起去格雷特纳的赌场经纪人联盟玩赛马。”他看起来精神抖擞，午饭后他坐在自己的小椅子上打了个盹儿。猎枪就放在他膝盖上，小雷圈着他的脖子睡着了。这父与子温情脉脉的场面着实感人。如果当爹的能够找到点什么事情做，能说点儿什么，绝对不会腻烦他儿子。他猛地醒了过来，盯着我看。这花了一分钟让他醒悟过来我是谁。“你去西海岸做什么，萨尔？”他问，过不了多会儿又睡着了。

下午的时候，我们去了格雷特纳，就布尔和我。我们开着他的老雪佛兰。迪安的哈得逊底盘是低低的，曲线柔美，布尔的雪佛兰是高高的，开起来吵闹得很。当时的情景就像1910年。赌场经纪人联盟坐落在靠近码头的地方，是一个大酒吧，装修得又是镀铬又是真皮，饶是高档。后边敞开的大墙面上，挂着马匹名牌和号码。路易斯安那州的家伙们手里拿着《赛马登记表》四下里闲逛。布尔和我来了瓶啤酒，布尔毫不在意地去往老虎机那儿，往里面扔了五十美分的一个硬币。计数器顿时开始翻动——“大奖”——“大奖”——“大奖”——最后一个“大奖”翻出来之前停顿了一会儿，又蹦回到“樱桃”。他就差了

毛发丝那么点儿，就会得到一百块甚至更多。“他妈的！”布尔嚷道。“他们的这个机器里面不老实，你已经可以看到了。我拿到了大奖，但机器又给转回去了。好吧，你什么招儿没有。”我们一起翻看《赛马登记表》。我已经很多年没玩过赛马了，被上面的新名字弄得晕头转向。那上面有匹马叫“大老爹”，这让我想起了我爸，他过去常常跟我一起玩赛马。我刚要跟老布尔提起它，他突然说：“哦，我觉得我想试试这个‘黑海盗’。”

我最终还是说了：“‘大老爹’让我想起了我爸。”

他沉默了一会儿，他那双盯着我的清澈见底的蓝眼睛让我神情恍惚，我无法确知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走了过去，押注在“黑海盗”身上。“大老爹”赢了，赔率是五十比一。

“他妈的！”布尔说。“我早知道就好了，我以前这样闹过。哦，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乖了？”

“你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大老爹’。你有远见卓识，孩子，远见卓识。只有他妈的傻子才会忽略远见卓识。你怎么知道你那个玩了一个辈子马的老手，不会给你通风报信说‘大老爹’要赢？那个名字给你带来灵机一动的东西，他借用马的名号来跟你通风报信。那正是你提到这个名字时，我想到的。我在密苏里州的堂兄有一次赌马的时候，把宝押在一只名字听起来让他想

起他妈的马上，它赢了，大挣了一笔。同样的好运气发生在今天下午了。”他摇摇头。“哈，我们走吧，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一起来赌马了，你那么灵光一现，真是把我搞晕了。”在回他家的车上，他说：“人类总有一天会意识到我们实际上和死人和另外一个世界有所联系，不管是怎样的联系，现在我们就能够预言，如果我们使了足够大的意志力，就能知道下一个一百年都会发生些什么，并能做点什么来预防各种各样的灾害。当一个人死了，他的大脑会发生突变，现在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但有朝一日科学家扑向这个课题，一切就会清清楚楚了。那些混球眼下还只是关心他们能否毁掉这个世界。”

我们告诉简这件事，她哼了一声。“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她在厨房用扫帚划拉着地面。布尔在卫生间，给自己来下午的一发。

迪安和埃德·邓克尔在外面马路上打篮球，他们拿着多迪的篮球，在路灯柱子上钉了只桶。我参与进去了。而后我们一个个显示了各自的运动技能。迪安简直让我大开眼界。他让我和埃德一人拿着一根铁棍的一头，举到我们腰那么高，他抓着自己的脚后跟，仅仅站着就跳过了这根铁棍儿。“继续，举高点。”我们不断地举得更高，直到到达胸部那么高。他依旧可以轻而易举地跳过去。而后他试了踏板跳远，跳了得有二十多英尺。而后我和他在马路上赛跑。我百米可以用十秒五跑完。他像一阵风一样超过我。正当我们奔跑的时候，我仿佛直面了一个狂野的幻象：迪安在他一生中就是像那么奔跑的——他瘦削的脸直面生活，他的胳膊挥舞着，他的额头出着汗，他的腿

像格劳乔·马克斯那样高频跑动。一边大叫：“对！对！你知道你行的！”但是没人能像他跑得那样快，那是实情。而后布尔出来，拿着两把刀，开始向我们展示如何制服在黑巷子里突袭的歹徒。我从我的角度也向他示范了特别牛的一招儿，让你的对手直接匍匐在地，用你的脚踝绕住他，并用肩下握颈的方法抓住他的手腕子。他说那可真不错。他又秀了些个柔道，小多迪喊她妈到回廊上，说：“看看那些傻男人。”她是那么个可爱聪明的小东西，迪安无法把眼睛从她身上挪开。

“哦，等她长大了！你现在看她用那双可爱的眼睛就能迷倒整条运河街，哦！哦！”他从牙缝里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我们和邓克尔夫妇在新奥尔良市区度过了一个疯狂的下午。迪安那天有点儿神魂颠倒。当他在火车场院看到图森一新奥尔良货运车时，就想马上给我们展示一切。“我还没带你看一遍，你就成了司闸员了。”他和我还有埃德跑过铁轨，在三个不同地点攀爬上货运车，玛丽露和拉迪雅在车里等我们。我们坐了有半英里远，一直抵达码头。一路向扳道工和司旗员挥手，他们向我们示范了从行进中的列车上下车的正确姿势。先伸下来一只脚，整个身体脱离列车，转身，让另外一只脚着地。他们给我们看了冰柜冷藏车和放冰块的地方，在冬夜，搭乘连通在一起的好几列空荡荡的车厢是挺好的。“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从新墨西哥到洛杉矶的路途吗？”迪安嚷嚷。“我就是这么晃悠过来的……”

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那两个女孩身边，当然了，她们都快要疯了。埃德和拉迪雅决定在新奥尔良找个住处，留在那里

找份活儿。这对布尔来说正中下怀，他对我们这票已经开始感到恶心和厌倦了。最初，他不过是请我一个人来做客。前厅，也就是迪安和玛丽露睡觉的地方，地板上到处都是果酱和咖啡渍以及安非他命废弃瓶，那本是布尔的工作间，那段时间他没法继续折腾他的隔板了。可怜的简被满屋子疯跑蹦跶的迪安搞得晕头转向。我们在等我的下一张退伍军人津贴汇票，我的姨妈已经把它寄出来了。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我们仨——迪安，玛丽露和我。当汇票一来，我发现我痛恨这么快离开布尔那舒适的屋子，但迪安已经劲抖抖地准备出发了。

一个忧伤而天色微红的黄昏，我们终于坐上了长途车。简，多迪，小男孩雷，布尔，埃德和拉迪雅微笑地围站在高高的草丛中，向我们道别。在最后一刻，迪安和布尔还在钱上面有了个误会。迪安想着跟他借点儿钱，布尔断然拒绝。这得回溯到得克萨斯时期，骗子迪安让人们逐渐疏远了他。他咯咯地笑着，全然不以为意。他摸着自己裆部的纽扣盖布，将他的手指头伸入玛丽露的衣服，亲着她的膝盖，亲到嘴角都是白沫子，说，“亲爱的，你知道我知道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摆平了，不管是什么抽象的概念，什么形而上的术语，或者任何你想要分门别类的术语，或者甜言蜜语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废话，车子呼啸着开起来了，我们再度去往加利福尼亚州。

8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当你开着的车驶离人们，他们在平原上渐渐变小直到变成一点点？——笼罩在我们身上的世界实在是太大了，那就是别离。但我们忍不住趋身向前，去迎接天空下的下一次冒险。

我们疾驰过阿尔及尔闷热的夜晚，回到渡轮上，回到那些裹满了泥浆，破破烂烂的，正渡过河流的旧船上。回到了运河那边，离开了它，上了开往巴吞鲁日的两车道的高速，天色一片紫红，在那里向西拐，在一个叫艾伦港的地方跨过了密西西比河。艾伦港——在雾气弥漫的黑暗里，那条河流恰如雨滴与玫瑰花丛，当我们打开了黄色雾灯，在环线上转了一圈儿，突然看到桥下有一具大块头的黑人尸体，它正越过永恒。密西西比河是什么？雨夜之中被冲刷的土疙瘩，河岸边轻柔的浪击声，水流冲过永远的河床，汇入了棕色的泡沫，流过无数的溪谷和林木河堤，途经墨菲斯，格林维尔，尤多拉，维克斯堡，

纳奇兹，艾伦港，和奥尔良港，达尔塔斯港，波塔斯，威尼斯，以及奈特的大海湾，而后进入大海。

收音机正在播出一档不知名的节目，当我向车窗外看时，正好看到一只标牌上写着“请使用库珀油漆”，然后我说，“好的，我会用的。”我们疾驰过暮色中的路易斯安那平原——劳特尔，尤尼斯，金德和德昆西，当我们抵达萨宾，西部那破破烂烂的小镇看着更像河口了。在老奥珀卢萨斯，我走进一家小卖店去买面包和奶油，迪安去加油站给车子加油。那小卖店就是个棚屋，我甚至能听到那一家子人在后边吃晚饭。我等了一小会儿，他们继续聊天。我拿上面包和奶油，一溜烟就跑了。我们的钱不够花到旧金山。与此同时，迪安从加油站顺了一条香烟，我们路上的储备齐全了——汽油，香烟和吃的。那傻子对此置若罔闻，他只管笔直地向前开车。

在斯塔克斯附近，我们看到了前方的天空中出现的一大片红光。我们想知道那是怎么了，过了一会儿，我们路过那个地方。那是树丛中的火光，在高速路上有很多车子停着。那应该是某种吃炸鱼的聚会，也可能是别的什么。靠近杜威维尔的时候，乡野的景象变得诡异而黑暗。突然，我们居然来到了一片沼泽地。

“哥们，你想想如果我们在那些沼泽地里遇到一家爵士酒吧会怎么样？又高又壮的黑人弹奏着忧伤的吉他布鲁斯，喝着烈酒，还跟我们做手势。”

“对！”

这一带有着神秘的氛围。我们在沼泽当中凸出的泥地上行进，泥地的两侧向下有斜坡，上面还缠绕着一些藤蔓植物。我们经过一个奇观：一个黑人穿着白衬衣，举起两只手朝向墨色的苍穹。他估计在祷告或者吁求一个诅咒。我们在他身边倏忽而过，我从车后窗上瞥见了他的翻白眼。“吼！”迪安说。“小心，我们最好别在这一带逗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遇到了堵车，不得不停了下来。迪安关了车子的前灯。我们身处一大堆藤蔓盘绕的林子当中，几乎可以听见上百万条铜头蛇发出的嘶嘶的声音。我们在黑暗中能看到的唯有那台哈德逊仪表盘上的红色发动机按钮。玛丽露因为害怕尖叫起来。我们开始狂笑着吓唬她，其实自己也挺怯的。我们想赶紧逃离这个毒蛇横行的破沼泽地，这喜怒无常的低垂的夜幕，重新回到了我们熟悉的美利坚大地和城镇。空气中可以闻到石油和腐烂的水的气味。这是我们无法读解的夜晚之书。猫头鹰呜呜地叫着。我们撞大运找到了其中一条泥泞的路，而后很快地，我们就穿过了该为这些沼泽地负责的邪恶的老萨宾河。我们惊诧地发现前方的建筑物中带着灯火。“得克萨斯！那是得克萨斯！博蒙特石油小镇！”在弥漫着石油香气的空气中，一座城市带着巨大的储油罐和炼油厂出现了。

“我很高兴我们摆脱了那里，”玛丽露说。“让我们再来点儿神秘莫测的节目吧。”

我们在博蒙特镇上急速开过，在利波蒂穿过三一河，而后直奔休斯顿。现在迪安开始说起他1947年前后在休斯顿的生活。“哈塞尔！那个疯狂的哈塞尔！我到处找他但总也找不

到。他曾经让我们在得克萨斯这一带晕头转向。我们和布尔开着车找小卖店的时候，他失踪了。我们不得不跑遍城里的每个射击场去找他。”我们正进入休斯顿。“多数时候，我们总是去城里那些低级的地方去找他。妈的，他也总是和他能找到的每一个人渣混在一起。有一天晚上，在找个旅馆住下时，发现我们又弄丢了他，我们本应该带些冰块给简，因为她带来的食物正在腐烂中。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找到了哈塞尔。我自己也瞎耽误了两天工夫——我下午的时候跑去泡那些购物的女人，就在这里，城里，超市。”——我们从空荡荡的夜晚呼啸而过——“而且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耳聋的女孩，她神经错乱了，到处游荡，想要偷个橘子什么的。她来自怀俄明。她那漂亮的身段儿跟白痴的脑子正般配。我发现她只会牙牙学语，就把她带回了旅馆房间。布尔喝多了，想让这个年轻的墨西哥女孩也喝酒。卡罗在写一首关于海洛因的诗。哈塞尔直到半夜三更才在吉普车里出现。我们发现他睡在后座上。所有我们之前买的冰块儿都化没了。哈塞尔说他吃了差不多五片安眠药。天，如果记忆允许我像我的脑子一样运行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所有我们做过的每件事的细节。哈，但我们知道时间的魔力。一切自有安排。我可以闭上眼睛，但这辆车子还能继续上路。”

在休斯顿凌晨四点的街上，一位机车男孩突然咆哮而过。他全身上下缀满了金光闪闪的纽扣，头盔带玻璃防风镜，穿着滑溜溜的黑皮衣，一位得克萨斯夜间的诗人，有位姑娘坐在后座紧搂着他，像婴儿袋一般，她的头发飞扬，一路向前，唱着，“休斯顿，奥斯汀，福特奥斯，达拉斯——有时是堪萨斯——有时是老安东尼，啊——哈哈哈哈哈！”他们瞬间就在视

野中消失了。“哦！看看那个家伙拴在裤带上的东西！我们也走啦！”迪安想要赶上他们，“打现在开始，我们团结一致，成为一群好哥们，甜甜蜜蜜和和美美不争不吵，没有麻烦事儿，没有孩子气的自我保护，或者身体上的麻烦导致的误解，诸如此类的，不好吗？哈！但我们都知道时间会改变一切。”他匍匐在方向盘上，专心开车。

开过休斯顿后，他的体力，尽管从来都很棒，还是消耗光了，于是换上我来开。我接手的那一刻，雨下起来了。现在我们在得克萨斯广袤的平原上，正如迪安所说：“你开吧，到明天晚上你还是在得克萨斯。”大雨如注，我开过一个只有一条泥泞主干道的破败小镇，发现前面没路了。“嘿，我该咋办？”他们都睡着了。我掉头回到镇上。一路上一个人也遇不到，也没有灯光。突然，我的前灯里出现了一个穿着制服骑着马的人，那是位治安官。他戴着的宽沿呢帽被雨水压塌了。“去奥斯汀走哪条道？”我问。他很有礼貌地告诉了我，我就离开了。在镇子外边，我突然发现在倾盆大雨中，有两道车灯直愣愣地照着我。妈呀，我以为我开上了逆行道，我避到右边发现自己陷在了泥里，我回到路上。那车灯依然毫不客气地照着我。到了最后一刻我才意识到另外那个司机逆行了，我却没发现。我一掰方向盘把自己打到泥泞里，那是平地，不是沟壑，感谢上帝。在倾盆大雨中，那辆违规的车辆退了回去。四个面色阴沉的农场工人，从他们烦闷的日常工作中逃出来喝酒寻欢，清一色穿着白衬衫，棕色的胳膊脏兮兮的，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地盯着我，大半夜的。那个司机和他们一样，喝得烂醉如泥。他说：“去休斯顿怎么走？”我用我的大拇指指了指

后边。突然顿悟到他们故意这么做，只是为了问个路，如同乞丐在人行道上故意挡住你的去路，就为了要几个小钱儿。他们不无遗憾地盯着自己车内的地板，几只空酒瓶子翻滚着，在那儿咣当作响。我启动了车子，它陷入了一英尺深的淤泥当中。我在得克萨斯雨夜的旷野中叹气。

“迪安，”我说，“醒醒。”

“干吗？”

“我们陷到泥里了。”

“怎么回事？”我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他开始不住地咒骂。我们换上旧鞋子和线衣，在暴雨中踉踉跄跄地下了车。我用我的后背顶住车子的后保险杠，又抬又顶，迪安把铁链儿塞到直打滑的车轮子底下。片刻之间，我们身上全是污泥。我们喊醒了玛丽露一起面对这恐怖景象，让她踩油门，我们推车。那受尽磨难的哈德逊呼哧带喘，突然它浑身一颤，滑到路对面去了。关键时刻玛丽露刹住了车，我们回到车上。事情就是这样——花了三十分钟搞定这事，我们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狼狈不堪。

我迅速入睡，带着一身的泥泞，早上醒来，那些泥巴已经板结了，窗外四下里都是雪。我们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在高原上。那是得克萨斯和西部史上最糟糕的冬天之一，牛群在寒潮中像苍蝇一样成批成批地死去，大雪席卷了旧金山和洛杉矶。我们狼狈极了，希望自己仍和埃德·邓克尔一起待在新奥

尔良。玛丽露开着车，迪安睡着了。她用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伸过来和后座上的我拉着。她喃喃自语，承诺着到旧金山之后如何如何。我又期待又悲哀地听着这一切话语。十点之后我接过了方向盘——迪安已经歇了好几个小时了——我开出去了好几百英里，穿过灌木丛生的雪地和崎岖不平的丘陵地带。牛仔们戴着棒球帽和护耳路过，看着牛群，偶尔会闪现出来个带着冒烟的烟囱的舒适的小房子。我多希望我们能进去坐坐，吃点儿奶酪和豆子，在壁炉跟前。

抵达索诺拉之后，我再度乘着店主在店的另一头和一位大农场主聊天之际，拿走了面包和奶酪。迪安闻讯兴高采烈，他饿了。我们不能花一毛钱在吃的上面。“是的，是的。”迪安说，看着那些在索诺拉街上闲逛的农场主，“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是个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上千头牛，工人，房产，银行里的存款。如果我住在这里会是灌木丛里的一个混球，我会是只野兔，我会吃光枝条，我会去找漂亮的女牛仔——嘿——嘿——嘿——嘿！他妈的！嘭！”他猛打了自己一拳。“是的！对的！打我！”我们压根也不知道他之后在说些什么了。他接过方向盘，开完了余下在得克萨斯的路程，大概五百英里，傍晚时分抵达埃尔帕索，他一下也没停，除了靠近阿桑那时，他脱掉了全身上下的衣服，在杂草丛里又喊又跳。过往的车无人留意到他的古怪行径。他跑回车里，继续开车。“那个，萨尔，那个，玛丽露，我要你们两个像我一样，把身上所有衣服的负担都卸掉——穿着衣服干吗呢？这就是我要说的——跟我一起晒晒你们美丽的身体。来吧！”我们向西行进，追赶着落日，光线从前挡风玻璃上照射进来。“打开你的腹部，当我们对着日

头开去的时候。”玛丽露毫不迟疑地附和了，我也是。我们坐在前排座上，我们仨。玛丽露拿出冷霜帮我们涂上，让我们更感刺激。时不时地，对面有辆大卡车开过，坐在高高的驾驶舱里的司机瞥见一位金发美人裸身，和两个同样裸体的男人坐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他们整个车子晃动了一下，当他们从我们的后窗消失的时候。一望无际的杂草荒原蔓延开来，一点儿雪也没有了。很快我们到达了带着橘色岩石的佩科斯峡谷地带，空中展示着一望无际的蔚蓝。我们下了车，去看一处印第安遗址。迪安还是裸体前往，玛丽露和我披上了外套。我们一路嘶喊着，嚎叫着，在岩石当中晃悠。有些游客看到平原上裸体的迪安，但他们不敢相信，晃晃悠悠地走开了。

迪安和玛丽露把车停在范霍恩附近，在我睡着的时候做了爱。我醒来的时候，我们的车子正穿过广阔的格兰德大河谷，经由克林特和伊斯莱塔。玛丽露跳到后座，我跳到前座，我们继续前进。在我们左侧，隔着空旷的格兰德大河谷，是墨西哥边境线上的红褐山丘，塔拉胡马尔地区，温柔的暮色嬉戏于山脊。前方，在远处落下了埃尔帕索和华雷斯的灯光，山谷如此广阔，你可以看到好几条铁道同时向不同方向延展，这好比它是世界的山谷。我们开向了它。

“克林特，得克萨斯！”迪安说。他把收音机的频道调到克林特电台。每十五分钟，他们都会放一张唱片，余下的时间在放送一家中学的函授课程广告。“这个节目覆盖了整个西部地区。”迪安兴奋地嚷嚷。“天，我在少管所和监狱的时候，不分昼夜地听这档节目，我们曾经都给它写信，如果你考过

了，就能收到一张邮寄来的中学毕业证儿，当然，是复印件。所有在西部的年轻羊倌儿，我不在乎具体是谁，总会给他们写信，这是他们都听得到的。你打开收音机，在斯特林，科罗拉多，拉斯克，怀俄明，不管哪里，你总能调到克林特，得克萨斯，克林特，得克萨斯。而那里边的音乐永远是西部牛仔音乐和墨西哥音乐，差不多是整个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节目，但人人无计可施。它有巨大的辐射面，他们把全国都给吞吃了。”我们曾经在克林特的棚屋后边看到过高耸入云的天线。“哦，天，看看我都跟你说了些什么！”迪安大嚷大叫，几近哽咽。远眺着旧金山和西海岸，我们在日暮时分进入了埃尔帕索，一文不名。我们必须得弄点钱买汽油，否则将无法前行。

我们试了各种招数，骚扰了旅行社，但那晚没人要去西岸。旅行社是你可以去找到那些想要付汽油费搭车的人的地方，在西部合理合法。机灵的人儿守在破烂不堪的旅行箱边上等着。我们跑去灰狗汽车站想要说服有些人给我们些钱搭车，而非坐上公交车去西岸。我们太羞涩了，不好意思靠近任何人。我们沮丧地四处溜达。外边挺冷的。一位男大学生看了一眼性感迷人的玛丽露便要流鼻血了，但他还装成啥事儿没有。我和迪安凑在一起商议了一下，决定不做这种皮条客。突然，一个傻乎乎的年轻孩子，刚从少管所出来的，想跟我们凑到一起去，他和迪安出去弄啤酒。“来吧，哥们，我们去砸碎一些人的脑门儿，抢走他们的钱。”

“没问题，哥们！”迪安高呼万岁。他们跑掉了。有一会儿我还挺担心的，但迪安只是想跟那小孩跑到埃尔帕索的街头找点乐子。玛丽露和我等在车里。她张开胳膊环抱住我。

我说：“他妈的，露，等着我们到旧金山再说。”

“我不管。迪安早晚要离开我的。”

“你什么时候回丹佛？”

“我不知道。我才不管我将要做什么。我可以跟你一起回东部吗？”

“我们得在旧金山弄点钱。”

“我知道在街角那边有家午餐馆子，你可以找个工作，我可以做女招待。我知道有个旅馆咱俩可以赊账入住。我们会腻在一起。喔，我愁死了。”

“你在犯啥愁呢，孩子？”

“我愁任何事情。喔，他妈的，现在我希望迪安不要再那么疯狂了。”迪安正好亮着眼睛回来，嘻嘻哈哈地笑着，跳进车里。

“真是只疯猫，噢呜！我早就看透他了！我曾经认识过成千那样的人，他们都一样，他们的脑子运行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哦，无穷无尽的结局，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他关上车门，趴在方向盘上，呼啸着开出了埃尔帕索。“我们得整

几个搭车的。我敢打包票我们能整到。哈！哈！开路。小心！”他冲着个摩托车嘶吼，避开他，而后又避开了一辆卡车，在城里的路上一路跌跌撞撞地前行。河对岸是华雷斯璀璨的灯光，忧伤干燥的陆地，以及上空亮晶晶珠宝般的星空。玛丽露一直偷眼看着迪安，在穿乡越镇的过程中，拿一种阴郁、悲哀的神色看他，好似她想砍下他的脑袋，藏到自己的衣橱里一般，她对于他既嫉妒又悔恨的爱让他显得更熠熠生辉了，混合着凶狠、蔑视和疯狂，她的微笑里糅杂了温柔的宠溺和邪恶的嫉妒，这让我感到诧异。她知道这种爱是不会有结果的，她看着那张瘦削的脸上流露出男人的自得与心不在焉，她知道他太疯狂了。迪安确认玛丽露是个婊子，他告诉我，她是个无可救药的撒谎者。但当她那么看着他时，又是充满爱的。当他注意到时，他总是报之以不由衷的假笑，扑扇着自己的睫毛，牙齿雪白又亮晶晶的，一秒钟之前他还沉溺在自己的白日梦里。而后玛丽露和我一起大笑起来——迪安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自顾自傻笑着，像是在跟我们说，难道我们没有因此获得一些乐子吗？确实是的。

在埃尔帕索郊外，在夜色中。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佝偻着的身影，他伸出了大拇指。那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搭车人。我们停车，把车倒至他身边。“你身上有多少钱，孩子？”那孩子一文不名，他差不多十七岁，苍白，古怪，一只手有残疾，没有手提箱。“他不可爱吗？”迪安说，冲着我讶异地说。“上来吧，哥们，我们带着你！”那孩子看到了他的机会，他说他有个姨妈在加利福尼亚州图莱里开了一家杂货店，一旦我们到了那里，他可以去跟她要些钱给我们。迪安乐不可

支，这多么像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遇到的男孩儿。“是的！是的！”他嚷嚷。“我们都有姨妈，好吧，我们去吧，去看姨妈和姨父还有他们的杂货店吧，赶路赶路！”于是我们有了一个乘客，后来证明他是个可爱的小男孩。他一言不发听着我们说。听了一分钟迪安的演说，他差不多该认为自己上了只疯人院的贼船。他说他从阿拉巴马州搭车到俄勒冈，他的老家。我们问他在阿拉巴马州做什么。

“我去找我叔叔，他说他在锯木厂有个活儿给我。当然工作是泡汤了，所以我又回家了。”

“回家，”迪安说，“回家，是的，我知道，我们会把你带回家，至少带到旧金山。”但我们一毛钱都没有，我想起我可以从我在亚利桑那州图森的老友霍尔·欣厄姆那儿借到五美元。很快迪安觉得这一切都搞定了，我们立刻去图森，我们真就这么干了。

当晚我们途经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天亮时抵达亚利桑那州。我从深睡中醒来，发现大家都睡得跟小羊羔似的，车子停在一个天知道是哪里的地方，因为我无法从雾气弥漫的车窗往外看到什么。我下了车，我们在群山之间，山谷中有翠绿的牧场，草地，金黄的变幻无常的云彩，满地都是地鼠洞、仙人掌和牧豆树。该我开车了。我把迪安和那小子推到一边，为了省油，下山的时候，我挂上离合器，松开油门。我就这么一路滑行到了亚利桑那州的本森。我又突然想起我有个怀表，是罗科才送我的生日礼物，一只价值四美元的怀表。在加油站，我问一个男人本森哪有典当行。在加油站隔壁就有一个。

我敲门，有人从床上起身应门，片刻之后我用手表拿到了一块钱。但很快，一个大块头持枪的警察出现了，正当我快要拔出手枪的一刻，他让我拿驾照给他看看。“那位在后座的哥们拿着驾照呢，”我说。迪安和玛丽露在毯子底下睡在一起。警察让迪安出来。突然他拔出手枪，叫嚷：“举起你的手来！”

“长官，”我听到迪安用一种极其虚伪而荒诞不经的声调说，“长官，我只是在扣裤裆的纽扣。”连警察都差点笑出声来。迪安下了车，一身泥点点、破破烂烂的T恤，揉着自己的肚皮，咒骂着，到处找着他的驾照和车证儿。警察还检查了我们的后备箱，所有的证件都没问题。

“只是查查，”他咧嘴微笑道。“你们可以走了。本森不是个太糟糕的镇子，如果你们在这儿吃早餐的话会喜欢的。”

“是的是的是的，”迪安说，几乎没怎么搭理他，开上车就走。我们暗自松了一口气。警察看到一票年轻人开着新车就起了疑心，再加上口袋里一文不名，还得卖表。“哦，他们总是要来插一杠子。”迪安说，“但他是个比弗吉尼亚那些条子好太多的家伙。那帮警察总想能逮住一个能上头条新闻的人，他们觉得每辆车里都坐着一票芝加哥黑帮。他们反正也没别的事儿可干。”我们开车一路飙往图森。

图森位于美丽的、到处都是牧豆树的乡间，后面是盖着白雪的卡特琳娜山脉。这个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工地。人们打着临时工，野性十足，雄心勃勃，忙忙碌碌，欢天喜地，晾衣绳，拖挂车，到处都是招牌的喧闹街市。总的看来相当的加

州。罗威尔堡街，欣厄姆住的那条街，在平坦宽阔的沙漠中，两边都是林木，就那么蜿蜒向前。我们看到欣厄姆本人坐在自家院子里沉思，他是个作家。他来到亚利桑那州就为了能好好地、安安静静地理他的书。他是个高大笨拙又腼腆的讽刺作家，总是把脑袋偏到一边，一边嘟嘟囔囔地跟你说着些搞笑的事情。他的妻儿跟他一起住在这所土房子里，房子很小，是他的印第安继父盖的。他的妈妈住在院子另一头她自己的房子里。她是个热情洋溢的美国妇女，喜欢陶艺，念珠和书籍。欣厄姆已经从我的纽约来信中知道了迪安。我们像一片云一样降落在他家院子里，每个人都饥肠辘辘，包括阿尔弗雷德，那位残疾搭车人。欣厄姆穿着旧汗衫，在沙漠干燥的空气中抽着烟斗，他妈妈从厨房里出来，邀请我们去吃点儿东西。我们用一口大锅煮了一大锅面条。

而后我们集体坐车去了十字街头卖酒的店家，欣厄姆在那里兑换了一张五美元的支票，把现钞给了我。

而后那就是个简单的道别。“这确实很开心，”欣厄姆说，把头扭到一边去。越过一些树，穿过沙漠，一只巨大的路边店霓虹灯招牌正亮着红光。当欣厄姆厌烦了写作时，总是去那儿喝上一杯。他非常孤独，他想回到纽约。当我们驾车远去，看到他高大的背影逐渐在暮色中消失时，真是件伤感的事。正如其他在纽约和新奥尔良的身影一样：他们恹恹惶惶地站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之下，关于他们的一切都被暮色遮蔽了。去哪里？干什么？为了什么？——睡觉。但这帮蠢透了的人依旧在赶路。

出了图森，我们在黑乎乎的路边又遇上了一位搭车人。这是一位来自加州贝克斯菲尔德的流动工人，他自述说：“该死的，我搭着旅行社的大车离开贝克斯菲尔德，把吉他落在另外一辆车里了，那车消失得无影无踪——吉他和演出的物件，你知道，我是个乐手。我要去亚利桑那州和约翰尼·麦考的山艾男孩乐队一起演出。好吧，他妈的，我就这么待在亚利桑那，一毛钱也没有，我的吉他也没了。你们把我带到贝克斯菲尔德，我会从我哥那儿给你们要来钱。你们想要多少钱？”我们想要足够从贝克斯菲尔德开车到旧金山的汽油钱，大概是三美元。现在我们有五个人在这辆车里了。“晚上好，夫人，”他说，举起帽子向玛丽露致敬，而后我们出发了。

半夜，我们从山上的公路看过去，棕榈泉的灯火尽收眼底。拂晓时分，穿过盖满白雪的山豁口，我们艰难地向着莫哈韦镇行进，那是去往哈查皮豁口的必经之路。那位移动工人醒

过来了，说着好玩的故事，甜美而年轻的阿尔弗雷德坐着，微笑着听他讲。移动工人告诉我们他认识一个工人原谅了他曾经冲他开了一枪的老婆，把她弄出监狱，结果又被开了一枪。我们当时正经过女子监狱，他聊起了这个事。我们一抬眼看到哈查皮豁口正在前方。迪安接过方向盘，带着我们直接奔向世界之巅。我们途经峡谷里一家巨大的、裹尸布般的水泥厂。然后我们开始下山了。迪安关上油门，光使用离合器，拐过每个发夹般的弯道，越过每辆车，不用加速器就完成了教科书式的驾驶。我紧紧地抓住车内的扶手。有时候，路又有了上坡的一段儿，他无声无息地超过那些车，仅仅靠着惯性。他知道各种节奏抓各种点儿去展示一流的超车技巧。当遇到悬崖时候，他知道如何向左来一个沿着矮石墙的U型大拐弯，他仅仅将整个身体大部分向左倾，把手搁在方向盘上，伸直手臂，就那么僵持着。而当需要再度向右拐的时候，这回我们左边有个悬崖峭壁，他大力地向右弯着自己的身体，让玛丽露和我也如法炮制。就这么，我们一路颠簸，到达了圣华金山谷。它在我们下方一英里处呈现，它差不多算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底层，从磕磕绊绊的岩石下方，郁郁葱葱地蔓延开去。我们不用汽油跑了三十英里。

突然之间，我们都兴奋起来。迪安忍不住想告诉我关于他所知道的贝克斯菲尔德的一切，当我们到达它的郊外时。他把他住过的宿舍楼指给我看，铁路旅馆，台球厅，饭馆儿，他从火车上跳下来摘葡萄吃的铁道岔线，他吃过饭的中餐馆，他跟姑娘们碰面的公园长椅，还有好几处他啥也没干只是干坐着和等着的地方。迪安的加利福尼亚——狂野的，汗津津的，要紧

的，孤单而流离失所又古怪的恋人们像鸟儿一样聚集的地方，而且是一个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失魂落魄、英俊、颓丧的电影明星们。“天，我曾经在那个药店门前的长椅上虚度过无数个小时！”没有他记不住的事情——每一场牌局，每个女人，每个忧伤的夜晚。很快，我们就经过了当年特雷和我坐在月下喝酒的地方，那个垃圾箱，1947年10月，我试图告诉迪安。但他实在太兴奋了，“这是邓克尔和我花了整整一上午喝啤酒的地方，当时我们想泡一个沃森维尔来的小女招待——不，特雷西，对，特雷西——她叫艾斯美拉达——哦，天，大概是那么回事儿。”玛丽露在盘算到达旧金山后她要干什么。阿尔弗雷德说他家住图莱里的姑妈会给他很多钱。流动工人给我们指路，去郊外的公寓楼找他哥哥。

正午时分，我们在一处被小玫瑰覆盖的棚屋停下了车，流动工人进去了，跟一些妇女说话。我们等了十五分钟。“我开始觉得这哥们比我还穷了，”迪安说。“我们又栽了，也许那家里没人会给他一毛钱，在他离家出走之后。”流动工人怯生生地出来了，指点我们去镇上。

“妈的，我希望能找到我哥哥。”他开始四下里打听，他也许觉得他是我们的人质。最后我们去了一家大面包房，流动工人终于跟他哥哥一起出来了，他穿着连体工装，应该是这个厂子里负责机修的。他跟他哥哥聊了一会儿。我们在车里等着。流动工人跟他所有的亲戚说了自己的遭际，包括丢了吉他的事儿。但他弄到了钱，给了我们，于是我们万事俱备只缺去旧金山了。我们向他道谢，启程了。

下一站是图莱里，我们轰隆隆地将车开进山谷里。我躺在后座上，精疲力竭，完全彻底地放弃了，午后有段时间，我在半梦半醒之间，那辆沾满泥浆的哈德逊经过了撒比纳尔郊外的帐篷区，我在那里居住过，恋爱过，工作过，幽灵般的过去。迪安僵硬着身体趴在方向盘上，捣鼓着他的变速挡杆。当我们最终到达图莱里时，我已经睡着了。我被弄醒了，听到了即时的新消息。“萨尔，醒醒！阿尔弗雷德终于找到他姨妈的杂货店了，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了吗？他姨妈开枪射击了她老公，被送进牢里了。那个杂货店也关张了。我们一毛钱也没拿到。想想吧！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流动工人跟我们说过类似的状况，麻烦不断，各种各样的麻烦事——靠，他妈的！”阿尔弗雷德咬着他的手指甲。我们在马德拉离开了俄勒冈境内的公路，而后我们与阿尔弗雷德道别。我们希望他好运气，平平安安地去往俄勒冈。他说这是他经历过的最开心的旅程。

就像是分分钟我们还在奥克兰跟前的山丘上行进，突然就到达了高处，而后展示在我们跟前的是那白色之城旧金山，坐落于十一座梦幻般的山丘上，背景是蔚蓝色的太平洋，以及它像土豆片墙一样逼近的雾气，临近黄昏的雾气是蒙蒙的金黄色。“真是美啊！”迪安嚷嚷道。“哦，我们办到了！汽油刚好够！给我水！再不要陆地了！我们再也不能前行了，因为再也没有陆地了！现在玛丽露，亲爱的，你和萨尔火速去找个旅馆等着，一旦我和卡蜜儿达成了某种协议，还有跟法国人谈了去铁道上值夜班的事儿处理完了之后，明天一早就跟你联系。你和萨尔一进城就赶紧买张报纸看看招聘栏，好开展我们的工作计划。”他开着车上了奥克兰湾桥，把我们带到了城里。在

城里，写字楼亮起了灯，这让人想起了山姆·斯佩德。我们在奥法拉大道下了车，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深呼吸，伸展伸展腿脚，这就好像历经漫长的海上旅行之后终于到达陆地。污水四流的街道在我们脚下直打滑，旧金山唐人街上飘来神秘的煮杂碎的气味。我们把所有的行李都从车上取下来，堆放在人行道上。突然，迪安说了再见，他急不可耐地要去见卡蜜儿，看看她最近发生了什么情况。玛丽露和我傻不愣登地站在路边，眼睁睁地看着他开车远去。“你看到他有多混蛋了吧？”玛丽露说。“迪安在任何时候都会把你扔到一边，只要对他自己有利。”

“我知道，”我说，我看着东边，叹了一口气。我们没有钱。迪安没提到钱的事儿。“我们能待在哪儿呢？”我们四处游荡，拿着我们的大包小包，奔波于狭窄而罗曼蒂克的大街小巷。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一个落魄的电影演员，一个过气的大咖，不得志的特技替身，小型车的赛车手，潦倒的加州人物带着他们大陆尽头的无尽忧伤，容貌英俊，郁郁寡欢，卡萨诺瓦式的男子，肿着眼睛的汽车旅馆里的金发女郎，骗子，皮条客，妓女，按摩师，招待，像柠檬一样数之不尽，一个人怎么能跟这样一帮人过到一起呢？

10

好在玛丽露和这一带的人们厮混过。离田德隆区不太远，一个灰头土脸的旅馆前台让我们赊账入住了一个房间。那是第一步。而后直到半夜我们才弄到口吃的。那时我们找到了一位在夜场唱歌的歌手，她在她的旅馆房间，将一只电熨斗倒过来，放在支在废纸篓里的衣架上，就那么给我们加热了一个猪肉煮豆子的罐头。我看着窗外闪烁的霓虹，对自己说，迪安在哪里？他为何不管我们的死活？那年我对他失去了信心。我在旧金山待了一礼拜，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崩溃的日子。玛丽露和我四处奔波，走好几英里，就为了找到点饭钱。我们甚至跑到教堂街的一家破旅馆里去找了几个她认识的醉鬼船员，他们给了我们威士忌。

我们在旅馆里一起住了两天。我发现，这会儿迪安不在视野之内，玛丽露对我完全丧失了兴趣，她只是想通过我来搞定迪安，他的铁哥们。我们在房间里有了争吵。我们也整夜躺在

床上，而后我把我做过的梦告诉了她。我告诉她我梦到过一条世界级的巨蛇蜷缩在地底下，就像虫子藏在苹果里头，有一天会拱起来成为一座山头，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蛇山，会在平原上不断延伸，足足有一百英里长，并继续吞食着它扩张途中的一切。我告诉她那条蛇就是撒旦。“那会发生什么呢？”她突然尖叫起来，很快紧紧地抱住我。

“一位叫萨克斯大夫的圣徒会用神秘的草药药杀它，这会儿，他正在美国某个地下棚屋熬制这味草药呢。也可以剧透一下啦，这条蛇不过是鸽子们的烟雾弹，当蛇死了之后呢，一大群银灰色的鸽子就会从它的身体里飞出来，带给整个世界和平的消息。”饥肠辘辘和痛苦让我有点儿懵逼。

有一天晚上，玛丽露和一个夜店老板跑掉了。我本来跟她约好了在拉金街和吉里街交接处对过的门道等她，那时我饿得半死，而那会儿她正好跟她的女友从高档公寓楼的门厅里走出来，还有那夜店老板，肚子圆滚滚的糟老头儿。本来她只是顺道去看看她的女友。我能看出她是怎样一个婊子。尽管她已经看到我站在门道那儿了，却不敢跟我打个招呼。她一路操着小碎步，上了那辆凯迪拉克，随他们而去。现如今，我形单影只，一无所有。

我一路闲逛，从街上捡些烟头来抽。我经过市场街一间卖炸鱼薯片的大排档，突然间，那家店的女老板用惊恐的神情看着我，当我路过的时候。她也许认为我带了枪，要进去洗劫那家店。我又向前走了几步，突然我感觉她是我两百年前在英格兰的母亲，而我是她沦为草寇的儿子，坐了牢出来，来她的廉

价小饭馆暴力夺取她的劳动所得。我停下脚步，在路边恍恍惚惚地定住了。我往市场街望去，我不知道它是市场街还是新奥尔良的运河街，它的尽头就是水，模棱两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水，正如纽约的第四十二大道，走到头儿就是水，而你永远不知道你在哪里。我想起了埃德·邓克尔在时代广场的幽灵。我有些迷糊，我想回去看看我那开小饮食店的奇特的、狄更斯式的母亲。我从头到脚抖个不停。我仿佛拥有指向1750年的英格兰的全部记忆，而我现在在旧金山不过是另外一次生命，另外一具躯体。“不，”那个妇女仿佛用她那惊恐的眼神在说，“别回来折磨你老老实实，卖力干活儿的妈。你不再像我儿子了——更像你爸，我的第一个老公，幸好有这个好心的希腊人可怜我。”（那位店主是个胳膊上寒毛很重的希腊人。）“你没个正形儿，就知道喝几泡猫尿，七搞八搞，最后不知羞耻地跑回来抢夺我在这个小店辛辛苦苦打拼得来的果实。哦，儿子！你有没有跪下来，祈求上天饶恕你的所有罪过和无耻行径？迷惘的孩子！走开！别再来骚扰我的灵魂，我好不容易忘掉了你。别来揭开我的旧伤疤，就当你从来没回来，没来看我——你来看的是我的血汗钱，那几个可怜的小钱儿——贪得无厌，巧取豪夺，阴险无情，狼心狗肺的我的儿子！儿子！”这勾起了我的回忆，在格雷特纳和老布尔在一起的情形。在那么一瞬间，我似乎到达了我一直想要到达的某种境界，那是从纪年意义上的时间，直接彻底跨进永恒的阴影的时刻，在肉身的束缚之下彷徨失措，感觉到死亡正敲打着我的脚后跟，催促我前行，幽灵也在敲打着自个儿的脚后跟，而我则慌不择路地奔向所有天使升天、进入圣洁而又无尽的空虚之地的那块板子，心灵中闪耀着强有力的、无法想象的辐射，无数

的莲花幻境落入神奇的飞蛾扑火般的天际。我能听到某种无法形容的、翻滚的轰鸣，它不在我耳朵里，而是四处弥漫，而且与声音本身毫无关系。我意识到我已经死了，并重生了无数次，我记不住是因为从生到死以及从死到生的转化过程是如此见了鬼似的容易，就跟恶作剧变戏法差不多。就像千百万次地睡去又醒来，是一种彻底的随意和深刻的无视。我意识到正是因为内在意志的坚定不移，这些生与死的蜕变才会发生，正如风吹过纯净、安宁、镜面般的水面。我感受到了一阵甜美而昏眩的欢喜，正如往主动脉来了一大针海洛因；也像黄昏时分喝了一大口红酒，让你战栗。我的双脚发软，我感觉自己在下一刻就要死去了。但我没死，而是走了四英里，沿途捡了十根长烟蒂并把它们拿回玛丽露的旅馆房间，把那里边的烟丝塞到我的老烟斗里，点燃了它。我太年轻了，意识不到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窗边，我闻到了整个旧金山的食物香味。外头是一些海鲜排档，他们提供热乎乎的圆面包，放面包的篮子本身足够好，也可以食用。那儿的菜单本软乎乎的，带着可食的香气，像是在热汤当中烫过，再重新烤干，也是可以吃的。只要给我展示一下海鲜菜单上蓝色海鱼的鱼鳞，我会立刻食欲大增。让我闻闻融化的奶油和龙虾脚的味道吧。有些馆子专营浓汁烩牛肉，或者红酒烤鸡。也有一些地方把汉堡放在烤架上烤，烤得滋滋作响，而咖啡只售五分钱一杯。哦，那从唐人街飘到我房间的炒面的香气，与北海滩的意面酱的香气有一拼，还有渔夫码头的软壳蟹——不对，还有菲尔莫尔的串着烤的烤小肉排！还有市场街的辣豆子，红彤彤的，还有码头上酒鬼之夜的法式炸薯条，湾区对面索萨利托的蒸螃蟹，这就是我对旧金山全部的幻想。加上雾，容易让人觉得肚子空空的阴郁的雾，在柔和

的夜晚闪烁不定的霓虹灯，穿着高跟鞋的女郎的脚步声，中国杂货店窗口内的白色鸽子……

迪安最终还是来找我了，他觉得我还有挽救的价值。并把我带回了卡蜜儿家。“玛丽露哪儿去了，哥们？”

“那个婊子跑了。”经历了玛丽露之后，卡蜜儿真是让人欣慰。一位有涵养、懂礼貌的年轻女人，而且她晓得早先迪安寄给她的十八美元是我的。但是你在哪儿啊，甜蜜的玛丽露？我在卡蜜儿的住处消闲了好几天。从她在独立街的木质结构公寓的起居室的窗户望出去，你可以看到在旧金山的雨夜熊熊燃烧的红与绿。我在那几天，迪安做了个荒诞不经的工作。他找到了一份去各家各户的厨房推销一种新式压力锅的工作。那位推销员给了他一大堆样品和小册子。第一天，迪安像打了鸡血一般，他约了客户见面，我跟他跑遍全城。他的点子是要先接受参加聚餐的邀请，然后站起身来，开始推荐那款压力锅。“天，”迪安激动地说道，“这比我给西纳干活时还要疯，西纳在奥克兰推销百科全书。无人能敌。他发表长篇大论

的演讲，他上蹿下跳，他大笑，他哭泣。有一次，我们跑进一个流动工人的家里，所有人正准备去参加个葬礼，西纳居然跪下，为逝去的灵魂得到解救而祷告，那流动工人全家人都哭了。他卖出去了整整一套百科全书。他是世上最疯的疯子。我想知道他哪儿去了。过去我们总是跟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坐在一起，在她们的厨房里摸摸弄弄。今天下午，我会跟一个优秀的家庭主妇一起待在她的小厨房里——环抱着她，演示如何使用压力锅。哈！嗯！喔呜！”

“继续努力，迪安，”我说。“也许有一天你能当上旧金山市市长。”他想好了一整套推销压力锅的说辞。夜里他在我和卡蜜儿跟前反复练习。

有一天一大早，他光着身子站在窗前，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看着外边。他看起来确实像是有朝一日会成为旧金山市异教徒市长似的。但他的精力耗光了。一个下雨的午后，那位推销员跑来看迪安在干吗。迪安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你是否试着要把那些东西卖掉？”

“不，”迪安说，“我在找另外一份工作。”

“好吧，那你打算拿这些样品怎么办？”

“我不知道。”在一片死寂中，推销员收拢所有他那些可怜的锅子，离开了。我对这一切又厌倦又厌烦，迪安也是。

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们突然又疯了似地跑了出去。我们去旧金山一家小夜店看瘦子盖拉德。瘦子盖拉德是个又高又瘦的

黑人，有着一双巨大忧郁的眼睛，总是在说“对头，奥隆尼”和“来点儿波本威士忌怎么样”。在旧金山，一大票年轻的知识分子聚拢在他身边，听他弹奏钢琴、吉他和手鼓。等他热身之后，他会脱掉衬衫和汗衫，兴之所至地表演起来。他将脑海中出现的任何东西拿出来说话。他会唱“水泥搅拌机，扑一提，扑一提”，而后突然将弹奏放慢，近乎冥想似地将手指尖靠近鼓面，几乎不触及它。当所有人身体前倾，屏住呼吸认真倾听，你以为他会这么来一分钟或者什么的，但他一直持续下去，进行了一个小时之久，用指头尖在鼓面上敲出几乎听不见的声响。那声音越来越小，以至于你再也听不着了，从开着的门涌进来了外边的车水马龙声。而后他慢慢地站起来，拿起麦克风，非常非常慢地说，“伟大的奥隆尼……好好的奥夫提……你好奥隆尼……波本奥隆尼……所有的奥隆尼……前面那排男孩和他们的女孩们待得怎么样了奥隆尼……奥隆尼……夫提……奥隆尼隆尼……”他如此喃喃自语了十五分钟，他的声音越来越低，直到你再也听不到了。他用忧伤的大眼睛巡视着台下的观众。

迪安站在后面，说：“上帝！就是这样！”——他的两只手像祷告那样放在胸前，满头大汗。“萨尔，瘦子太会了，他太会了。”瘦子在钢琴跟前坐下，弹了两个音，是两个C，而后再来两个音，再来一个，突然间那个又高又壮的贝斯手突然从白日梦中醒来，意识到瘦子在弹“即兴的C布鲁斯”，于是他用他的大粗指头弹拨着琴弦，传出了巨大而沉闷的节奏声，所有人开始跟着摇摆，而瘦子看起来和先前一样悲哀，于是他们演奏了半个小时的爵士乐。而后瘦子转向疯狂，抓起手鼓，开始

敲打出极其快速的古巴节奏，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用秘鲁方言，用埃及语，用所有他知道的语言喊叫着疯狂的东西，他懂得数不清的语言。而后这一环节结束了，每个环节要花两个小时。瘦子盖拉德站了起来站在一张海报跟前，当所有人涌上前去跟他说话时，他特别哀矜地看着所有人。有人递给他一杯波本威士忌。“波本—奥隆尼——谢谢—你—奥夫提……”

没有人知道瘦子盖拉德在哪里。迪安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到他怀了一个孩子，他的肚皮鼓到发蓝，躺在加州一所医院的草地上。在一棵树下，跟着一群有色人种，围坐在盖拉德身边。迪安用一个母亲绝望的眼神看着他。瘦子说：“来吧，奥隆尼。”现在迪安靠近了他，他靠近了他的上帝，他觉得瘦子就是他的上帝，他在他跟前坐立不安，鞠躬作揖，请他跟我们坐在一起。“好的一奥隆尼。”瘦子说，他可以跟任何人坐在一起，但不能保证他的灵魂也是如此。迪安弄了一张桌子，拿来了喝的，毕恭毕敬地坐在瘦子跟前。瘦子却神游天外，越过了他的脑袋。每次瘦子说“奥隆尼”，迪安就说，“是的！”我跟这两个疯子坐在一起，啥也没发生。对于瘦子盖拉德来说，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奥隆尼。

同一个晚上，我跟“灯罩”打听了菲尔莫尔和吉里的下落，“灯罩”是个高大的黑人，他穿着大衣，不忘帽子和围巾，冲进旧金山的音乐酒馆，跳上舞台，就开始唱歌，额头青筋暴起，向后仰着，将他灵魂中所有的力气使出来，吹奏起布鲁斯。他唱歌的时候向人们嚷嚷：“不要死了才去天堂，从现在开始就大吃大喝，到威士忌结束！”他的声音盖过了一切。

他扮鬼脸，扭来扭去，作出种种莫可名状的样子来。他来到我们这桌，凑近我们说：“是的！”而后他踉踉跄跄地上了街，去另外一家酒馆。然后是康尼·乔丹，一个男神经，一边唱歌一边挥舞手臂，最终把身上的汗都溅到所有人身上，他能踢开麦克风，像个女人一样尖叫。而且深夜你还能见到他流连于詹姆森的夜场，听着狂野的爵士乐，瞪大他的眼睛，耷拉着他的双肩，双眼放空地望着某个地方，或者跟前的酒杯。我从未见过如此疯狂的乐手。在旧金山所有人都在演奏爵士乐。那是这个大陆的末日，他们不拿这些当回事儿。迪安和我就拿着这种态度，在旧金山各处晃悠，直到我拿到我的下一份退役军人津贴，而后准备回家。

我到底为什么去旧金山，我也不知道。卡蜜儿希望我走人，迪安怎么都行。我买了一大条面包和肉，给自己做了十个三明治，打算横穿大陆的时候再吃，我到达科他的时候，这些三明治已经开始要变质了。在旧金山的最后一个晚上，迪安发了疯，在市区某个地方找到了玛丽露，于是我们坐到车上，穿过码头跑遍了里士满，在石油工人居住区的棚屋听着黑人爵士。玛丽露要坐下的时候，一个黑哥们抽掉了她屁股下的椅子。姑娘们在厕所向她求欢，我也被追求了。迪安局促不安。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我要走了。

天亮时分，我坐上开往纽约的巴士，跟迪安和玛丽露道别。他们想要我的一些三明治。我拒绝了他们。那是个忧伤的时刻，我们都觉得我们再也不会见到彼此了，而且我们不在乎。

PART 3

1949 年 · 春 *ON THE ROAD*

1

1949年春天，我从退役军人教育补助当中省下了一点钱，去了丹佛，想着要定居在那里。我发觉自己在美国中部，已经是个孤独长老，我感到孤独。没人在我身边——没有贝比·罗林斯，雷·罗林斯，提姆·格雷，贝蒂·格雷，罗纳德·梅杰，迪安·莫里亚蒂，卡罗·马克斯，埃德·邓克尔，罗伊·约翰逊，汤米·斯纳克，一个也没有。我在柯蒂斯街和拉里默街一带闲逛，偶尔在水果批发市场干点活儿，在1947年差点就被雇用了——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工作。有时候，几个日本小孩和我得把整个火车车皮移动到一百英尺开外，仅借用千斤顶，每动一次千斤顶，车子只能移动四分之一英寸。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装西瓜的板条箱从冰冷的冷冻车厢地板上，拖向热辣辣的太阳底下，不停地打着喷嚏。以上帝之名和星辰为证，我图个什么？

暮色中，我外出散步。我觉得自己就像这悲伤红色地球表面的一个小斑点。我经过温莎旅馆，迪安·莫里亚蒂曾经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他爸爸一起住在那里。回首往昔，我到处寻觅着我心目中那位忧伤而又传奇的白铁匠。你要么在诸如蒙大拿那样的地方找寻一个看着像你父亲的男人，要么就在找寻着你朋友早已不在的父亲。

在有丁香花的紫色的夜晚，我浑身酸痛地走在丹佛黑人区华灯初上的第二十七大道和威尔顿街交界口，希望自己是黑人，感觉白人世界最好的部分也不足以迷醉我，没有足够味的生活，还少了刺激、黑暗、音乐，也没有足够的夜晚。我在一个小棚屋跟前停下，那里有个男人正在卖装在辣椒盒里的红辣椒，我买了一些吃，在灰暗、神秘的街巷间闲逛。我希望自己是丹佛的墨西哥人，甚至是一个穷困过劳的日本人，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不是眼下这个如此沉闷，幻灭的所谓“白人”。我穷尽一生满足自己作为一个白人的野心，因此把像特蕾那么好的一个女人扔在圣华金山谷，我路过墨西哥人和黑人黑漆漆的门洞。有人在里面轻声地说着话，偶尔，一个黑乎乎的膝盖露了出来，来自某位神秘而性感的女孩儿，以及乔木玫瑰背后黑乎乎的男人的脸。孩子们像圣人一样坐在古老的摇椅上。一群有色人种的妇女打此路过，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的从像她母亲那么老的一群妇女中脱离出来，飞速地向我跑来——“哈喽，乔！”——突然发现我不是乔，她红着脸又飞快地跑了回去。我希望自己是乔，但我只能是我，萨尔·帕拉迪斯，郁郁寡欢，在紫色的夜色中孑然独行，多么不堪忍受的夜晚，我希望可以跟那些快乐、真诚、自我沉醉的美国黑人们交

换我们各自的世界。这些烂糟糟的街区让我想起了迪安和玛丽露，他们打小就对这种街区熟悉至极。我多么希望我能找到他们。

在第二十三大道和威尔顿那头，有个垒球赛正在泛光灯下进行，那灯光是用煤气罐供给燃料的。赛场上的每一点儿动静都激起场下观众的欢呼，场上各色人等聚集，白人、黑人、墨西哥人、纯纯的印度人，掏心掏肺地参加着比赛。都是一些业余的年轻人。我从未以运动员的身份在家人、女友和邻家小孩面前，像这样在灯下打过比赛。我总是在大学，大场合，一本正经，从未像这样充满童趣、充满生机地玩耍。这一切已经太晚了。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个黑人，显然每个晚上都在看比赛。挨着他坐的是个白人老流浪汉，旁边是墨西哥的一家人，然后是一些女孩子，一些男孩子——各种人，形形色色。哦，那晚的灯光如此忧伤！有个年轻的投手看起来好似迪安。一位坐在椅子上的金发女郎恰如玛丽露。那是丹佛之夜，我能做的就是去死。

在丹佛，在丹佛

我能做的就是去死

在街对面，有黑人一家人坐在他们家门前的台阶上，一边闲聊，一边透过树叶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他们仅仅在柔软的

氛围中休息或者有时看看比赛。很多车子时不时地开过街区，在红灯亮起的时候在街角停下。到处都是兴奋的，空气中弥漫着真正愉悦的生活，不知道何谓失望或者“白人的忧伤”，诸如此类的。那位黑人老爹在他的大衣兜里放着一听啤酒，正打开要喝，而那位白人老儿艳羡地瞄着人家的啤酒罐子，摸索着自己的衣兜，看看他能不能也买一罐。我要死了！我赶紧走开。

我要去见一个我认识的有钱妞。大早上她从丝袜里抽出一张一百美元的大钞，说：“你总是说要去旧金山远行，既然这么着，拿上这钱，赶紧开开心心地去吧。”于是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坐上一辆旅行社的车子，掏了十一美元的汽油钱去往旧金山，而后秒遁了。

两个家伙轮番开这辆车，他们说自己是皮条客。另外两个和我一样是乘客。我们坐得很拥挤，一门心思只想早点到达目的地。我们途经伯绍德山口，下行到大草原上，塔布马什，查布森，克雷姆灵，从兔耳朵山口直奔汽艇泉，然后出来，绕了一个五十英里远的大弯路，然后是克莱格和美国大沙漠。当我们穿过科罗拉多—犹他边境线时，我看到上帝以沙漠上空金光闪闪的云彩的模样存在，好像在指着我说：“从这儿经过，你将走向天堂之路。”好吧，呜呼哀哉，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些破破烂烂的货运车，和内华达沙漠里靠近可口可乐售卖机的破台球桌，一些屋子上挂着被风吹日晒得残破不堪的招牌，他们被无聊沙漠中的风吹得啪啪响，那上面写着：“响尾蛇比尔就住在这里”或者“老掉牙的安妮在此蛰居多年。”好吧，走人！

在盐湖城，那两个皮条客巡视了他们的姑娘们，然后我们继续行进。不经意间，我再度看到传奇之城旧金山，在午夜的码头延展。我火速去找迪安。他现在有了个小房子。我急不可耐地想知道他现在脑子里在琢磨着些什么，现在要发生些什么，在我身后，啥也没有了，所有让我通向人世的桥梁已然断绝殆尽，我对什么都他妈的不在乎了。我在午夜两点敲响了他的门。

2

他全裸着来应门，除非是总统亲自来敲门，他才会有所介意吧。他光溜溜地迎接这个世界。“萨尔！”他惊喜万分地说。“我简直没想到你真这么做了，你终于来看我了。”

“是的，”我说。“我的一切都支离破碎的，你怎么样？”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但我们有上百万件事情要聊一聊。萨尔，你终于来找我们了，是好好聊一聊的时候了。”我们一致认为时候到了，我进了屋子。我的到来某种程度上像是个奇怪的、最邪恶的天使，降临到一个铺着雪白地垫的家庭，当迪安和我在楼下厨房兴高采烈地聊着的时候，楼上时不时地传来一阵抽泣声。任何我对迪安说的话，他都会答之以疯狂、小小声、颤抖的“是的！”卡蜜儿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了。显

然迪安已经安静了好几个月了，现在天使降临了，他又要转入疯狂。“她怎么了呢？”我小声问。

他说：“她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哥们，她又是哭又是闹，不让我去看瘦子盖拉德，每次我回家晚了都要发疯，然后当我待在家里的时候，她又不跟我说话，我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畜生。”他跑上楼去安抚她。我听到卡蜜儿在嚷嚷：“你是个骗子，你是个骗子，你是个骗子！”我得了空便来好好看看他们拥有的这个特别棒的房子。那是个挤在廉租公寓当中的一座两层、破烂的木质结构房，就在俄罗斯山上，可以俯视整个湾区，它有四个房间，三间在楼上，楼下就是个超级大的底层厨房。厨房门开向了杂草丛生的院子，那里还有晾衣绳。在厨房后边是个储物间，迪安那双那晚哈德逊陷入布拉索姆河、沾上了一脚得克萨斯污泥的鞋子还放在里头。当然了，哈德逊没了，迪安付不起它后续的费用。他现在没车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突如其来地生了下来。听到卡蜜儿那么哭真是要命。我们无法忍受这个，跑出去买了啤酒，买回来后放在厨房里喝。卡蜜儿终于睡去了，或者整晚睁着眼睛盯着黑暗中的空白。我不知道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也许真是迪安把她搞疯了。

自从我上次离开旧金山，他再度为玛丽露而疯狂，花了几个月在她迪维萨德罗的公寓边上守望，在那儿，她每晚都和不同的水手回家，他透过她的信箱口就能看到她的床。他看到玛丽露大早上四仰八叉地跟男人躺在一起。他整个城地跑着去尾随她。他要找出她确是妓女的有力证据。他爱她，他为了她不惜汗流夹背。最终，他搞到了一点儿糟糕的绿货，内行这么说

——绿的，没有好好处理过的大麻——基本上就是错买，而且抽了太多。

“头一天，”他说，“我挺尸在床上跟块木板似的，一动不动，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我只能瞪大眼睛直愣愣地向上看。我能听到我脑壳里尽是嗡嗡声，看到各种各样多彩多样的幻象，感觉好极了。第二天，所有的一切都回到我这里，那些我曾经做过的、知晓的、读过的、听过的或狐疑过的，都以一种全新的、符合逻辑的方式涌到我的跟前，我内心可以感受到惊诧与感激，但是难以言表，我只是不停地这么说：‘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声音不大，只是‘是的’小小声地重复，而那些绿货带来的幻觉持续到了第三天。到了那时候，我理解了自己的一生。我的一生早已尘埃落定，我知道我爱玛丽露，我知道我必须去找我爹，不管他在哪里，我要去挽救他，我知道你是我的好兄弟、铁哥们，我知道卡罗有多伟大。我知道任何人任何地方的上千件事情。之后从第三天开始，我做了一系列白天的噩梦，它们如此彻底地恐怖，恶心，我只能躺在那里，搂紧我的膝盖，说：‘哦，哦，哦，啊，哦……’邻居们听到我这么惨叫，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卡蜜儿带着孩子去走亲戚了。所有的邻里都很担忧我。他们来了我家，看到我僵硬着四肢，躺在床上。萨尔，我带着一些这种绿货去找玛丽露。你知道吗？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那个傻娘们身上。——同样的幻觉，同样的逻辑，同样的对于任何事情的终极结论，那些导致梦魇和痛苦的看待真相的角度——哇擦！然后我知道我如此深爱着她，我想杀了她。我跑回家，把自己的脑袋往墙上撞，我跑去找埃德·邓克尔，他和拉迪雅回到旧金山了。我向他打听

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有枪的哥们，我跑去找那个哥们，我拿到了枪，又跑去找玛丽露，我从信箱口看进去，她跟一个家伙睡在一起，我不得不踌躇了一会儿，一个小时后又跑回来了，剩她一个人了，我给了她那把枪，让她结果了我。她手里拿着那把枪，拿了很久的一段时间，也下不去手。我请求她给予我一个甜蜜的死亡承诺。她不想给。我告诉她我们当中有一个必须得死。她说不。我把自己的脑袋往墙上撞。天哪，我发神经了。她会跟你说的，她让我别做梦了。

“然后发生了什么？”

“那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在你离开之后。她最后嫁给了一个二手车商，那个傻畜生发誓说，一旦他再看到我，就要杀了我，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会自卫，杀了他并进入圣昆廷监狱，因为，萨尔，不管再有个什么罪，我就会进入圣昆廷监狱度过下半生——那就是我的下场。带着这残废的手。”他给我看了他的手。我在最初的兴奋中没有发现他的手遭遇了一场糟糕的事故。“我打了玛丽露的前额，在二月二十六日，晚上六点——事实上是六点十分。因为我记得我得在一小时二十分钟之内去赶一辆速运货运车——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碰面，最后一次我们决定了一切，现在听着：我的大拇指从她前额上滑溜开，她分毫未损，事实上还在大笑。但我的大拇指却在手腕子上方掰断了，一个糟糕的大夫给我骨头上安了个装置，但是很难搞定，至少打了三处石膏，二十三个小时连续不断的时间，我坐在一块硬板凳上等着，苦不堪言，最后一处石膏还有一只固定骨头的钉子，从我的大拇指尖穿过，所以，当四月份他们

拆除我的石膏时，那只钉子感染了我的骨头，我因此得了骨髓炎，它还转为慢性病，经过又一次失败的手术之后，我又被打了一个月的石膏，结果是我大拇指尖上的那一小块儿被截肢了。”

他把缠着绷带的指头解开给我看，指甲尖下少了差不多半英寸大的一块肉。

“情况越来越不妙，我不得不养活卡蜜儿和艾米，不得不尽快去火石公司做模具工人，把破旧的轮胎翻新，而后把一个个一百五十磅重的轮胎从地上搬到车顶——只能用我那只好手，但坏掉的手还是常常再度受伤——又受伤，又去治，又一次感染，又肿起来。所以现在卡蜜儿去干活儿的时候，我得看着孩子。你知道吧？要了命了，我被定位为三A级伤员，爵士乐乐迷莫里亚蒂有一根总发炎的指头，他老婆每天给他注射盘尼西林，为了他的指头，因为药物过敏，他还出了荨麻疹。他不得不每个月注射六万单位的青霉素。为了中和青霉素导致的过敏反应，他不得不在这个月每四个小时吃一颗药片。他还得吞下可待因阿司匹林好减轻他拇指的疼痛。他还得给他脚上做个小手术，为了发炎的囊肿。他下个礼拜一得六点起床去洗牙。他每两个礼拜得去看一次足部大夫，做个治疗。他每个晚上都得喝咳嗽糖浆。他必须经常性地吸鼻子清鼻涕，因为数年前的一次手术，导致了他鼻梁下面有点儿坍塌，导致了鼻子功能变弱。他投球的那只手臂上的指头坏了。这位墨西哥州少管所史上最棒的七十码传球手。还有——还有，我看到孩子们在阳光下嬉戏，从未觉得好一些，爽一些，快乐一些。但我很高兴见

到你，我失而复得的好萨尔，我知道，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明天就会见到她，我可爱至极的漂亮的女儿，现在一次可以独立站立三十秒了，她体重二十一磅，二十九英寸高。我刚刚发现她有百分之三十一又四分之一的英格兰血统，百分之二十七点五的爱尔兰血统，百分之二十五的德国血统，百分之八又四分之三的荷兰血统，百分之七点五的苏格兰血统，百分之百的完美。”他无比真挚地祝贺我刚写完的那本书，它刚刚被出版社接受了。“我们知道生活，萨尔，我们逐渐变老了，我们每一个，一点点地，慢慢地知人识事了。你告诉我你生活当中的一切我都相当明白，我总是深知你的感受，现在呢，事实上你只消跟一个特别棒的女孩在一起，跟她厮混，让她意识到你的灵魂，正如我一直努力去跟我的女人们做的那样。屎！屎！屎！”他叫喊道。

大早上，卡蜜儿把我们俩赶出家门，连人带行李。开头是因为我们打电话给罗伊·约翰逊，老丹佛罗伊，让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喝啤酒，那会儿迪安正在后院看孩子，洗碗碟，但因为太激动了，活儿干得就很糙。约翰逊答应开车带我们去米尔城找雷米·博古尔。卡蜜儿从诊所上班回来，一脸丧，像个怨妇。我试图跟这个怨妇示好，表明我对于她的家庭生活毫无恶意，跟她问了好，尽可能地说点儿温暖的话语，但她知道那只是某种伎俩，也许我是从迪安那儿学来的，她只是敷衍地跟我笑笑。大早上的，就是一副糟糕的情景：她躺在床上抽泣，而这当儿我突然必须得去卫生间，而我去卫生间又必须穿过她的房间。“迪安，迪安，”我喊道，“最近的酒吧在哪里？”

“酒吧？”他说，惊讶极了，他正在楼下厨房水槽里洗手。他以为我想去喝两杯。我告诉了他我的需求，他说：“走进去，她总那样的。”不，我不能那么做。我冲出去找个酒吧。我在俄罗斯山四个街区的范围内上山下山一通乱窜，但只看到了洗衣店，干洗店，冷饮摊，美容院。我回到那个歪歪斜斜的小房子。他们正对彼此嘶吼，我借机溜了进去，脸上挂着尴尬的笑容，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几分钟后，卡蜜儿把迪安的东西扔到起居室地上，让他趁早收拾滚蛋。我则惊讶地发现沙发上放有一张拉迪雅·邓克尔的全身肖像画。我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女人，消磨着好多个月的孤独时光，跟其他姐妹待在一起，谈论着男人如何疯狂的事情。我听到迪安发出的咯咯的傻笑声，充满了整个房子，伴随着他的孩子的哭嚷。下一瞬间，我看到他用像格劳乔·马克斯一样的步态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带着他用白色绷带缠裹的又粗又大的大拇指，如同在惊涛骇浪当中屹立不倒的灯塔。我再次看到他那巨大而有可怜的破箱子当中露出的袜子和破内裤，他弯下腰收拾它们，把每样他看到的東西往里扔。然后他拿上了自己的行李，全美国最历经沧桑的行李箱。它是用纸板制作的，但在上面画了一些纹样，让它看起来更像是皮质的，铰链也是胡乱贴上去的，面上裂开了个大口子，迪安拿出绳子捆好了箱子。而后他拿出自己的水手布口袋，往里扔着东西。我拿起我的袋子，也胡乱地塞着东西，与此同时卡蜜儿躺在床上说：“骗子！骗子！骗子！”我们溜出房子，奋力穿过街道去往最近的车站——一团糟的男人们和行李，当中有只巨大的缠着绷带的大拇指，指向空中。

那只大拇指成了迪安晚期发展的标志。他不再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像过去那样），现在他都对所有的事情，原则上都非常关注，也就是说，这对于他都是一样的，他属于这个世界，但他又对所有事情无能为力。他在半道上挡住了我。

“现在，哥们，我知道你也许真的不爽，你刚到了这地方，我们第一天就被扫地出门。你肯定想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落到这步田地之类的——以及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嘿嘿嘿！——但看看我，求你，萨尔，看看我。”

我看着他，他穿着一件T恤，破裤子挂在他脐下，还有破烂不堪的鞋子，他没刮胡子，头发又乱又长，眼睛充满了血丝，而那只硕大的缠着绷带的指头放在他胸口高度的空中（他不得不那么做），脸上堆着一如既往的傻笑。他踉踉跄跄地兜圈子，看着每一处。

“我的眼球看到了些啥？哈——蓝天，大——家伙！”他晃动身子，眨巴着眼睛，揉揉眼睛。“包括窗子——你可否认认真真研究过窗子？现在让我们聊聊窗子。我确实见到过一些疯狂的窗子，向我做着鬼脸，有些窗子被窗帘覆盖，于是它们开始眨眼睛。”他从水手布口袋里掏出来一本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整了整自己T恤的前襟，开始作出卖弄的姿态，在街角读书。“现在，真的，萨尔，让我们一边前行一边好好研究所见所闻吧……”过了一会儿他又忘掉了自己说的这些，茫然地看着周围。我很庆幸我来了，他现在需要我。



图像

“卡蜜儿为什么把你赶出来，你接下来要干什么？”

“哎？”他说，“哎？哎？”我们绞尽脑汁想着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我发现这是由我来决定的。可怜的，可怜的迪安——这个魔鬼的化身从未落魄至此，白痴状态的，带着感染的大拇指，被几个破破烂烂的行李箱包围着，过着没有母亲的、穿越美国又无数次折返的生活，一只无脚鸟。“让我们走着去纽约吧，”他说，“当这是我们的生活，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耶！”我拿出我的钱数了数，我给他看了我的钱。

“我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了，”我说，“共有八十三美元，和一些零钱，如果你要跟我一起走，我们可以一起去纽约——之后，我们可以去意大利。”

“意大利？”他说，他的眼睛发亮了。“意大利，是啊——为什么我们要去那里，亲爱的萨尔？”

我寻思了一下。“我会弄到一些钱，我会从出版商那儿拿到一千美元。我们会去罗马，巴黎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会会那些疯狂的女人，我们会坐在街边咖啡馆里，我们会住在妓院里，为什么不去意大利？”

“为什么，是的！”迪安说着，意识到我是认真的，头一回用眼角看着我，过去我从未直面过他巨大的生活负担，他的眼神像是一个打算最终孤注一掷的男人，在权衡他的机会时才

会有的。在他邪门的眼神当中，混合着得意和骄傲，他长时间没把自己的眼睛从我身上移开。我回望着他，忍不住红了脸。

我说：“怎么了？”我这么问的时候，觉得自己有些卑鄙。他没回答，只是继续用他那倨傲的眼角余光看着我。

我试着回想他一生中做过的事情，想知道到底是什么状况使得他现在对于有些事情抱着怀疑的态度。坚定而又无可辩驳地，我重复我所说的——“跟我一起去纽约，我有钱。”我看着他，我的眼睛充满了窘迫的泪水。他依然盯着我。现在他的眼神转向空洞，并看向了我之外的东西。那好像是我们友情的支点，在他意识到我确实花了一些时间考虑了他和他的困境时，他试图将这些杂乱无章的想法归入他庞杂巨大的心理分类范畴当中。我们同时咯噔了一下。就我而言，那是因为突然关心起一个比我年轻好几岁的人，是五岁，而最近几年就他而言，他的命运和我息息相关，纠缠在一起，我是后来从他的举动中意识到的。他变得异常高兴，说一切都解决了。“干吗那么看着我？”我问，他痛苦地听着我那么说，皱起了眉头，迪安很少皱眉头的。我们都感到有什么事情是举棋不定，迷茫的。我们站在旧金山一个美妙晴天的山顶上，我们的影子落在人行道边上。就在卡蜜儿住处的隔壁公寓楼，一行共十一人的希腊男男女女突然站在有阳光的人行道上，站成一排，另外有个人，站在狭窄街道对过，微笑着给他们拍照。我们盯着这些古代人，也许他们是给其中的一个女儿举办了一次婚礼派对，也许是他们绵延不绝的黑暗中的世代当中的第一千代，眼下正在日光下微笑着。他们穿着讲究，看着有些古怪。迪安和我在

此情此景跟前像是到达了塞浦路斯。海鸥们从耀眼的空中一飞而过。

“好吧，”迪安用一种很害羞，很甜蜜的声音说，“我们去不？”

“是的，”我说，“我们去意大利吧。”我们收拾起我们的袋子，他用他好的胳膊背上他自己的一只，而我拿着余下的，然后艰难地走到电车站。过了一会儿，我们晃晃悠悠地下了山，两条腿搭在道路一侧的搁板上抖着，两位西部夜晚的落魄英雄。

3

头一件事，我们去了市场街上的一家酒吧，决定了所有事情——就是我们要粘在一起，做最好的兄弟，至死方休。迪安心情十分平静，忧心忡忡地看着酒吧里的几个老流浪汉，他们让他想起了他的父亲。“我想他应该在丹佛——这次我们一定得找到他，他也许在郡立监狱，也许又跑到拉里默街一带流浪，但是他必须被我们找到，同意吗？”

是的，我们达成了一致，我们将会做一些我们从未做过的事情，过去做起来特别傻的事情。而后我们彼此承诺在旧金山再逗留两天之后，再出发，当然了，另外达成一致的是，我们将会坐旅行社分摊汽油费的车子出发，好尽可能多的节约旅费。迪安声称他再也不需要玛丽露了，尽管他还爱她。我们都同意到纽约后再琢磨这件事。

迪安穿上他的细条纹外套和一件运动衫，我们花了十美分把所有的行李放在灰狗巴士站的寄存箱内，而后我们出发去找罗伊·约翰逊，他将在我们逗留旧金山的两天期间，做我们的司机。他先前在电话里答应了这么做。不久之后，他到市场街和第三大道交汇处的街角来接我们。罗伊现在住在旧金山，做着文员的工作，和一位叫桃乐茜的美丽娇小的金发女郎结了婚。迪安觉得她的鼻子太长了——这是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对她提出的一大论点——但她的鼻子一点儿也不长。罗伊·约翰逊是个瘦瘦的、肤色黝黑的、英俊的家伙，面部轮廓清晰，留着分头，他时不时地把两边的头发往后拢。他有着非常真诚的个性，总是笑得很开心。很明显他的妻子，桃乐茜，对于他来给我们做司机的事情，跟他闹别扭——而他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脸面（他们租了个小房间住着），毫不犹豫地信守了对我们的承诺，但带着矛盾复杂的心情，他用令人难堪的沉默来体现他内心的纠结。他整天整夜带着我和迪安在旧金山跑，但不发一语，他能做的就是穿过红灯，用两只轮子猛地拐弯，以此来向我们显示他对我们加诸他的压力的不满。他在新婚妻子和他的老丹佛台球厅那帮老伙计的头目之间摇摆不定。迪安相当满意，他当然不会为他开车的状态所干扰。我们彻底不管罗伊怎么回事，只是坐在后座上，不停地聒噪。

第二件是我们要去米尔市看能不能找到雷米·博古尔。我有些好奇地注意到那艘叫“菲利比海军上将”的老船已经不在港口了，当然了，雷米也不会依然住在峡谷棚户区倒数第二间那里。一位漂亮的有色人种女孩替代他开了门，迪安和我跟她聊了好一会儿。罗伊·约翰逊在车里等着，读着欧仁·苏的

《巴黎的秘密》。我最后看了一眼米尔市，觉得对她神秘的过往再盘根究底已经毫无意义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打算去找埃德·邓克尔借宿一晚。埃德再度离开了拉迪雅，跑到丹佛去了，如果她再不想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可就麻烦了。我们发现她盘着腿坐在她东方风格的地毯上，这是个位于教堂前街的有四个房间的公寓。她正拿着纸牌算命。好姑娘，我依然看到了忧伤的迹象，这表明埃德·邓克尔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而后仅仅出于麻木和不情愿离开了。

“他会回来的，”拉迪雅说，“那家伙没有我照顾不好自己。”她凶巴巴地看了迪安和罗伊·约翰逊一眼。“这回是汤米·斯纳克坏的菜。在他来之前，埃德特别开心，他去上班，我们出去玩儿，过得不错。迪安，你知道那种感觉。然后，他们一起坐在卫生间好几个小时，埃德坐在浴缸里，而斯纳克坐在椅子上，他们聊啊聊啊聊啊——聊着一些蠢透了的事情。”

迪安笑了。多年以来，他是这帮人的带头人，现在他们学会了他的小窍门儿。汤米·斯纳克留起了小胡子，而他巨大忧伤的眼睛来到旧金山到处寻找埃德。事实上（是真的，所言不虚的）汤米在丹佛一次小事故中被切掉了一小根指头，他拿到了一大笔抚恤金。出于青天白日下毫无理由的缘故，他们打算甩掉拉迪雅，跑到缅因州的波特兰。斯纳克似乎在那里有个姨妈。所以现在他们不是在丹佛，就是正穿行过丹佛，不然就是已经在波特兰了。

“等汤米的钱花光了以后，埃德就会回来的，”拉迪雅说，看着她的牌面。“大傻瓜——他啥也不懂啥也不会。他只

需要知道的是我爱他。”

当拉迪雅坐在那块地毯上时，她看起来就像太阳下拍照的希腊一家人的女儿，她的长发垂到地上，玩着算命的扑克。我忍不住喜欢起了她。我们甚至打算好了那天晚上出去听爵士乐，而迪安则跑去找住在街道尽头的身高六英尺的金发美人儿玛丽。

那天晚上拉迪雅、迪安和我一起去找玛丽。这个女孩拥有一个地下室公寓，一个年幼的女儿，和一辆几乎不开的车，迪安和我不得不在街上使劲儿地推那辆车，两个姑娘坐在车里踩离合。我们去了拉迪雅家，而后所有人坐成一圈——玛丽、她的女儿、拉迪雅、罗伊·约翰逊和他的老婆桃乐茜。大家在那个被家具挤满的房间里几乎不怎么开聊，而我站在一个角落里，将旧金山的一切置之度外，迪安站在房子中间，在胸口以上舞动着她气球一样肿胀的大拇指，傻笑着。“他妈的，”他说，“我们都没了手指头——哈——哈——哈。”

“迪安，你干吗显得那么蠢？”拉迪雅说，“卡蜜儿给我打电话说你离开了她。你没意识到你有了个女儿了吗？”

“他没离开她，是她把他踢出来了！”我说，打破了自己的中立立场。大家全都不以为然地看着我，迪安自顾自咧着嘴笑，“有这么个大拇指，你能指望这个可怜的家伙干些什么？”我又补充。他们全都看着我，桃乐茜·约翰逊特别将她的带有敌意的目光投向了我，那仿佛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个缝纫圈子，正当中的是那个罪魁祸首，迪安——他得为此负责，

也许，一切都是错的。我看向窗外市场街吵吵嚷嚷的夜色，我想出门去听旧金山伟大的爵士乐——记着，这只是我到本城的第二天而已。

“我觉得玛丽露离开你是非常，非常明智的，迪安，”拉迪雅说。“这么些年来，你对任何人都没有负责。你做了那么多糟糕透顶的事情，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

事实上那才是核心问题，他们团团围住迪安，用那么低看而又仇恨的眼神盯着他，而他站在中间的地毯上，咯咯地傻笑——他就是咯咯傻笑。他跳了几下舞。他的绷带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脏，开始松开，剥落。我突然意识到迪安正因为干了这么多糟糕透顶的事，正在变成一个白痴、蠢货、人堆里的圣人。

“你完全彻底地除了你自己和你的刺激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你关心的唯有你裤裆里的那个玩意儿，你能从人们那里弄到多少钱和乐子，然后你就把他们扔到一边。不仅如此，你还愚蠢得不行不行的。你从未意识到生活是严肃的，有人会认真严肃地对待生活本身，而不是从来就瞎糊弄。”

那就是迪安，神圣的傻瓜。

“卡蜜儿今晚把心都哭碎了，但一分钟也别指望她想要你回去，她说她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她说这次就是最后一次了。而你站在这里做鬼脸，我不觉得你心里还有在乎这两个字。”

那是不对的，我更知道实情，我应该可以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看不出有任何必要这么做。我想要走过去，搂住迪安的肩膀说，现在看这儿，看你自己，记住这点：这个家伙也有自己的烦恼，另外一点，他从不抱怨，他总是让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度过美妙的时光，仅仅靠着做他自己，如果这对你是不够的，把他送到刑场吧那么，显然这就是你们心痒痒着想要做的……

不仅如此，拉迪雅·邓克尔是那帮人里面唯一不怕迪安的，她可以镇定自若地坐在那里，挂着她的脸，当着众人的面数落他。早些年在丹佛，迪安可以让所有人坐在黑暗中，跟一些女孩在一起，他只是说，只是说着，仅仅靠着声音带来的奇怪的催眠作用，仅仅靠着他的说服力和他说的内容，就能让那些女孩就范。那时候他才十五六岁。现在他的信众已经结婚了，而信众的妻子们可以让他站在地毯中央，这个给她们的生活带来性感与乐趣的人。我继续听着。

“现在你要跟萨尔一起去东部了，”拉迪雅说，“你觉得你去了东部又能怎样呢？卡蜜儿不得不待在家里带孩子，既然你跑了——她怎么能保住她的工作？——而且她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不怪她。如果你在路见到埃德，你让他回到我身边，否则我就要杀了他。”

就是那么直白不加掩饰。那是最忧伤的一夜。我感觉自己像是跟一群陌生的兄弟姐妹待在一个悲哀的梦中。而后全然的沉默笼罩了所有人。过去的迪安在这种情形下本来都会以他如簧的巧舌脱困，他现在却不发一言，而是站在众人跟前，破衣

烂衫，邋邋遢遢，像个白痴。在灯光的照耀之下，他瘦削的脸上汗津津的，血管一跳一跳的，说着：“是的，是的，是的，”恰如不断地有某种召示正灌入他的体内，我可以确定这些召示到来了，其他人可能也意识到了，并且被吓到了。他被打败了——打根子里，天使般的灵魂。他知道了些什么？他试着竭尽全力把他的所知告诉我，因此他们嫉恨我，嫉恨我在他身边的地位，维护他，为他而迷醉，正如他们过去那样。而后他们看着我。我在干什么，一个陌生人，在如此美好的夜晚，在西岸干什么？这个想法让我害怕。

“我们要去意大利，”我说，我想让自己从这些麻烦里摆脱出来。而后，与此同时，空气中弥漫着某种奇妙的满足感，所有的女孩子们看着迪安确实如同母亲看着她们最疼爱最误入歧途的孩子，带着他可怜的大拇指和他所有的启示，他对此一目了然，也正因此，他才能在钟表嘀嗒的寂静中，一言不发走出了公寓，在楼下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就时间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就是我们感受到的人行道上的幽灵。我向窗外望去。他孤零零地站在门洞那儿，怅然若失地看着街道。痛苦，自责，忠告，道德，悲伤——他啥也看不到了，在他面前的唯有纯粹存在的破衣烂衫和狂喜。

“来吧，拉迪雅，玛丽，让我们去听爵士，忘掉这一切吧。迪安总有一天会死的。那你又能说他什么呢？”

“他早死早超生，”拉迪雅说，像是代表了房间里所有人的官方宣示。

“很好，那么，”我说，“但现在他还活着，我敢保证你们都想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他有我们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秘密，那把他的脑壳快要撑破了。如果他疯了，别担心，那是上帝的错误而不是你们的。”

他们反对这一点，他们说我不了解迪安了，说他是有史以来最恶的恶棍，而我总有一天会发现这一点并追悔莫及的。我听着他们的据理力争，感觉非常逗乐。罗伊·约翰逊奋不顾身地为女士们辩驳，他说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迪安，他不过是一个非常有趣，甚至搞笑的骗子。我出去找了迪安，我们就此简单地聊了聊。

“哈，哥们，别担心，一切都很好，很棒。”他揉搓着自己的肚皮，舔着自己的嘴唇。

4

女孩们出来了，我们开始了一夜的狂欢，再次推起停在楼下的汽车。“喂哦！我们走吧！”迪安嚷嚷，我们跳入了汽车后座，哐当哐当地驶向了福尔松街那头的小哈莱姆区。

我们进入了一个温暖、疯狂的夜晚，听到马路对面一个狂野的萨克斯手的吹奏，就像“咿一呀！咿一呀！咿一呀！”边上有人有节奏地拍手，喊叫着“走！走！走！”迪安已经举着大拇指穿过街道，喊着，“吹啊，哥们，吹啊！”一群黑人穿着周末夜晚的衣服，在前面大喊大叫。那是个铺着木屑的酒馆，有一个小乐台，那些乐手们戴着帽子，在人们的头顶上演奏，一个疯狂的地方，女人们有时穿着浴衣在小巷子里四处闲逛，酒瓶互相碰撞。黑漆漆的大厅连接着黑漆漆的走廊，那头到处都是水的卫生间，好多男男女女靠墙站着，喝着葡萄酒，冲着星星吐口水——红酒和威士忌。那位戴着帽子的萨克斯手，即兴地吹到高潮迭起，连绵起伏的乐段从“咿一呀”到更

疯狂的“咿—得—哩—呀”，连带着边上一个野兽似的黑人鼓手接连不断的击鼓声，他长着公牛般的脖颈，他拿他的鼓压根不当回事，除了举着鼓槌，敲打，啦嗒哔嘭，敲打。音乐声虽然喧嚣吵闹，但是萨克斯手掌控了全局，所有人知道他办得到。迪安在人潮拥挤中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脑袋，那是一群疯狂的人们。他们呼喊着想让萨克斯手坚持住，保持住，他们嘶喊，他们有着疯狂的眼神。萨克斯手从蹲下的姿势站了起来，而后再度弯腰，带着他的萨克斯，让它的声音压倒喧嚣的人群。一个六英尺那么高的黑人妇女在萨克斯管的口子上摩擦着她的骨头，乐师作势用萨克斯插她，“咿！咿！咿！”

所有人都在翻滚，拉迪雅和玛丽手里拿着啤酒，站在她们的椅子上，摇晃着，跳着。一群黑人兄弟从街上晃悠着进来，一个又一个地进来。“坚持住，哥们！”一个男人带着响亮的声音说，他发出了一声如雷的巨响，也许萨克拉曼多都能听到，啊—哈！“噢！”迪安说。他揉搓着自己的胸部、脖子，汗水从脸上炸出来。嘭，敲打，那位鼓手似乎要把自己的鼓打进地下室，而他致命的连环捶击将楼上也震翻了，啦嗒——嘭！一个大胖子冲向乐台，把它晃得咔嚓作响。“哟！”那位钢琴师正张开指头在琴键上敲按，弦乐，就在那位了不起的萨克斯换气的间隙——中国弦乐，让钢琴上的每一块木材、缝隙、琴弦都颤抖，嘭！那位萨克斯手从乐台上跳下来，站在人群当中，到处吹奏，他的帽子盖在眼睛上方，每个人都帮他往后推。他向后退一步，降低萨克斯管，出来一个爆破音，而后再深呼吸，举起萨克斯，高高地，辽阔地吹着，空气都被炸裂了。迪安正好在他跟前，他的脸正

好略低于萨克斯风的喇叭口，他拍起了手，汗水溅到了那乐师的按键上，那人留意到了，在他的管乐那头狂笑，如此炸裂、持续、疯狂的笑声，其他人也都狂笑起来，所有人都翻滚，翻滚。最后萨克斯手打算吹到最高音，他蹲下身去，来了一个长时间的高音C，压倒了周边的一切，人群的呼喊声更加热烈了，我以为警察会从附近区域簇拥过来。迪安完全沉溺其中。那位萨克斯手的眼睛死命地盯着他，他面对的是一个不仅理解，而且在乎，甚至想要比实际上理解得更多、特别多的疯狂男人，他们开始了某种意义上的二重奏！所有从那个管乐中吹出来的，不再是旋律，只是呼喊，呼喊，从“啾”降低到“乒”，再升回到“耶耶耶耶耶”！落到音符当中，甚至有旁门左道的回声。他试了所有的一切，上，下，左右，上下，水平线，三十度，四十度，最后他靠向所有人的臂膀之中，放弃了，大家将他推起，呼喊着，“是的！是的！他吹出了那个音！”迪安用手帕擦着自己的汗。

而后萨克斯手重新回到乐台，让乐队慢一点儿演奏，然后越过人们头顶，望向开着的门洞，开始唱“闭上你的眼睛”。所有的一切安静了一分钟。那位萨克斯手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羊皮外套，一件紫色的衬衫，松松垮垮的鞋，一条皱巴巴的佐特裤，他不在乎。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黑人版的哈塞尔，棕色的大眼睛时刻盯着某处，带着忧伤的神情，他唱得很缓慢，带着长长的、若有所思的停顿。但在第二乐段，他突然兴奋起来，紧紧抓住麦克风，跳下乐台，弯下了腰。为了唱一个音，他弯腰到能碰到脚趾头的地步，而后慢慢直立起来，开始吹奏，他吹得如此卖力导致他踉跄了一下，恢复过来之后他唱了下一个

长句子。“音一乐，奏一起来！”他将他的脑袋仰向天花板，手低低持着麦克风，摇摆，晃悠，而后他又弯下身体，麦克风几乎怼在自己脸上。“在一梦幻中一舞蹈”——他看向外面的街道，嘟噜着嘴，比莉·荷莉戴的嘟嘴——“当我们风流倜傥的时候”——他向两侧摇摆——“爱一的一假一期”——他摇晃着脑袋以显示自己对整个世界的厌恶和不满——“将会让它显得”——什么会让它显得如何呢？所有人等待着，他嘟噜着——“可一以。”钢琴奏出和声，“所以宝贝来吧闭一上你美丽的小一眼一睛。”——他的嘴唇在颤抖，看着我们，迪安和我，那一种神情仿佛在说，嘿现在，我们在这个忧伤暗淡的世上还能做些什么呢？——而后，他的歌即将结束了，在此之前，必须精心准备一番，在这期间，即便你能把加西亚的信息向全世界发布二十次，对众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在这里，我们是一些要应对可怜的、不公平的贫穷生活本身、糟糕的浪迹街头的男人们，于是他如此这般歌唱，“闭一上一你的——”而后向天花板，穿越天花板直上星空而去——“眼一睛”——而后摇摇晃晃地从舞台上走到台下。他和一帮男孩一起坐在角落里，没搭理他们。他垂下眼睛，哭了，他是最伟大的。

迪安和我走过去和他说话。我们邀请他到我们的车上去。在车里他突然叫嚷道：“是的！没有什么比找点好的刺激的让我更开心了！我们去哪儿？”迪安跳上车，坐在座位上，狂躁地咯咯乱笑。“等会儿！等会儿！”那个萨克斯手说。“我得带上我的男孩们去贾米森角，我得去唱歌。天哪，我活着就为了唱歌。已经唱了两个礼拜《闭上你的眼睛》了——我不想唱

别的什么歌。你们这些哥们要去做什么？”我们告诉他两天以后我们要去纽约。“天，我还从来没去过那里，他们告诉我那是个真正炫酷的城市，但我对自己待的地方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我结婚了，你知道。”

“哦，是吗？”迪安说，他喜形于色。“那你亲爱的今晚在哪里？”

“你什么意思？”萨克斯手问，斜眼看着他。“我不是说我跟她结婚了吗？”

“哦，是的，哦，是的，”迪安说。“我只是问。也许她有些个朋友？或者姐妹？你知道，我只是想去找个舞会。”

“哎，舞会有什么意思，生活太悲哀了，没必要天天跳舞，”萨克斯手说，垂下他的眼睛看着街上。“他妈的！”他说，“我一毛钱也没有，今晚我也不在乎。”

我们回到酒吧喝更多的酒。女孩们对我和迪安很不满，因为我们没搭理她们到处乱跑，她们步行去了贾米森角，那辆车反正也开不动。我们看到酒吧里一个可怕景象：一个白人乐迷，看起来像个基佬，穿着夏威夷衬衫，正在问那位大块头鼓手他能不能坐下来敲鼓。那些乐手们怀疑地看着他。“你能行吗？”他说他可以，扭捏作态地。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说：“是啊是啊，这是那个男人干的事儿，妈的！”于是那基佬坐在鼓手的位置上，乐队开始演奏一支爵士乐曲，他开始轻轻地敲打波普爵士乐的鼓点，摇晃着他的脖子，他表现出来的

一切只说明他总是喝太多的茶，吃太多软绵绵的东西，寻找一些微小的刺激。但他不介意。他对着空中微笑，持续地敲击，虽然声音很轻，还是波普爵士乐的节奏，在整个乐队正演奏的布鲁斯后边，提供了潺潺泉水流动着的、人群低声浅笑的背景声，大家压根也没留意到他。那位大块头、公牛脖子的黑人鼓手等着轮到他上场。“那哥们们在干吗？”他说。“奏乐！”他说。“搞什么鬼！”他说，“屎！”他大为不快地扭过头去。

萨克斯手的小伙子来了，他是个整洁的黑人小伙儿，开了辆巨大的凯迪拉克。我们都跳了进去。他操持着方向盘，让那车以每小时七十迈的速度一刻不停地穿行在旧金山。虽然正是交通高峰期，但人们甚至没注意到他，他是那么的棒。迪安心服口服。“看这家伙，天！看他坐在那儿的模样，一根骨头也没动，就能把车开得好好的，他整个晚上都在说话都行，因为他丝毫不受聊天影响，哈，天，这就是，这就是我希望我能做到的——我希望——哦，是的，我们冲，我们不要停下来——现在就走，对的！”而后那个男孩拐了个弯，径直把我们送到贾米森角门口，还停好了车。一辆出租车在边上停了下来，从车里跳出来一个骨瘦如柴的黑人牧师，他扔给那位出租车司机一块钱，并嚷嚷道：“奏乐！”他冲进了俱乐部，穿过楼下的酒吧，嚷嚷着：“奏乐奏乐奏乐！”他踉跄着上楼，差点迎头摔倒在地上，演奏着音乐的房间开着门，他伸出手去扶着任何他能扶着的东西，才避免了摔倒到爵士演奏的屋子里，他摔在那一季正在贾米森角当男招待的“灯罩”身上，里边的音乐连天震响，他定定地站在打开的门口处，嘶吼：“为我演奏，老兄，演奏！”那乐手是个吹中音小号的小个子黑人，按

照迪安的说法，他就像汤米·斯纳克，还跟祖母住在一起，白天睡一整天，晚上吹一整晚，在他跳下乐台之前，他得演奏几百个乐章，那就是他在做的事情。

“那是卡罗·马克斯！”迪安在嘈杂中大喊。

确实是的，这位祖母的小男孩用胶带缠着中音小号，有着一双又小又圆、忽闪忽闪的眼睛，弯曲的脚丫子，细长溜的腿，他举着他的小号拖着脚蹦来跳去，眼睛专注地盯着观众（那是些哈哈大笑的观众，分散在二十来张桌子边上，三十英尺见方的屋子，低矮的天花板），而他一刻不停息。他的想法非常简单。他喜欢的是给一个主题一些新鲜意外的简单变奏，他从“嗒—突啪—嗒得一啦啦……嗒—突啪—嗒得一啦啦”开始，如此循环反复，他对着自己的小号又是亲吻又是微笑，转向了“嗒—突啪—呃呃—哒—得—得啦—鲁噗！嗒—突啪—呃呃—哒—得—得啦—鲁噗！”所有人听着这一切都会心大笑，充满理解，那些听着的人们都是如此。他的音调如同铃铛一样清澈、高亢、纯净，而且仅在我们两英尺开外演奏。迪安站在他跟前，将世上的一切置之度外，低着头，他的两只手互相击掌，整个身体都在用脚跟蹦跶，而汗水，所有的汗水，从他衬衣的领子一直流到脚底，积成一摊水。拉迪雅和玛丽也在那里，我们差不多五分钟后才意识到，哦呜，旧金山之夜，美洲大陆的尽头，一切困惑的终结，所有若隐若现的困惑和无聊，再见了。“灯罩”举着他放啤酒的大盘子穿梭于人群之中，他做的一切动作都按着节拍来。冲着女招待用这种节奏来喊叫，“嘿现在，宝贝宝贝，让开，让开，这是‘灯罩’借你的

过。”而后他举着啤酒越过她的头顶，穿过旋转门进入厨房，跟厨师们舞蹈一番，再摇摆着回来。萨克斯手一直在角落的桌子边上一声不响地坐着，跟前搁着一杯饮料，他碰也没碰，两眼放空，两只手下垂直到快要触及地板，两只脚像慵懒的舌头一样伸出，他的身体缩成一团，进入了彻底的倦怠与无尽的悲哀之中，这就是他感受到的一切：一个男人在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击溃了自己，让其他人在夜里，把他送到终点。他周边的一切旋转着就像一朵云。包括那个祖母家的乖宝宝级别的小号手，那个小一号的卡罗·马克斯，捧着他神奇的小号又蹦又跳，演奏出两百个主题的布鲁斯，一个主题比一个主题疯狂，丝毫没有精力衰竭或者想要结束这一天的意思，整个房间都在战栗。

在第四大道和福尔松街交界处，我和埃德·福尼尔，旧金山的一位萨克斯手，一起站在街边等着迪安。迪安正在一家酒馆里头给罗伊·约翰逊打电话，让他开车来接我们。那本来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我们也就是在那儿聊聊天，突然我们看到了非常诡异和奇怪的一个场景。那是迪安闹的。他想要告诉罗伊·约翰逊那个酒吧的地址，所以他让他别挂电话，他跑到外边来看，为了这么干他得跑出长吧台，那里坐了一大票穿着白衬衫，喝得热热闹闹的酒徒，他跑到外边街上，看街边的路牌。他那么做时，像格劳乔·麦克斯一样向着地面弯腰曲背，他的双足带着他，一阵旋风般飞出酒吧，带着他气球般竖起的大拇指，在夜色之中，而后又旋风般地停在路中央，看着他上方的每一处，寻找着路牌。它们在暮色中很难找到，他在路中央差不多转了十几圈，大拇指始终举着，在狂野而焦虑的寂静当

中，一个头发乱蓬蓬的男人举着气球般的大拇指，正如天空中的一只大鹅，在黑暗中盘旋又盘旋，另外一只手始终插在口袋当中。埃德·福尼尔正在说：“我不管到哪儿都演奏甜美的曲子，如果人们不喜欢，我也无能为力。看，哥们，你那个哥们就像只疯猫，看他在那儿呢”——于是我们一起看着。在迪安盘旋着出来找路牌和回到酒吧的过程中，空气中有巨大的寂静，特别是他能够从一些人的脚底下穿过去，而且如此迅速地穿过酒吧，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带着疑虑看着他。过了一会儿，罗伊·约翰逊来了，以同样令人惊诧的迅捷，迪安穿过街道，上了车，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发出。我们再度离去。

“现在，罗伊，我们知道你要跟老婆为了这件事纠缠不清，但我们绝对必须在不可思议的三分钟之内赶到第四十六大道，吉尔里街路口，否则一切都要错过了。嗯呢！是的！（咳一咳）明天一早，我和萨尔就要出发去纽约了，这绝对是我们最后一晚上找乐子，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不，罗伊不会介意的，他只是闯过了每个红灯，为了我们的愚蠢赶路。天亮时分，他回家睡觉。迪安和我还在酒吧里和一个叫华尔特的黑人喝酒，他要了酒，把它们排成一行，并说：“葡萄酒——威士忌！”那就是来一口葡萄酒，再来一口威士忌，再来一口葡萄酒。“美妙的甜蜜蜜的夹克，给那些烂威士忌！”他喊道。

他邀请我们去他家喝瓶啤酒。他住在霍华德街后头的廉租公寓里。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睡着了。整个公寓唯一的亮光就是她床上方的灯泡。我们不得不爬上一只凳子，把

灯泡旋下来，她躺在那儿微笑着。是迪安取的灯泡，他的睫毛扑闪着。她比华尔特年长十五岁，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而后我们必须从穿过她的床连上接线板，她只是微笑着微笑着。她不问华尔特他去哪儿了，几点了，什么也不问。最后我们把连着灯泡的电线接到厨房，坐在拥挤的桌子边喝啤酒，说着故事。天亮了，该走了，于是我们把电线拉回卧室，旋回灯泡。华尔特的老婆始终微笑着，当我们重复着这些傻乎乎的事情时。她一句话也不说。

坐在黎明的街上，迪安说：“现在你看到了吧，哥们，这才是适合你们的真挚的女人，从不说一句不好听的，从不抱怨，或者纠正别人。她家老头子可以在夜里任何时候回到家里，带着任何人，在厨房里聊天，喝着啤酒，在任何时候离开。这才是个爷们，这才是属于他的城堡。”他指着廉租公寓。我们踉踉跄跄地离去。盛大的夜晚结束了。一辆巡逻车狐疑地跟了我们好几个街区。我们在第三大道一家面包店买了新鲜的面包圈，在灰溜溜、破烂不堪的街上吃了它们。一个高个子、戴着眼镜、衣着考究的家伙，摇摇晃晃地跟一个戴着卡车司机帽的黑人走在路上。他们是奇怪的搭档。一辆巨大的卡车呼啸而过，那个黑人指着它激动不已，试着说他的感受。那高个儿白人偷摸从他肩膀看过去，开始数钱。“那是老布尔·李！”迪安咯咯乱笑。“数着他的钱，为一切担忧，而另外一个男孩不过是想聊聊卡车，和他知道的一些事情而已。”我们跟了他们一会儿。

圣洁的花朵飘浮在空中，那是爵士美国拂晓时所有困倦的脸。

我们必须睡觉，拉迪雅·邓克尔家当然没什么问题。迪安认识一个叫伊斯特·伯克的铁路司闸员，他跟他爸住在第三大道的一家旅馆里。之前，他和他们相处得不错，最近就不怎么样了，迪安的主意是让我出面，说服他们让我们睡在他们房间的地板上。那很可怕，我得从一家早餐店给他们打电话。老爷子口气狐疑地接听了电话。他记得我，他儿子曾经跟他提过我。让我们惊讶的是，他下到大堂来迎我们。那不过是个悲哀的棕色古老的旧金山旅馆。我们上了楼，老爷子慷慨地给了我们整张床。“无论如何我也该起来了，”他说着，跑到小厨房里去煮咖啡。他开始谈起了他在铁道上工作的旧时光。他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不睡觉，听他说着那些故事。迪安没有在听，他在刷牙，满屋子乱窜，对于老爷子所说的一切，他都说：“是的，没错。”最后，我们睡着了。上午，伊斯特从西分区下班回来，迪安和我起床后，他接着睡。这会儿老伯克先生收拾停当，准备和他的中年甜心会面。他穿着一件绿色的粗呢大衣，同料的帽子，在外套的翻领上插了一朵花。

“这些浪漫的老旧金山司闸员过着他们自己悲伤而又热烈的生活。”我在卫生间和迪安说。“他真挺好的，让我们睡在这儿。”

“可不，可不，”迪安说，其实他压根也没听进去。他跑出去找一辆旅行社的车子。我的分工是跑去拉迪雅·邓克尔家取我们的包。她正坐在她家地上，拿着扑克牌算命。

“好吧，再见了，拉迪雅，我希望你一切顺利。”

“等埃德回来，我带他去贾米森角夜夜狂欢。你看这样管用吗，萨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些牌怎么说？”

“黑桃A离他很远，那些红桃心总是围绕着他——红桃皇后从不走远。看到这张黑桃J了么？那就是迪安，他总是不走远。”

“好吧，我们一个小时之内要去纽约了。”

“总有一天迪安上了路，就再也不回来了。”

她让我洗了澡刮了胡子，而后我道了别，拿着大包小包下楼，在路边招手叫了一辆旧金山的出租小巴士，那也是普通的出租车，只不过总是跑着固定路线，你可以从任何角落喊住它们，花个十五美分，像坐巴士一样跟其他乘客簇拥在一起，但可以像乘坐私家车一样热聊着笑话。我们在旧金山的最后一日，教堂街上正在翻修，孩子们正在玩耍，兴高采烈的黑人们开始下班回家，遍地扬尘，兴奋不已，到处都是聒噪声，这确实是美国最令人兴奋的城市——头顶是明净的蓝天，欢乐的雾海总是在夜晚翻滚着，让每个人饥肠辘辘，想要更多的刺激。我不想离开，我在这里逗留了六十几个小时。跟着狂热的迪安，我只是走马观花，而非停下来好好看一看。下午时分，我们再度踏上去往萨克拉门托和东部的路途。

5

那辆车属于一个又高又瘦的基佬，他正打算回堪萨斯家中，戴着墨镜，开得极其谨慎。这辆车恰如迪安所说的是个“基佬的普利茅斯”。它既不会加大油门，也不会有真正的动力。“娘们兮兮的车子！”迪安在我耳边小声说。车上还有两个乘客，是夫妻，典型的旅行者，在任何地方都想停下来睡一觉。本来下一站应该是萨克拉门托。压根不能算是丹佛之行的最佳起点。迪安和我坐在后排，他们全都坐在前面，方便说话。“现在，天，昨晚那个萨克斯手吹到IT了——他一旦抓住就不放松，我从未见过一个哥们能够坚持那么久。”我想知道“IT”是什么意思。“哈，好吧”——迪安笑道——“现在你给我出难题了——嗯哼！这儿有个人，其他人在他周围，对吧？大家脑子里的意思来自于、取决于他，他开始了第一段主题，而后把他脑海里的想法、人物串起来，是的，是的，但是抓住了重点，而后他跟着这个点子走，演奏出与此相匹配的旋

律。在旋律当中的某处，他卡到点子上了——所有人高看着他，明白他在道上了，他们听着，他抓住这条线索，始终前行。时间停止了。他填补了我们生命当中存在的实质性的空白，从他肺腑之中发出的告白，思想的秩序，固有主题的变奏，他不得不跨过诸多的连接来演奏，再周而复始地回来。这期间充满了真挚的灵魂深处的感受，那些曲调的瞬间本质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不单是曲调本身，而是IT——”迪安无法再进一步说明了，他已经说得汗如雨下。

而后我开始说话，我一生之中从未如此健谈。我告诉迪安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坐在车上总是想象我手持一把大镰刀，砍倒窗外渐次而过的树木，电线杆，甚至于每座山头。“没错！没错！”迪安喊叫。“我也曾经是这样的，只是用了不同的镰刀——告诉你为什么。在西部开长途车的时候，我得拿着一把无比长的镰刀，它能够探到远处的山，削平它们的山尖，而后抵达另外一个高度，去削除更多的山脉，与此同时，去除路上的每一根电线杆子，那些有规律地跳动着的电线杆子——哦，天，我不得不告诉你，现在，我有了IT——我得告诉你，在大萧条时期的中期，我跟我爸还有拉里默街上另外一个穷光蛋流浪汉，一起到内布拉斯加州去卖苍蝇拍。我们是怎么做这些苍蝇拍的呢，我们买了一些普通常见的旧窗纱和一些铁丝，我们把那些铁丝折起来，弯成圈儿，用或蓝或红的布条儿包好边，这种东西在那些便宜货杂货店也就卖个几分钱，我们做了几千个这种苍蝇拍，放在老流浪汉的破车上，开遍内布拉斯加的每个农场，每个卖五分钱——多数人买它们就当是施舍了，两个流浪汉和一个男孩，天空中掉下来的苹果馅饼，

我的老爹在那些日子里总是唱着‘哈利路亚，我又成了个流浪汉，流浪汉’。而哥们，听着，在两周无比艰难险阻的四处奔波，在烈日下走街串巷出售这些糟糕透顶的苍蝇拍子之后，他们为了分配所得争吵了起来，在路边大打了一架，然后又和好了，之后买了一些酒，开始喝酒，如此喝了五天五夜，我在一边默默哭泣，当他们把最后一分钱都花掉之后，我们回到了最初出发的地方，拉里默街。我老爸被抓起来了，我不得不跑到法庭上跟法官请求释放他，因为他是我爸，而我没有老妈。萨尔，八岁的时候，我就当着两个有利害关系的律师的面唇枪舌战……”我们很热，我们一路向东，我们十分兴奋。

“让我告诉你更多，”我说，“只是为了作为你所说的一切的插曲，继续我刚才说的那些。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躺在我爸的汽车后座上，我也有一个幻觉，觉得自己身骑白马，越过了每一样可能阻碍它的障碍物：包括躲开电线杆子，绕着房子转开，有时候来不及了，干脆就越过障碍，冲向山丘，难以置信地穿过车水马龙、突如其来的广场——”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迪安在狂喜中使劲呼吸。“跟你唯一的不同是，我自己跑，我没有马。你是个东部的孩子，向往着马。当然了，我们不会觉得那些事情是真真切切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无聊的、文学性的想法，但也许因为在我可能的人格分裂状态中，我确实撒开了腿，追着汽车在跑，有时候跑到了难以置信的时速九十迈，越过所有的灌木和栏杆，还有农舍，有时候我猛地冲向小山，又一刻也不耽搁地跑回来……”

我们聊着这类事情，彼此都汗津津的。我们全然忘掉了前座的那些人，他们肯定开始想知道后座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有那么一刻司机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在后边快要震翻天了。”我们确实是，那辆车随着迪安和我的节奏一起摇摆，我们聊天中达到的终极IT，我们平生潜伏在灵魂深处的所有数不尽的狂暴而天使般的特质，都被翻出来了。

“哦，天！天！天！”迪安嘟囔着。“这连个开头都不算呢——我们终于要一起结伴去东部了，我们还从来没有一起去过东部呢，萨尔，想想，我们将要一起去探究一下丹佛，看看所有人都在干些什么，尽管这跟我们关系甚微，重点是，我们知道了何谓IT，我们知道了时间，我们知道一切都很棒。”

然后他窃窃私语，抓住我的衣袖，汗流满面，“现在你看看前面那几位。他们有烦恼，他们计算剩下多少英里的路途要赶，他们想着今晚去哪儿睡觉，加个油得花多少钱，天气怎么样，他们怎么到达那里——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到那里的，你知道，但他们必须得忧心忡忡，时不我待那股劲儿，纯粹的焦虑和烦躁，他们的灵魂永远不得安宁，除非找到了一种确定无疑、有凭有据的烦恼，一旦找到那种烦恼，他们就会有相配套的表情去对应它，去跟定它，那就是，你所知道的，不开心，这一切无时无刻地跟随着他们，他们心里清清楚楚，那也让他们烦恼个没完。听着！听着！“‘好吧，现在’”他开着玩笑，“‘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应该在那家加油站加点油。我最近在《国家石油报》上读到，这种石油内含大量的辛烷精液^{注1}，而有人曾经告诉我，它甚至含有非官方的高品质的鸡巴，但

我不知道，好吧，我只是不觉得而已……’天，你看看这些人。”他不住地捅着我的肋骨好让我明白。我费尽了吃奶的力气去搞清楚。乒乒，乒乒，后座上尽是是的！是的！是的！前座的人不得不使劲擦着自己前额的汗，悔不该在旅行社的时候带上了我们。当然了，那仅仅是开始。

在萨克拉门托，那个基佬羞愧地在一家旅馆开了一间房，邀请迪安和我一起去喝一杯，而那对夫妻到亲戚家住去了，在旅馆房间，迪安费尽心思想从基佬那儿搞点钱。那太疯狂了。那基佬开始的时候说，他很高兴带着我们一路上一起走，因为他就喜欢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小伙儿，不管我们信不信，他真的不喜欢女孩，他最近跟旧金山一个男人在一起，在那段关系里面，他扮演男人，而那个男人扮演女人。迪安一直试图问他一些生意方面的事情，他急切地点着头。那基佬说他特别想知道迪安对这一切到底怎么看。威胁迪安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个混混，迪安问他手里有多少钱。我待在卫生间里，那个基佬瞬间变得超级阴郁，我觉得也许他开始对迪安的终极动机起了疑心，跳过钱的话题，只是给了一个到丹佛的承诺。他不停地数着自己的钱，检查着自己的钱包。迪安摊开双手，死心了。“你看，哥们，最好别烦他们。给予他们偷偷摸摸想要的东西，他们反倒一惊一乍起来了。”但他着实得到了普利茅斯主人的信任，不反对他帮着开车了，我们才真的开始了旅行。

破晓时分，我们离开了萨克拉门托，中午的时候穿过了内华达沙漠，我们风驰电掣地途经多雾的锡耶拉，后座上那两个旅行者紧紧地靠在一起。我们坐在前面，掌控了方向盘。迪安

又高兴起来。他想要的就是把方向盘把控在手中，四个轮子走在路上。他谈及布尔·李开车的技术有多烂，他演示着——“任何时候，一旦一辆像那样的卡车进入视野，布尔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它，因为他看不见，哥们，他看不见。”他学着布尔使劲地揉着自己的眼睛。“然后我就说，‘喂，小心，布尔，一辆卡车！’他就说，‘呃？你说的什么，迪安？’‘卡车！卡车！’到了最后一刻，他就会像这样冲着卡车开过去——”迪安开着普利茅斯直奔那辆呼啸而来的大卡车，在它跟前晃动了一会儿，卡车司机吓得面如土色，后座的人吓得不敢呼吸，而后他在最后一刻闪开了卡车。“就像这样，你看，就像这样，他得有多糟糕。”我一点儿也不怕，我了解迪安。后座上的人们一声不吭。事实上，他们不敢抱怨，天知道迪安会干些什么，他们想，如果他们敢抱怨的话。他就那么穿过了整个沙漠，演示着各种劣质驾驶技术，他老爸过去怎么开那辆老破车的，厉害的司机如何拐弯的，差劲的司机拐弯的时候，在开头拐得太大，后来又手忙脚乱，诸如此类。那是个阳光灿烂的炎热午后。雷诺，巴特山，埃尔科，内华达沿路的小镇一个个飞越而过，傍晚的时候，我们抵达盐湖区的平原地带，盐湖城璀璨而又闪烁的灯光，在平原一带蔓延了一百英里那么远，分为两层，地平线之上和地平线之下，一层是清晰的，另外一层是模糊不清的。我告诉迪安这个世界把人们关联在一起的东西是不可见的，为了证明它的存在，我指向了在盐湖边沿蜿蜒曲折前行的电线杆子。他受伤手指的绷带，现在已经很脏了，在风中颤颤巍巍地抖动，他的脸上有一道光。“哦，是的，哥们，亲爱的上帝，是的，是的！”突然之间，他停下车，身体缩成一团，我转过头，看到他整个身体在

座位的一角缩成一团，睡着了。他的脑袋垂在那只没问题的手上，那只缠着绷带的手，自动地、恪守职责地举在空中。

后座上的人们松了一口气，我听到他们窃窃私语想要造反。“我们不能再让他开车了，他绝对疯了，可能是从疯人院什么的放出来的。”

我回过头来为迪安辩护。“他不是疯子，他会好的，别为他的驾驶技术担心，他是世界上最棒的司机。”

“我就是没法忍受，”那个女孩压低声音，却是歇斯底里地说。我向后靠，欣赏沙漠上的夜幕降临，等着可怜的孩子、天使迪安再度醒来。我们在一座小山上，俯视着盐湖城整洁如昼的灯光，他睁开眼就能看到这个他多年前出生的地方，在这个幽灵般的世界，那时候的他无名无姓，脏兮兮的。

“萨尔，萨尔，看，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想想！人们在变化，他们年复一年，一日三餐，翻新花样。呃！看！”他是那么兴奋，这让我忍不住落泪。那对旅行者坚持要开完余下到丹佛的路途。好的，我们不在乎。我们坐在后座聊天。但他们到早上的时候实在太累了，迪安在科罗拉多东边的克雷格接手了方向盘。我们在犹他州的草莓山口小心翼翼地爬行了差不多一整个晚上，浪费了许多时间。他们睡着了。迪安朝着伯绍德山口开去，它在一百英里之外世界的屋脊之上，像是云中的巨大的直布罗陀海峡。他把伯绍德山口看成六月虫——正如蒂哈查皮山口那样，他把引擎熄灭，漂浮着开，超过一辆辆车，一

刻不停地按着山势的节奏顺势而为，直到我们看到丹佛巨大的平原——迪安到家了。

那帮愚蠢的人们把我们放下后，松了一大口气，他们把我们放在第二十七大道和联邦街的交接口。我们乱七八糟的行李再度被堆积在人行道上，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但没关系，道路就是生活。

[注1](#) 精液的单词是gook，鸡巴的单词是cock，它们放在一起不单有逻辑关系，

还押韵，别有趣味。

6

我们在丹佛有更多的情况要处理，而且它们跟1947年相比情况不一样。我们可以坐上另外一辆旅行社的车，或者逗留几天，找点儿乐子，一边找找他的父亲。

我们俩都精疲力竭，肮脏不堪。在一家餐馆的厕所里，我小便的时候，堵在迪安去洗手池的路上，我停止小便，并换了一个便池继续尿，跟迪安说：“看看俺这本事。”

“是的，哥们，”他在洗手池洗手时说，“这是一种好本事，但是对你的肾不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次你这么做的時候，等你老了，坐公园里的时候，你的肾病就够你受的了。”

这句话让我恼火。“谁老了？我没比你老多少！”

“我没那么说，哥们！”

“哈，”我说，“你总跟我的年龄过意不去。我不是像那个老基佬一样的基佬，你犯不着拿我的肾威胁我。”我们回到餐厅里头，女招待正好端来了烤牛肉三明治——而迪安一向都是如狼似虎地扑向食物——我压住自己的愤怒说：“我再也不想听任何那种话了。”突然，迪安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站起来，丢下他热乎乎的吃的，走出餐厅。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就此不回来了。我不在乎，我是那么疯狂——我确实情绪失控，把一切都归咎于迪安。但看到他不吃的东西让我更加难受，比过去数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难受。我不应该那么说……他那么热爱吃的……他从未像这样丢下他的吃的……真他妈的，这说明他动真格的了。

迪安在餐厅外边站了整整五分钟，然后回来坐下。“好吧，”我说，“你在外边干吗呢，握紧你的拳头？诅咒我，想出新的取笑我的肾的花样？”

迪安一声不吭地摇摇头。“不，天哪，不，天哪，你完全误会了，如果你想知道，好吧——”

“继续，告诉我。”我这么说着，一刻也不从我的食物上抬起头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畜生。

“我在外头哭了。”迪安说。

“哈，见鬼，你从来不哭。”

“你干吗这么说？你为什么觉得我从来不哭？”

“你死都不会哭，怎么会哭。”我所说的每句话，都像是在我自己身上下的刀子。我长久以来对我兄弟的不可告人的想法一股脑儿地暴露了：我得有多丑陋啊，我内心深处的那些龌龊的心理得有多见不得人啊。

迪安摇着头。“不，哥们，我确实在哭。”

“继续，我打赌你快要气疯了，你得走了。”

“相信我，萨尔，真的相信我，如果你对我有过一点信任的话。”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我也知道自己不想跟真相较劲，当我看着他时，觉得自己确实满肚子花花肠子，看什么都不正常。

“哈，天哪，迪安，对不起，我从来没这么对待过你。好吧，现在你知道我是个什么货色了。你知道我再也不会跟任何人发生任何亲密关系了，我不知道该拿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像拿着几坨屎在手里，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里。让我们忘了这一茬吧。”这位圣洁的骗子开始吃起了东西。“这不是我的错！这不是我的错！”我跟他说。“在这个操蛋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怪得到我头上，你看不出来吗？我不想这样，它不能这样，也不会这样。”

“是的，天哪，是的，天哪。但是话说回来，请相信我。”

“我相信你，我相信。”这就是那个下午的悲伤故事。当晚，迪安和我去流动工人家里投宿时，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簇

拥而来。

他们是我两周之前，独自住在丹佛时候的邻居。那个妈妈是个很棒的女人，穿着牛仔裤，为了养活孩子们，冬天在山区开运煤的大卡车，她统共有四个孩子。她的丈夫多年前就离家出走了，当时他们正开着个拖车在全国旅行。他们从印第安纳一路去往洛杉矶。历经许多好时光之后，某个周日下午，在一个十字路口酒吧，大喝一顿，开怀大笑，夜里弹着吉他，那个举止粗鲁的男人突然向着黑漆漆的田野走去，再也没有回头。她的孩子们特别棒。老大是个男孩，那个夏天没在家，去山里野营了；老二是个可爱的十三岁的女孩子，她写诗，在田野里采花，长大后想去好莱坞做个女演员，她叫珍妮特；然后是那两个小的，小吉米夜里坐在篝火边，嚷嚷着要吃还没烤熟的土豆，小露西呢，她把虫子、角蟾蜍、甲壳虫和诸如此类能够爬的东西都当宠物养，还给它们起名儿，给地方住。他们养了四条狗，在那条新居住区的街上过着穷困而又开心的生活，来自邻居半是尊重，半是同情的理解，因为那个可怜女人的丈夫离开了她，因为他们住在一个乱糟糟的院子里。在夜里，整个丹佛的灯光亮了起来，就像平原底下一个巨大的风车，他们的房子坐落在丹佛的西边儿，那正是山脉从高处向平原伸展的地方，经过海一般的密西西比河柔和波浪的冲刷，形成了诸如伊文斯、派克和朗斯这类岛状的山丘。迪安到了那里，当然了，他一看到他们便既甜蜜又开心，特别是珍妮特，但我警告他别碰她，而且也许不一定需要去碰她。那个妈妈也是个很有男人缘的主儿，很快就吸引走了迪安的注意力，但是她有些害羞，

迪安也有些不好意思。她说迪安让她想起了她离家出走的丈夫。“跟他一模一样——哦，他也是疯子，我跟你说！”

我们最后是在那个杂乱的起居室，喧嚣无比地喝啤酒，吵吵闹闹地吃晚饭，将巡警电台的声音开到炸裂。如此繁复的状况恰如群蝶飞舞，那个女人——弗兰克，大家都这么喊她——最终打算要去买一辆车，她多年来一直想干这件事，直到最近才有了一些闲钱可以去买一辆。迪安迅速地承担起了帮着选车和砍价的职责，当然是因为他自己也想用用这辆车，就像过去那些年，他下午的时候，开着车把女孩们带出高中校园，到山里兜风。可怜的、单纯的弗兰克总是听从任何建议。但是当她们到了卖车的地方，面对销售的时候，她又害怕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迪安坐在阿梅达大道的尘土里，用自己的拳头打着脑壳。“就一百块钱，你不可能买到比它更好的东西了！”他发誓自己再也不跟她说话了，他诅咒发誓，脸气得发紫，他恨不得跳上那辆车，开上就走。“哦，这些蠢透了的流动工人，他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彻头彻尾不可思议的愚蠢，这些人麻痹、恐惧、歇斯底里，除了他们想要的，没有什么能战胜他们——简直就是我老爸的翻版！”

迪安那天晚上十分兴奋，因为他的表哥山姆·布雷迪要跟我们在一个酒吧碰面，他换了一件干净的T恤，精神抖擞。“现在听着，萨尔，我得告诉你关于山姆的事情——他是我表哥。”

“顺便问一句，你去找你爸了没有？”

“今天下午，哥们，我去过吉格斯快餐厅找他，他过去经常去那里喝生啤喝到微醺，被老板一通咆哮，然后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去——不——然后我到了温莎边上的老理发馆——不，没在那儿——老头子跟我说他觉得他在——想象的！——在铁道工的灶棚里工作，或者在新英格兰波士顿和缅因的船只上干活！但我不相信他，他们为了一毛钱都可以编故事，现在听着，在我的童年时代，山姆·布雷迪我特别亲近的表哥，绝对是我的英雄。过去他在山里贩运私酒，威士忌，有一次，他跟他的兄弟在院子里大打出手，足足打了两个小时，所有的女人都害怕尖叫。我们过去睡在一起，他是家里唯一一个亲切关心我的人。而今晚是我在七年之后第一次见他，他刚从密苏里州回来。”

“见他干吗？”

“没啥事儿，哥们，我只是想知道这些年来我家族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有一个家，记得不？——更为重要的是，萨尔，我想让他告诉我一些我已经淡忘了的童年往事。我想记住，记住，我确实想！”我从未见过迪安如此开心和兴奋。当我们在酒吧里等他表哥的时候，迪安跟那里许多年轻的潮人和妓女聊天儿，跟进最新社团的动态。然后他打听玛丽露的近况，因为她最近在丹佛。“萨尔，我小时候，我经常到这一带的报刊亭来偷钱，去买点儿炖牛肉吃，你看那个站在那儿，一脸凶相的家伙，过去他心里啥也不想只想着杀人，一天到晚打不完的狠架，我甚至还记得他的疤痕，现在，年复一年地站在街角，他已经被岁月磨平了，生活简单粗暴地教训了

他，现在他彻底变得对每个人甜蜜、和和气气、有耐心，他变成了那个街角的固定设施，你看到岁月催人老了吧？”

而后山姆来了，一个瘦子，卷发，三十五岁，双手干惯了粗活的样子。迪安在他跟前毕恭毕敬。“不，”山姆·布雷迪说，“我再也不喝酒了。”

“看见了吗？”迪安在我耳边窃窃私语。“他再也不喝酒了，而他过去曾是镇上最大号的威士忌酒徒。他现在还信教了，他跟我在电话里说的，看他，看一个男人的变化——我心目中的英雄变得这么古怪。”山姆·布雷迪对他年轻的表弟带着疑虑。他带着我们坐上他那辆破旧不堪的双门车到处转转，很快他摆正了自己对迪安的态度。

“现在看着，迪安，我不再相信你，也不再相信任何你打算跟我说的话。我今晚来看你，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份文件需要你代表家族签个字。我们都不再提到你父亲了，我们彻底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而且，我要很抱歉地说，从今往后，对你也一样。”我看着迪安，他的脸耷拉，而且阴沉了下来。

“好，好，”他说，那位表哥继续带我们兜风，还给我们买了冰淇淋汽水，尽管如此，迪安还是抛给了他无数个关于过去的问题，表哥悉数回答了，有那么一会儿，迪安又因为兴奋而满头大汗。哦，他那个沧桑的老爹那天晚上在哪里呢？表哥在闪耀着嘉年华忧伤灯光的阿尔梅达大道和联邦街的路口把我们放下来。他跟迪安约定了第二天下午签署文件，然后离开了。我跟迪安说我很抱歉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了。

“记得我相信你。我对我昨天下午对你大放厥词，感到特别特别抱歉。”

“好了，哥们，我们没事儿了。”迪安说，我们一起去逛了嘉年华。那里有旋转木马，摩天轮，爆米花，轮盘赌，锯末，还有几百个丹佛少年穿着牛仔裤在周边闲逛。地上的尘埃直往星空蹿，伴随着所有地上哀伤的音乐。迪安穿着洗得发白的包身里维斯牛仔裤和T恤，顿时又变成了土生土长的丹佛人。一些骑着摩托戴遮阳帽檐的年轻人，留着八字胡，镶嵌着珠子的夹克，跟那些穿着牛仔裤和玫瑰色衬衫的女孩们在帐篷后边调笑。那儿也有很多墨西哥女孩儿，有一个令人惊艳的女孩只有三英尺高，一个侏儒，但是长着一张世界上最美最柔和的脸，她转向自己的伙伴并说：“哥们，让我们喊上戈麦斯走吧。”迪安在见到她的一瞬整个人就定住了，仿佛黑夜中有一把刀子扎了他一刀。“天哪，我爱她，哦，爱她……”我们不得不跟着她走了好长时间。最后她穿过高速公路，到一家汽车旅馆去打了个电话，迪安假装也去那里翻阅电话本，实际上只想近距离地看看她。我试着想要跟那个可爱的洋娃娃的朋友们聊聊天，但是她们压根就不理睬我们。戈麦斯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卡车来了，把女孩们都带走了。迪安站在路上，抓住自己的胸口。“哦，天哪，我快要死了……”

“你他妈的干吗不跟她说话？”

“我不能，我不能……”我们决定买上一些啤酒，跑去流动工人弗兰克家听唱片。我们提了一大袋听装啤酒，在路上搭车。小珍妮特，弗兰克十三岁的女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

儿，即将长大成为一个销魂的小美人儿。最美的是她修长、曼妙、敏感的手指头，她说话的时候伴随着那些手姿，正像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在尼罗河上起舞。迪安坐在房间里最远的一个角落，眯起眼睛看着她，说：“是的，是的，是的。”珍妮特留意到他了，她转头寻求我的保护。在那个夏天之前的几个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她待在一起，聊着一些书，以及另外一些她感兴趣的小事情。

7

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我们上床睡觉。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次日。那天下午，迪安和我跑去丹佛城里处理一些琐事，去旅行社看看有没有去纽约的车子。下午晚些时候，在回家路上，我们又去了弗兰克家，到了百老汇街那儿，迪安突然跑进一家运动用品商店，冷静地从柜台里拿起一只垒球，走了出来，一边把球在手里上下扔着，没人留意到，没人发现这类的事情。那是个又闷又热的下午。我们一路走一路玩球。“我们无论如何明天都会找到一家旅行社的。”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送了我一夸脱那么大容量的老祖父牌波本威士忌。我们在弗兰克家开始喝起来。穿过后边的玉米地，住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妞，迪安从他来的那天起就打算勾搭人家。麻烦来了，他往她的窗口扔了太多的小石子儿，吓着她了。我们在那间乱糟糟的小起居室里喝着波本威士忌，周围到处都是那些狗和那些四散的玩具，我们忧伤的闲聊着，迪安不

停地跑出厨房后边的门，穿过玉米地，扔小石子儿，吹着口哨。有时候，珍妮特也跑出去看热闹。突然迪安苍白着小脸回来了。“糟了，我的天，那个女孩的妈妈端着一把猎枪追着我，她还找了一票高中生，蹲守在半道上准备胖揍我一顿。”

“这是干吗？他们在哪儿？”

“在玉米的那头，哦天。”迪安喝多了，他毫不在乎。我们一起出去，在月光之下穿过玉米地。我看到一群人在黑暗而又肮脏的路边站着。

“他们来了！”我听到。

“等一会儿，”我说，“请问是怎么回事？”

那个当妈的从后边站出来，手里端着猎枪。“你那个该死的朋友骚扰够我们了。我不是那种会告官的人。如果他再来一回，我就会开枪，会死人的那种开枪。”那帮高中生握紧拳头围成一圈。我喝得大醉，所以我也不在乎，但我还是试图打打圆场。

我说：“他不会再那么干了。我会看着他，他是我弟弟，他会听我的。请把你的枪收起来了，别烦恼了。”

“有种再来一次！”她在黑暗中固执而又坚定地说。

“你不用这么干，他不会再烦你们了，理解了。现在冷静一下，好好的。”在我身后，迪安在急促的呼吸之下不停地诅

咒。那个女孩从自己的窗口偷偷地张望。我过去就认识这些人，所以他们足够信任我，冷静下来了。我拉住迪安的胳膊，从月光朗照的玉米地走了回来。

“喔—嘿！”他喊叫道。“我今晚要一醉方休。”我们回到弗兰克和孩子们身边。突然之间，迪安对于小珍妮特正在放的一张唱片发怒了，拿起来就用膝盖抵住它给折断了：那是一张牛仔音乐的唱片，是一张迪兹·吉莱斯皮早年录制的唱片——《刚果布鲁斯》，马克斯·韦斯特打的鼓。我以前送给珍妮特的，我告诉正哭泣的她，拿起那些碎片，往迪安头上砸去。她走了过去，照做了。迪安顿时傻掉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我们大笑，就该这么办。而后弗兰克大妈想要出去，到路边酒馆喝啤酒。“走吧！”迪安叫道。“现在他妈的，如果礼拜二那天你买下我让你买的那辆车，我们就不用走路了。”

“我不喜欢那辆该死的车！”弗兰克嘶吼。呜呜，孩子们开始哭了起来。暗淡的深棕客厅，忧伤的墙纸，粉红的灯光，凝重的脸蛋。小吉米吓坏了，我把他抱到沙发上睡觉，让狗狗过来陪着他。弗兰克醉醺醺地去喊一辆出租车，突然，正当我们坐着等出租车时，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打了个电话过来。她有一个中年表哥，特别讨厌我，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布尔·李，他现在在墨西哥城，我告知了他迪安和我的冒险记，以及我们在丹佛处于何种境况之中。我写道：“我有一个女性朋友，给我威士忌、钱和大餐。”

我傻乎乎地把这封信交给她的中年表哥帮我邮寄，在刚刚吃完一顿烤鸡晚餐之后。他打开它，读了它，而后火速把它交

给她，以证明我是个骗子。现在她泪眼婆娑地给我电话，说她再也不想见到我了。而后那个自以为胜利的表哥接过来电话，开始骂我狗杂种。这时出租车到了，在外边使劲按喇叭，狗叫孩子哭，而迪安抱着弗兰克翩翩起舞。我在电话里用我想得到的咒骂怼了回去，并且加了很多新鲜刺激的词句，在我的醉意中，我让电话里的每个人都去死，挂了它，并继续出门买醉。

我们挨个儿出了出租车，在酒馆外面，那是个山边上的牛仔酒吧，我们进去了之后就开始要酒。一切都乱七八糟的，让事情变得更不可挽救地糟糕的是，那里有个疯疯癫癫的家伙，用他的胳膊一把搂住迪安，贴着他的脸嘟嘟囔囔，迪安顷刻也疯了，一头大汗，而且更让人一头雾水的是，迪安居然在下一秒钟跑出去，在行车道上偷了一辆车，在丹佛城里兜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开了另外一辆车回来，更好的一辆。突然，在酒吧里，我抬头一看，看到警察和其他人挤在行车道上，巡警车的头灯亮着，谈论着被偷的那辆车。“有人偷了一辆车跑了，就在这儿！”那个警察正说着。迪安就站在他身后，听着并插话，“哈，是哟，哈，是哟。”警察走开去调查此事。迪安进了酒吧，跟那个疯疯癫癫的孩子一起东倒西歪，那孩子那天才刚结婚，他喝了个烂醉，他的新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等他。“哦，天哪，这家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家伙！”迪安大喊大叫。“萨尔，弗兰克，我要出去弄一辆真正的好车这回，我们可以跟托尼一起走。”（托尼就是那个疯癫的家伙）“我们可以到山上好好兜一兜风。”而后他又飞快地跑了出去。与此同时，一个警察进了酒吧说丹佛城里的行车道上，有一辆车被偷走了。人们正在那里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从窗户那儿，我看

到迪安跳进了最近的一辆车里，呼啸而去，没有一个人留意到他。几分钟后，他又开着一辆完全不同的车回来了，一辆全新的敞篷车。“这辆车真棒！”他在我耳边偷偷说。“另外那辆噪音太大——我把它扔在十字路口了，然后看到这辆漂漂亮亮地停在农舍门口。我就去丹佛城里转了一圈。来吧，哥们，我们一起去兜风。”他在丹佛期间所有的艰难困苦与疯狂都烟消云散，离他而去了。他的脸涨得通红，汗津津的，做出了一幅很难搞的样子。

“不，我可不想跟那种偷来的车发生什么瓜葛。”

“噉，来啊，哥们！托尼要跟我一起走，是吧，亲爱的好托尼？”托尼——一个瘦巴巴，黑头发，眼神纯洁，一直嘟嘟囔囔的失败的家伙——靠住迪安，不停地呻吟，因为他突然发病了，也因为某种奇怪的理由驱动，他突然害怕起迪安来，他将两只手举起来，用手掩住脸，哆哆嗦嗦地躲开他。迪安低下头，汗流满面。他跑了出去，开着车走掉了。弗兰克和我在行车道上发现了一辆出租车，打算回家。出租车司机带着我们开上了阿梅达大道，在这个夏天之前的那几个月里，我在这里来回走了无数遍，唱着歌儿，自言自语，仰望着头顶的星星，任由我内心的液体一滴又一滴地滴落在滚烫的柏油马路上，迪安突然开着他偷来的敞篷车从后面追上了我们，开始不停地按喇叭，把我们往一侧挤，尖叫着。出租司机的脸都吓白了。

“只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说，迪安突然嫌弃起我们，猛地以一个小时九十迈的速度蹿到前边，扬起了一阵尘埃。然后他转向去弗兰克家的路，在门口停了片刻，突如其来的，他又

把车开走了，来了个U型的大拐弯，当我们下了出租车正在付钱的时候，他又转去了城里。过了一会儿，当我们焦虑地在黑漆漆的院子里等待时，他又开了另外一辆车回来了，一辆破烂的双门车，在门前一阵烟尘中停了下来，踉踉跄跄地出来，直接进入卧室，在烂醉如泥中迅速入睡，而我们守着门外又一辆偷来的车。

我必须把他弄醒，我无法启动车子，把它开到远处。他跌跌撞撞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只穿着他的小内裤，我们一起上了车，当孩子们在窗边上咯咯笑时，我们启动车子，硬把它开上道路尽头遍布苜蓿的沟壑当中，底盘磕得一塌糊涂，直到车子再也承受不住，死火停在了老磨坊附近的三角叶杨树下。迪安只说了句“开不动了”，就下了车，从玉米地走了回去，差不多半个英里，穿着他的小短裤在月光下。我们回到屋子里，他去睡觉。所有的事情都一塌糊涂，整个丹佛，我的女性朋友，车子们，孩子们，可怜的弗兰克，到处都是啤酒和啤酒罐子的起居室，我试着入睡。但一只蚰蚰吵得我时不时地醒来。在晚上，在西部的这一带，那些星星，正如我在怀俄明的时候一样，像罗马的蜡烛一样大，像乔达摩王子一样寂寞，他失去了祖传的果园，在北斗七星的引导下到各处去游历和寻找。于是北斗们缓慢地推动着夜晚的进程，早在真正的日头升起之时，有一大片红光出现在西边堪萨斯的阴暗大地上，而鸟儿在丹佛上空开始了鸣唱。

8

要了命的恶心感让我们第二天难受得不行。第一件事，迪安就是出门穿过了玉米地，去看看那辆车能不能带我们去东部。我告诉他算了，他还是去了。他苍白着脸回来了。“天，那儿有辆侦探的车子，从那年我偷了五百辆车子之后，所有城里的警局都有我的指纹。你知道我拿那些车子干吗了，我只是想开一开而已，天哪！我必须得走了，听着，我们如果不马上离开这里的话，我们会立刻被抓到牢里去。”

“你说得太他妈对了，”我说，我们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领带和衬衫下摆胡乱归置在一起，我们迅速地说了再见，冲出这个甜蜜的家庭。踉踉跄跄地走上了那条谁也不认识我们，但安全可靠的大路。小珍妮特哭着看着我们，为我，或者不论是谁送行——弗兰克很有礼貌，我亲吻了她并向她道歉。

“他确实是个疯子，”她说。“确实让我回想起了我跑掉的丈夫。就是一样的男人。我希望我的米奇长大后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但他们已经开始有点儿像了。”

我跟小露西说了再见，她手里拿着她的宠物甲壳虫，小吉米还在睡觉。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在一个可爱的礼拜天的大早上，我们跌跌撞撞地提着乱七八糟的行李走了。我们如此匆忙。每时每刻我们都觉得有一辆警车打乡间拐角上开过来，要带走我们。

“如果那个带着猎枪的女人发现了我们，我们就死定了。”迪安说，“我们必须约个出租车，那样才安全。”我们差点儿就去敲门喊醒一家农户，借用他们的电话，但他家的狗把我们吠走了。每一分钟，事情变得都更加危急，那辆双门车会被早起的农夫发现坏在玉米地里，最后，一个可爱的老太太让我们用了她的电话，我们打电话给了丹佛城里的出租车，但车子迟迟不来。我们狼狈地回到路上，早高峰开始了，每辆车看起来都像一辆巡逻车。突然间，我们看到了一辆巡逻车来了，我知道我的人生结束了，正如我已经知道的那样，我将进入一段堪称恐怖的铁窗生涯。但是那辆所谓的巡逻车是我们叫的出租，从那以后，我们便一路东去。

在旅行社，我们逮到了一个绝妙的好事儿，有人想要开一辆四七年款的凯迪拉克豪华轿车去芝加哥。车主带着他全家从墨西哥开过来的，开得太累了，他把家人都送上了火车。他想要的就是司机能提供身份证明，并把它开到那儿。我的身份证明让他吃了定心丸。我跟他说明啥也不用担心。我告诉迪

安：“别拿这车耍花招。”迪安跳了上去，兴奋不已地看着车内。我们得等一个小时，因为车主要开车去火车站。我们躺在教堂附近的草地上，1947年，在送丽塔·贝当古回家后，我曾在那里跟一帮流浪汉厮混了些时间，因为极度疲惫，我居然脸冲着那天下午的鸟就给睡着了。事实上，他们在附近吹奏管风琴。迪安在镇子里瞎逛，他在一家餐厅不知怎么的就跟一个女招待勾搭上了，还约她那天下午一起开着他的凯迪拉克兜风，还跑回来把我弄醒了，通报了这条新闻。我感觉好点儿了，等着事情的进展。

当凯迪拉克来了的时候，迪安迅速地开着它跑去加油，那位旅行社负责人看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乘客准备好要走了。”他指着两位来自东部耶稣会学校的爱尔兰男孩说，他们的行李箱放在长椅上，正等着。

“他只是去加油，很快会回来的。”我跑到街角去查看，看到迪安车子没有熄火，正在那儿等着女招待，那个女人正在她的旅馆房间换衣服，事实上，从我站的地方，我能看到她正在镜子前整理自己的丝袜，我希望自己能跟他们一道出去玩耍。她跑出来了，跳上了凯迪拉克。我回去宽慰旅行社的负责人和乘客们，我在门内所站的位置，足以看到克利夫兰广场上，一辆凯迪拉克闪电般地开过，车上坐着穿着T恤、兴高采烈的迪安，两只手在方向盘上晃动，跟那个女孩说着话，他把车子开得飞快，女孩儿坐在他身边既忧伤又骄傲。他们光天化日下把车子开到一个停车场，在砖墙后面停下（那个停车场迪安工作过），在那里，他声称，他跟她做了爱，在那没一处平坦

的地方，不仅如此，还说服她在礼拜五一旦拿到自己的薪水之后，立刻跟我们去东部，坐汽车去，在纽约列克星敦大道的伊恩·麦克阿瑟故居跟我们碰头。她答应去，她叫贝弗利，三十分钟后，迪安呼啸而归，把那个女孩送回旅馆，带着亲吻、再见、承诺，而后迅速地回到旅行社去接乘客。

“好吧，该出门儿了。”百老汇山姆旅行社老板说，“我以为你要开着凯迪拉克跑掉了。”

“这是我的职责，”我说，“别担心。”——我那么说是因为迪安看起来疯疯癫癫的，所有人都会猜他是不是疯了。迪安公事公办了起来，帮那两个耶稣会男孩儿搬放行李。没等他们坐稳，没等我跟丹佛摆手再见，他就出发了，强劲的引擎动力十足。出了丹佛不到两英里，计速器就坏掉了，因为迪安时速超过了一百一十迈。

“好吧，没了计速器，我不知道我开得有多快。我只管这么开着去芝加哥，就知道花了多长时间了。”感觉我们的时速不会超过七十迈，但是所有的车子都落后于我们，像一只只死苍蝇，在去往格里格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往东北方向开的原因是，萨尔，我们必须去拜访一下埃德·华尔在斯特林的农场。你得跟他碰一面，看看他的农场，这辆车速度如此之快，我们可以毫无悬念地赶路，在那个男人的火车到之前，提前很久先到。”好的，我没问题。天开始下雨了，但迪安丝毫不受影响。那是一辆漂亮的大车子，最新一款老派风格的豪华车，黑的，加长车身和侧面发白的轮胎，也许是防弹的车窗。那两位耶稣会的男孩——校名圣博纳文图拉——坐在后边，车一开

起来后就兴高采烈的，他对于我们开得有多快压根没概念。他们想要攀谈，但迪安啥也不说，脱掉他的T恤，光着上身开车。“哦，那个贝弗利真是个甜蜜可爱的小家伙——她会去纽约跟我会合——一旦我拿到跟卡蜜儿的离婚证书，就马上跟她结婚——一切都是越快越好，萨尔，我们开路。是的！”我们越快离开丹佛我越开心，我们确实开得飞快。我们在一个岔路口开出高速公路时，天黑了下来，然后开上一条泥泞的道路，这条路带领我们穿过荒芜的东科罗拉多平原，去往埃德·华尔的农场，在坎尤提诺威的中央位置。但天还下着雨，污泥让车子直打滑，迪安开慢到时速七十迈。但我让他再开慢一点儿，否则我们会滑翻，他说：“别担心，哥们，你知道我的。”

“这次不行，”我说，“你确实开得快得出奇。”他在滑溜溜的泥浆里飞驰，当我那么说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高速路上一段很急的左拐弯，迪安使劲地掰方向盘，想让它拐过去，但是这辆大车还是在巨大的惯性当中滑了出去，整个车身不停抖动。

“小心！”迪安大喊，他有那么一会儿确实没带着他的天使一起摔跤，我们在路边一条沟里陷得死死的，四下里一片静寂。我们听到风呜呜地吹过。我们在一大片荒芜的大草原之中。在四分之一英里外有个农舍。我忍不住咒骂起来。我对迪安疯了似地愤恨。他啥也没说，穿上雨衣在雨中走往农舍，找人帮忙。

“他是你的弟弟吗？”后座的男孩问。“他对于车简直就是个魔鬼，对吧？——听他说话的意思，他一定整天跟女人搅

和在一起。”

“他很疯，”我说，“而且是的，他是我弟弟。”我看到迪安带着一个开拖拉机的农夫回来。他们挂上钩子，那位农夫把我们从沟里拖了出来。车子上全是褐色的污泥，一整块挡泥板都撞烂了。那农夫管我们要五块钱，他的女儿们在雨中围观。那个最漂亮、最害羞的躲在田野后边远远地看，她当之无愧，因为她绝对是迪安和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女孩。她差不多有十六岁，有着野玫瑰般的肤色，碧蓝碧蓝的眼睛，和特别可爱的头发，谦逊而又敏捷得如同野羚羊。我们每看她一眼，她就后退一步。她站在那儿，来自萨斯克彻温的风，一阵阵地吹起她的秀发，像面纱一样蒙住了她的头，她显出窘态，而脸越来越红了。

我们跟那位农夫结了账，最后看了一眼那位草原上的天使，就继续上路了，这回车开得很慢，直到天快黑了，迪安说埃德·华尔的农场就在眼前。“哦，一个那样的女孩让我害怕，”我说。“我会放弃一切，甚至我自己去换取她的怜悯，如果她不想要我，我只会离开，跑到天涯海角去。”耶稣会的男孩们咯咯地笑了起来。他们满嘴陈词滥调和东部学生腔，鸟豆儿那么大的脑袋里啥也没有，除了一些对阿奎纳神学的病态理解，为了给他们自己撒一些胡椒粉。迪安和我压根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当我们穿过泥泞的大平原的时候，他聊起了自己昔日做牛仔的日子，他指了指一条直路，当年他整个早上都在那里骑马。我们一旦开入华尔家牧场广阔的地界，他又开始告诉我们他曾经在哪里修补围栏，老华尔，埃德的父亲，又是在

哪里追赶小牛犊，伴随着他自己哒哒的马蹄声，大喊：“拦住它，拦住它，该死的！”“他每隔六个月就得换一辆新车，”迪安说，“他压根儿顾不上。每次有一头牛跑丢了，他就会开上车子去追，追到最近的水坑，然后下车，光着脚去追。他计算自己挣的每一分钱，并把它放到罐子里。一个疯狂的老农场主。我回头会指给你看工棚附近的破旧屋子。那是我最后一次从监狱出来，受雇的地方。那些你看到的，写给里查·金的信，就是住在这里时写的。”我们离开了大道，想抄小道穿过冬季牧场。一群哞哞叫的白脸牛突然从我们的车灯里出现，穿行。“它们在那儿！华尔的牛群！我们没法从它们当中穿过，我们只能下车，把它们赶走！嘿—嘿—嘿！”但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只需要一点点挪着过去，有时候，它们碰到车的外壳，哞哞地叫着，好似车门周围的一片海洋。而后我们看到了埃德·华尔牧场的灯光。围绕着这盏孤独的灯光的是周围蔓延数百英里的平原。

那种彻底地降临到草原上的黑暗，对于一个东部来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天地之间，没有星星，没有月亮，除了华尔夫人的厨房发散出来的光线之外，没有一丁点儿光亮。在那个庭院的阴影之外，是一望无际的世界，天亮之前你无法看清。我们敲门，在门外黑漆漆的地方喊着埃德·华尔。他正在谷仓挤牛奶，我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走了一小段路，最多二十英尺。我想我听到了丛林狼的嚎叫。华尔说那也许是他爸爸走丢的一批野马在远处嘶叫。埃德·华尔跟我们年龄相仿，高个子，瘦瘦的，牙齿尖尖的，没什么废话。他和迪安过去曾经站在柯蒂斯大道的街角，冲女孩们吹口哨。而如今他彬彬有礼地把我们请

到他灰蒙蒙的、棕色调的、不怎么用的客厅里，他找来了暗淡的油灯点亮，跟迪安说：“你的大拇指他妈的到底怎么了？”

“我揍了玛丽露受的伤，它感染得很严重，不得不把末梢切了。”

“你他妈的那么做到底图什么？”我看得出他过去总是充当迪安的大哥。他摇摇头，牛奶桶还放在他脚边。“你总是个傻头傻脑的狗娘养的。”

与此同时，他年轻的妻子在农场巨大的厨房里给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她为桃子冰淇淋道了歉：“它啥也不是，只是把冰淇淋和桃子冻在一起。”当然了，那是我一生中唯一吃过的真正的冰淇淋。她的晚餐开头十分简约，后来却相当丰盛；我们一边吃，桌上一边出现了一些新东西。她是个身材很好的金发女郎，但是跟很多生活在旷阔西部的妇女一样，她会有点抱怨生活的烦闷无聊。她历数她最近夜里经常听的电台节目。埃德·华尔站着，盯着自己的一双手。迪安狼吞虎咽。他让我陪他撒谎说我是那辆凯迪拉克的主人，说我是个很有钱的男人，他是我的朋友和司机。埃德·华尔压根不买账。每一次，谷仓里有点什么动静，他总是侧耳倾听。

“好吧，我希望你们哥俩顺利到达纽约。”他压根也不相信是我拥有那辆凯迪拉克，他还认为那是迪安偷来的。我们在农场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埃德·华尔像山姆·布雷迪一样丧失了对迪安的信任——每次他看迪安时，总是充满了警惕。过

去他们跌跌撞撞地在怀俄明拉勒米大街上手拉手地走路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已经翻篇了。

迪安再也待不住了。“好吧是的，好吧是的，现在我想我们最好上路了，因为我们明天晚上之前得到达芝加哥，我们已经浪费了好几个小时了。”那两位大学生很有礼貌地向华尔道谢，我们再度出发。我回过头去看看厨房的灯光渐渐隐没在一片夜的海洋之中，然后向前倾身。

9

很快我们就回到了主高速上，那天晚上，我看到整个内布拉斯加州就在我眼前。我们以一百一十迈的速度直穿而过，一条窄路，沉睡中的镇子，没有车来车往，月光之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流线型的火车，被我们落在身后。那天晚上我一点儿都没感到害怕，在那里，时速一百一十公里是合法的，我们边开边聊，所有内布拉斯加州的镇子——奥加拉拉，哥特堡，卡尼，大岛，哥伦比亚——当我们一边闲聊一边飞速前进时，它们也加速度迎面而来。那是一辆特别棒的车，它在路上行驶，如船行于水上。柔和的弧度让它行动自如。“哈，天，真是一艘梦幻之舟。”迪安感慨。“想想如果你和我有这么一辆车，我们会干吗。你知不知道有一条路经过墨西哥，直通巴拿马？——也许它会到达南美洲的最南边，在那儿，印第安人有七英尺高，在山坡上吃可卡因？是的！你和我，萨尔，你和我将会用这么一辆车探索全世界，哥们，这条道路将最终通向

整个世界。它去不了别的地方了——对吧？哦，我们还可以开着它在整个老芝加哥逛一逛！想想，萨尔，我这辈子还没去过芝加哥呢，没逗留过！”

“我们开着凯迪拉克去那儿，看起来就像黑社会！”

“是的！那些女孩们！我们可以带上女孩们，事实上，萨尔，我已经决定全速前进，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晚上开着它到处逛逛。现在你放松就行了，我要使劲赶路了。”

“好吧，你现在开到多快了？”

“稳定地保持在一百一——你没有察觉到。这个白天，我们跑完了艾奥瓦州，然后我得义无反顾地冲过伊利诺伊州。”两个男孩已经睡着啦，我们一个晚上聊了又聊。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迪安时而疯疯癫癫，时而又游魂归位——我觉得那总是跟一辆在高速路上飞驰的车子，一处即将抵达的海岸，路尽头的一个女人联系在一起——他可以因此变得平静而头脑清醒，即便什么也没发生。“现在我每次来丹佛都会变成这样——我不能再忍受这个城市了，乱七八糟的，迪安也邋里邋遢，走！”我告诉他，在1947年，我曾经跑过内布拉斯加这条路。他也是。“萨尔，那时候我给洛杉矶的新纪元洗衣店工作，1944年，谎报了我的年龄，跑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一趟。日夜兼程就想去看看阵亡将士纪念日赛车的热闹，白天搭车，夜里偷车，好赶路。早先，我在洛杉矶有一辆二十美元买的别克车，我的第一辆车，但它验车时通不过刹车片和车

灯的检测，所以我希望弄到一份跨州的驾驶执照，为了开那辆车的时候不被抓，所以我跑来这里弄个执照。当我在这其中某个镇子搭车的时候，弄到几个车牌藏在大衣下面，一个事儿逼治安官觉得我太年轻了，不像那种会去搭车的人，就在主路边上把我拦截下来了，他发现了车牌，就把我扔进有两个牢房的监狱，同监狱的关着的另外一个人本应该在家待着，但他不能自己吃饭（治安官的老婆喂他），成天坐在那里傻痴痴地流口水。经过审讯，包括像父亲一样慈爱的询问，突如其来的恐吓威胁，比对我的笔迹等等，我发表了平生最精彩的一次演讲，对于我过去在偷车问题上撒谎做了坦白，并说是为了寻找在这附近农场做帮手的老爸才这么干的，他放我走了。当然了，我错过了赛车季。接下来那个秋天，我又这么干了一次，为了去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看圣母玛利亚——加州棒球赛——这回我得逞了，萨尔，我的钱只够买张门票，多一分钱也没有，来回路上啥也没吃，只好向路上所有我遇到的疯狂的家伙要点儿吃的，还跟女孩们蹭吃蹭喝。全美国再也没有一个家伙比我看一场球赛费更大的劲儿了。”

我问他1944年在洛杉矶，是何种情形。“我在亚利桑那被抓了，那个牢房绝对是我待过的最糟糕的牢房。我不得不越狱，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越狱了，说到越狱，你看，通常，在灌木丛里，你知道的，爬行于沼泽之中——上到那些山间的村子里。为了避开再度被抓后的严刑拷打和苦力活儿，还有所谓的意外死亡面对着我，我不得不走山脊上的林子里头的路，避开小路，中路和大路。不得不脱去我的囚服，在旗崖外的一个加油站，偷到了干干净净的T恤和裤子，两天之后，我到了洛

杉矶，装成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大摇大摆地走进我遇到的第一家加油站，被雇用了，给自己弄了个房间，改了名字（李·布里埃）在洛杉矶度过了令人兴奋的一年，结交了一帮新朋友，和一些绝对棒的女孩们，那个季节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好莱坞大道上开车，我让我哥们帮我把持一下方向盘，当我亲我的姑娘的时候——我当时开着车，知道吧——但他没听到我说什么，然后我们直接撞到邮筒上，但速度只有二十迈，但我撞断了我的鼻子。你在那之前见过我的鼻子——本来这里是希腊式的线条。那之后，我去了丹佛，那年春天在一家饮品店遇到了玛丽露。哦，天，她才十五岁，穿着牛仔裤，就在那儿等着别人搭上她。我们在王牌饭店聊了三天三夜，三层，东南角的房间，多么值得纪念的房间，难以忘怀的我的光辉岁月——她那时候多么甜美，多么年轻，嗯，哈！但是嗨，看那儿，大晚上的，一大票老流浪汉在铁路边围着篝火，他妈的。”他几乎要慢下车速。“你看，我永远不知道我爸在不在里头。”铁道边有几个人，正在篝火跟前跌跌撞撞地走动。“我永远不知道要不要去问问。他可能在任何地方。”我们继续开车，在我们身后某处，或者我们跟前某处，在茫茫夜色之中，他的爸爸有可能喝多了倒在灌木丛里，毫无疑问差不多是那样——下巴上有痰迹，裤裆里有尿液，也许头发上还有血迹，月光朗照在他身上。

我抓住迪安的胳膊。“哈，哥们，我们现在肯定在回家路上了。”纽约将第一次成为他临时的家，他忍不住咯咯地笑，他等不及了。

“还有，想想，萨尔，当我们抵达宾州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听到那些美妙的东部波普音乐了，从那些电台节目里，翻滚哟，旧船，翻滚哟！”那辆超棒的车让风声呜咽，它使得大平原缓缓展开，宛如一幅画卷。它将滚烫的柏油从自己身上有尊严地甩开——一艘高贵的邮轮。我朝着缓缓降临的黎明睁开眼睛，我们向它飞奔而去。迪安瘦削的脸庞映照在仪表盘的灯光当中，有着自己坚持的神色。

“你在想什么？流行乐？”

“啊—哈，啊—哈，老掉牙的东西，你知道的——妞们妞们妞们。”

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进入了干燥炎热的七月的星期天上午，在艾奥瓦州，迪安依旧在马不停蹄地开车，丝毫也没有放缓下来，他在艾奥瓦曲曲绕绕的玉米地里最少还能开到八十迈的时速，在直路上依旧保持了一百一十迈的速度，只有当遇上双向的大堵车时，他才不得不在车流当中，可怜巴巴地开到了六十迈的时速。一旦他有机会冲到前面，他就能跟一支离弦之箭一样冲出来，转瞬之间，超出半打车，将它们留在身后的一团尘埃般的云团之中。一个开着全新别克车的狂妄的家伙在路上看到这番景象，打算跟我们飙飙车。当迪安即将超过一串车的时候，那家伙突然毫无预警地超过了我们，然后大喊大叫，鸣响喇叭，闪烁着尾灯挑衅示威。我们像一只大鸟一样很快超过了他。“现在，等着，”迪安笑道，“我在接下来二十英里左右，要好好调戏一下这个狗娘养的。”他让别克车先在前面开着，然后突然加速，用一种特别不礼貌的方式赶超了

它。疯狂的别克真是疯到家了，他提速到一百迈。我们有了个看清他长什么样儿的机会。他看起来像是芝加哥那种好赶时髦的人物，带着一个几乎跟他妈一样年龄的女人一起旅行——也许真就是——上帝知道她是不是在抱怨，但他还在赶路。他的头发是深色的，狂乱的，一个来自老芝加哥的意大利人，穿着一件运动衫。也许在他脑海中，我们是来自洛杉矶的一伙新黑帮，要入侵芝加哥，也许是米奇·科恩的手下，因为这辆豪华车看起来风光体面，而我们的车牌是加州的。也许仅仅是为了在路上找点刺激。他冒了极大的风险保持在我们前面，他为了超车选了很刁钻的曲线，当大卡车迎面开来时，几乎来不及并回原先的车道。我们在艾奥瓦州境内你追我赶了差不多八十英里，这场追逐如此有趣，我几乎没功夫害怕。最后那个疯子服软了，进了一家加油站，也许来自那位老女人的训斥，我们呼啸而过时，他无比欢乐地冲我们扬手。我们照旧赶路，迪安光着膀子，我把两只脚驾在仪表盘上，大学生们在后排睡觉。我们停下车到一家小餐馆儿吃早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经营着它，她给了我们超分量的土豆，与此同时，附近镇子教堂的钟声响起。我们继续前行。

“迪安，白天别开得那么快。”

“别担心，哥们，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开始战战兢兢起来。迪安挤进车流当中，好似一位恐怖天使。他为了加塞儿，几乎要把其他车挤出队列之外。他戏弄着其他车子的保险杠，他向前推进着车子，一边伸出脖子看弯道的情况，于是这辆大车在他的操控下超车了，差不多是一根头发丝的毫厘之

差，当对过的车子塞满了队列时，我们这辆车又回到了原先的车道，我对此胆战心惊。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在艾奥瓦，仅仅在有限的机会内，你可以发现一段像内布拉斯加境内那样的大直路，我们一旦逮着机会碰上一段，迪安立马恢复到他惯常的一百一十迈的时速，我看到窗外闪过的几个场景，回想起了1947年的一些往事——一段伸展出去的路台，我和埃德曾经在那里站了足足两个小时。所有过去的路途在眼前展现，好像生命之杯被打翻，一切归于疯狂。我的眼睛在梦魇般的白天感到疼痛。

“哈，天，迪安，我要去后座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没眼看。”

“嘿—嘿—嘿！”迪安咯吱乱笑，在一座窄桥上超过了一辆车子，在扬尘中拐弯，继续加速。我跳到后座上，蜷成一团睡大觉。其中一个男孩换到前排找乐子。总觉得这个早上会车毁人亡的恐惧感抓住了我，我躺到地板上，闭上眼睛，试着入睡。做海员的时候，我总是想着船底舱壳子下面，滚滚而过的波浪，还有没有尽头的深海——现在我能感受到二十英寸之下的道路，在那位疯狂的亚哈^{注2}操纵的方向盘之下，那条道路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滚过呻吟中的大陆。当我闭上眼睛，满脑子里都是向我扑来的公路。当我睁开眼睛，我看到了闪动的树影在汽车底板上震颤。无处可逃。我只能听天由命。迪安还是在开车，在我们抵达芝加哥之前，他丝毫也不想睡觉。那天下午，我们再度穿过老得梅因，在这里我们当然因为交通不畅而速度变缓，我会到前面坐着。这时有个奇怪而可悲的事故发

了，在我们前面是一个胖胖的黑人带着全家，开着一辆厢式小车，在后保险杠上挂着他们卖给沙漠里的游客的帆布水袋。他猛地刹车，迪安正跟后座上的男孩说话，没留意到，我们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撞上了水袋，水袋像煮沸的水一样炸开，水在空中泼洒开来。除了一只保险杠撞弯了之外，倒也没别的问题。迪安和我下车去跟他理论。无非就是交换一下彼此的地址，聊聊了聊，而且迪安一刻也没把自己的眼睛从那个男人的老婆胸前挪开，她长着一双漂亮的麦色乳房，那件松松垮垮的棉衬衫几乎无法掩饰。“是的，是的。”我们给了他我们芝加哥车主的地址，继续上车了。

到了得梅因城的另外一侧，一辆巡逻车拉响了警笛追上我们，让我们停车。“怎么了？”

那警察下车了。“你们刚才是不是出了事故了？”

“事故？我们在个路口撞破了一个人的水袋。”

“他说他被一伙偷车贼撞了车了。”这是我和迪安很少遇到的一个黑人老蠢货假模假式地怀疑的状况。这让我们深感讶异，以至于大笑起来。我们不得不跟着他去了警局，在草地上等了一个小时，等他们给芝加哥那位凯迪拉克的车主打电话，确认了我们是受雇开车的司机们。那位金主说，据警察转述，“是的，那确实是我的车子，但我不能为那几个男孩或许干过的事情负全责。”

“他们在得梅因出了点小事故。”

“是的，你已经告诉我这点了——我的意思是，我无法为他们过去或许做过的事情负责。”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我们继续上路。艾奥瓦州的纽顿，1947年的一个拂晓，我在那里散过步，那天下午，我们又经过了昏沉沉的老达文波特，以及低低地陷于木屑河床的密西西比河。然后是岩石岛，塞了几分钟的车，夕阳渐渐泛红，然后突然看到缓缓流淌的小河，温柔地穿行过奇妙的林木，那是美国中部伊利诺伊州的青翠景色。一切看起来又像是柔和甜美的东部。那干燥宏大的西部已成过眼云烟。当迪安以持续稳定的速度通行时，伊利诺伊州在我眼前以空无之境展现了好几个小时。在他疲惫的时候，他变本加厉。在通过一座架设在一条可爱迷人的小河上的窄桥时，他猛地进入了一种几乎没有可能的境地当中。两辆开得慢腾腾的车子在桥上相撞，就在我们跟前。另外一个方向上开来了一辆巨型的铰接式大卡车，他错误地预估了慢腾腾的车子过桥的时间，他以为当他开到桥上时，它们已经开过了。在桥上绝对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一辆大卡车，和迎面而来的任何其他车辆。在卡车后面的那些车蠢蠢欲动，想要找机会超过它。在那两辆慢腾腾的车子跟前，其他慢腾腾的车子你拥我挤。整条路满满当当，所有人都想通过。迪安竟以一百一十迈的时速抵达此地，毫不犹豫。他超过那些慢腾腾的车子，突然一拐，差点儿撞上桥左边的栏杆，他直接插入丝毫没有减速的大卡车的阴影下面，来了一个很猛的右拐，正好错过卡车的左前轮，差点撞到第一辆慢腾腾的车子，他退后打算超车，而后不得不回到主车道上，因为卡车后面的车子有人探出头来查看情况，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两秒之内，一切一

闪而过，除了一阵烟尘，什么也没留下，而一次持续了两秒钟的、来自五个方向的糟糕的汽车相撞事故，居然避免了。那辆大卡车仅仅撞到了后屁股，在伊利诺伊州午后致命的夕阳红，以及它那梦幻般的田野当中。我无法将这场景从脑海中抹去，当然了，最近一位著名的波普爵士演奏家在伊利诺州死于一场车祸，也许也在类似于这样的一天。我重新回到后座上。

那两个男孩现在也坐在后座上，迪安一门心思要赶在天黑之前到达芝加哥。在公路和铁路交界口，我们让两个老流浪汉搭车，他们两人筹了半块油钱。就在刚才，这两人还坐在几堆枕木上面，喝尽他们的最后一点儿酒，现在他们却坐在一辆即便裹满污泥依然气派非凡的凯迪拉克豪华车里头，风驰电掣地赶往芝加哥。事实上，坐在迪安身边那个老家伙，一刻不停地盯着前方的路，用他老流浪汉的方式祷告着。我就这么讲吧。“好吧，”他们说，“我们从不知道能这么快就去芝加哥。”当我们途经暮色中的伊利诺伊州城镇，这里的人们见到我们这样开着豪华车的芝加哥黑帮早就习以为常，我们看起来怪模怪样的：我们都没刮胡子，司机光着膀子，两个流浪汉，我坐在后排，抓住皮抓手，我的脑袋向后靠在垫子上，骄傲地看着外面的田野——正如加利福尼亚新成立的一个黑帮，跑到芝加哥来争夺地盘，一伙在月黑风高之夜逃出犹他州的越狱犯。当我们在一个小镇的加油站停下来喝可乐和加油时，人们跑出来盯着我们看，但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他们在暗自记住我们的容貌特征和身高，以备不时之需。跟经营加油站的女孩交谈时，迪安只是把他的T恤像围巾那样挂在脖子上，卷成一条，一句废话也没有，回到车上，我们又扬长而去。不多时，

天空的红色转为紫色，最后我们闪过一条风光旖旎的小河，而后看到前方芝加哥的烟雾。我们从丹佛，途经埃德·华尔顿农场，抵达芝加哥，统共一千一百八十英里，刚刚好十七个小时，没算上在沟里的两个小时，在农场的三个小时，在艾奥瓦州诺顿警察局的两个小时，差不多每个小时七十迈的时速，横穿整个大陆，只有一个司机。这是一个疯狂的记录。

[注2](#) 亚哈是梅尔维尔长篇小说《白鲸》当中疯狂的捕鲸船船长，他近乎偏执地执着于去抓捕一只大白鲸莫比·狄克，这只白鲸曾经咬断了船长的一条腿。

10

伟大的芝加哥在我们眼前闪着红光。我们突然在麦迪逊大街上跟一大批流浪汉待在一起，他们当中有些人仅仅是把脚丫子搁在马路牙子上，松松垮垮地待着，其他几百个在酒馆和巷道跟前彷徨失措。“呜！呜！睁开眼睛找找老迪安·莫里亚蒂，他说不定今年正好在芝加哥。”我们让那两个流浪汉在这条街上下车，赶赴芝加哥市中心。轰隆隆的电车，报童，路过的姑娘们，空气中油炸食品和啤酒的气味，闪耀的霓虹——“我们在一个大城市里，萨尔！呜嗷！”第一件事就是把凯迪拉克停在暗处，去洗漱一新准备过夜生活。我们在基督教青年会对过的街上找到了一个红砖楼之间的小巷子，我们在那里停好了凯迪拉克，把车头朝外，时刻准备出发，然后跟着那两个男孩进入了基督教青年会，他们在那里弄了个房间，允许我们用他们的盥洗室一个小时。迪安和我刮胡子，洗澡，我把自己的钱包丢在屋子里了，迪安发现了它，差点把它藏在他的

衬衫里头，而后他发现这是我们自己的，感到很是失望。然后我们向那两个男孩告别，他们很高兴自己毫发无伤地完成了这次旅程，我们赶紧跑去咖啡馆吃东西。古老，棕色的芝加哥带着自己半是东方半是西方的风格，就要开始运转了。迪安站在自助餐厅前，摩挲着自己的肚皮，将一切尽收眼底。他想跟一个进入自助餐厅的中年黑人妇女说话，那个女的很古怪，说是她没钱，但是带来了小圆面包，问餐厅人员能不能给她一点儿黄油。她是扭着胯进来的，被人拒绝后，又撅着腩出去了。“喔！”迪安说。“我们跟着她，把她带到小巷子里的凯迪拉克那儿，耍一耍。”但我们很快忘掉了这盘算，径直前往北克拉克街，在内环高架附近晃了晃，看了色情舞蹈演出，听了波普爵士乐。多么美妙的一晚。“哦，哥们，”我们站在一间酒吧门前时，迪安说，“看看这充满生机的街道，那些走来走去的中国，多么古怪的城市——哇唔，那扇窗里头的女人，看看她那双大奶子耷拉在睡衣外头了，又大又空旷的眼睛。喔，萨尔，我们得去，不停地去，直到我们到了那儿。”

“我们去哪儿，哥们？”

“我不知道，但我们就是去，去。”这时，哪儿来了一票年轻的波普爵士乐手，从车上把乐器搬了下来。他们一窝蜂地进了一家酒馆，我们也跟着进去了。他们坐好就开始演奏。看看！乐手的头子是个瘦削、颓废、卷发、嘟嘟嘴的萨克斯手，肩膀薄薄的，一件运动衫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在温暖的夜晚显得很凉快，眼神里写着骄傲自满。他拿起萨克斯，冲着它皱起了眉毛，吹出冷静而又丰富的曲调，一边随着他的想法优雅

地踏着节拍，弯下腰，躲避呼呼而来的其他想法——说：“演奏。”当其他男孩独奏时，他则安安静静。然后是普鲁斯，一位嗓子沙哑，英俊的金发美男子，像一位长着雀斑的拳击手，裹在一件长长的鲨鱼皮呢外套之下，领子向后竖起，领带解开，装成又锐利又松弛的样子，拿腔拿调地举起萨克斯，吹奏起来，腔调恰如莱斯特·扬本人一样：“你看，哥们，普鲁斯是个挣钱的乐手，他对技术吹毛求疵，他是唯一一个穿得人模狗样的人，当他吹错一个音时，会忍不住焦虑起来，但那个头头，那只冷面猫，告诉他别担心，只管演奏，演奏——他只在乎音乐的音响与活力，他是个艺术家。他在教那个年轻的拳击手普鲁斯。现在看看别人！”那第三个乐手是个中音萨克斯手，十八岁，酷酷的，查理·帕克型的淡定乐手，还是个中学生，长着一张大嘴，比其他人都高，相当肃穆。他举起他的萨克斯，安静而又饱含深思地吹奏起来，发出了鸟鸣般的乐句，有着建筑结构感的迈尔斯·戴维斯逻辑，他们是了不得的波普爵士新一代的创新者。

曾几何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新奥尔良的泥沼地里吹起他美妙的高音；在他之前，一位疯狂的乐手在官方节日的游行队伍中，打破了苏萨风的行军节奏，变成了散拍的拉格泰姆，然后是摇摆风的爵士小号手罗伊·艾尔德里奇，生机勃勃而又强壮有力，在小号中寻获了一切，将它带入了力量、逻辑和精妙的浪潮——他演奏时，两眼闪闪发光，带着亲切的微笑，将震动整个爵士世界的乐音奏响。然后是查德·帕克，曾在堪萨斯城他妈妈的柴草间里，演奏用胶布缠着的中音萨克斯，在雨天也去看热气腾腾的老牌摇摆乐巴塞和班尼·莫腾的

演出，然后他离开故乡去往纽约的哈莱姆区，遇到了疯疯癫癫的塞隆尼斯·蒙克和更加癫狂的吉莱斯皮。查德·帕克早年演奏的时候，特别喜欢转着圈儿吹奏。他比也来自堪萨斯城的莱斯特·扬要年轻一些，那个忧愁的、圣徒般的蠢货浓缩了爵士乐的历史；当他高高地举起他的小号，用嘴水平吹奏的时候，吹出了他的最高境界；当他的头发长长后，他变得更加懒散，他的小号就拿在一半的高度；直到最后落到了嘴底端，他感受不到人生的路途，他的小号松松垮垮地抵在他胸前，他没精打采地吹了几下。这就是今晚美国波普爵士乐的孩子门。

还有更古怪的家伙——当那个黑人中音萨克斯手目空一切地望过众人头顶时，一个来自丹佛柯蒂斯街年轻高瘦的金发小伙子，穿着牛仔，饰着铆钉的皮带，撮起他的腮帮子，正等着其他人结束；当他们结束时，他方才开始，你不得不环顾四周，找独奏声音的来源，它来自一张天使般微笑着的嘴，那是个轻柔、甜美、神话般的中音萨克斯独奏。像美国一般孤独的、穿透了夜晚的声音。

其他那些人，和各种音响的造就者又如何呢？那位贝斯手，有着狂热的眼神，卷毛红发，每一次随着节奏，臀部都要向小提琴撅一下，弹奏到兴起时，他的嘴巴像隧道一样悬挂在那里。“天哪，那家伙真能玩弄他手里的家伙！”那位忧伤的鼓手，如同我们在旧金山福尔瑟街上遇到的白人乐迷一般，近乎痴狂，盯着虚无缥缈的空中，嚼着口香糖，瞪大眼睛，随着德国钢琴手摇头晃脑，意醉神迷。钢琴手——一位意大利卡车司机，大高个儿，长着一双肉手，带着若有所失的欢愉神色。

没人听他们的。老北克拉克街上来的流浪汉歪在吧台上，妓女们愤怒地嚷嚷着。行踪可疑的中国人来回走动。喧闹的色情舞蹈乐声穿插进来。他们正好路过。在外边人行道上来了个家伙——一位十六岁，留着山羊胡子的乐手，带着长号盒子。瘦得跟得了伤寒一般，疯狂的面部表情，他想参与这伙人，跟他们一起演奏。他们认识他，不想让他掺和。他偷偷走进了酒吧，一声不吭地打开长号盒子，把长号举到嘴边。没有开场白，没人搭理他。他们演出完毕了，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前往另外一个酒吧。那个瘦巴巴的芝加哥男孩也想跟着走。他带上他的黑框眼镜，独自在酒吧举起长号，只吹了“啵”就跑出去追上他们。他们不愿意他跟着他们一起演出，就像老球员不乐意带菜鸟。“所有这些家伙还都跟自己的祖母住在一起，正如汤姆·斯纳克和我们中的音萨克斯手卡罗·马克斯。”迪安说。我们匆匆忙忙跟着整个乐队。他们进入了安妮塔·奥黛夜总会，在那儿拿出设备，演奏到了次日早上九点。迪安和我在一边喝着啤酒。

当中一段时间，我们坐上凯迪拉克，满芝加哥想方设法带上女孩们。她们被我们庞大、伤痕累累、先知般的车子吓坏了。在疯狂的情绪之下，迪安在倒车时撞上了消防栓，他还咯咯傻笑。九点钟的时候，整辆车已经乱七八糟的了，刹车再也不能用了；保险杠凹了进去；手柄吱吱嘎嘎。迪安在遇到红灯的时候，也无法把它停下，它在路上总是轰隆隆地响。它折腾这一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更像一双沾满泥泞的靴子，而不再是闪亮的豪华轿车。“喔！”男孩们还在尼特斯夜总会演出。

突然，迪安看向乐池的一角说：“萨尔，上帝降临了。”

我也看了过去，乔治·谢林。他用苍白的手，扶着看不见东西的脑袋，仿佛大象一样支棱着耳朵，全神贯注听着美洲大陆的声音，将其纳入他的英格兰夏夜之中，而后他们怂恿他站起来上台演奏。他同意了。他演奏了无数个主题，随着越来越高亢的和声，汗滴溅满了整台钢琴，所有人带着敬畏和恐惧听着。他们一个小时候后才让他下台。他回到自己黑暗的角落里，老上帝消失了。男孩们说，“在他之后，没什么可听的了。”

但那位瘦高的小头目皱起眉头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得演出。”

一些东西还是出现了。总是有些什么出现，一点点地出现——它从未结束。他们在谢林的探险之后，试图找到新的乐句；他们非常努力地尝试，他们扭动，扭动，演奏。三不两时地一个清晰和谐的叫喊给了音调一个新的建议，有朝一日将变成这世上唯一的音调，将让人们的灵魂进入愉悦的状态。他们发现了，他们失去了，他们死死地抓住，他们再度发现，他们欢笑，他们呻吟——迪安满头大汗地坐在桌子边上，为他们加油，加油，加油。到了早上九点，所有人——乐手，穿着宽松长裤的女孩们，酒吧的侍者和那个瘦巴巴、郁郁寡欢的长号手——跌跌撞撞地步出夜总会，进入喧闹的芝加哥的白天，回家睡觉，直到另外一个狂野的波普爵士之夜再次降临。

迪安和我面对如此的喧闹嘈杂，忍不住哆嗦起来。是时候把凯迪拉克还给它的主人了，他住在湖边豪宅公寓当中，地下

有个巨大的车库，由满身油污的黑人打理。我们把车开到那里，把那脏兮兮、一身烂泥的东西停在那儿。工人们没认出这就是那辆凯迪拉克。我们把文件递了过去，他看着这东西直挠头。我们不得不慌忙跑路。我们确实那么做了，而后坐上公交车回到芝加哥城区，一切也就这样了。从那以后，我们从未从那个阔佬那儿听到一个字儿关于他的新车状况的抱怨，即便他手里有我们的地址，完全可以找到我们。

我们又该继续前行了，坐上了去往底特律的公交车，钱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吃力地拖着行李穿过车站。现如今，迪安大拇指上的绷带已经差不多像煤炭一样黑，全部散开了。我们也像所有那些跟我们一样经历了这一切的人一样狼狈。精疲力竭，迪安一坐上轰隆隆开往密歇根州的公交车就睡着了。我跟一个漂亮的乡村姑娘攀谈了起来，她穿着一件低领衬衫，露出了美丽的被太阳晒过的乳房的上半部。她谈起了在村子里，每天晚上在自家门廊上做爆米花的事。这种话题本来可以让我满心欢喜，但由于她聊到这件事情时并不觉得开心，只是她觉得应该做的，我也就索然无味了。“那你还干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呢？”我想挑动她聊聊男朋友们和性。她褐色的大眼睛空洞洞地看着我，里面是从她的血液里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苦恼，是没能去做她内心渴望的事情——不管是什么，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你想从生活里得到什么？”我想要抓住她，把

这些答案从她身体里挤出来。她对于她要什么一丝一毫也不知道。她嘟囔着工作，电影，夏天去她祖母家，希望她自己有朝一日能去纽约的罗克西影院看看，那天到来的时候她会如何打扮——正如去年复活节她穿戴的模样，白色的帽子，玫瑰饰带，玫瑰的浅口鞋，薰衣草色的华达呢外套。“你在星期天下午干些什么？”我问。她坐在她的门廊上。男孩们骑着自行车经过，停下来聊聊天。她读搞笑报纸，躺在吊床上。“你在热乎乎的夏天夜里干些什么？”她坐在门廊上，她看着路上的猫。她和她妈妈做着爆米花。“你爸爸在热乎乎的夏天夜里干些什么？”他上班去了，他在锅炉厂通宵上班，他花费了一辈子养活了一个女人和一群儿女，毫无荣耀可以显摆。“你哥哥在夏天的夜里干些什么？”他骑着自行车四处闲逛，他在冷饮店门前厮混。“他想干吗呢？我们都想干吗呢？我们想要什么呢？”她不知道，她打着呵欠，睡意蒙眬。这对她来说太过了。没人能说清楚。没人曾经说清楚过。事情都结束了。她仅仅十八岁，十分可爱，十分迷茫。

迪安和我，脏兮兮地在底特律下了公交车。我们打算待在贫民窟的电影院里过夜。去公园太冷了。哈塞尔曾经在底特律的贫民窟待过，他用那双黑溜溜的眼睛不止一次探寻过每个射击场，每个通宵影院，每个喧嚣的酒吧。他的幽灵总是缠绕着我们。我们再也没能在时代广场找到他。我们想着说不定老迪安·莫里亚蒂也在这里——但他没在。我们每个人花了三十五美分进了一家破破烂烂的电影院，坐在包厢内，直到次日早晨被人赶了出来。那些待在通宵影院的人们都是一些闲极无聊的人。穷困潦倒的从阿拉巴马州来底特律工厂打工的黑人工人；

老白人流浪汉；穷途末路的、留着长发的时髦青年，喝着酒；妓女，普通夫妻，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没别的地方可去，没人可以信任。如果你把整个底特律的人放到一个网筛内过一下，把那些粗里扒拉的东西筛出来，都比这帮人强。电影说的是牛仔歌手艾迪·迪安和他勇敢的白马普鲁普，那是第一部；第二部同场放映的电影是乔治·拉夫特，希尼·格林斯特雷和彼得·洛雷，一个关于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我们当晚把这两部电影都整整看了六遍，我们看着他们醒着，我们听着他们睡着，我们感受到他们在做梦，我们深入理解了西部古怪灰色的传奇和东部黑暗离奇的神话，当次日早晨来临时，这次恐怖的洗脑经历之后，我的各种行为被下意识地自动控制了。我听到格林斯特雷几百次的讽刺；我听到彼得·洛雷发出了他邪恶的邀请；我和乔治·拉夫特一起沉浸在他偏执狂式的恐惧之中；我和艾迪·迪安一起骑马歌唱，跟盗马贼进行了无数次枪战。人们啜几口小酒，东张西望，在黑漆漆的影院里寻摸着有什么可做的事，有什么可聊的人。在脑海中，每个人都空空如也，没人说话。暗淡无光的黎明像幽灵一样缠绕在电影院的玻璃窗上，挂在它的檐下，我把脑袋搁在木头座椅扶手上睡大觉，六个影院的工作人员正在打扫昨晚所有这些人整出来的垃圾，当我低着脑袋打鼾的时候，他们堆成的垃圾小山快要碰到我的鼻尖了。直到他们差点把我也扫地出门，这是迪安跟我说的，他坐在我后边十排远的地方。所有的烟屁股，酒瓶子，纸板火柴，来来往往的杂物堆成了垃圾。如果他们把我也混入其间，迪安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将不得不在全美国嘶吼，从这条海岸到那条海岸寻遍每个垃圾堆，发现我像个胚胎一样蜷缩在我的生活，他的生活，所有相干和不相干的人的生活里。我

从我垃圾的子宫里要跟他说些什么呢？“别烦我，哥们，我在这儿待得高兴着呢。你在1949年8月的底特律把我弄丢了。你还有什么权利跑到这里来，扰乱我在这个垃圾桶里的清梦？”在1942年，我是那个时代最烂的一个戏剧的男主角。我是个水手，去波士顿斯科拉里广场的帝国咖啡馆喝酒；我喝了六十杯啤酒，跑去厕所，我躺在马桶边上，睡着了。在那天晚上，至少有一百个水手和形形色色的人进来，在我身上撒尿，直到我满身满脸都是尿。但是那又怎么着？——与其到天堂去光辉闪耀，不如寂寂无闻地待在人世间做个普通人，什么是天堂？什么又是人间？不过在一念之间。

天亮时分，迪安和我踉跄着、满口胡言地离开了那个可怕的地方，跑去旅行社找个顺风车搭搭，在一个黑人酒吧厮混了一个上午之后，跟姑娘们调了情，在自动点唱厅听了爵士乐唱片，如此才踉踉跄跄地坐上了当地的公交车，带着我们所有的行李，去到那个管我们每个人要四美元的当地车主家，他将带我们去纽约。他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年金发男人，有个老婆有个孩子还有栋不错的房子。我们在院子里等着他收拾停当。他那可爱的妻子穿着棉质下厨服装，给了我们一杯咖啡，但我们忙着说话，没功夫喝。到了这时候，迪安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他有些神志不清了，看到什么都高兴。他到达了另外一层癫狂的状态，他不停地出汗，出汗。我们上了那辆崭新的克莱斯勒，出发去纽约，那个车主人发现搭车的是两个怪物，但他无计可施，事实上，当我们路过布里格斯体育馆，提到下一年的底特律拳击锦标赛时，他也就习惯了我们的风格了。

在雾气沉沉的夜晚，我们穿过托雷多，直奔老俄亥俄。我发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美国的城镇之间穿梭，犹如一个旅行推销员——一塌糊涂的旅程，糟糕的库存，老套的推销把戏，没人买账。接近宾夕法尼亚州时，那个男人累了，把方向盘交给迪安，他开完了去纽约余下的路途。而后我们开始听到电台里锡德交响乐团的最新波普爵士乐演出，我们进入了美国最伟大和最后的城市。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是大早上，时代广场开始了一些躁动，因为纽约从不止息，我们下意识地找起了哈塞尔。

一个小时之后，迪安和我在我姨妈长岛的新家门前下了车，她那会儿正招呼着帮忙粉刷墙壁的亲友们，跟他们讨价还价中，从旧金山回来的我们蹒跚地爬上了楼梯。“萨尔，”我姨妈说，“迪安可以在这里待几天，那之后他得走人，你懂我的意思吧？”旅行结束了。迪安和我当晚在长岛散了个漫长的步，在储油罐、铁路桥和雾灯之间，我记得他站在一盏街灯下的情形。

“刚才我们经过那一盏路灯时，我正要跟你说另一件事情，萨尔，但是我临时有了新的想法，等到我们到了下一盏路灯时，我再跟你说这件事，行吗？”我当然没问题了。我们如此习惯于在路上，非走遍整个长岛不可，但那里再也没有陆地了，只有大西洋，而我们只能走这么远了。我们握紧彼此的手，答应做彼此永远的朋友。

不到五个晚上之后，我们跑去了纽约的一个派对，我看到一个叫伊内兹的女孩，我告诉她我带来了一位朋友，她应该跟

他见个面。我喝多了，告诉她他是个牛仔。“哦，我总是想见到个牛仔。”

“迪安？”我在派对上大声喊叫——那里还有诗人安格尔·卢斯·加西亚，瓦尔特·埃文斯，委内瑞拉诗人维克多·比利亚努埃瓦；我过去的情人基尼·琼斯；卡洛·马克斯；基恩·德克斯特；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来吧，哥们。”迪安羞答答地走过来。过了一个小时，在醉醺醺晕乎乎的派对当中（“这当然是为了庆贺夏日的结束”），他跪在地上，把下巴颏放在她的肚皮上，告诉她，承诺她一切，汗如雨下。她是个大个头的黑发女郎——如同加西亚所说“德加笔下的人物”，完全就像是风情万种的巴黎女人。没过几天，他们就一起在电话上跟还在旧金山的卡蜜尔来回探讨，要她寄来必需的离婚文件，好让他们俩结婚。不只如此，没过几个月，卡蜜尔生下了迪安的第二个孩子，那是年初他们几个晚上短暂复合的产物。又过了几个月，伊内兹也生下了个娃。加上西部一个不知道什么犄角旮旯的地方的私生子，迪安现在拥有了四个小家伙，但却一文不名，有的只是烦恼，狂喜以及动如狡兔。如此一来我们就无法去意大利了。

PART 4

1950 年 · 春 *ON THE ROAD*

1

我卖书挣了一些钱。将年底之前的房租尽数交给了我姨妈。每年春天到来之际，我总是抵挡不住大陆的诱惑，伴随着新泽西吹来的河上的风，迫不及待地想要出行。于是我又出门了。破天荒地把迪安独自一人留在纽约。他在麦迪逊大街和第四十大道交界处的一家停车场工作。一如既往，他穿着他烂糟糟的鞋，T恤和挂在胯上的裤子，为了应对中午来来往往的车子焦头烂额。

通常在傍晚他不忙的时候，我会去看他。他站在窝棚内，数着票子，揉搓着自己的肚皮。收音机总是开着。“哥们，你有没有留意过那个疯子，马蒂·克里克曼解说的篮球赛——进入中场，虚晃过对方球员，投篮，两分。绝对是我听过的最棒的解说员。”时至今日，他对于乐子的要求仅止于此。他和伊内兹一起住在没有热水的公寓里，在东第八十大道。晚上下班之后，他便脱光全身上下的衣服，仅穿了一条到屁股那么长的

中国丝绸褂子，坐在他的安乐椅上放松，抽着茶叶做的水烟袋。这是他回家后的全部乐子，玩着一副色情的纸牌。“最近我一直在琢磨这张方块二，你能看出她的另外一只手在哪儿吗？我打赌你说不出来。看久一点儿，试试。”他想递给我那张方块二，那上面是个高大威猛、郁郁寡欢的家伙，和一个淫荡、悲伤的婊子，正在床上试某个姿势。“继续，哥们，我试过很多次了！”伊内兹从厨房探出头来，诡异地笑了笑。她反正就那样。“看出来没有？看出来没有？那是伊内兹，那是她做的一切，她探出脑袋来笑。哦，我已经跟她谈过了，我们要做许多美妙的事情。今年夏天，我们要住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漂亮的农场里头。开个房车偶尔会来纽约玩玩，漂亮的大房子，接下来几年生他几个孩子。阿哈！哈哈！阿嘎！”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换了一张威利·杰克逊的唱片《鳄鱼尾巴》，他站在唱机跟前，一手捏着手击打着另外一只手的掌心，那两个膝盖扭动出节奏。“喔！那个狗娘养的！我第一次听到他以为他第二天就死了，没想到他还活着。”

这跟他在大陆另外一头，和卡蜜尔在旧金山一起生活时的情况完全一样。同一只破旧的行李箱露出一角，放在床底下，随时打算远走高飞。伊内兹经常给卡蜜尔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聊得起劲；她们甚至谈到了他的私处，或者那是迪安要求的。她们就迪安的怪行径通信。当然了，他每个月都得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寄给卡蜜尔，否则他将会受到指控，到感化院去待六个月。为了找补贴，他想了不少花招，这方面他简直就是个艺术家。我见过他向一个阔佬祝福圣诞节快乐，因为聊得投机，那人本来要给他五块钱小费，后来换成了二十

块。我们出门，去博得兰酒吧把它花了。莱斯特·扬站在舞台上，带着他的黑眼圈。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第四十七大道和麦迪逊大街的角落里聊到深夜三点。“好吧，萨尔，他妈的，我希望你不要走，我真的希望你不要走，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待在纽约，没有你在的纽约。”他说，“纽约，我只是在这里暂时待着，旧金山才是我的故乡。到这里这么多次，我仅仅泡到了伊内兹这一个姑娘——只有在纽约我才这么背！他妈的！但是想到又要横穿这个该死的大陆——萨尔，我们很久没有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了。”在纽约，我们总是跑到各种一醉方休的派对上，跟一大票朋友混在一起。某种意义上，这并不适合迪安。当他在寒冷的、烟雾弥漫的雨夜，晃悠在空无一人的麦迪逊大街上时，才更像他自己。“伊内兹爱我；她承诺我，我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不会带来任何麻烦。你知道的，哥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麻烦事儿越来越多。有一天，你我会堕落到去小巷子的垃圾桶里，翻寻罐头盒子里还有什么吃的。”

“你是说，我们最终会像个老流浪汉一样终老？”

“为什么不，哥们？当然了，我们会这么着，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么着老去也没什么坏处。你花费了一辈子不跟别人的愿望冲突，包括政治家和富人，他们也不来烦你，你可以特立独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同意他说的这些。他用最为直截了当的方法，道出了他自己“道”的精髓。“你的道路是什么，哥们？——圣徒之路，疯汉之路，彩虹之路，浪荡子之路，任何道路。这是一条对于任何人任何方法都适用的路途。

该去往何方呢？”我们在雨中点头。“该死的，你得好好照顾好自己，是条汉子就得蹦跶——这是医生说的吧。我会告诉你的，萨尔，前进，不管我住在哪里，我的行李箱永远放在床底下，我随时打算离开，或者被扫地出门。我已经做好随时放下一切的准备。你已经看到我摔得屁滚尿流的样子，你知道那没什么，而且我们知道如何打发时间——怎么不紧不慢，到处闲逛，看看这看看那，找些老掉牙的刺激，还能有些什么刺激呢？我们知道的。”我们在雨中叹气。那天晚上，哈德森山谷到处都在下雨。那条宽阔得像海洋一般的河流，四下里流淌。波基普西的老轮渡码头湿漉漉的。作为河流源头的裂岩湖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范德威客山也是湿漉漉的。“所以，”迪安说，“我这辈子就这样走到哪里算哪里，你知道我最近给我在西雅图坐牢的老爹写信——早些日子，这么多年来，我头一回收到他的来信。”

“真的吗？”

“是啊，是啊。他说他能来旧金山的时候，想看我那个孩子，他把‘baby’拼成了‘babby’，我在东四十大街发现了一个月十三块钱的不带热水的公寓，如果我能把这笔钱寄给他，他就能来纽约住了——如果他能来，我很少跟你说我妹妹的情况，但你知道我有一个可爱的小妹妹，我也想让她过来跟我一起住。”

“她在哪儿？”

“好吧，说是这么说，我也不知道——他一直想找到她，那个老头儿，但你知道他事实上干了些什么。”

“他去了西雅图？”

“直接坐了脏兮兮的牢。”

“他之前在哪里呢？”

“得克萨斯，得克萨斯——所以你看，哥们，我的灵魂，我的状态，我的处境——你留意到我安静一些了。”

“是的，那确实是的。”迪安在纽约慢慢变得安静下来，他总是想出去走路，在冷雨中，我们总是冻得瑟瑟发抖。在我离开之前，我们相约在我姨妈家门口碰面。

接下来的礼拜天下午，他来了。我有一个电视，我们看了电视上的棒球比赛，听着收音机里的另外一场比赛，同时还调频到电台的第三场比赛，在这三场比赛当中一刻不停地切换。“记着，萨尔，霍奇守二垒，在布鲁克林赛场，所以当菲利普队替补投球手即将上场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换到波士顿的巨人队，与此同时，注意迪马乔已经拿了三个球，投手开始把手伸到松脂袋的时候，我们赶紧去看看鲍勃·汤姆森怎么样了，三十秒钟之前，他那边的人已经在三垒上了。是的！”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跑到长岛铁道调度场，在煤场那儿跟一帮孩子打垒球。我们还打篮球，打得相当起劲，年轻一些的男孩们说：“放松点儿，你犯不着跟要杀了自己似的。”他们

轻轻松松地围着我们，轻而易举地赢了我们。迪安和我汗流浹背，有那么一下，迪安一个四仰八叉，脸朝下摔在水泥地上。我们呼哧带喘地把球从男孩手里抢过来；他们一转身，就把球传了出去。其他人冲过来，轻轻松松地把球从我们头顶飞了过去，投篮。我们冲着篮架起跳，疯了一般，那些年轻的男孩们及时上手，从我们汗津津的手里抢过球，就把它带跑了。我们就像是整天在小巷子里流连的三流中音萨克斯手，试图要跟斯坦·盖茨和库尔·查理在篮球上一较高下。他们觉得我们疯了，迪安和我在回家的路上，两人分别走在人行道的一侧，传球接球。我们尝试了一些特殊的玩法，越过灌木丛，躲开电线杆子。当一辆车子经过时，我跑到一边，挨着汽车后保险杠，把球传给了迪安。他迎上前来，接住球，在草地上打了个滚儿，从一辆停着的运送面包的卡车边上，又把球传给了我。我用我的右手接下了球，又传回给迪安，迪安不得不转过身子，向后退了一步，整个身体趴在篱笆丛上。我们到了我姨妈家，迪安拿出钱包，嘴巴里嘟嘟囔囔，把上次在华盛顿我们收到超速罚单那次借姨妈的钱，还给她。她十分意外，相当高兴。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好吧，迪安，”我姨妈说，“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照顾你即将出生的新宝宝，好好维持这段婚姻。”

“是的，好，好。”

“你不能再全国到处乱跑，生下那些宝宝了。那些可怜的小家伙将会无助地长大。你得给他们活下去的机会。”他看着

他的脚丫子，点点头。夕阳西下的时候，在高速公路的一座桥上，我们彼此告别。

“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还在纽约。”我跟他说。“我所期待的，迪安，仅仅是有一天我们两个家庭可以住在同一条街上，成为世交。”

“那没问题，哥们——你知道我全心全意期盼这一天的，我清楚我们的那些困境，和即将遇到的麻烦，正如你姨妈所知，并告诉我的那样。我不想要新宝宝，伊内兹坚持要，我们吵了一架。你知道玛丽露跟一个二手车销售商结了婚，也快要生孩子的事吗？”

“知道，我们早晚都要去那儿。”虚无的倒置的湖泊泛起涟漪，那是我本该说的。世界的底部是金黄色的，世界是本末倒置的。他拿出了一张卡蜜尔和新宝宝的快照。一个男人的影子折射在阳光灿烂的人行道上，穿着长裤的两条长腿的影子横在宝宝身上，忧郁万状。“这是谁？”

“那是埃德·邓克尔，他回到拉迪雅身边了，他们现在回到了丹佛，花了一天时间拍照。”

埃德·邓克尔，他的悲悯像圣徒的悲悯一样，总是被人忽略。迪安拿出了其他照片。我意识到这是一些将来的孩子们会带着好奇来看的快照，想着他们的父母生活得平顺、秩序井然、安稳，每天早上起床后，踌躇满志地走上生活的人行道，从未想到过我们真正在过的是这么糟糕烂账的生活，我们真实

的夜晚，地狱般的、毫无感觉的梦魇般的道路。这里边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空虚。可悲的无知。“再见，再见。”迪安向着暗红的暮色走去。火车头在他头顶上喷着浓烟，他的影子跟着他，追随着他的脚步和思想。他转过身，向我腼腆羞涩地挥挥手。他给我开了个虚拟的高球，他上上下下地跳着，他叫嚷着一些我听不清的话，并跑成了一个圈儿。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靠近铁道通道的水泥墩子。他对我做了最后一个手势，我也向他招了招手。他突然弯腰疾行，快步走出了我的视线，向着他自己的日子。我也向着自己惨淡无望的日子目瞪口呆。我也有自己漫长而又可怕的路途要去经历。

2

接下来的午夜，我唱着这首小曲儿：

米苏拉的家，

特拉基的家，

奥珀卢瑟斯的家，

没有一处是我的家。

老梅朵拉的家，

翁迪德尼的家，

奥加拉拉的家，

是些我永远不会去的家。

我搭上了去华盛顿的公共汽车，在那里瞎逛了一段时间；绕了一段路特地去看了蓝岭，听了听谢兰多厄的鸟鸣，探访了石墙杰克逊之墓；日暮时分，我站在卡洛瓦河畔向河里吐痰，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的乡间漫步；夜半的肯塔基阿什兰，表演散场之后，帐篷下的孤单女孩。暗淡而神秘的俄亥俄州，拂晓中的辛辛那提，而后是印第安纳州的田野，圣路易斯永恒的河谷上的云彩。泥泞不堪的煤块和蒙大拿的原木，破旧不堪的河上之舟，老旧的招牌，河畔的青草和套索。一首无穷无尽的诗。夜间的密苏里河，堪萨斯原野，堪萨斯广阔原野里夜间的牛群，木板房屋的小镇上，每条街的尽头都是大海；阿比林的拂晓。东堪萨斯的草原向西堪萨斯的牧场过度，向上延展称为西部之夜的山丘。亨利·格拉斯和我坐同一辆公交车。他是从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上车的，现在他跟我说：“我已经告诉你我为什么讨厌我穿的这件衣服了，它太糟糕了——但也不是。”他拿出文件给我看，他刚从特雷霍特的监狱里出来，因为在辛辛那提偷车卖车。他是个年轻的卷发男孩。“我一到丹佛，就会把这身衣服送到当铺，弄一身牛仔服。你知道他们在牢里是怎么对待我的吗？把我跟一本《圣经》单独关在一起，我用它坐在石头地面上。当他们发现我这么干了之后，把那本《圣经》收回去了，给我换了一本口袋袖珍版。再也不能用来垫屁股了，我只好读了整本旧约和新约，嘿——嘿——”他捅了捅我，咀嚼着他的糖果，他老得吃糖果因为他的

胃在坐牢期间受损了，再也不能承受其他东西——“你知道《圣经》里头有一些真正劲爆的东西。”他告诉我什么叫作“显摆”。“任何人即将离开监狱，都开始跟那些还得留下来的人谈论自己出去的时间，那就是‘显摆’。我们掐住他的脖子威胁说：‘别跟我显摆！’坏事儿，别跟我‘显摆’，听见没有？”

“我没显摆，亨利。”

“任何人跟我显摆，我的鼻孔就会呼哧带喘，我会疯狂到想杀人。你知道为什么我一辈子都在牢里待着吗？因为我十三岁那年情绪失控，当时我跟一个男孩一起去看电影，他跟我妈妈起了冲突——你知道，他说了脏话什么的——于是我掏出自己的小折刀，一把割了他的喉咙，差点儿就杀死了他，要不是别人把我拉开的话。法官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当你袭击你朋友的时候？’‘是的先生，法官大人，我知道，我想杀了那个狗娘养的，我到现在还这么想。’因此我失去了假释的机会，直接被送到管教所。因为是单独囚禁，我坐在地上太久，还得了痔疮。千万不要进联邦监狱，他妈的，我可以聊一整晚，因为太久没跟人聊天了。你不知道我出来得有多爽。你就那么坐在公交车上，当我上车的时候——这车要穿过特雷霍特——你在想什么呢？”

“我只是傻坐着，没在想什么。”

“我，我在唱歌，我坐在你旁边是因为我不敢坐在任何女孩身边，担心自己发疯失控，把手探到她们的衣服下面去。我

得等一段时间。”

“你要是再去坐牢，这辈子可能都别想出来了，从现在起，你得悠着点儿。”

“这也是我的想法，麻烦的是，我很容易精虫上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他要去他哥哥嫂子家住，他们在科罗拉多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他的车票是联邦政府给买的，他还在假释期。这是个像昔日的迪安的年轻男孩儿，他总是热血沸腾血气方刚，鼻孔朝天，没有任何靠谱的力量，能够让他摆脱自己酷爱招惹是非的命运。

“做个哥们，在丹佛看紧我点儿，好不好，萨尔？让我平平安安地到达我哥哥家。”

我们到了丹佛后，我拖着他的胳膊去拉里默街，去典当他监狱里的衣服。包裹刚解开一小角儿，那些老犹太人就觉察到那是什么。“我不想要这类该死的东西，我每天都能从那些刚从牢里出来的人那儿收到这些东西。”

整条拉里默街上充斥着那些刚刚从大牢里出来，想要把狱衣典当出去的人们，亨利最终把那些衣服放在一个纸袋里，夹在腋下，穿上了崭新的牛仔服和运动衫。我们去了迪安老去的格兰纳姆酒吧——在路上，亨利把狱衣扔到了垃圾桶里——打电话给提姆·格雷，已经是夜里了。

“是你啊？”提姆·格雷咯咯乱笑。“等着。”

十分钟左右，他跟斯坦·谢泼哈德大步流星地走进酒吧。他们刚去了趟法国，对于他们在丹佛的生活深感不满。他们喜欢亨利，给他买酒。他开始大花特花他在牢里积攒下来的那点钱。我再度回到了丹佛柔和、幽暗的夜晚，和它不可思议的小街巷，以及疯狂的房屋。我们开始造访城里所有的酒吧，西考尔福克斯的路边店，五点黑人酒吧，等等。

斯坦·谢泼哈德一直等着跟我见面。多年以来，我们第一次一起面临一次冒险。“萨尔，即便我刚从法国回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一个人能干些什么。你打算去墨西哥是真的吗？真他妈棒，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我能弄到一百块钱，一旦我弄到了，我们可以根据美国军人法案去墨西哥城市学院申请个奖学金什么的。”

好吧，我们达成了一致，斯坦跟我一起去。他是个修长、羞涩、头发乱糟糟的丹佛男孩，有着让人舒服的笑容和缓慢、随和的格雷·库珀般的动作。“真他妈棒！”他说着，把两只手插在裤腰带上，大模大样地走向街道，从这头晃到那头，慢腾腾地。他的爷爷正跟他对着干，当初反对他去法国，现在正在全力阻止他去墨西哥。因为和爷爷不痛快，他整天像个流浪汉一样在丹佛街上瞎逛。那天晚上，我们既喝得尽兴，又没让亨利在考尔福克斯的热卖店出洋相，斯坦跑到亨利在格兰纳姆酒吧上头的旅馆房间去睡大觉。“我一会儿不能回家太晚——我爷爷会跟我吵，然后他跑去在我母亲那儿撒气。我跟你说萨尔，我必须尽快离开丹佛，否则我要疯掉了。”

就这样，我在提姆·格雷家待着，后来，贝比·罗林斯给我找个整洁的地下室房间，接下来一个礼拜的每个晚上，我们都在歌舞升平中度过。亨利离开了，去找他哥哥，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能见到他，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向他“显摆”，他们是不是把他再度投入牢里，他是不是在自由自在的夜里挣脱自己的镣铐。

提姆·格雷，斯坦，贝比和我花了一整个礼拜的下午，厮混在丹佛可爱的酒吧里。那些女招待穿着长裤，带着羞涩、可爱的眼神，不是那种风尘味儿十足的女招待，而是会跟顾客陷入爱河，闹出爆炸性的恋爱事件的女招待。我们汗流浹背地转场，从一家酒吧到另外一家；那一周，我们每晚五点都去酒吧听爵士，在疯狂的黑人酒吧喝酒，再到我地下室的房间神侃到清晨五点。中午的时候，我们通常在贝比家的后院儿待着，跟那些正在扮演西部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孩子们在一起，他们从那些开着花儿的樱桃树上扑通跳下来，跳到我们身上。斯坦和我怂恿提姆跟我们一起去看墨西哥，但是提姆离不开他的丹佛生活。

我正打算离开，有天晚上，丹佛·多尔突然打来电话说：“好吧，萨尔，猜猜谁要来丹佛了？”我猜不出来。“他已经在路上了，我得到的小道消息。迪安买了一辆车，打算来跟你会合。”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迪安的样子，一个浑身冒火的，吓人的天使，风驰电掣地向我扑来，靠近的模样就像一朵云，以急驰的速度，在平原上恰如穿着裹尸布的旅行者，飞速地向我逼近。我看到他那张大脸上疯狂、瘦削的深情，还有闪

闪发光的眼神，我看到了他的翅膀，我看到了他那辆正发射出千万道光芒的破旧的车子，我看到了一路燃烧过后的道路。它甚至踏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碾过玉米地，穿过城市，摧毁桥梁，吸干河流。带着横扫西部的天谴之怒，一路狂奔而来。我知道迪安再次发疯了。如果他所有的积蓄都被他从银行里拿出来，买了一辆车，他肯定再也没法把钱寄给任何一位妻子。他的生活再度完蛋了，一切都完蛋了，他身后的废墟还在冒着烟。他又一次穿过呻吟而又可怕的大陆，很快，他就要来了。我们急慌慌地为他做了些准备。有消息说，他将要带上我开车去墨西哥。

“你觉得他会让我一路同行吗？”斯坦怯怯地问。

“我会跟他说的，”我阴郁地说，我们不知道会迎来怎样的结果。“他在哪儿睡呢？他吃什么？有什么妞给他备着吗？”好像马上要来的是高康大^{注3}，得为他扩大丹佛排水沟的尺寸，为此修订相应的法律，好适用于他庞大的身躯和炸裂的狂喜。

^{注3} 高康大是拉伯雷系列《巨人传》小说当中的巨人老国王。

3

迪安来到丹佛的场景像是一部老电影。一个金色的午后，我正待在贝比家。这个家可以多说两句。贝比的母亲常年居住在欧洲。她的监护人姨妈叫查莱蒂，她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了，还跟一只小鸡一样欢脱。罗林斯家族遍布整个西部，她总是从一家跑到另外一家，让她自己变得很有用。有一度，她身边有一堆儿子，后来他们都跑光了。他们集体抛弃了她。她是老了，但是对我们说的和做的每件事都兴致勃勃。当我们在起居室喝几口威士忌时，她忧伤地摇摇头。“你们到院子李去喝吧，年轻人。”楼上——那年夏天那里几乎成了宿舍——住着一个叫汤姆的小伙，他毫无希望地爱着贝比。他来自佛蒙特州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们说，他家里有产业之类的等着他去继承，但他宁可待在有贝比的地方。每天晚上，他拿着一张报纸涨红着脸坐在起居室，每当我们聊点什么，他其实听到了，但假装不动声色。当贝比说点什么时，他的脸蛋尤其红。我们强

迫他放下报纸时，他显得好像遭受了不可理喻的凌辱。“呃？哦，是的，我想是这样的。”他通常只是这样说。

查莱蒂坐在角落里，一边织毛衣，一边用她像鸟儿一样锐利的眼睛观察着我们。她的任务就是伴随左右，她要留意没有人咒骂。贝比坐在沙发里咯咯地笑。提姆·格雷，斯坦·谢泼哈德和我，懒洋洋地瘫在椅子上。可怜的汤姆备受折磨。他起身，打着呵欠，说：“好吧，又过了一天了，晚安，”然后在楼梯上消失了。贝比对于他来说根本还不算是个情人。她还爱着提姆·格雷，他却扭动着想要摆脱她的控制。我们就像这样坐在一起，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等着开晚饭。迪安在门前停下车，从他的破车里跳出来，穿着一件带坎肩的花呢子外套，还有表链。

“吼！吼！”我闻声出来迎他。他跟罗伊·杰克逊在一起，罗伊刚从洛杉矶回来，打算和他的妻子桃乐西一起重返丹佛。邓克尔和拉迪雅·邓克尔，还有汤姆·斯奈克也是如此。所有人再度聚集在丹佛了。我走到回廊下。“好吧，我的天，”迪安说，伸出了他的大手，“我发现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哈啰哈啰哈啰，”他对每个人说。“哦是的，提姆·格雷，斯坦·谢泼哈德，你们好啊！”我们把他介绍给了查莱蒂。“哦是的，你好吗？这是我的朋友罗伊·杰克逊，得亏他一路陪着我，哈啰！呃！咳！咳！哈珀尔少校，嗨！”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他的手向汤姆伸过去，他正盯着迪安看。“是的，是的，好吧，萨尔老哥，有啥新故事，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墨西哥？明天下午？好的，好的，啊哈！现在，萨

尔，我正好有十六分钟好去埃德·邓克尔家，我要去取回我自己的老牌铁道表，好看看能不能在拉里默街打烊前给它当掉，与此同时，我要尽快地看看我老爹有没有可能正好在吉格斯自助餐厅，或者别的什么酒吧里头，然后我跟那位多尔常常让我别忘了去光顾的理发师有个约，这个老规矩我可从来没变过——哇！哇！六点整！——六点整，听到没有？——我要你在这儿等着我，我会尽快开车来接你，我们去罗伊·杰克逊家遛一圈儿，放一放吉莱斯皮的唱片，或者别的什么波普爵士乐唱片，先放松一个小时，然后你和提姆、斯坦、贝比，再按晚上事先计划好的安排活动，有我没我你们都那样的过法。就在四十五分钟前，我还在自己那辆三七年款的老福特里，你能看到它就停在那儿。我还在堪萨斯城停了好一会儿去看我表哥，不是山姆·布雷迪，而是个更年轻的……”说这番话时，他在起居室众人不太能看到的地方，迅速地把外套换成了T恤，把表塞进另外一条从破衣箱里拿出来的裤子兜里。

“伊内兹怎么样？”我说。“纽约怎么样了？”

“官方地说，萨尔，这次旅行是去墨西哥办理离婚手续的，比任何其他方式都要快，要便宜。我最后终于和卡蜜尔达成一致，一切都顺理成章，安排妥当，一切都可爱无比，我们明白现在啥也不担心了，对吧，萨尔？”

好吧，是的，我总是随时打算听从迪安，于是我们立马安排了一大套新计划，安排了盛大的晚会。那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在埃德·邓克尔的哥哥家举行，他的另外两个哥哥是公交司机，他们看着我们布置的一切，无比新奇。桌子上放着好多

美味佳肴，蛋糕还有喝的。埃德·邓克尔看着既开心又满足。“好吧，你和拉迪雅没事了吧？”

“是的，先生，”埃德说，“我确信没问题了，我打算去丹佛大学上学，你知道的，我和罗伊。”

“你们打算学什么？”

“哦，社会学之类的科目吧，你知道的，比方说，迪安一年比一年疯疯癫癫了，是吧？”

“他确实是的。”

拉迪雅·邓克尔也在，她试着找人说说话，但迪安控住了全场。他站在谢泼哈德，提姆，贝比和我面前，夸张地表演着。我们全部坐在靠墙的厨房椅子上，一整排。埃德·邓克尔在他身后心神不宁地站着。“嗨！嗨！”迪安说着，拉拉自己的衬衫，摩挲着自己的肚皮，上上下下跳着。“是的，好吧——我们又聚到一起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你看，我们谁都真的没有什么变化，真是神奇啊，持——续——性，事实上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带来一套扑克，来给所有人算个命。”还是那套色情扑克，桃乐西·约翰逊和罗伊·杰克逊在角落里直愣愣地坐着。那是个沉闷的派对。迪安突然安静下来，坐在斯坦和我之间的椅子上，像狗一样死死地盯着前方，对谁都不再关注了。他仅仅是消失了片刻，好聚集起更多的能量。如果你碰了他，他又会像悬崖上一堆圆形石头上的一块石头一样摇摇欲坠。他可能像块石头一样滚下悬崖，也可能仅仅像个岩石一

样摇晃。突然那块石头炸裂开，像朵花儿，他脸上也露出了迷人的笑容，而后他如梦初醒一般对周围的人说：“哈，看看这些坐在我身边的好人儿。不是挺美妙的嘛？萨尔，就像我那天跟你说的一样，怎么了，哦，哈，是的！”他站起来，穿过房间，向着那个汽车司机伸出手去。“怎么样，我叫迪安·莫里亚蒂，是的，我对你记得清清楚楚。一切都好吗？好，好，瞧那蛋糕多可爱。哦，我能吃点儿吗？就我自己？一副可怜相？”埃德的妹妹说是的。“多好啊，大伙儿都这么好。蛋糕和漂亮的東西摆放在桌子上，只是为了极好的小小的欢乐和开心。嗯，哈，是的，真棒，真好，好正点，呀哦！”他站起来，在房间中间摇摆，吃着他的蛋糕，敬畏地看着所有人。他转过身去，看着他身后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让他兴奋不已，所有他看到的東西。人们三五成群地在房间里聊天，他说：“就是这样，没错！”墙上的一张画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站起来，凑近了看，退后了看，他弯下腰跳起来，他想从各种可能的高度和角度看这幅画儿，他拉扯着自己身上的T恤：“他妈的！”他不知道自己在他人眼中是个什么印象，他也不是太在乎。人们脸上对迪安开始漫溢着母亲或者父亲般的爱意。他终于成了一个天使，正如我期待的那样；但正如所有的天使，他也会愤怒和狂躁，而那晚当我们集体离开派对，一大票人闹哄哄地前往温德泽酒吧时，迪安已经烂醉如泥，半是天使，半是疯魔。

记得温德泽酒吧，一度是丹佛城里著名的旅馆，是一时之盛——在楼下的大厅墙上，还残留着弹孔——一度还是迪安的家。他曾经跟他老爸住在楼上一个房间里。他并非游客。他在

这家酒馆喝得醉醺醺的，仿佛他老爸的幽灵。他像灌水一样灌下红酒、啤酒和威士忌。他的脸涨得通红，汗如雨注，嘶吼着，扭动着穿过酒吧的舞池，在那儿，西部来的怪客们正跟女人们跳舞，还想弹钢琴。他张开双臂拥抱那些昔日的囚犯，和他们一起大嚷大叫。与此同时，我们这票人围坐在两张拼在一起的大桌子边上。有丹佛·D·多尔，桃乐西和罗伊·杰克逊，一个来自怀俄明州水牛城的女孩，那是桃乐西的朋友，斯坦，提姆·格雷，贝比，我，埃德·邓克尔，汤姆·斯奈克，还有其他一些人，统共有十三人。多尔玩得很开心：他把一只自动售卖花生机放在自己跟前的桌子上，往里投硬币，开始吃花生。他建议我们全都在一张明信片上写点什么，寄给在纽约的卡罗·马克斯。我们写下了一些疯话。拉里默街的夜晚播放着喧闹的音乐。“太好玩儿了！”多尔嚷嚷道。在男厕所，迪安和我大力撬门，试图撞开门，但它有一英寸厚。我撞碎了我中指的骨头，但是直到第二天才发现。我们醉得一塌糊涂，一度我们桌上同时摆放了五十杯啤酒。你需要做的只是围着它狂转，每一杯喝一口。峡谷市的前囚徒们跟我们一起喝得烂醉如泥，说着胡话。酒吧外边的门厅，在嘀嘀嗒嗒的老挂钟下面，过去的拓荒者们拄着拐杖做着美梦。这景象在他们昔日的伟大时代也出现过，一切都在旋转不朽，到处都有派对。甚至在城堡里也举办了一个，我们一道开车前往——除了迪安，他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在城堡里，我们坐在大厅里的一张巨大的桌子上，嘶吼嚎叫。外边有游泳池和岩洞。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世界巨蛇抬起头来的地方。

那天深夜，仅仅迪安、我、斯坦·谢泼哈德、提姆·格雷、埃德·邓克尔和汤米·斯奈克，坐在一辆车里，一切都展示在我们眼前。我们去了墨西哥小镇，我们去了“五点”，我们到处瞎跑，斯坦·谢泼哈德高兴得东倒西歪。他不停地喊着：“狗娘养的！真给力！”他拼命地喊叫，拍打着自己的膝盖。迪安对他很是着迷。他重复着斯坦说的每句话，将自己脸上的汗抹去。“萨尔，跟这个孙子斯坦一起去墨西哥旅行错不了！错不了！”那是我们在神圣丹佛的最后一晚，我们将它过得既盛大又狂野。最后，我们在地下室的烛光中喝红酒，查莱蒂拿着手电筒，穿着睡袍，在楼上巡视。我们当中有个黑人，他管自己叫戈麦斯。他在“五点”附近瞎晃悠，啥事儿没有。当我们看到他时，汤米·斯奈克喊道：“嘿，你叫约翰逊吗？”

戈麦斯退了几步，再度路过我们说：“现在，你们能重复一遍自己说的吗？”

“我说你是不是那个人称约翰逊的家伙？”

戈麦斯又退了回去，再度路过我们。“这样是不是还有点儿像他？因为我想尽办法像他，但我没招儿啊。”

“好吧，哥们，跟我们一起玩去。”迪安叫道，戈麦斯跳上了车子，我们就开走了。我们在地下室尽量地小声，避免打扰邻居。早上九点，所有人都离开了，除了迪安和斯坦，他俩依旧像疯子一样絮絮叨叨。人们起床做早餐的时候，听到地下

室传来的奇怪的声音说：“是的！是的！”贝比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去墨西哥的时候到了。

迪安把车开到最近的维修站，将车子检修了一番。那是一辆三七年款的老福特，右边的车门已经脱臼了，绑在了门框上。左边前边的座椅也已经残破，当你坐上去的时候，你的脸不得不冲着破破烂烂的车顶。“就像电影《拯女记》[注4](#)一样。”迪安说。“我们一路颠簸着，踉踉跄跄地去往墨西哥；这会花掉我们不知道多少天。”我查看了地图：统共超过一千英里的路程，大部分在得克萨斯州境内，一直到墨西哥边境小城拉雷多，然后是穿越墨西哥的整个七百六十七英里的路途，一直到靠近地峡裂口和瓦哈坎高地。我无法想象这段旅程。这一定是最美妙的一次。它不再是东部到西部，而是一路向南。我们似乎看到了整个西半球的山脉穿入火地岛，带着我们沿着地球的弧面直抵其他的回归线和其他的世界。“老兄，这趟旅行最终会带我们进入那个境界！”迪安满怀信心地说。他拍打着我的胳膊。“等着瞧吧。吼！嘿！”

我和谢泼哈德一起去处理了他在丹佛还没处理好的事务，而后去跟他可怜的祖父见了面，老人站在他们家门口，一遍遍地喊着：“斯坦——斯坦——斯坦。”

“怎么了，爷爷？”

“别走。”

“哦，这事儿已经定了的，我现在必须要走了；你干吗非不让我走呢？”那老头儿长着灰白的头发，巨大的杏仁眼儿和脖子紧绷。

“斯坦，”他只是说，“别走，别让你的老爷爷哭泣。不要再度把我一人孤零零地抛下。”此情此景让我心碎。

“迪安，”那老头儿说，冲着我说，“别把我的斯坦带走。我过去带着他去公园里看天鹅，那会儿他还是个小娃娃。而他的小妹妹就淹死在那个池塘里。我不想让你把我的孩子带走。”

“不，”斯坦说，“我们现在得走了，再见。”他努力挣脱老爷子的拉扯。

他爷爷死死地抓住他的胳膊。“斯坦，斯坦，斯坦，别走，别走，别走。”

我们低着头飞速地离开，那老头儿继续站在他丹佛街边的小屋门口，珠串门，客厅里满满当当的家具。他的脸色像床单一样煞白。他还在喊着斯坦。他行动不便，有点偏瘫，无法离开门口，无法移动一步，只是站在那里，喃喃地说“斯坦”和“别走”，充满渴望地看着我们转过街角。

“天哪，斯坦，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别管他！”斯坦嘟囔着说。“他总是这样的。”

我们和斯坦的妈妈在银行碰面，她正在打算取钱给他。她是个可爱的花白头发的老太太，看起来还很年轻。她和她的儿子站在银行的大理石地板上，窃窃私语。斯坦穿着牛仔服之类的，一副铁了心要去墨西哥的样子。他在丹佛还是个小屁孩，现在要跟着狂躁的迪安离家远行了。迪安蹦跶着拐过街角，按时跟我们会合。谢泼哈德太太坚持要买杯咖啡给我们喝。

“照顾好我的斯坦，”她说。“那样一个国家，保不齐要发生什么事。”

“我们会照顾好彼此的，”我说，斯坦和他妈妈走在前头，我和疯疯癫癫的迪安尾随其后；他把东部和西部厕所涂鸦的异同跟我说了一遍。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在东部，大多是些俏皮话，粗俗的玩笑和露骨的暗示，以及一些淫秽的字样和画面；在西部，则是直接写上人们的名字，红头发奥哈拉，大大咧咧蒙大拿，到此一游，某年某月某日，认真得要命，跟埃德·邓克尔一样，造成这种差异的缘由是漫无边际的寂寞感，你一进入密西西比，就会想要刮胡子剪头发。”好吧，我们前方就有一个寂寞的男孩儿，斯坦的母亲是个可爱的母亲，虽然她舍不得儿子走，但知道儿子不得不走。我知道斯坦是在躲着他爷爷。我们仨——迪安在找他老爸，我的老爸死了，斯坦在躲着他家老爷子，我们一起进入了茫茫黑夜。他在第十七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吻别了他的母亲，她坐上一辆出租车，向我们挥手道别，再见。

我们到贝比家开上了车，跟贝比道别。提姆搭我们的车回到他郊外的家。贝比那天显得很漂亮，她的头发又长又闪耀，特别瑞典，她的雀斑在日光下清晰可辨。她看起来跟小时候一模一样。她眼睛里有一团雾。她也许会和提姆一起来跟我们会合——但是没有。再见，再见了。

我们继续前行，把提姆扔在他郊外平原上的家的院子里，我回头看到提姆在平原上越来越小。那个奇怪的家伙站在那里整整两分钟，目送着我们离去，想着天知道的什么难过的念头。他变得越来越小，但是一动不动，一只手扶着晾衣绳，就像一个船长，我回过头想再次看看提姆，但只看到一片虚空，那是向东看向堪萨斯，直到我的家乡亚特兰蒂斯的一片虚空。

现在，我们将咯吱作响的车头转向南方，直奔科罗拉多州的岩石堡，这时日头已经转为夕阳红，向西的山脉上的岩石，看起来就像十一月的黄昏当中的布鲁克林啤酒厂。在岩石高处的紫色阴影里，有人在里边走着，走着，但我们看不见；或许那个白发老人是我多年前在高地上见过的。萨卡特卡斯市^{注5}的杰克。他现在离我更近了，正说不定就在我身后了。而丹佛就像盐柱之城一样在我们身后消逝，它在空气中散为烟雾，从我们的视野中渐渐隐退。

[注4](#) 《拯女记》，1930年一部美国喜剧电影。

[注5](#) 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的首府，历史名城。

4

这是五月，在科罗拉多州温馨的午后，有农田，有纵横的沟壑，带树荫的小山谷——小男孩们经常在那里游泳——怎么会出现一只叮咬了斯坦·谢泼哈德的虫子？他当时正把胳膊搁在坏掉的车门上，一路边走边开心地聊天，突然，一只虫子飞到他的胳膊上，狠狠地蜇了一口，他大声叫了起来。这竟是在美国的一个午后发生的事情。他叫嚷着，使劲拍打着胳膊，想要把刺拔出来，不消几分钟，他的胳膊肿了起来，疼痛难忍。这种情况只能等着看看肿胀能不能消退。我们身处这样的境况，去往未知的南方大陆，离开家乡还不到三英里，可怜的儿时的故乡，一只奇怪的、凶狠的、莫名其妙的虫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这是什么？”

“我从不认识这附近有能把人咬成这样的虫子。”

“该死的！”这让我们的旅程显得不祥而又阴郁。我们继续驾车前行。斯坦的胳膊变得更糟糕了。我们在遇到的第一家医院就停了下来，给他来了一针盘尼西林。我们经过了岩石堡，在暮色中进入了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派克峰在云间，耸立在我们的左侧。我们在普韦布洛高速路上行进。“我在这条路上搭过成千上万次车，”迪安说，“有一天晚上，我躲在那些铁丝网围栏后头，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慌。”

我们决定各自说各自的经历，是一个接着一个说，斯坦第一个来。“我们要走很长一段路，”迪安提议，“所以你们可以悠着点儿，把各种想得起来的细节都说一说——即便如此也只能是个大概。慢慢来，慢慢来，”他提醒斯坦，后者已经开始说他的故事了，“你也得放松来说。”我们隐入黑暗之中时，斯坦开始讲他的人生故事。他从他在法国的经历开始讲，但是讲着讲着，说不下去了，又从他在丹佛的男孩成长时光讲起。他和迪安比对着看到彼此骑着自行车在街上瞎逛的时间。“有一次你肯定忘掉了，我知道——阿拉帕霍汽车修理厂？想起来了没有？我在街角朝你身上扔了一个球，你用拳头把它打回来了，球掉进了水沟。还是小学时候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了没有？”斯坦既激动又焦虑不安。他想跟迪安说所有的事情。迪安现在变成了裁判，老头儿，法官，听众，批准者，点头者。“是的，是的，请继续。”我们经过了沃尔森堡；突然又经过了特立尼达，查德·金也许就坐在那条路边的某堆篝火跟前，跟一票人类学家坐在一起，也正在讲着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万万没想到我们在那一刻正从高速公路上呼啸而过，前往墨西哥，说着我们自己的故事。噢，忧郁的美国之夜！而

后，我们到了新墨西哥，经过了拉顿的圆形巨石，在一家餐馆停下，狼吞虎咽地吞下了几只汉堡包，又拿餐巾纸包了几只，等南下边境之后再接着吃。“整个得克萨斯州就在我们跟前，萨尔，”迪安说。“在我们让它消失在地平线之前。每推进一步，我们将会几分钟之内抵达得克萨斯州，直到明天这会儿还没离开它的境内，即便你一刻不停地开车。想想吧。”

我们继续开车。穿行过夜晚广阔的平原，迎面而来的就是得克萨斯的小镇，在黑漆漆的地面上，在五十英里开外。月光下到处都是牧豆树和空荡荡的土地。地平线上端放着一轮明月。扁扁的大大的锈黄锈黄的，她看起来那么温柔醇厚，打着卷儿，直到晨星出现，直到露水飘进了我们的车窗——在达尔哈特之后——空饼干盒式的小镇——我们到达阿马里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了，车窗外是一片疾风劲吹的牧草地，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搭建了不少野牛皮帐篷的地方。现在那儿有了加油站，还有新式的五〇年款的投币式点唱机，看着外观像模像样，十美分一首歌，歌单糟糕透了。从阿马里奥到采尔德里斯，迪安和我把我们读过的小说情节，一本本说给斯坦听，斯坦自己这么要求的，因为他想知道。到了采尔德里斯，在烈日炎炎下，我们径直拐向南边，路变少了，经过一片光秃秃的荒地，直抵得克萨斯的帕杜卡哈，加斯里和阿比林。现在迪安要睡觉了，斯坦和我坐在前排座椅上，轮番开车。这辆老爷车引擎发烫，轰隆隆作响，上下颠簸着前进。一大团夹杂着沙粒的风从闪闪发亮的地方吹向我们。斯坦一边开车，一边说着蒙特卡罗，海边的卡涅河和芒通，在那里，黑面孔的人们在白色的墙边走着。

毫无疑问，前面就是得克萨斯，我们开着滚烫的车子进入阿比林，全都打起精神看着它。“想象一下住在这样一个离城市一千英里的小镇上，哇，哇，在铁轨那头是古老的镇子阿比林，大家把牛宰杀了，换成胶鞋，喝酒喝到两眼通红。看看那边！”迪安大喊大叫，他的嘴嘟噜起来好像W.C. 菲尔兹，他才不在乎得克萨斯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呢，红脸蛋的得克萨斯人对他不理不睬，在火烧火燎的人行道上快步行走。我们在城市南边的公路上停下车来吃东西。夜幕降临像是还在千里之外，我们继续奔向科尔曼和布雷迪——那是得克萨斯的核心区，我们绕行在尘埃漫天的五十英里的土路上，酷热难当。沿途只有荒野当中的灌木丛，偶然有一些房子出现在干涸的小溪边上，尘埃满天的五十英里的绕行路，以及无休无止的酷热。“老墨西哥还远着呢，”迪安在后面睡眼惺忪地说道，“继续开车，哥们，很快我们就可以亲到那些妞了，只要你知道怎么跟这辆车子说话，怎么哄着她，这辆老福特就还能开——除了它的后屁股快要掉了，但是别担心，直到我们到地方。”他继续睡觉。

我接过方向盘，一口气开到费雷德利克斯堡，在这里，我又走回到昔日的老路上，玛丽露和我在1949年双手紧扣的那个地方，而玛丽露现在在哪里呢？“演奏！”迪安在梦中喊道，也许他梦到了旧金山的爵士乐，甚至即将到来的墨西哥曼波舞曲。斯坦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自打迪安头天晚上给他打了鸡血，他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这会儿他聊到了英国，说到他一路搭车从伦敦到利物浦的冒险经历，头发长得长长的，牛仔裤破破烂烂，古怪的英国卡车司机让他在欧洲大陆空无的阴郁中上了车，得克萨斯冷冰冰的大陆风把我们的眼睛吹得红通通的，

我们每个怀里都揣着个石头，知道不管怎么慢，早晚都会到的。车子以四十迈的速度，颤颤巍巍地行进。从弗雷德利克斯堡开始，我们进入了西部辽阔的高地上。飞蛾打在我们的前挡风玻璃上。“进入干燥地带了，哥们，沙鼠和龙舌兰。这是我头一回抵达这么南边的得克萨斯。”迪安惊叹道。“天哪，这是我老爸冬天来的地方，狡猾的老叫花子。”

突然之间，我们置身于一条蔓延五英里长的小山丘，彻头彻尾是热带的炎热，在前方，我们看到了圣安东尼奥的灯光。你会感觉这里过去确实是墨西哥的地盘。路边的房子看起来风格迥异，加油站比较破败，路灯比较少。迪安很高兴接过方向盘，带着我们进入圣安东尼奥。我们进入了一个有着荒芜的墨西哥南方棚屋的小镇，那些房子没有地下室，门廊上放着老摇椅。我们在一个破败的加油站加了一点儿机油。墨西哥人站在周边，在那些灼热的灯泡照耀下，那些灯泡上爬满了山区甲虫，从软饮箱子里拿出一瓶瓶冰啤酒，把钱扔给服务员。整个家庭都在户外闲待着。到处都是木屋和弯弯曲曲的树木，还有空气中弥漫着的野生肉桂的香气。墨西哥少女和少年走过来走过去。“噢！”迪安嚷嚷道，“好的！明儿！”音乐从各个方向袭来，各种各样的音乐。斯坦和我喝了几瓶啤酒，嗨了。我们似乎即将离开美国境内，但也确实还在美国，在它最疯狂的核心区。机车轰隆隆开过，圣安东尼奥，啊哈！

“现在，哥们，听我说——我们也许可以在圣安东尼奥待上个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可以去给斯坦的胳膊找个诊所好好看看，你和我，萨尔，可以到处瞎逛逛，看看附近的街道——看

看街对面的那些房子，你可以看到正对着的前厅，那些漂亮的女儿们正躺着看《真爱》，喂！来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毫无目标地开着车转悠，问人哪儿有诊所。那是在城中心附近，房屋看起来比较像模像样，更美国，还有几栋半高不高的楼，许多的霓虹灯和连锁药房，车子从暗地里出来，往各个方向乱窜，感觉这里像是没有交通规则似的。我们在医院的车道上泊了车，我带着斯坦去看医院的实习医生，迪安待在车里换衣服。医院的候诊室里挤满了贫穷的墨西哥妇女，她们当中有些人怀孕了，有些人生病了，或者带着她们的小病孩儿。情景十分伤感。我想起了可怜的特雷，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斯坦不得不等了整整一个小时，等着一个实习医生过来看他肿胀的胳膊。他那种感染有个专门的医学术语，但我们都记不住，他们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

那会儿，迪安和我出去墨西哥圣安东尼奥的大街上闲逛。空气芳香而又柔软——我所知的最柔软的空气——幽暗、神秘而又滋滋响动，在嗡嗡作响的黑暗之中，一个带着白色头巾的女孩会猛地出现。迪安只顾走着路，一句话也不说。“哦，在这里干啥都行！”他小声说。“我们只需要这么走着，就能看到所有的一切。看啊！看啊！一个疯狂的圣安东尼奥台球厅。”我们走了进去。有十来个小伙儿在三张桌子边上玩着台球，全是墨西哥人。迪安和我买了罐可乐，将硬币投入自动点唱机，唱起了温诺尼·布鲁斯·哈里斯、莱昂内尔·汉普顿和拉奇·米林德，并且蹦蹦跳跳。这时候，迪安提醒我留意。

“看那儿，现在，用你眼角的余光，当我们听着温诺尼唱着他的宝贝的布丁，当我们也呼吸着你所说的柔软的空气——看那个男孩，那个瘸着腿的在第一张台球桌那儿玩球的男孩，所有人都拿他开玩笑，你知道的，他一辈子都是别人笑话的中心，其他人总是整蛊他但是也很爱他。”

那位瘸腿的男孩是个小侏儒，有一张又大又漂亮的脸，实在太大了，脸上长着一双巨大的褐色眼睛。“你看到没有，萨尔，这是一位圣安东尼奥的汤姆·斯奈克，世上的故事都差不多。看他们拿台球杆戳他屁股？哈一哈一哈！听他们笑成那样。你看，他想赢得这场比赛，他下了五毛钱赌注。看啊！看啊！”我们看着的时候，那个天使面孔的小侏儒打算来个回弹球，他失手了。其他人开始起哄。“哈，哥们，”迪安说，“现在看看。”他们把那个小侏儒的后脖领提起来，把他玩闹式地提溜得团团转。他高声叫了起来。他跑进外边的夜色之中，但不时地回过头来，害羞地、甜蜜地看一眼。“哦，我好想跟着这只小兔崽子，看看他是怎么想的，他有些什么样的女孩——哦，哥们，这样的空气让我迷醉。”我们一路溜达，路过了几个黑暗、神秘的街区，无数的屋子隐藏在郁郁葱葱，几乎就像热带丛林的院落里。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前厅坐着的姑娘，门廊上待着的姑娘，灌木丛里跟小伙儿们在一起的姑娘们。“我从没见过这么疯狂的圣安东尼奥！想想墨西哥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去吧！我们去！”我们跑回医院，斯坦完事儿了，跟我们说他感觉好多了。我们圈住他的胳膊，告诉他我们做的一切。

现在，我们准备好奔赴余下的一百五十英里的边境线了。我们跳进车子，打算出发。我感到如此地精疲力竭，于是我在途经迪利、恩西纳尔到拉雷多这一路时都睡死过去了，直到他们半夜两点把车子停在一家午餐店。“啊，”迪安叹口气说，“得克萨斯到此为止了，美国到此为止了，余下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了。”酷暑难当，我们全都一身大汗淋漓的。没有夜间的露水，没有一丝凉风，除了数以亿万计的飞蛾奔赴灯泡，以及附近夜色中一条低处、发出恶臭的热乎乎的小河——里奥格兰德河，在冰冷的落基山山谷发源，在世界闻名的山谷结束，在墨西哥湾将它的热气与密西西比河的污泥混合在一起。

那天早晨，拉雷多是个险恶的小城。各种各样的出租司机和边境线上的贩子到处流窜，到处找着机会。他们人数不太多，但是为时过晚了。这些家伙是美洲大陆沉渣的最底层，那些不知所措的人们必须抵达一个特定的地点，然后找机会偷摸入境。糖浆空气当中黏糊糊地酝酿着诈骗。警察的脸蛋红通通的，他们阴郁，汗津津的，一点儿也不张扬跋扈。女招待们既肮脏又神色厌恶，到了这会儿，你可以感受到整个墨西哥的辽阔，几乎可以闻到千万张煎玉米饼子在暗夜里的焦糊味。我们对于墨西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还毫无概念。我们再度到了海平面的高度，当我们想要吃个什么零食的时候，实在又吞不下去。不管怎样，我把它卷在餐巾里，带到路上吃。我们感到既糟糕又悲伤。但当我们的车轮子跨过那座桥，进入墨西哥真正意义上的国土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尽管那不过是个边境汽车检查的通道。上了街道之后，墨西哥在我们眼前呈现了。我们

好奇地四下张望。让我们惊讶的是，这里看起来正像是墨西哥。这时候是凌晨三点，戴着草帽、穿着白裤子的家伙们懒洋洋地靠在商店门外土夯的墙上。

“看——那一群——猫仔儿！”迪安小声说，“哦，”他轻柔地呼吸，“等一等，等一等。”墨西哥当地官员笑嘻嘻地出来了，让我们把车上的行李搬下来，我们依计而行。我们无法将自己的一双眼睛从街对面移开。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跑到对面，迷失在那些西班牙风格的神秘街巷之中。那不过是新纪元时代的拉雷多，但在我们看起来它像是圣洁的拉萨。“天，那些家伙像是彻夜不眠似的。”迪安窃窃私语。我们直接尽快地弄完入境手续。他们警告我们别喝自来水，现在我们过了边境。那些墨西哥人无动于衷地看着我们的行李。他们一点儿也不像那些官员们。他们如此懒散又如此温和。迪安无法把眼睛从他们脸上移开。他扭头对我说：“看看这儿的警察，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揉揉自己的眼睛，“我在做梦。”而后，到了我们该换钱的时间了。我们看到一大摞比索搁在桌上，知道了大概每八个比索换一个美元。我们把自己的大部分钱换成了比索，然后开开心心地把大卷大卷的比索放到了我们的兜里。

5

而后我们羞赧又好奇的转脸注视着墨西哥，那帮暮色中的墨西哥人从拉低的帽檐底下偷偷地观察着我们。那头有音乐声传来，通宵餐厅冒出烟雾。“喔！”迪安非常小声地说。

“就是这样了！”一位墨西哥官员微笑着说。“你们这些男孩手续都办好了。往前走吧。欢迎来到墨西哥。好好享受在这里逗留的时光。看好你们的钱。小心驾驶。私下跟你们说，我是雷德，大家都叫我雷德。有事儿找雷德。好好吃，别担心。一切都好好的。在墨西哥能找到很多乐子。”

“是的！”迪安急不可耐地说，我们步履轻盈地进入墨西哥的街巷，停好了车。我们仨一起齐头并进，走入棕黄色、昏暗的西班牙风格的街道。夜色中，坐在椅子上的老人像是来自东方的瘾君子 and 圣哲。没人拿正眼看我们，即便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拐了个大锐角进入了一家烟雾弥漫的午

餐店，走到了一架正播放坎普音乐的美国三十年代的自动点唱机跟前。穿着衬衫领子的墨西哥出租司机和戴着草帽的墨西哥古惑仔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吃着烂糊糊的玉米饼、豆子、煎玉米卷，等等。我们买了三瓶冰啤酒——那啤酒品牌叫皇冠——每瓶大概三十墨西哥分，或者十美分。我们又买了几包墨西哥烟，每包花了六美分。我们反复打量着手里美妙的墨西哥货币，玩弄着它们，环视四周，对每个人微笑。在我们身后，是整个的美国以及迪安和我过往所知的一切，还有那些在路上的生活。我们终于在路的尽头发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我们从未想象过那种神奇的程度。“想想那些宿夜无眠的家伙们。”迪安小声说，“想想我们跟前这片广阔的大陆，有着我们在电影上才能见到的壮观的马德雷山脉，这一路上的热带丛林，以及整个几乎和我们国家一样大的荒漠地带，一直连到危地马拉或者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喔！我们要干吗？我们要干吗？出发！”我们出了门，进到了车里。看了里奥格兰德河那头的美国最后一眼，调转车头，轰隆隆地去往该去的地方。

很快地，我们来到了大漠之上，方圆五十英里之内看不到灯光或者车子，处处一望无际。暮色降临了墨西哥湾，我们开始看到周围鬼魅般形状的丝兰仙人掌和烛台掌。“多么荒凉的野地！”我嚷嚷道。迪安和我彻底醒过来了。在拉雷多时，我们困得要死。斯坦，以前有过出国经验，这会儿在后座上睡得死沉死沉的。整个墨西哥就展现在迪安和我的眼前。

“现在，萨尔，我们把一切都抛诸脑后，进入了一个崭新而又未知的世界。所有这些年，这些麻烦事统统滚蛋了——现

在是这些！我们可以心无旁骛、什么也不想地只管前行，我们可以直面这一切，去真正了解这个世界，老实说，就是我们之前其他美国人没干过的事儿——美国人以前来过这儿，不是吗？墨西哥战争，大炮轰隆隆前进。”

“这条路，”我告诉他，“也是老牌美国逃犯穿过边境，前往老蒙特雷的路线，如果你眺望着那灰蒙蒙的沙漠，想象一下那些老墓碑一样的幽灵般的家伙，孤单一人亡命天涯，你还能看到……”

“这就是世界，”迪安说。“我的上帝！”他喊道，拍打着方向盘。“这就是世界！我们可以一路走到南美洲如果这条路通的话。想想看！狗娘养的！他妈的！”我们继续前行。天光顷刻之间大亮，我们开始看到沙漠中的白色沙子，路边上三三两两的小屋子。迪安放慢车速，想认真看看它们。“破屋子，哥们，你只有在死亡峡谷里头才能看到那样的破烂货，甚至更糟糕。这帮人压根不在乎房子的外观。”地图上第一个标注了名字的镇子是萨维纳斯伊达尔戈，我们热切地盼望着早一点儿到。“这条路跟美国的路看起来没什么两样的，”迪安大叫，“只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即将注意到，就在这儿，公路牌标注的是公里数，他们倒数着一直到墨西哥城。看，整个国家唯一可以称之为‘城市’的地方，一切都指向它。”距离首都只有七百六十七英里，换算成公里是一千多。“他妈的！我得出发了！”迪安嚷嚷。有那么一会儿我因为太过疲惫闭了会儿眼睛，只听到迪安不停地用他的拳头捶打着方向盘说：“他妈的！”“好刺激！”“哦，这地方真他妈

棒！”“是的！”我们穿过沙漠，到达了萨维纳斯伊达尔戈，差不多是早上七点的时候了。我们慢下来看着这一切。我们喊醒了后座的斯坦。我们正经八百地坐起来看外边。主干道坑坑洼洼，泥泞不堪。两边都是脏兮兮的土坯墙，骡子们装载着货物在街上行走。光着脚的妇女从昏暗的门洞里看着我们。街上熙熙攘攘，尽是走路的人，他们正开始墨西哥乡村崭新的一天。留着向上翘的八字胡的老头儿直愣愣地盯着我们。他们看到了三个胡子拉碴、衣衫褴褛的美国年轻人，而非通常所见的衣着颇为考究、对他们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的游客们。我们以每小时十迈的速度在路上颠簸前行，看到了一切。一票女孩在我们跟前走着，当我们超过她们时，其中一个说：“你们要去哪儿，哥们？”

我诧异地扭头看着迪安：“你听到她说什么了没有？”

迪安也大为惊讶，他一边慢慢开着车，一边说：“是的，我听到她说了什么了，我听得清清楚楚，哦，天，哦，我的天，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我好兴奋，今天早上对我来说太开心了。我们终于来到了天堂。不会比这更好了，不会比这更嗨了，不会比这更牛了。”

“好吧，我们回去，带上她们。”我说。

“是的，”迪安说着，把车速降到了每小时五迈。他有点儿晕头转向的，不像他在美国那么自如。“这一路上，这样的妞有上百万个！”他说。尽管如此，他还是调转车头，回到女孩们身边。她们到地里干活，微笑着看着我们。迪安目不转睛

地盯着她们看。“他妈的，”他屏住呼吸说。“哦！这一切都太棒了，简直不真实。姑娘，姑娘，特别是对应于我当下的地位和处境来说，萨尔，我们路过那些小房子的时候，可以顺带瞟一眼里边的情形——那些歪歪扭扭的门洞，你可以往里看，看到稻草堆的床，和棕色的小孩儿正在睡觉，他们即将醒来，他们睡意蒙眬，大脑里头一片空白，袖子挽得高高的，那些妈妈们用铁锅做饭，他们用木板作为窗户，还有那些老头儿，那些老头儿看起来相当冷静和伟大，丝毫不受任何事情的影响。在这里没有猜忌，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个人都酷酷的，每个人都用直率的棕色眼睛看着你，但是他们啥也不说，只是看着，而在那种眼神当中，充满了温柔与克制的人性之美。想想你读过的那些关于墨西哥的愚蠢的论调，关于美国佬如何如何被坑了等其他胡说八道的论调——关于那些老墨如何不靠谱啊什么的——诸如此类的，这里的人们直接又善良，也不煞有介事。我对此印象深刻。”经过一个晚上坎坷不平的路途，迪安终于来到了一个有看头的世界。他匍匐在方向盘上，向道路两边张望着，慢慢向前开。我们在萨维纳斯伊达尔戈的另外一头加了油。一帮戴着草帽、翘着八字胡须的当地农场主老爷们聚集在老式加油泵跟前，大声说着笑话。在田地的另外一头，一个老儿举着木棍儿赶着他的骡子。升起的太阳照耀着纯净而古老的人类生活。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去往蒙特雷的路途上。巨大的山脉顶着雪帽子，展现在我们跟前；我们呼啸着向它行进。开阔的峡谷逐渐闭合成一个关口，我们穿过了它。没过几分钟，我们就通过了长了牧豆树的沙漠，在清冽的空气中爬上了一条山路，沿

悬崖一侧有山石垒成的墙，崖上有用白灰涂鸦的总统的名字——阿莱曼！我们在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那一条路在云层中盘旋反复，带我们去往山顶的高原。穿过高原就是巨大的工业城镇蒙特雷，这个城市的烟囱向空中排放着烟尘，那些巨大的海湾烟云在空中之碗当中，像羊毛一样覆盖着天空。进入蒙特雷就像进入底特律，都有又高又大的工厂外墙，不一样的只是墙外，蒙特雷还有骡子在草地上晒太阳，厚土坯墙的邻里，成千上万的流浪汉在门洞里流连，妓女从窗户里边往外看，还有那些什么都卖的商店，那些狭窄的通道上，人潮拥挤得就像是在香港。“哟！”迪安叫喊道，“全因为那天上的太阳。你有没有留意到墨西哥的太阳，萨尔？它会让你兴奋。喔！我只想不停地赶路，赶路——这条路驱使我一直在赶路。”我们提出要不要停车休息一下，去体验令人兴奋的蒙特雷，但迪安想把多出来的时间花在墨西哥城，另外，他知道那条路会越来越有趣，特别是一路前行时，从来都是在一路前行时变得越来越有趣的。他像个魔鬼一样不停歇地开车，一刻也不休息。斯坦和我累得半死，放弃了努力，只能呼呼大睡。在离开蒙特雷之后，我回望它，看到云霄中的双子峰，凌驾于老蒙特雷之上，凌驾于那些不法之徒头顶。

前方是蒙特莫雷洛斯，虽然是下行的海拔，却进入了更热的纬度。天气变得异乎寻常的热和奇怪。迪安不得不喊醒我，看周围的一切。“看，萨尔，你肯定不想错过。”我看了。我们正经过一片沼泽地，每隔一段烂糟糟的路，就会见到一个奇怪的墨西哥人，穿得破破烂烂，砍刀挂在腰际的皮带上，正走着路，他们当中有些人正在砍灌木丛。他们都停下来，看着我

们，脸上毫无表情。透过那些杂乱的灌木丛，我们偶尔能看到那些非洲式的竹墙，高高耸立的茅草屋顶。奇怪的年轻女孩，跟月亮一样黝黑，从神秘的、荒草幽谧的门洞里向外看。“哦，哥们，我想停下车来跟这些小可爱们玩耍，”迪安叫道，“但是得留意总是在这附近的老太太或者老头儿——总是在后头，有时候一百码开外，在捡树枝或者照料牲口。她们不会孤身一人的。没人在这个国家是孤孤单单的，当你们这些家伙睡着的时候，我已经研究了这条路和这个国家，如果可以，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告诉你们，哥们！”他正在冒汗。他的眼睛缠满了红血丝，并且疯狂，但是依然克制而又温和——他已经发现了和他自己一样的人们。我们以稳定的时速五十迈，稳步前进，穿过这片沼泽地。“萨尔，我想这个乡村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变化。如果你可以来开车，我就要睡了。”

我接过方向盘，开起了车，回忆着我自己的往事，经过林纳雷斯，经过炎热、平坦的乡村，经过伊达尔戈附近奔腾的索托拉玛利亚河，诸如此类。有着一大片绿色庄稼的一大片宽阔的山谷出现在我面前。一群男人在一座窄小的老桥上，看着我们经过。滚烫的河流奔腾不休。而后我们进入了海拔升高的地段，直到沙漠重新出现。格雷戈里亚城就在眼前。男孩们都在沉睡，我独自一人开着车，而道路又直又狭窄。不像在卡罗来纳，或者得克萨斯，或者亚利桑那，或者伊利诺伊开车；而像是穿行过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我们可以从那些印第安农夫当中认识到自我的世界，这些最基本、原始而悲痛的族群，缠绕在世界的脐带周围，从马来亚（中国的长指甲）到印第安的宽广大陆，到阿拉伯，到摩洛哥，到达一望无际的沙漠和墨西哥

丛林，穿过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波澜，抵达身着黄袍的神秘的暹罗一带，于是你可以听到西班牙的卡迪斯的废墙的呜咽，你可以听到世界之都贝纳勒斯地心深处一万两千英里的回声。这些人民显然是如假包换的印第安人，不像被文明化了的虚假的美国民间传说当中的佩德罗们和潘乔们——他们有着高颧骨，细长的眼睛，举止优雅；他们不是傻子，他们不是小丑；他们是伟大、肃穆的印第安民族，是人类的源泉和父辈。那些波涛是中国式的，土地却是印第安式的，如同岩石是沙漠的根本一样，他们是历史的沙漠。我们路过他们时，他们深知这一点，我们显然是自以为是的、暴发户式的美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为非作歹；他们知道，对于人类这一地球上的古老生命而言，谁才是父辈，谁又是儿孙，因此不予置评。当历史遭遇毁灭时，费拉欣的农夫们毁灭性地回归到无数次轮回之前，人们还是会从墨西哥的岩洞，或者巴厘岛的岩洞向外张望，那是一切的起源，亚当就是在那儿嗷嗷待哺，并被教育成人的。当我开车进入炎热的、阳光烘烤的格雷戈里亚城时，纷至沓来的就是这些想法。

早些时候，在圣安东尼奥时，我开玩笑似地答应迪安，我会给他一个女孩，这是个打赌和挑战。当我把车子停在靠近阳光灿烂的格雷戈里亚城的一个加油站时，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男孩儿穿过马路，拿着一只巨大的遮阳板，问我买不买。“你喜欢吗？六十比索。会西班牙语吗？六十比索。我叫维克多。”

“不，”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要买小姐姐。”

“是的，是的！”他兴奋地嚷嚷道。“我给你找妞，随时随地。现在太热了，”他露出恶心的表情又补了一句，“热天没好妞。等今晚吧。你喜欢遮阳板吗？”

我不想要遮阳板但我想要姑娘们。我把迪安弄醒了。“嘿，哥们，我在得克萨斯答应给你一个姑娘——好了，舒展舒展你的骨头醒醒，哥们，有姑娘在前头等着我们呢。”

“什么？什么？”他叫道，蹦了起来，疯狂地嚷嚷，“哪儿？哪儿？”

“这个男孩维克多会带我们去找。”

“好啊，去吧，去吧！”迪安连滚带爬出了车子，抓起维克多的手。加油站边上还有另外一帮男孩围着看热闹，咯咯地笑，他们当中有一半人光着脚，都戴着垮垮的草帽。“哥们，”迪安对我说，“这是一个打发下午时光的好方法，可比丹佛的台球厅凉快多了。维克多，你有姑娘？在哪儿？A donde? [注6](#)”他用西班牙语大喊大叫。“看看，萨尔，我正说着西班牙语呢。”

“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弄到一些大麻。嘿，小孩儿，你有大麻没有？”

那孩子认真地点点头。“没问题，随时随地，没问题，跟我来。”

“嘿！吼！呼！”迪安大喊。他醒透了，在墨西哥安静的街道上上蹿下跳。“大伙儿一起去啊！”我给大家分发“好运”香烟。他们在我们身上找到了许多乐子，特别是从迪安身上。他们扭头向彼此，用手掩成喇叭状，小声议论着那个疯狂的美国人。“看看他们，萨尔，这么聊着我们。哦我的天，这是个什么世道！”维克多上了我们的车子，然后我们一起扬长而去。斯坦·谢泼哈德本来睡得很沉，这会儿也被喧闹声吵醒了。

我们开到了镇子另外一头的沙漠，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路，车子前所未有地颠簸。前方就是维克多家的房子。它坐落在一些仙人掌周边，掩映在几棵树木下，不过是一些饼干盒子似的房子。院子里有几个闲人待在那里。“那都是谁？”迪安叫喊着，兴奋不已。

“那是我的哥哥们。我妈也在，姐姐也在。那是我的家人。我结婚了，我住在城里。”

“你妈妈怎么样？”迪安有点怂了。“她会怎么说大麻？”

“哦，她帮我弄大麻。”我们在车里等的时候，维克多下了车，慢慢走到房子那边，跟那个老太太说了几句话，她很快跑开了，跑到后边的园子里，开始收集晒干了的的大麻叶，那是早先从植株上摘下来，在沙漠的烈日下暴晒的大麻叶子。与此同时，维克多的兄弟们在树下呵呵笑。他们想过来跟我们碰

面，但是从那边走过来得好一会儿。维克多回来了，甜蜜地微笑着。

“天，”迪安说，“那个维克多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可爱、最靠谱、最神奇的短尾巴小猫仔儿，你看看他，看他慢腾腾地走过来的样子。在这里没必要着急忙慌。”一小股稳定的小风，从沙漠那边吹进车里。天气真是挺热的。

“你看看有多热？”维克多说，他跟迪安一起坐在前排，指着福特车冒烟的前盖。“有了大麻，你很快就不热了。你等着。”

“是的，”迪安说，扶了扶自己的墨镜，“我等着。当然了，维克多好小子。”

很快地，维克多高个子的弟弟，捧着上面放着大麻叶子的一张报纸走了过来。他把报纸摊在维克多的膝盖上，然后靠在车门边上，点着头，微笑地看着我们，说：“你们好。”迪安点着头，开心地向他笑，没人说话，一切都很好。维克多开始卷一个所有人从未见过的、史上最大根的大麻烟，他（用棕色纸袋纸）卷出来一根巨大无朋的皇冠牌雪茄一样的大麻烟。太大了，迪安死死地盯住它，眼珠子暴凸。维克多施施然点燃了它，在众人当中传递。抽这么大一根玩意儿感觉就像凑近了烟囱边，使劲吸烟。它冲向你的喉咙，就像是一大股热气。我们所有人同时屏住呼吸，并同时吐出了一大口气。瞬间，我们都嗨了。汗水凝结在我们的前额，我们就像是在海滨的阿卡普尔科。我从汽车后窗望出去，维克多另外一个最奇怪的兄弟——

一个斜挎着肩上的带子的秘鲁印第安人——斜靠在灯柱上，他过于害羞，没过来跟我们握手。看起来我们的汽车像是被维克多的弟兄们围住了，另外一个又从迪安那一侧出现了。而后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变得那么嗨，一切的繁文缛节都省掉了，大家把注意力直接放在最感兴趣的事情上头，现在就是一幅古怪的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在沙漠里，厮混在一起叽叽喳喳的场景，更为奇怪的是看清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些挨得很近的面孔，皮肤上的毛孔，手指头上的茧子和羞怯的颧骨。于是那些印第安兄弟也开始小声议论我们。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观察，衡量，比较，交流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或者纠正，或者修订，“是的，没错”，当迪安、斯坦和我同时在使用英语八卦他们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知道那个一直没从电线杆子那儿移动一步的兄弟，是怎么回事儿？脸上一直带着羞涩腼腆的笑容。还有站在我左边的这个，年长一些的，比较自信一些但是很忧伤的样子，看着打不起精神来，甚至有点儿像个城里的流浪汉，而他的兄弟维克多已经是个结了婚的体面人——他可真像他妈的埃及法老，你们也看得出来。这帮家伙真给力。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事情。而且他们在谈论我们，对吧？就像我们对他们一样，但是他们肯定有所不同，他们感兴趣的没准儿是我们的衣着打扮——跟我们差不多，事实上——奇怪的事情也许是我们车里的样子，而且我们笑起来的样子跟他们大相径庭，甚至我们闻起来跟他们也不一样。无论如何，我都愿意付出一切来知道他们在怎么议论我们。”而后迪安试了。“嗨，维克多，哥们，你的兄弟们这会儿在说什么？”

维克多用他棕色的忧伤的眼睛看着迪安。“是啊，是啊。”

“不，你没懂我说的话。你的兄弟们在聊啥？”

“哦，”维克多大惑不解地继续说，“你不喜欢这种大麻？”

“哦，喜欢，挺好的！你们在聊啥？”

“说的？是的，我们在说——你喜欢墨西哥吗？”不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流起来真费劲。而后所有人恢复了安静，平静下来，但是依然兴奋，只是享受着沙漠吹来的微风，各自思考着各自国家的、种族的和个人的千古难题。

到了该去找姑娘的时候了。维克多的兄弟们撤回到了他们各自的树下，妈妈从她阳光灿烂的通道那儿向这里张望着，我们慢慢折腾回镇上去。

而今，颠簸的车况不再是不舒适的感觉了；它像是在最舒适、最优雅的波涛中的旅行，穿过蔚蓝色的大洋，迪安的脸上泛出了不同寻常的金色光芒，他一路给我们介绍着车上的减震弹簧，头一回我们享受着车子的颠簸，连维克多都像是明白了，在开怀大笑。而后他向左指着路，给我们指往哪条路可以找到姑娘，迪安向左边张望，带着无法形容的欢乐，整个身体倾斜过去，扭转方向盘，带着我们轻松而又明确地向着目的地行进，与此同时，听着维克多信口开河地说天道地。“是的，当然了！在我脑子里这是确定无疑的！确定无疑！哥们！哦，

毫无差错！什么，确实，确定，你都说到我心坎儿里去了！当然了！是的！请继续走！”对此，维克多以自己准确无误的西班牙语给予回答。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想着迪安能够理解所有他说的话，不仅仅靠着狂野的洞察力和瞬间而来的天才直觉，还因为他在狂喜中不可思议的灵光闪现。在那一刻，他看起来有多么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我那飘浮不定的眼神和起起落落的脑回路产生了某种错觉——于是我在座位上打起了精神，而且兴奋不已。在无数道刺眼的、来自天国的光线当中，我努力辨认着迪安的轮廓，他看起来就像是上帝本人。我过于兴奋，不得不把自己紧贴在座位上；车子的上下颠簸让我越发感到激动。我罕有想起来看看窗外的墨西哥的念头——它现在在我脑海中已经是别的什么东西了——像是在某种闪亮的、不知道里边是什么的百宝箱跟前感到畏惧，因为你的眼睛看着它的时候，它们却向后退缩，因为其中的财富与宝藏太多太多了，你无法一览无遗。我咽了下口水。我看到黄金般的河流流淌过天际，流淌过破破烂烂的老爷车的车顶，穿过我的眼球，并钻了进去，它无所不在。我向窗外看那酷热、阳光灿烂的街道，看到一个门洞里站着的一个女人，我想她正听着我们说的每句话并暗自点头——这是大麻产生的常见的偏执幻觉。但黄金之河还在继续。有那么一阵子，我失去了意识，直到后来，我从火与沉默当中醒来，就像是从睡梦中醒来，从空无中回到梦境之中，然后他们告诉我，我们已经在维克多家，他已经把自己的儿子抱到车门边上，让我们看。

“你看到我的宝宝没有？他叫佩雷斯，他六个月大。”

“啊，”迪安说，他的脸因为极度的兴奋甚至狂喜闪闪发光，“他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看看这双眼睛，现在，萨尔和斯坦，”他说，严肃而又柔和地转向我们，“我想让你们特别留意下这个墨西哥小孩子的眼睛，我们特棒的朋友维克多的儿子，你们要留意到这么一双眼睛会像一扇窗户一样，贯穿到他的成人时代，这么可爱的一双眼睛，确实预示着最最可爱的灵魂的存在。”这是一段精彩的演说。这是一个漂亮的孩子。维克多忧郁地低头看着他的小天使。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拥有那么一个小儿子。也许是我们对于那个孩子的灵魂太过专注了，他感觉到了什么，一撇嘴就开始哇哇大哭，那时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莫名的悲伤，我们无法触碰到的悲伤，因为它来自无穷无尽的神秘感和久远之前的时间。我们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维克多抚摸着他的脖子，摇晃着他，迪安哄着他，我伸出手去轻轻地拍打着孩子的小胳膊。他越发哭得响亮了。“哈，”迪安说，“我实在觉得很抱歉，维克多，我们把他弄得不开心了。”

“他不是不开心，小宝宝总是要哭的。”在维克多背后的门洞里，站着他那因为过于害羞而不敢出来、光着脚的小妻子，热烈地渴望着她的宝宝能够重新回到她棕色的、柔软的臂弯。维克多给我们看完孩子后，爬回了车里，骄傲地指示我们转向右边。

“好的，”迪安说，开动了车子，向着窄小的阿尔及利亚街道开去，沿途有很多面孔从各个方向看着我们，带着和善的好奇神态。我们去了妓院，那是一座在耀眼的阳光下辉煌壮观

的建筑物。向着妓院开的两个窗台边上，斜靠着两个警察，穿着阔腿裤，慵懒而又烦闷，我们走进的时候，他们懒洋洋地看了我们一眼，接下来的整整三个小时，我们就那么在他们的鼻子底下狂欢，当我们黄昏时分出来时，在维克多的示意下，我们象征性的给了他们每个人二十四美分，仅仅是做做样子。

在那儿我们见到了姑娘们。她们当中有些人歪在跳舞的地板上的沙发里头，有些人在右边的长吧台那边小酌。中间一道拱门通向一间小棚屋，看起来就像是你在公共海滩浴场放你的游泳衣的房间。那些棚屋都沐浴在院落阳光之下。经理站在吧台后面，一个年轻的家伙，一听到我们想听曼波音乐，立马跑出去，过了一会儿抱回来一大堆唱片，大部分都是佩雷斯·普拉多的，把它们放在扬声器之上。瞬间，整个格雷戈里亚镇上都弥漫了繁荣时代的乐音。到处都是音乐声——这才是使用自动点唱机的正确方法，它本来是为了这么使用才发明的——一时间，它的声量如此巨大，甚至震惊了迪安、斯坦和我，因为我们从未敢按着自己的愿望那么喧嚣地播放音乐，而这正是我们梦中的音量。声音直接向我们冲击而来。几分钟之后，一半儿的小镇居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美国人和姑娘们跳舞。他们全都站着，跟警察们肩并肩，在脏兮兮的人行道上，慵懒而又不经意地斜靠着窗户。《更多的曼波简波》《曼波的查塔努加》《第九号曼波》——这些无穷无尽的乐曲舞动在金色、神秘的午后，正如你希望在世界末日和耶稣再临时听到的曲子一样。小号的声音如此嘹亮，我想他们在沙漠上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无论如何，小号就是在沙漠中诞生的。鼓声十分疯狂。曼波的节奏是来自刚果河畔的康加舞的节奏，那时属于非洲，也

是属于世界的河流，因此也正是世界的节奏。哦嘛——嗒，嗒——坡——啾——哦嘛——嗒，嗒——坡——啾。钢琴奏出的即兴应答如雨倾盆从喇叭泻到我们头顶。为首那个唱歌的人就像是在空气中大喘气。最终的小号合奏来自康加鼓、小手鼓，在那张查塔努加唱片里头，迪安有那么一会儿无所适从，直到他开始发抖和冒汗；当小号的声音刺破昏昏沉沉的空气，如同空谷或岩洞颤抖的回音，他的眼睛变得溜圆，如同看到魔鬼一般，然后又紧紧地闭上。我自己也像提线木偶一样被晃动着；我听到小号的声音在震动着我所见到的光线，我忍不住发起抖来。

在激烈的“曼波简波”音乐当中，我们开始疯狂地和女孩们跳舞。在极度的狂放不羁中，我们也开始觉察到她们不同的个性。她们都是了不起的女孩们，很奇怪的是，其中最狂野的一位有一半儿印第安血统，一半白人血统。来自委内瑞拉，只有十八岁。她看着像来自一个不错的家庭。她为什么来墨西哥做妓女，有那么好看的脸蛋，那么美好的容颜，上帝才知道。应该是一些糟糕的悲伤促使她这么做。她喝得很猛。即使似乎不能再喝了，她还是一杯接一杯仰头灌酒，这也像是为了让我们尽量多地花钱。炎热的午后，她穿着薄薄的浴袍，和迪安一起痛饮，她勾住他的脖子，不停地提要求。迪安已经喝得烂醉，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先要姑娘还是先要曼波音乐。他们跑去更衣室躲了起来。我被一个胖乎乎的、带着一只小狗的女孩给纠缠上了，那小狗让我不爽，因为它总想咬我。她做出了妥协，把它弄到后头去了，但是等她回来时，我被另外一个女孩给纠缠上了，好看一点儿，但也不是最好的，她像一条水蛭一样绕住我的脖子，我想方设法想要摆脱她，去找厅对面的

一个黑姑娘，她正沮丧地坐在那儿，透过她衬衫模样的上衣，查看她自己的肚脐眼儿。可我没摆脱掉。斯坦跟一个杏色皮肤的、十五岁的女孩在一起，穿着那种上边和下边的纽扣都各扣了一半的衣服。真够疯狂的。一个不错的二十来岁的男子正歪在那扇窗边，朝里望。

过了一会儿，那个黑姑娘的妈妈——她没有多黑，只是肤色深一些罢了——满面愁容地跑过来，哀怨地跟女儿说了一会儿话。我看到这个场景之后，羞愧难当，放弃了去泡那个女孩的想法。我让那只水蛭把我弄到后头去，在那里，像做梦一样，在屋里那些音箱巨大的声浪中，我们在床上折腾了半个小时。那只是个用木板搭起来的四方形的房子，没有天花板，一个角上有个圣像，另外一个角上有洗脸盆。在幽暗的大厅当中，传来一些女孩的叫喊声：“水，热水！”她们用西班牙语说的。我找不着斯坦和迪安。我那个女孩管我要了三十比索，相当于三个半美元，还跟我另外要了十个比索，为此絮絮叨叨说了半天。我不知道墨西哥钱到底价值几何，我只知道自己好像是有上百万比索。我把钱朝她身上丢。我们回去跳舞。街上看热闹的人群更多了。警察们看起来像平日一样无聊。迪安漂亮的委内瑞拉姑娘把我拖过一道门，进入了另外一个奇怪的酒吧，显然这酒吧也属于妓院。在这儿有个侍者正在一边说话，一边擦拭杯子，一个留着八字胡子的老头儿坐在那里，正认认真真地聊着什么。这里的音响也播放着喧闹的曼波音乐。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喧嚣。委内瑞拉女孩搂住我的脖子，乞求我买酒给她喝。那位侍者不肯给她。她反复地哀求，侍者给她酒的时候，她却把酒泼在了地上，这次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从她低落

的眼神里看到了沮丧。“没事儿的，宝贝。”我跟她说。我不得不一直扶着她，她不停地滑下来。我从未见过一个喝得如此烂醉如泥的女孩，而且她才十八岁。我又给她买了一杯酒，她拉着我的裤子让我发发慈悲。她又一饮而尽。我没胆子去搞她。我想要的姑娘大概已经三十岁了，能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委内瑞拉姑娘在我怀里翻来转去，我想把她弄到后面，脱光她的衣服，但是只是和她聊聊天——我对自己这么说。我对她，还有那位小黑姑娘，充满了欲望。

可怜的维克多，在此期间，他一直站在酒吧的黄铜踏脚上，背靠着吧台，在那儿上蹿下跳，开开心心地看着他三个美国朋友寻欢作乐。我们给他买了饮料。他看到女人眼睛也亮了，但谁也不要，因为要忠诚于他的妻子。迪安把钱扔给他，在这所有的疯狂当中，我有机会看到迪安疯到了什么程度。当我盯着他的脸看的时候，他居然没认出我是谁。“耶！耶！”这是他所说的一切。看起来这一切都是没完没了的。这像是一个漫长而又荒诞不经的阿拉伯式的梦，在另外一次生命在另外一个下午发生——阿里巴巴、小径和宫女们。我又带上我的姑娘冲到她的房间里去；迪安和斯坦交换了他们之前的女孩；我们火速消失了，外边那些看热闹的只好等着好戏继续下去。这个下午变得又漫长又冷清。

很快地，又老又破的格雷戈里亚的神秘的夜晚即将来临。曼波音乐一刻也不肯停歇。像是丛林中永无止境的旅行。我无法把自己的眼光从那个黑姑娘脸上移开，她看起来就像个皇后，她在边上走动，任由阴郁的酒吧侍者使唤，让她时而给我

们拿喝的，时而干一些别的清洁活儿。在那些女孩当中，她似乎应该是最需要钱的，也许她妈妈早先跑来是跟她要钱，好养活年幼的弟弟妹妹。墨西哥人很穷的。我没能直接去找她，给她一点儿钱。我感觉她接过钱的同时会带着某种程度的轻蔑，那种来自她的轻蔑会让我退缩不前。在最后那几个小时之内，我确实确实发了疯似地爱上了她。我脑海中确实产生了和恋爱一般地无可辩驳的疼痛和刺疼，一样的叹息，一样的痛苦，还有一样的害怕和恐惧靠近对方。奇怪的是，迪安和斯坦也无法靠近她。她不容置疑的尊严感让她穷困，在那么一家放荡的妓院，想想吧。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迪安像个雕像一样靠近她，像是随时打算扑向她，但是当她冷冷地看着他，他又怂了，她看着他手足无措，他停止摩挲他的肚皮，哑口无言，最后低下了头。因为她是女王。

现在，维克多突然使劲儿地抓着我们的胳膊，并做着各种手势。

“怎么了？”他费尽心思让我们明白。而后他跑到吧台，从侍者手里抓过账单，不顾对方冲着他愁眉苦脸的，给了我们看。这张账单超过了三百比索，大概三十六美元，在任何妓院都是一大笔开销。我们无力挣脱，我们还不想走，即便我们都走远了，我们还是想跟我们的女孩们厮混在一起，在我们艰苦卓绝的在路上之后，沉迷于这奇怪的阿拉伯的伊甸园内。但是夜晚来临了，我们还得继续走到终点。迪安发觉了这一点，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打算直接落跑，最后我也提出了一走了之的想法。“前面还有好多呢，朋友现在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错儿！”迪安喊道，他目光呆滞，扭头看看他的委内瑞拉女友。她终于彻底醉倒了，躺在一张木椅子上，从真丝裤子下面露出她雪白的大腿。那些围在窗外的人乘机看了个够。他们身后，暮色渐渐降落，我听到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婴儿的哭啼声，提醒我毕竟是在墨西哥，不是在大麻导致的天堂幻梦之中。

我们歪歪倒倒地出了门，我们忘了斯坦，我们试着找回他，发现他正魅力十足地向那些刚来上晚班的妓女们鞠躬问候。他想要从头开始。当他喝多了，他踉踉跄跄得犹如一个身高十英尺的人，而且当他喝多了，他压根没法从女人们那儿脱身。女人们总是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他坚持要留下来，试一些更新、更奇怪的、更能耐的女人。迪安和我狠狠地敲打他的后背，把他拖了出来。他对所有人挥手说再见——姑娘们，警察们，围观群众，外边街上的小孩们。他向四面八方抛飞吻，在格雷戈利亚人的欢呼声中，从人群中蹒跚走出，他试图向他们说话，想要把他在今天下午感受到的欢乐与爱传达出来。所有人都在哄堂大笑。有些人拍着他的背。迪安冲了过去，给了那警察四个比索，跟他们握手，咯咯大笑，向他们鞠躬致敬。而后他跳上了车子，那些我们已经认识的姑娘们，包括那个被人喊起来跟我们告别的委内瑞拉姑娘，围拢在车子边上，穿着她们轻薄无比的衣服，向我们道别，亲吻我们，那个委内瑞拉姑娘甚至开始抽泣——即便不是为了我们，我们知道，不是全然为了我们，但也足够了，足够好了。我那深色皮肤的小爱人儿消失在屋里黑漆漆的阴影中。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出发了，将好几百比索换来的欢乐和祝福抛诸脑后，这一天感觉还不

错。隐隐约约的曼波音乐跟了我们好几个街区。一切都结束了。“再见，格雷戈里亚！”迪安喊道，向它抛了个飞吻。

维克多为他自己感到自豪，也为我们感到自豪。“现在你想洗个澡吗？”他问。是的，我们所有人都想好好洗个澡。

他带着我们去了一个世上最奇怪的地方：那是一个常见的美国式的澡堂子，就在镇外一英里的地方，高速路边上，一大票孩子在外边的泳池嬉戏，里边是个可以洗澡的石头房子，只消花几分钱就可以洗个澡，从管理员那里领来肥皂和毛巾。那也是悲催的儿童乐园，有秋千和一台坏掉了的旋转木马，在夕阳当中显出了异样的美感。斯坦和我拿上毛巾，直接进入冰冷的浴室内，出来的时候焕然一新。迪安不乐意洗澡，我们看到他远远地绕着悲催的公园行走，挽着善良的维克多的胳膊，热火朝天、兴致勃勃地聊着天，甚至兴奋地歪向他好切磋一个问题，捶打着自己的手心。而后他们恢复到手挽手的状态，继续溜达。跟维克多说再见的时候到了，所以迪安抓紧时机和他单独待在一起，逛逛公园，了解他对于万事万物的一般看法，这是迪安最喜欢做的事情了。

维克多看起来十分伤感，因为我们就要走了。“你们会回来格雷戈里亚，看我吗？”

“当然了，哥们！”迪安说。他甚至承诺要带着维克多回美国，如果他想的话。维克多说他得好好琢磨一下这件事。

“我有老婆孩子——没钱——我知道。”当我们在车中向他挥手告别的时候，他甜美和蔼的脸蛋在夕阳中被映红了。在他身后，是那悲伤的公园和那些孩子们。

[注6](#) 西班牙语，意为：在哪儿？

6

刚出格雷戈里亚，路面就开始下沉，高大的树立在两边，在渐渐暗下来的树影里，我们听到了数以亿万计的昆虫的鸣叫声，它们聚合在一起，像是没完没了的高声尖叫。“喔！”迪安说，他试图打开前灯，但是不管用。“什么！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儿？”他击打着跟前的仪表盘。“哦，天，我们不得不黑灯瞎火地穿过这片黑森林，想想得有多可怕，只有当对面有车开过来，我才能看到路，但是这会儿一辆车也没有！没有灯光怎么行？哦，我们该怎么办，该死的？”

“我们只管开车，也许我们应该返回去？”

“不，绝不，绝对不行！我们继续走。我勉强看得到一点路。我们能行的。”现在，我们浸淫于黑魑魑的环境当中，穿过虫子的鸣叫，而一股巨大的、排山倒海式的、酸朽的味道迎面而来，我们想起并且分辨出地图上标明了，一旦过了格雷戈

里亚，就是北回归线的开始。“我们进入了北回归线以南，怪不得会有这些味道！闻闻！”我把脑袋探出车窗，虫子猛地打在我脸上；当我竖起耳朵想要听一听风声的时候，只听得一阵群虫的噪音。突然，我们的车灯又好了，光线照着前方，照亮了在两侧数以百英尺高、铜墙铁壁般纠缠的林子当中那条孤独的路。

“狗娘养的！”斯坦在后座上喊道。“该死的！”他还是那么嗨。我们突然意识到他还在一个很嗨的状态里面，因为丛林和艰难困苦对于他欢乐的灵魂都是不在话下的。我们开始大笑，所有人。

“去他妈的吧！我们今晚就把自己扔在这该死的丛林当中，我们就睡在那里今晚，开路吧！”迪安嘶喊着。“老斯坦是对的。老斯坦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被那些女的、大麻和那些这个世上最无与伦比的疯狂的曼波音乐搞得魂不守舍，那些音乐太燥了，我现在耳膜还在扑通扑通跳——唔！他太嗨了，他知道他在干吗！”我们脱下各自的T恤，一头扎进丛林，赤膊上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啥也没有，迷失的丛林，连绵不绝，海拔一路下降，越来越热，虫子们越来越喧嚣，植物长得越来越高，气味越来越浓烈，直到我们开始适应了，喜欢上了它们。“我只想脱光了，在林子里滚来滚去，”迪安说，“没错，妈的，等我找到一处好地方就那么干！”突然之间，利蒙出现在我们眼前，一个丛林当中的镇子，一点儿褐色的灯光，深重的阴影，头顶上无边无际的天空，一大票人拥簇在木板棚屋跟前——一个热带的十字路口。

我们在难以言喻的柔和气氛中停下了车子。那儿就像烤箱里边一样热，正如新奥尔良六月的夜晚。整条街上，一家家男女老少在黑暗中三三两两地站着，聊着天；偶尔有个把女孩路过，但是都非常的年幼，直顾着好奇地看着我们的样子。她们大都光着脚，脏兮兮的。我们斜靠在一家破破烂烂的小卖店的木质走廊上，面粉堆积如山，新鲜的菠萝在货架上开始腐烂，引来不少苍蝇，这里只有一盏油灯，外边还有一些昏黄的灯光，其余的地方，一片漆黑，漆黑，漆黑。我们现在当然精疲力竭，必须快点儿睡着，我们把车子从土路上挪开好几码，挪到镇子后段。天气热得不可思议，简直没办法睡着。于是迪安拿出一条毯子，就着柔软、炎热的路上的沙地铺好，而后躺下。斯坦躺在前排，将福特车两侧的车门打开，想要有点儿风，但是一丝风也没有。我，坐在后座上，汗如雨下。我下了车，踉踉跄跄地站在黑暗之中。整个镇子瞬间进入了梦境；现在唯一的动静就是狗叫。我怎么能睡得着呢？成千上万的蚊子咬着我们的胸、胳膊和脚踝。而后我脑子里灵光一闪：我爬到车顶的铁皮上，仰面朝天躺下。依旧没有一丝风，但是铁皮能够导热，把我背上的汗烘干了，使得数以千计的虫子的尸体一块一块粘在我的皮肤上。躺在车顶上，面朝着黑乎乎的天空，如同夏夜躺在一只封闭的行李箱里。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天气并不是某种触碰我、抚慰我、让我冻僵或者汗津津的东西，而变成了我。空气和我变成了一体。轻柔的虫子们的羽翅轻柔地在我脸上扫过，当我睡着的时候，它们感觉十分愉悦而柔软。天空中一颗星子儿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十分沉重。我可以整夜躺在那里，让我的脸朝着天空，它们对我除了盖上一幅天鹅绒的帷幕之外，毫无害处。死去的虫子们和我的血混在

一起；活着的又来捣乱，我开始感到浑身痒痛，闻到丛林腐烂、炎热、朽坏的味道，从头发和脸到脚和脚趾头。当然了，我光着脚。为了减少流汗，我穿上了遍布虫子的T恤，重新躺下。一块黑影在略黑的路上，那是迪安睡觉之处。我能听到他的鼾声，斯坦也在打鼾。

偶尔地，一丝灯光在镇子里亮起，那是地方治安官打着自己弱弱的手电筒一边在巡视，一边在丛林的夜晚中喃喃自语。而后我看到他的手电筒光柱向着我们移动，听到他落在沙地和草地上轻柔的脚步声。他停了下来，照亮了车子，我坐了起来，看着他。他用某种颤抖的、几乎是哀怨的、绝对轻柔的声音说：“Dormiendo? [注7](#)”指着正躺在地上的迪安，我知道这指的是“睡觉”。

“Si, dormiendo. [注8](#)”

“Bueno, bueno. [注9](#)”他对自己说着，一边不情愿而又哀伤地离去了，继续他那孤寂的巡逻路线。这么可爱的警察，美利坚从未有过。没有怀疑，没有质问，没有打扰：他是这个睡梦中的小镇的看守者。

我回到我的铁皮床上，伸开双臂躺了下去。我甚至不知道是树枝还是开阔的天空径直在我头顶，但也没什么两样了。我张开嘴巴，使劲地吸入几口热带丛林的空气。那不是空气，绝非空气，而是树林和沼泽散发出来的触手可及的、鲜活的气息。我保持着清醒。草丛里某处有只公鸡开始报晓。依然没有空气，没有微风，没有露水，只有北回归线一样沉重的力量将

我们死死地钉在地上，那是令我们感到激动的归属之地。天还没有亮的意思。突然，我听到黑暗中有狗开始狂叫。而后我又听到了隐隐约约的马蹄声。它越来越近。这是怎样一个疯狂的骑手？而后我看到了本尊：一只野马，白如幽灵，直接冲着迪安奔来。在它身后，一群狗吠叫着、奔跑着。我甚至看不清楚它们，它们都是脏兮兮的丛林老狗，但是那匹马洁白如雪，迅捷无双，几乎发散着磷光，很容易看到。我不为迪安感到惊慌。那匹马看到了他，正好从他脑袋边上踩了过去，像跨过一艘船一样跨过了车子，轻柔地叫了一声，而后继续穿过了整个镇子，在群狗的追逐之下，嘚嘚地冲向丛林的另外一头，我听到的仅仅是丛林中渐渐消逝的、轻微的马蹄声。狗群消停了，开始舔自己。这匹马是怎么来的？怎样的传奇和幽灵，怎样的圣灵？迪安醒来后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认为我在发梦。而后他自己也迷迷糊糊地想起梦到了一匹马，然后我告诉他这不是梦。斯坦·谢泼斯坦慢慢醒来了。我们略微动一动又是一身大汗。天色依然黑漆漆的。“我们启动车子，吹点儿风吧。”我喊道。“我要热死了。”

“没错！”我们风驰电掣地驶离镇子，而后疯狂地上了高速，我们的头发在风中飞扬。天色很快变亮了，露出了道路两侧众多的沼泽，高大的、缠绕着的树木向下低垂。我们沿着铁路主干道开了一会儿。前方出现了曼特城怪模怪样的无线电天线。我们抵达了内布拉斯加。我们发现了一家加油站，开始给油箱加油，与此同时，最后一群丛林夜间的虫子如期而至，它们黑压压的聚集在灯泡上，一大批一大批地落在我们脚下，它们当中有的翅膀得有四英寸长，有的恐怖的蜻蜓看着简直可以

吞下一只鸟，还有成千上万、嗡嗡乱叫的巨大的蚊子，以及难以计数的各种各样蜘蛛一样的昆虫。我在人行道上跳来跳去，想躲开它们。我最终只好躲到车里，将两只手抱住脚丫子，恐惧地看着车轮子周边的那些虫子。“走吧！”我叫道。迪安和斯坦对虫子们坦然受之；他们镇定地喝下了两瓶橙汁儿，把它们从水冷却器跟前踢开。他们的衬衫和裤子，跟我的一样，也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成千上万死去的虫子的血迹。我们深深吸气，闻着自己的衣服。

“你知道吗？我开始喜欢这气味了，”斯坦说。“我已经闻不到我自己的气味了。”

“这是一种奇怪的，好闻的气味，”迪安说，“不到墨西哥城，我绝不换掉自己的T恤，我要一路带着它们，记住它们。”我们再度启程，让流动的空气吹着我们滚烫的、皮肤板结一样的脸。

突然眼前出现了山脉，全是绿的。经过这次攀爬，我们能够进入大平原，准备好了去墨西哥城。很快地，我们攀爬到五千英尺的高处，穿过了雾霭茫茫的山口，往下看，一英里之下就是那条泛黄的河流。那就是伟大的莫科特苏马河。这一路上的印第安人显得非常古怪，他们自成一体，山地印第安人，除了泛美高速这条通道之外，他们完全与世隔绝。他们矮小，敦实，黝黑，牙口很差；总是背着沉重的东西在后背上。穿过布满植物的巨大沟壑，我们看到了一些拼图一样的农田，在陡峭的山地之间。他们在这些山地之间上上下下，在干着农活儿。迪安以每小时五迈的车速慢慢开着车，观看着他们。“喔，我

从未想过有这种状况。”上到最高处，是如同落基山脉一样伟岸的山峰，我们看到那里种着香蕉，迪安下了车，一边到处指指点点，一边用手摩挲着自己的肚皮。我们正站在一处悬崖边上，悬崖上盖了一座小茅草房，犹如盖在世界之巅。太阳在莫科特苏马河上形成了黄金般的雾霭，此时，这条河离我们已经不止一英里了。

在一座茅屋门前的院子里，一个约莫三岁的印第安小女孩，指头含在嘴巴里，用她那双褐色的大眼睛看着我们。“她也许这辈子都没见过谁把车停在她家门口！”迪安喘着气说。“哈啰，小姑娘，你好吗？你喜欢我们吗？”那个小姑娘害羞地扭开了头，并撅起了小嘴。当我们开始聊天时，她又把指头含在嘴里，继续观察我们。“哎，我真希望我有点儿什么能给她的！想想看，在这悬崖边生下来，活下去——这里代表了她所知的一切生活。她老爸也许把绳索垂到底下的沟壑那边，把他储藏的菠萝从岩洞里取出来，或者在陡峭如八十度角的山脊上砍柴，底下深不见底。她将永远不能，永远不能离开这儿，知道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情况。这是个族群，想想他们一定会有的狂野的酋长！他们说不定远离这条主干道，在另外一个悬崖边上，离这里好几英里远，肯定更加狂野和奇怪，因为泛美高速也许让这条路边的族群还文明化了一些。留意她额头上的汗，”迪安指着她，有些痛苦地说。“这不是我们流的那种汗，它油渍渍的，它总在那儿因为一年四季这里都无比炎热，她不知道不出汗是种什么情形，她生而出汗，死而出汗。”她小小额头上的汗珠，沉重，凝滞；它不流动；它只是在那儿，像橄榄油一样闪闪发亮。“这必然影响他们的灵魂！

他们各自关注的事情，价值系统和期待必然因此而各个不同。”一路上，迪安惊叹得嘴都合不拢，以十迈的时速开着车子，他无比渴盼看到在路上的这些人。我们攀爬着，攀爬着。

当我们攀爬着的时候，空气渐渐变凉，走在路上的印第安女孩拿披巾裹住她们的脑袋和肩膀。她们使劲儿地向我们吆喝，我们停下来看看怎么回事。她们想卖给我们一些碎小的岩石水晶。她们用那些棕色的、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我们，充满了来自灵魂的真实，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她们产生情欲的邪念。再加上她们确实非常小，她们当中有些人不过十一岁，但是看起来像是三十了。“看看那些眼睛！”迪安深呼吸。她们正如圣母玛利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从中看到了基督耶稣温柔宽恕的眼神。她们无所畏惧地直视着我们的眼睛。我们揉搓着自己不安的蓝色眼睛，才敢看回去。当她们开始开口说话的时候，她们变得充满了热情，并且近乎愚蠢。当她们闭上嘴，她们又恢复了故我。“她们也就最近才学会了卖水晶，既然高速路也不过是近十年来才修好的——在那之前，整个族群一定寂然无声。”

那些女孩们聚拢在车子周边。一位女孩特别热情地抓住迪安的胳膊。她用印第安语恳求着他。“啊是的，啊是的，亲爱的，”迪安温柔而又接近于忧伤地说。他下了车，在后备箱的衣箱里寻摸了一番——同样是那只苦难深重的美式衣箱——而后拿出了一只腕表。他把它给那些孩子看。她欣喜若狂，几近抽泣。其他人带着惊讶围了上来，而后迪安从那位小女孩手里找到了一只“她特地从山上帮我找到的最甜蜜、最纯洁、最小

的水晶。”他找到的那只还没一颗莓子大。他给了她那只腕表。她们的嘴张得圆圆的，好像合唱队的孩子们的嘴。那位幸运的小女孩把腕表紧紧地按在她的破破烂烂的衣服前襟内。她们摩挲着迪安，向他致谢。他站在她们当中，历经沧桑的脸朝着天空，看着下一个也是最高、最后的山口，看着就像是来到她们中间的先知。他回到车上。她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离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我们驾车驶向一条笔直的山道时，她们招着手，跟在后面跑。我们拐了一个弯，再也看不到她们了，但她们还跟着我们在跑。“啊，这真是让我心碎！”迪安叫喊着，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她们这样的表白和忠诚会坚持多久！在她们身上会发生什么？她们会不会想要一直跟着车子去墨西哥城，如果我们开得足够慢？”

“会的，”我说，我深信不疑。

我们进入了东马德雷山那让人头昏目眩的高度。香蕉树在雾气中闪着金色光芒。浓烈的雾气从悬崖边的石头墙漫了过来。下方，莫科特苏马河在绿色的丛林垫子上就像一根细细的金线。奇妙的十字路口小镇在世界屋脊之上，纷纷向后退去，披挂着披巾的印第安人从帽檐下和披巾当中看着我们。生活凝滞、暗淡而又古老。他们看着迪安，后者正正经八百而又自以为是地开着车子，目光炯炯有神。所有人都伸出了手。他们从后山和高地来，伸出了自己的手，一位文明人能给他们一些什么，他们没想到这票人也是如此悲哀，如此穷困潦倒。他们不知道有颗炸弹已经从天而降，会炸毁我们所有的桥梁和道路，将它们毁于一旦，而我们有朝一日会像他们一样赤贫，用一模

一样，一模一样的方法伸出我们的手。我们破破烂烂的福特，过去三十年代繁荣时期生产的美国福特车，唧唧歪歪地从他们当中穿行而过，消失在尘土飞扬的路上。

我们抵达了最后一片高原的边沿。现在太阳金光璀璨，天空蔚蓝，沙漠当中，除了它偶尔一见的小河之外，只有一片热气腾腾的沙地，以及突然出现的有年头的树荫。现在迪安睡着了，斯坦在开车。牧羊人出现了，身披他从来如此的飘逸的长袍子，妇女们扛着一捆捆金色的亚麻，男人们则是一些木板材。在金光璀璨的大漠当中，在巨大的树下，牧羊人们坐着闲聊，羊群在大太阳底下挤来挤去，折腾起了大片灰尘。“天哪，天哪，”我喊着迪安，“醒醒，醒醒，看看那些牧羊人，看看耶稣基督诞生的金色世界，你亲眼瞧瞧就知道了！”

他从自己的位置上抬起了脑袋，在落日的夕阳红当中向周边看了一圈儿，倒下又睡着了。当他醒来后，他向我描述了所有的细节，并说：“是的，哥们，我很高兴你喊我起来看了。哦，天父，我能干些什么呢？我要去哪里呢？”他摩挲着自己的肚子，眼睛红红地看着天空，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们旅途的终点即将来临。我们两侧蔓延着广袤的田野；美妙的风吹拂过偶尔一见的树林子，穿过一片旧豪宅，在最后的余晖中，将它们变成了鲑鱼肉般的粉红。那些云朵又近又大，扶摇直上。“傍晚就能抵达墨西哥城了！”我们成功了，统共一千九百英里的路途，从丹佛午后的院落到这世上最空旷的、古老的区域，现在我们即将抵达路程的最后一站。

“我们该不该把虫子T恤换下来？”

“不必，我们穿着它们进城吧，管他的！”我们开着车进入了墨西哥城。

过了一个简单的山坳，我们突然进入了能看到底下整个墨西哥城的高处，它在火山盆地当中展开，炊烟袅袅，城市入暮的灯光闪烁。我们向着谷底飞驰，到达起义者大街，而后直达城中心的改革大街。孩子们在空旷的空地上打橄榄球，扬起一层层灰尘。出租司机追上我们，一个劲儿地问我们现在要不要姑娘们。不，我们现在不需要姑娘们。一长溜破破烂烂的贫民窟棚屋在平原上延展；我们看到昏暗的小巷道里，人影幢幢。黑夜很快就要降临了。而后整个城市突然喧闹起来，突然间，我们经过了拥挤的咖啡馆与戏院，还有许多灯火。报童们向我们嘶喊。工人们懒洋洋地路过，光着脚，手里拿着扳手和破抹布。光着脚丫子的印第安司机在我们跟前横冲直撞，围拢着我们，乱按喇叭，造成了一片混乱的交通状况。这嘈杂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墨西哥的车辆不安装消音器。喇叭想按就按，吵个不停。“喔！”迪安喊道。“小心！”他在车阵当中穿梭，跟每个人玩耍。他像个印第安人一样开车。他在改革大街那儿兜圈子，四面八方都有车子向我们冲来，左边，右边，前面，后边，他又喊又叫兴奋极了。“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路况啊！所有人都在往前冲！”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美利坚的救护车拉响警报，在车阵当中穿行。印第安救护车在他们自己的街上以每小时八十迈的速度前行，每个人不得不躲避着它们，他们不为任何人、任何情况稍作停留，只是飞驰而过。我

们眼看着他们绝尘而去，在闹市之中，在喧嚣躁动的滚滚车流当中。司机都是印第安人。人们，甚至是老太太们，追着从不停下的公交车。年轻的墨西哥城商人互相打着赌，追赶着公交车，跳了上去。公交司机光着脚丫子，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疯狂极了，他们坐得很低，穿着T恤，方向盘又低又大。点着香的神像在他们跟前闪烁。车里的灯不是棕色的就是绿色的，黑漆漆的脸蛋在木质长凳上排成一排。

在暮色迷离的墨西哥城，成千上万个嬉皮士头戴草帽，光着膀子穿着长翻领的夹克，在主街道上溜达，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小巷子里卖十字架和大麻烟，也有些人跪在破败的小教堂跟前的地上，这些教堂紧挨着表演墨西哥当地戏剧的棚屋。有一些巷道铺着碎石子儿，下水道开敞着，有个小门通向橱柜那么大小的酒吧，那是在土墙上开挖出来的。你不得不跳过一条水沟去买酒喝，在那条水沟下面就是阿兹特湖泊的古迹所在。你从酒吧出来得紧紧地贴在墙上，慢慢地挪回街上。那些酒吧提供混合了朗姆酒和肉豆蔻的咖啡。到处都是曼波音乐。几百个妓女排成一列，站在暗淡无光的窄路上，她们忧郁的眼神在夜里看着我们。我们四处晃悠，既像一个幻觉又像身处梦境之中。我们在一家奇怪的墨西哥咖啡馆吃了非常不错的四十八美分一块的牛排，有一大堆马林巴琴师站在一只巨大的马林巴琴跟前——还有一些边走边唱的吉他手，一些老头儿站在角落里吹着小号。你追随着龙舌兰酒酸溜溜的味道就能找到酒馆；他们会给你一杯仙人掌汁，两美分。没有什么会停止下来，整个晚上街道生机勃勃。乞丐们从墙上撕下广告招贴，就那么裹着睡觉。还有些人一家子老小都坐在马路牙子上，吹吹小笛

子，整晚开开心心地聊天。他们光脚走路，点着不明亮的蜡烛，整个墨西哥像是一个不小的吉普赛营地。在一些角落里，老妇女们从一只煮熟的牛头上切割下来肉，把它包在玉米卷里，加上辣椒酱包在餐巾大小的报纸上，兜售给路人。这是最伟大的、最后的、未经驯化的、孩童般的大城市，我们早就知道我们最终会发现这么一个地方，在路途的终点。迪安一路走着，像僵尸一样将自己的两只胳膊垂在身体两侧，嘴巴张着，眼睛闪闪发光，带领我们成就了如此艰辛而又神圣的旅程，一直到天亮我们跟一个戴着草帽的男孩在田野上一路走，一路欢笑，一路闲聊，那男孩还想跟我们玩手球游戏，这类事情永无止境。

而后我发起了高烧，胡说八道，失去了知觉，患上痢疾。我在黑暗之中，带着自己迷迷糊糊的意识睁开眼睛，我知道自己躺在海拔八千英尺之上的床上，在世界屋脊，我知道我的整个一生当中，甚至好几世，我总是悲哀地被局限在自己的肉身之中，我有那么多的梦想。我看到迪安趴在厨房的桌子上，那是几个晚上之后的事情了，他已经打算随时离开墨西哥城。“你在干吗，哥们！”我嘟囔着。

“可怜的萨尔，可怜的萨尔，生病了。斯坦会照顾你的。现在听着，如果你还能在病中听得到的话：我在这里终于得到卡蜜尔的同意要离婚了，我今晚将开车返回纽约去找伊内兹，如果车子还扛得住的话。”

“从头再来一遍？”我大叫。

“从头再来一遍，好兄弟。我得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去。真希望我能留下来陪着你。祈祷我能回来吧。”我抚摸着自已抽搐中的肚子，呻吟着。当我再度抬起头时，迪安已经提着自己破旧的衣箱站在那里了，低头看着我。我已经不清楚他到底是谁了，他知道这点，满带同情地伸手帮我把毯子盖到肩膀上。“是的，是的，是的，我得走了现在，发烧中的老萨尔，再见了。”而后他就走了。我在十二个小时悲催的高烧之后，终于明白他走了。那会儿，他独自驾车穿行过山上的香蕉林，这次是夜里。

当我好了一些之后，我意识到他是怎样的一个混球，但我依旧不得不理解他那难以理喻的复杂生活，为什么他不得不离开我，病中的我，去处理他的两个老婆，那无穷尽的烦恼，“好吧，老迪安，我没什么可说的。”

[注7](#) 西班牙文，意为：睡觉。

[注8](#) 西班牙文，意为：是啊，睡觉。

[注9](#) 西班牙文，意为：好，好。

PART 5

1950 年 · 秋 *ON THE ROAD*

迪安从墨西哥城开车回去，在格雷戈里亚又跟维克多会面了，然后把那辆车一直开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湖，在那辆车的后半截如他所料断在路上之前。于是他给伊内兹发去电报，让她给自己机票钱，然后飞完了余下的路程。当他拿着离婚材料抵达纽约时，他和伊内兹立马去往纽瓦克结了婚。那天晚上，跟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担心，即便在莫名来临的烦恼面前，依然要保持理性，他跳上公交车，再次走上那条糟糕的横穿大陆的路途，回到旧金山，跟卡蜜尔和两个宝贝女儿团聚。于是现在他是结了三次婚，离了两次婚，跟他的第二任老婆住在一起。

秋天的时候，我自己开始从墨西哥城回家，有一天晚上，正好跨过拉雷多边境线，进入得克萨斯州的迪利，我正站在酷热的路边，在一盏被夏日的蛾子们撞击的弧光灯下头，这时，我听到了上面从黑暗中传来的脚步声，然后，一个高个子老头，白发飘飘，背着背包，他路过时一直看着我，他说：“去哀悼人们吧，”而后又步入黑暗之中。这是否意味着我应该重返美洲大陆，继续我漫无边际的漫游，在黑暗的大道上？我奋力赶赴纽约，有一天晚上，我正站在曼哈顿黑漆漆的路边，抬

头向着一个窗户喊叫，因为我以为我的朋友们在里面开派对。但一个漂亮的姑娘从那里伸出脑袋，说：“什么事？你是谁？”

“萨尔·帕拉迪斯，”我说，而后听到我的名字在悲哀而又空旷的街上回响。

“上来，”她喊道。“我在做热巧克力。”于是我上楼了，她就在那儿，一个有着纯净无邪的眼神的女孩，我一直追寻着的，我追寻了很长时间的。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对方。到了冬天，我们移居到了旧金山，用一辆破旧的厢式货车，将我们所有的破烂家当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带上。我给迪安写了信，告诉了他。他回了一封长达一万八千字的信，关于他在丹佛的青年时代，并说他会来找我，跟我一起挑选一辆旧卡车，带上我们回家。我们有六周时间可以省钱买那辆卡车，开始工作，算计每一分钱。当然了，迪安突然来了，提前了五个半星期，因此没人有足够的钱去履行计划。

半夜里我在散步，然后回去找我的姑娘，告诉她我在散步途中的所思所想。她诡异地站在黑暗中的小脚垫上笑着。我跟她说了好几件事情，突然感受到房间里一片静寂，我四处看了看，发现收音机上有一本破破烂烂的书。我知道那是迪安午后最喜欢的读物普鲁斯特。跟做梦一样，我看到他穿着袜子从黑暗的门厅走出来。他语不成句。他又蹦又跳，笑道拍手，说：“啊——哈——你得听我说。”我们听着他说，全神贯注。但他忘了自己要说什么。“好好听着——啊哼。看，亲爱的萨尔——可爱的劳拉——我来了——我走了——但等着——

啊，是的。”他用全部的悲哀神色盯着自己的手。“没法说了——你能明白吗——或者也许——但听着！”我们都听着，他听着半夜的动静。“是的！”他敬畏地喃喃自语。“但你看——不再需要说了——没必要了。”

“但你干吗这么快就来了，迪安？”

“哈，”他说，像初次见面一样看着我，“这么快，是的。我们——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不知道。我拿着铁道票来的——货车——旧硬座车——得克萨斯州——一路上吹着笛子，还有木头做的小鹅笛。”他拿出了他新的木笛。他吹了几个凌厉的高音，并穿着袜子蹦来蹦去。“看到没？”他说。“但是当然了，萨尔，我还可以像从前一样开始说话，告诉你很多事情，事实上，在这一路坐车过来的时间，我一直在读了又读这本普鲁斯特，穿过整个大陆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很多可以告诉你的东西，但我没时间跟你说。当然了，我们还没说墨西哥城，你发烧我们分开之后的情形——但没必要说了。现在绝对没有必要了，对吧？”

“好的，我们不说了。”而后他又开始絮叨他在洛杉矶做的一些事情，极尽详细罗列之能事，他怎么去一户人家做客，如何一起吃饭，跟那家的父亲聊天，儿子怎么回事儿，姐妹们怎么回事——他们看起来怎么样，他们吃什么，他们家里的家具，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兴趣，他们特别的灵魂。他花了三个小时描述这些细节，最后总结陈词：“哈，但你看，我真想告诉你的是一——回头聊更多的——阿肯色州，坐火车穿行过去——吹笛子——跟男孩们玩牌，我的色情扑克牌——赢了钱，

吹小鹅笛——给那些水手听。长达五天五夜的烦闷旅途，就为了来看你，萨尔。”

“卡蜜尔怎么样了？”

“当然达成一致了——等着我。卡蜜尔和我会白头到老的……”

“那伊内兹呢？”

“我一我一我想让她回到旧金山，住在镇子的另外一头——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随后，他突然充满惊喜地说：“好吧，是的，当然了，我想看看你可爱的姑娘和你——为你高兴——一如既往地爱你。”他在纽约待了三天，又急匆匆地带着他的铁路通票回去，穿过大陆，在尘埃弥漫的车厢和硬座车内坐了五天五夜，当然了，我们没钱买一辆卡车跟他一起回去。他花了一个晚上和伊内兹解释、发誓、干仗，我收到一封信，是写给迪安的，我看了内容，卡蜜尔寄的：“我看到你背着包穿过那些铁路的时候，心都要碎了，我祷告着祷告着你能平安回来……我确实希望萨尔和他的朋友来住在同一条街上……我知道你可以的，但我忍不住要担心——现在我们决定了一切……亲爱的迪安，这个世纪的上半场已经结束。欢迎你带着爱和亲吻来和我们度过余下的半个世纪。我们都等着你。[落款]卡蜜尔、艾米、小乔安妮。”现在，迪安终于尘埃落定，跟他最稳定、忠诚、最了解他的卡蜜尔一起，我为此替他感谢了上帝。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种忧伤而又奇怪的情形之下，雷米·邦库尔在数次环游世界之后，抵达了纽约。我想要他跟迪安见个面，认识一下。他们确实碰面了，但迪安什么也说出来了，什么也没聊，于是雷米扭头走了。雷米弄到了杜克·埃林顿在大都会歌剧院的门票，坚持让我和劳拉跟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去。雷米胖了，神色忧伤，但依然是个热情而又有板有眼的绅士，他总是想要用正确的法子做事，正如他一再强调的一样。于是他让他的经纪人开着凯迪拉克送我们去音乐会。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凯迪拉克等在外头，准备出发。迪安站在窗外，带着他的大包，准备去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再度跨过大陆。

“再见了，迪安，”我说，“我真的希望自己不去这个音乐会。”

“你觉得我能搭你们的车去第四十大道吗？”他小声说。“想跟你多待会儿，老兄，而且这时候的纽约真的太冷了……”我跟雷米窃窃私语。不，他不同意，他喜欢我，但他不喜欢我的白痴朋友。我不想像1947年跟罗兰·梅杰在旧金山阿尔弗雷德酒吧时一样，把整个晚上原本安排妥当的事情，弄得一团糟。

“绝对不行，萨尔！”可怜的雷米，他特地系了一根专门为今晚特制的领带。上面印了今晚音乐会入场门票的图形，还有萨尔和劳拉，雷米和他的女朋友维基的名字，还有一系列忧伤的笑话，以及他最喜欢的谚语，比如“你没法教老手吹出新调”。

于是，迪安无法跟我们一起进城，我能做的唯有坐在凯迪拉克的后座上，向他挥手道别。开车的经纪人也对迪安不屑一顾。他穿着一件为了扛住东部的寒冷天气而特地买的、被虫子蛀了的大衣，独自一人走远了，我最后一眼看到他时，他正拐向第七大道，两眼直视前方，再次砥砺前行。可怜的小劳拉，我的宝贝，我和她说了关于迪安的一切，她见状几乎要哭了。

“哦，我们不应该让他就这么离开。我们能干些什么呢？”

老迪安走了，我想，随即说出声来：“他不会有问题的。”而后我们动身前往那个挨千刀的音乐会，我压根就提不起胃口，所有的时间，我只是在想着迪安，他如何回到返程的火车上，穿过漫漫三千英里的大陆，而且不知道他为什么来，除了看我一眼。

于是，在美洲大陆，当落日西沉，我坐在破破烂烂的河边码头上，望着新泽西上空那遥远的天际，想着那宽阔地延伸去往西部的无限土地，所有的路途之上，所有在那一片浩瀚之中，怀抱梦想的人们，我知道此刻在艾奥瓦州，一定有孩子在允许他们哭泣的土地上放声痛哭，今晚，将会群星闪耀，你不知道上帝就是维尼熊吗？今晚，金星将会低垂，将它璀璨的祝福降落在大草原上，在整个夜晚真正降临之前，祝福大地，让所有的河流变得暗淡无光，罩住整座山峰，掩盖住遥远的海岸，没有人知道所有其他人将要遭际什么，除了垂垂老矣，我

想起了迪安·莫里亚蒂，我甚至想起了我们从未找到的老迪安·莫里亚蒂，我想迪安·莫里亚蒂。

凯鲁亚克大事记

1922年 出生

简·路易斯·凯鲁亚克于3月12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卢平路9号的家里。他是约瑟夫·奥斯德·里欧·凯鲁亚克和加布里埃·列夫·凯鲁亚克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他于3月19日在圣路易斯法兰西大教堂受洗。（他的父亲，在1889年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的圣湖贝尔，和家人移民到纳书亚，在新汉普顿学习了印刷术。不久后他搬到了洛厄尔，成为了一家名为《星星报》的法国报的管理和发行人，同时他在从事卖保险的业务。他的母亲，出生于魁北克的圣帕克姆，也是在少年时就移民到纳书亚，在16岁时成为了孤儿。1915年10月25日，她嫁给了里欧·凯鲁亚克，当时她在一个鞋厂工作。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杰拉德，出生于1916年8月23日，他们的女儿凯洛琳出生于1918年10月25日。）一家人在家说的是加拿大方言式法语。

1923年 1岁

父亲在洛厄尔开了自己的印刷店。

1924年 2岁

一家人搬到了本拿比街35号。大儿子杰拉德患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1925年 3岁

一家人搬到了波利库街34号。大儿子杰拉德于6月2日去世。

1927年 5岁

一家人搬到了希尔德蕾思街320号。

1928年 6岁

凯鲁亚克进入圣路易斯法兰西教会学校入读。该校用英语和法语双语授课。一家人搬到了希尔德蕾思街240号。

1930年 8岁

一家人搬到了西街66号。

1932年 10岁

一家人离开了洛厄尔的中心威尔区，搬到帕夫塔克威尔区的菲比大街。父亲在那里成为了一家社交俱乐部的经理。凯鲁亚克转学到圣约瑟夫的教会学校。

1933年至1935年 11-13岁

1933年进入巴特利特初中，在那里开始全英授课。开始记录他的第一本日记，同时记录他在运动方面的成就。发明了一种棒球游戏，用纸牌、弹珠和骰子玩儿。创造出想象中的联盟和虚拟的玩儿家。开始写短篇的故事，画卡通，创造出虚拟的神秘人物角色“萨克斯博士”。在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看大量的书。

1936年 14岁

梅里马克河在3月发了大洪水，这对父亲的印刷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家人搬到萨拉大街35号。凯鲁亚克开始进入洛厄尔高中就读十年级。

1937年至1939年 15-17岁

非常擅长运动，特别是在田径中作为一个短跑运动员和在橄榄球比赛中作为跑锋。读托马斯·沃尔夫，威廉·萨罗扬，亨利·大卫·梭罗，马克·吐温和其他作家的作品。父亲于1937年卖掉了自己的店铺，在母亲又开始在鞋厂工作时，他去应聘成为了一名印刷工。父亲的赌博与酗酒增加了一家人的金钱压力。一家人搬到了穆迪街的736号。凯鲁亚克和赛巴斯蒂安·桑帕斯成为了密友，常与其讨论文学、哲学和政治。并和他以及其他一小伙朋友从事政治活动。

1939年至1940年 17-18岁

于1939年6月28日从洛厄尔高中毕业。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橄榄球奖学金，条件是他需要在布朗克斯的一个预备学校霍勒斯·曼就读一年，与他母亲的继母一起住在布鲁克林，每日搭乘地铁上学。他的第一篇小说在《霍勒斯·曼季刊》出版，同

时被他的同学西摩怀兹介绍去哈莱姆的现场爵士乐，为校报撰写爵士和体育的乐评。

1940年 18岁

9月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与新生队的第二场比赛中他的右腿胫骨骨折，这让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康复。

1941年 19岁

法学和文学课都获得了高分，但是化学课不及格。夏天在洛厄尔和新哈文度过，他的父母在8月时搬来了。9月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和教练发生了争执，退出了橄榄球队同时辍学。搬到了康涅狄格州，在哈特福德做加油站的服务员，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在灌木丛上》（有些故事在他去世后出版在1999年版的《在灌木丛上：早期的故事和其他》）当他父母回到洛厄尔时他也回去了。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注册参加了海军航空训练。在等待应征的时候成为了洛厄尔日报的一名体育记者。

1942年 20岁

3月份辞掉了日报的工作去了华盛顿。在那里他参与了五角大楼的建设，同时他也在做兼职的厨师。回到洛厄尔，加入了

一个商船战队，7月开始从波士顿出发，作为多切斯特号上的一名水手在格陵兰海岸跑船，10月回到波士顿。（该船于1943年2月3日被德国潜艇击沉，675人丧生。）接受了重新加入哥伦比亚橄榄球队的邀请。但是在陆军比赛中因坐冷板凳后而退出了球队。秋天留在纽约，开始与格罗斯·波因特的艺术系学生伊蒂·帕克（1922年出生）有私情，开始创作小说《海是我的兄弟》（2011年出版）。12月份回到了洛厄尔。

1943年 21岁

没有通过飞行训练考试，3月份被送到了纽波特罗德岛州的海军新兵训练营，在那里他多次违抗命令，然后被送往基地医院进行精神观察。后来转院去了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在那儿被确诊为“精神分裂倾向”，并被解除了兵役。和他在皇后区欧宗公园的父母一起住在跨湾大道94-10号。重新加入商船队，9月乘坐乔治·威姆斯号离开纽约，这是艘载着炸弹驶向利物浦的船。10月返回了纽约。在欧宗公园和伊蒂·帕克以及琼·奥尔沫·亚当斯合租的西街公寓度过他的时光。见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卢西恩·卡尔（1925年出生）。

1944年 22岁

卡尔介绍他认识了威廉·S·巴勒斯（1917年出生），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艾伦·金斯伯格（1926年出生），以及大卫·

卡摩尔（1911年出生），卡尔的前童子军队员，从圣路易斯跟随卡尔到纽约，赛巴斯蒂安·桑帕斯在意大利的安齐奥海滩担任军医时受伤，于3月2日去世。开始创作《盖拉威》，这部小说最后命名为《乡镇与城市》。卡尔于8月14日在河边公园不幸捅死了卡摩尔，然后去见了凯鲁亚克，凯鲁亚克帮助他处理掉了他的刀以及卡摩尔的眼镜。凯鲁亚克在卡尔自首后作为重要证人被拘留，并因其父亲拒绝保释而入狱。8月22日凯鲁亚克与伊蒂·帕克在一个民事仪式上结婚，并从她的家人那里获取了保释金后获释。他们搬到了密歇根州的葛洛斯角。在那儿，凯鲁亚克在一家滚珠轴承厂工作。（卡尔承认了过失杀人罪，并在监狱服刑了两年。）10月份从纽约乘坐罗伯特·特瑞特·潘船，但是在弗吉尼亚州的纽福克跳船返回纽约。11月16日，凯鲁亚克估计自1939年以来他写了50000字左右了，包括9本没写完的小说。艾迪在圣诞时回到了纽约，他们搬进了位于西街115号的和琼·奥尔沫·亚当斯一起的家

1945年 23岁

凯鲁亚克和巴勒斯合作了小说《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中》，是一本基于卡摩尔案件所创作的小说（2008年出版）。描写了纽约时代广场的黑社会巴勒斯和赫伯特亨克，一个瘾君子、小偷和骗子。夏天时和艾迪分居，帮助照顾他得胃癌的父亲。因为血栓和静脉炎住院，循环系统不好的腿可能和1940年的橄榄球伤势有关。凯鲁亚克还把他的病因归结为他大量的使用苯丙胺和大麻。

1946年 24岁

凯鲁亚克、巴勒斯和金斯伯格接受了阿尔弗雷德·金赛针对《人类男性的性行为》(1948年出版)的学习采访。父亲于5月17日去世。与杰拉德一起葬在纳书亚。凯鲁亚克继续撰写《镇与城》。同意了伊蒂·帕克的要求，结束了两人的婚姻。12月，凯鲁亚克被他的朋友哈尔·蔡斯介绍给尼尔·卡萨迪（生于1926年），一个来自丹佛的偷车贼和骗子，他正和妻子罗安一起去纽约。

1947年 25岁

6月去北卡罗来纳州拜访了他的妹妹凯洛琳和她的第二任丈夫保罗·布莱克。7月，离开纽约，乘坐公共汽车到芝加哥，然后搭便车走完了剩下的路程。会见了凯洛琳·罗宾森（和卡萨迪在1948年4月结婚）。8月乘坐公共汽车到旧金山，在那里亨利·克鲁（霍勒斯·曼的朋友）给了他一个在马林市做保安的工作。游遍了加州然后在10月前回到了纽约。

1948年 26岁

在5月完成了《镇与城》的初稿。开始创作《在路上》的一个早期大框。在6月拜访了在北卡罗来纳州落基山的妹妹。6月在他的侄子小保罗·布莱克出生后与作家约翰·克莱伦·福尔摩斯相遇。在纽约的新学校上了埃尔伯·兰罗和阿尔特雷德·卡兹恩的社会研究课。凯鲁亚克在圣诞节去探望妹妹时卡萨迪也到了落基山并且开车带他返回了纽约。

1949年 27岁

和卡萨迪、罗安以及阿尔欣克尔一起于1月离开纽约，开车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尔及尔。拜访了在那里生活了多年的阿勒斯和琼·奥尔沫·亚当斯。然后和罗安、卡萨迪继续前往旧金山，在2月乘坐公共汽车回到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马克·范·多伦向在布拉斯哈考特的罗伯特·吉鲁推荐了他的《镇与城》，后来在3月末的时候他预付了凯鲁亚克一千美元。凯鲁亚克和吉鲁开始进行定稿和修改原稿的工作。在5月搬到了丹佛，在韦斯特伍德的西中心街61号租房子。继续创作《在路上》。8月去旧金山旅游，然后和卡萨迪一起回到了纽约，在葛洛斯角拜访了埃迪。搬去和他的母亲一起居住在皇后区蒙德山的里希134街94-21号。

1950年 28岁

3月2日《镇与城》出版。褒贬不一，销售不佳。5月去丹佛旅游。然后开车和卡萨迪去了墨西哥城，在那里他见到了巴勒斯。8月回到了纽约。于11月3日遇到了琼·丹勒斯（1931年出生）并且在11月17日与其在民事仪式上结婚。他们居住在西21街的一个公寓里。然后又搬到凯鲁亚克的妈妈在皇后区的家里。在12月收到了一封来自卡萨迪的长信。（后来凯鲁亚克说卡萨迪“又迅猛又疯的自白式”的信对他写《在路上》非常有启发）

1951年 29岁

和琼一起搬到了曼哈顿西街454第20路的一个公寓，琼正在一个百货商店工作。在4月2日开始写新版本的《在路上》，在三周内写完并且从金斯伯格和巴勒斯那儿用十二英尺长的纸卷将其打印了出来。标明《自述散文》。和琼分居了，和路西·卡尔以及艾伦·金斯伯格搬到了一起。当琼告知其她怀了他的孩子时极力否认。罗伯特·吉鲁科斯出版社拒绝了卷轴版的《在路上》。雇佣了MCA的雷·埃弗里特作为他的文学经纪人。在看望住在北加利福尼亚的妹妹时犯了几次血栓病。8月住进了布朗克斯的国王桥弗吉尼亚医院。9月7日巴勒斯在墨西哥城意外地杀死了琼·沃摩尔·艾达慕斯，起因于她喝多后拿一个酒瓶敲破了他的头。9月凯鲁亚克离开了医院回到了里士满山。重新开始用一种更自然的方式创作《在路上》（重新制作的版本在1972年出版，命名为《迪安的幻象》）。12月搬到了旧金山

和尼尔、凯洛琳·卡萨迪以及他们的孩子一起住在罗素街29号。

1952年 30岁

在南太平洋铁路上担任行李员。接受了来自艾希图书的250美元的《在路上》预付款。2月16日女儿简·米歇尔·凯鲁亚克在奥尔巴尼出生。凯鲁亚克开始和凯洛琳·卡萨迪偷情。和卡萨迪一家开车前往墨西哥边境亚利桑那，然后搭乘公共汽车前往墨西哥城，在那儿他和巴罗斯一家住在一起。5月6月写了《萨克斯博士》。7月与在北加利福尼亚的母亲和妹妹同住。9月搬进了在桑琼斯的卡萨迪一家家中。在南太平洋铁路做刹车工。有一个月由于和凯洛琳·卡萨迪的婚外情压力太大，搬到了旧金山的小旅馆里，然后11月又回到了桑琼斯。约翰·克莱伦·霍姆斯出版了小说《走》，凯鲁亚克在其中被虚构成基恩·帕斯特·纳克，11月1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是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和尼尔·卡萨迪游览了墨西哥城，然后回到了皇后区的母亲家中。

1953年 31岁

撰写了《麦琪·卡西迪》。和维京出版社的麦考林·考利讨论了他接下来的出版意向。4月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旅行，在那儿他重新开始为南太平洋工作。5月辞职然后

从旧金山航行到新奥尔良，在S·S·威廉·卡卢瑟斯号上当厨子。6月回到了皇后区。在10月21到24日期间撰写了《地下人》。回答了博勒斯和金斯伯格关于他写作思路的问题，撰写了《自然散文要义》。

1954年 32岁

1月末离开纽约和在圣何塞的卡萨迪一家住在一起，一边学习佛经一边当停车场服务员。4月回到了他在皇后区的母亲家。聘请斯特林勋爵作为他的文学经纪人（勋爵在此之后都为他代言）。开始撰写《达摩流浪者》（1997年出版）。麦考林·考利在《星期六评论》里用“垮掉的一代”形容凯鲁亚克，他写道：“他还未问世的小说《在路上》就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10月，凯鲁亚克拜访了罗威尔。

1955年 33岁

1月，阿尔弗雷德·阿·诺普夫成为了第六个谢绝《在路上》的出版商。琼把凯鲁亚克告上法庭，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他的律师，尤金·布鲁克斯（艾伦·金斯伯格的哥哥）以凯鲁亚克患有静脉炎和他妈妈也搬家过这两件事打赢了官司，由于疾病复发，法庭推迟了官司。凯鲁亚克和他的妈妈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4月，《新世界文章》选登了《在路上》里的《节拍一代》和《迪安的幻象》。7月去墨西哥城旅游。在11月

去旧金山前开始创作《特里斯特莎和墨西哥城》。在10月7日于旧金山的第六画廊会见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罗伦斯·费林赫迪、迈克尔·麦克卢尔、菲利普·拉曼蒂亚、菲利普·华伦和盖里·谢纳德。艾伦·金斯伯格在那儿第一次读了《嚎叫》。和盖里·谢纳德在10月去了爱达荷州的锯齿山。《巴黎评论》刊登了《墨西哥城女孩》，它是《在路上》的另一选段。凯鲁亚克回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并且于12月27日开始创作《吉拉德的幻象》。

1956年 34岁

1月16日完成了《吉拉德的幻象》。3月搭便车到加利福尼亚。和密尔谷的盖里·谢纳德住在一起，在那儿他写了《午夜天使》（1993年出版）和《金色永恒的经典》。6月搭便车去了华盛顿北部的贝克山国家公园里的一片森林中。当了两个月的消防队员，住在荒凉峰的一个瞭望小屋里。9月在去墨西哥城之前返回了旧金山，在那儿开始创作《裸露的天使》。金斯伯格的《嚎叫》等诗歌由城市轻书出版。11月凯鲁亚克回到了纽约。维京出版社同意了《在路上》的出版。

1957年 35岁

在1月完成了《在路上》的最终版本。（维京坚持要更改书中的名字和地点，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诽谤投诉。）开始和作家

乔伊斯·格拉斯曼搞暧昧。2月份启航前往丹吉尔。在那儿拜访了巴勒斯一家，并帮助他排版了小说《裸体午餐》（名字是凯鲁亚克根据另外一个不同的手稿起的）。4月去巴黎和伦敦旅游然后回到了纽约。搬去他妈妈在加州伯克利市的家，但是7月他们又搬到了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他妹妹住的地方。去墨西哥城旅游，然后又回到了纽约。9月5日《在路上》出版发行，成为最畅销的书，这让凯鲁亚克成了全国周知的名人。（在《纽约时报》上，评论家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称其为“这代人最优美、清晰、最重要的言语，而在之前，代表这代人的凯鲁亚克还被称为‘垮掉了’。”）尽管《在路上》卖得非常火，但是维京拒绝了凯鲁亚克所有其他未出版的手稿，包括《萨克斯博士》《特里特莎》和《荒凉天使》。在秋天写了剧本《垮掉的一代》（2005年出版）以及小说《达摩流浪者》。在12月末回到了纽约，为爵士现场演奏会做了一系列的读书活动。

1958年 36岁

做了一系列的采访，其中包括麦克·沃尔莱斯为《纽约邮报》做的一个采访。《地下人》在2月被格洛弗·普莱斯出版，遭到了非常糟糕的评价。在长岛北港的吉尔伯特大街34号买了房子。当他在一家酒吧外被人殴打时，他的手臂骨折，鼻子也被打断了，另外还得了脑震荡。凯鲁亚克和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一起开车从纽约到了佛罗里达。4月搬去北港的家中和他母亲一起居住。7月，尼尔·卡萨迪因贩卖大麻而开始服刑。（于1960年夏天从圣坤廷获释。）10月2日维京出版社出版了凯鲁亚

克的《达摩流浪者》。结束了和乔伊斯·格拉斯曼的感情。由于常年酗酒以及苯二胺的滥用，凯鲁亚克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1959年 37岁

录制先锋电影《拉出雏菊》，由罗伯特·弗兰克和画家阿尔弗莱德·莱斯利导演。为弗兰克的摄影集《美国人》写了简介。4月格洛弗出版社出版了《萨克斯博士》的贸易平装版，7月，雅芳出版社出版了《玛姬·卡西迪》的大众平装版。凯鲁亚克开始在《越轨》杂志写专栏。和他的母亲搬到了北港的49街。11月到洛杉矶旅游，在史蒂夫·艾伦秀中的《科迪的视角》获得信息。格洛弗出版社出版了《墨西哥城蓝调》。11月30日，时代周刊刊登了保罗·奥尼尔攻击凯鲁亚克和尼尔·卡萨迪的文章《垮掉的一代：悲伤却聒噪的造反者》。

1960年 38岁

开始撰写《孤独旅者》和《梦之书》。图腾出版社出版了《金色永恒的经典》。雅芳出版社出版了《崔斯莎》的大众平装版。兰纳德·麦克当劳导演了电影版本的《地下人》，片子很失败在商业上损失惨重（凯鲁亚克收到了一万五千美元版权费）。在劳伦斯·费林赫迪位于比克斯比峡谷的小屋里度过了夏天。在那里他试图戒酒时精神崩溃了。在9月回长岛前见了凯

洛琳·卡萨迪最后一次。9月27日，麦克劳·希尔出版了他的《孤独旅者》，一本关于旅行片段的集子。

1961年 39岁

1月和金斯伯格一起会见了缇茂茨，并且开始吸食LSD(一种毒品)。城市之光图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梦之书》。在4月时离开北港，搬到他母亲居住的奥兰多的阿尔弗莱德大街1309号。在墨西哥城度过了夏天并且完成了《荒凉天使》的第二部分。8月几米杂志刊登了文章《我的前夫杰克·凯鲁亚克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详细描写了琼·哈利福特如何长期独自抚养凯鲁亚克的孩子们的事。9月30日至10月9日在奥特兰多写了《大瑟尔》。秋天时在纽约一直喝个烂醉。

1962年 40岁

见到了他的女儿简，简时年十岁。在2月他们第一次做了亲子鉴定，每周拿出十二美元作为女儿的抚养费。3月，格洛弗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巴勒斯版本的《裸体午餐》。法拉·斯特劳斯和库达出版社在9月11日发行了《大瑟尔》。12月和他的母亲住进了他在北港的朱迪安大街7号购买的房子。

1963年 41岁

继续他1942年开始创作的《杜洛兹的虚荣心》。法拉·斯特劳斯和库达出版社在9月出版了《吉拉德的幻象》，反响很差。

1964年 42岁

3月在哈佛大学醉酒读书。夏天在纽约和肯·凯西见了尼尔·卡萨迪最后一面，也会见了玛丽·普兰卡斯特一家。出售了北港的房子，和母亲一起搬到了佛罗里达圣彼得堡的第五北街5155号。凯洛琳·凯鲁亚克于9月19日在奥兰多死于心脏病发作，她被埋葬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因为凯鲁亚克无法支付墓碑的费用。

1965年 43岁

3月在圣彼得堡的一个酒吧里，他被人打断了两根肋骨。5月3日法拉·斯特劳斯和库达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荒凉天使》。访问了巴黎和布列他宁并试图研究他的先祖。在他返回佛罗里达后很快创作了《巴黎之悟》。

1966年 44岁

春天和母亲搬到了马萨诸塞州海恩尼斯市科德角镇布里斯托尔大街20号。格洛弗出版社出版了《巴黎之悟》。8月安·查特斯特拜访了他，查特斯特正在编辑他的生平史（1973年出版了凯鲁亚克的第一本传记）。9月9日，母亲患了严重的中风，导致瘫痪。凯鲁亚克短暂地访问了米兰和罗马，并宣传了《大瑟尔》。和他的洛厄尔朋友赛巴斯蒂安的妹妹赛帕斯于10月18日在海恩尼斯结婚。

1967年 45岁

1月与斯特拉一起和他的母亲搬到了洛厄尔桑德斯大街271号的房子里。完成了《杜洛兹的虚荣》。接受了泰德·贝里根、阿兰·萨拉彦以及邓肯·麦克劳德后来刊登在《巴黎评论》的长篇采访。在11月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他的女儿简。

1968年 46岁

尼尔·卡萨迪于2月4日在墨西哥的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突然昏倒并且去世。科奥德·麦克肯尼出版社于2月6日出版了《杜洛兹的虚荣》。3月访问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和德国。在9月初他去纽约录制威廉·佛·伯克利的电视节目《开火线》的时候最后一次见了巴勒斯和金斯伯格。回到了圣彼得堡，和斯特拉以及他的母亲一起搬到了第10北街的5169号。

1969年 47岁

完成《图片》（1971年出版）。遭受着9月初他在一个酒吧外被打断肋骨的痛苦。在9月28日的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了自己与自己隔绝的文章《在我身后，滚滚红尘》。于10月20日因肝硬化引起的大出血死于圣安东尼医院。10月24日，在圣·简巴普特斯特教堂安魂弥撒。凯鲁亚克安葬在爱德森天主教公墓。

译后记

生活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我有过真正的“在路上”的生活经历，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一代人（七零后）在青春伊始，想要过的就是凯鲁亚克式、迪安式的在路上的生活，不过真正能够付诸实践的人却很少，或者说，想得多做得少。编辑让我翻译《在路上》，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决定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做一个译者，但是这是《在路上》啊，1993年，我只身踏上西去的路途，背包里确实放着这本书，当时封面是四个裸着上身、纹身的男人和一个用手遮盖着胸部的女人交缠着躺在一起，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陶跃庆的译本。左上角写着：“垮掉派力作，嬉皮士经典”。

那一路，我和一群在路上认识的新朋友们，搭军车去林芝未果，河断了，我们在河边住了一晚上，去找通行的团长想办法，他说：“我们在等救援部队来，要很多天，你们还是回去吧，这里连吃的都不够。”我们只好灰溜溜地往回走，一路继续搭车，我们当中有个男孩一只脚是义肢，他爬上军车的灵活度比我们这些人还高。我打算回拉萨，搭了军车，他们有去甘孜的，有去雍布拉康的，后来我也去了甘孜，去了雍布拉康，无数次在这些地方，和这几个人重逢。

记得在西藏离拉萨还有两三百公里处，附近是个温泉聚集的地方，我搭车的卡车司机提议我去泡个温泉，我们的车子在夜半停在路边，他们用报废的轮胎点起火来，恶臭扑鼻，然后从边上农田里摘了一些青稞，就那么放在火上烤着吃。这个车队是从上海一路开过来的，到了西藏，到小村子里去兜售在上海款式过时的羊毛衫，他们用极低的价格从上海的羊毛衫厂子里收来这些衣服。

我打扮成男孩模样，短发，带着一顶在路上买的黑鸭舌帽，深色牛仔裤，在西宁路边军品店花十块钱买的低帮厚底军靴，那一年我二十岁，觉得自己不走遍五湖四海简直对不起自己。

去西藏的路上，遇到过火车骗子，身上仅有的钱差点被骗光，最后在拉萨，钱花光了，给父母打了电话，等父亲电汇钱到拉萨人民邮电局给我，住在十块钱一晚上的拉萨军区武警招待所，每天跑一趟邮局，去问钱到了没有，这种经历凯鲁亚克

曾经也有过，而且不止一次，只不过在书中，给他寄钱的是住在纽约的姨妈。

刚才说到搭大卡车从林芝回到拉萨（因为常常搭大卡车，我对卡车司机有特别的感情），一路搭车搭下来，司机们都喜欢我，为首的老大因为长年累月跑村子，头发留得长长的，胡子也不刮，自然地留成了算命先生一样的八字胡。他跟我说：“我们接下来要去藏南村子里转三个月，我们这里缺个有文化的人，帮我们写海报，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包吃包住。”

跟凯鲁亚克不一样的是，我想到了自己尚未完成的学业，大学二年级，三个月过后，学校可能会开除我。实际上，当你想过凯鲁亚克式的在路上的生活的时候，你首先得是个自由之身。后来，我依然有过许许多多在路上的经历，有过在荒郊野外的小卖店，买到一罐出品于1974年的猪肉罐头，然后一群人欢天喜地地吃完，才惊觉的经历，有过跟盲流们一起睡在火车站，被他们偷了行李的经历，有过投宿在路上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经历，开面馆的女老板，公园里偶遇的小夫妻俩，农舍的阁楼上……我也有过迪安一样的朋友，英俊，笑咪咪，无所顾忌，永远在路上的他年近四十，喝酒躺在浴缸里，溺水而亡，他叫李立群，也是民谣歌手和诗人周云蓬的好友，最近周云蓬组建了一个群，一起回忆这个中国迪安，要为他出一本书，我也参与写了纪念文章，我也想把他的故事写成一本中国版的《在路上》，在书中，我打算叫他莫尔，在现实生活中，他叫李立群。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我追忆自己过去在路上的生涯的最佳时机，我从十九岁开始，就走上了这世间唯一的一条路。“Beat Generation”当中的Beat是多义词，是多声部的混响，它不单是垮掉、疲惫与潦倒，还有击打、打败的意思。据说凯鲁亚克还为它挖掘出了“欢腾”或者“幸福”这两层意思。你如何定义“幸福”呢？这最终决定了你的生活，幸福是定居在烦闷无聊的婚姻里，上着循规蹈矩的班，穿着一成不变的熨烫过的衣服吗？幸福是拿望远镜看着几十年开外的自己，坐在轮椅上、养老院的小破床边，苦苦等候迟迟不来探视自己的儿子吗？幸福是服从吗？是迁就吗？是容易的还是难的？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幸福没有标准答案，幸福对于任何人都有形形色色的定义，对于一个牙齿掉光了的老人来说，拥有一口好牙就是幸福的，对于孩子来说，幸福被切割成每时每刻的细小的欢欣：一颗糖，或者玩一会儿手机。

迪安们的幸福就是在屋子里待不了两天，就又出门了。开着他们形形色色的小破车，有很多还是偷来的。他们出门的理由有时候是为了去旧金山或者新奥尔良看一位老朋友，有时候是为了去和前女友复合或者找现任妻子办离婚手续，或者帮亲戚往纽约拉趟家具，或者纯粹是为了去找个陌生的地方乐一下，很少是为了挣一笔钱，或者挖一个金矿，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路上，过着潦倒的生活，在过着潦倒生活的过程中，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无非如此。他们最终一起去了墨西哥，在妓

院中狂欢了一个下午，花光了所有的钱。这像是最终的华彩，是烟花最后的绽放。

现实生活中，凯鲁亚克像所有尘世中的普通人一样，与人同居，结婚，生子，闹离婚，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妻子的辩护律师居然是金斯伯格的亲兄弟），撕扯争吵，生病。在路上的历程伴随着这些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事件，一刻也不得消停，怨怼与疯狂，懵圈与顿悟，他和所有的垮掉们，都是一样的，他的朋友们更夸张：坐牢、误杀妻子、吸毒贩毒……偷车贼尼尔·卡萨迪正是书中迪安的原型，凯鲁亚克一度和他老婆偷情。

他还说过：“我做的一切，我写的一切，都基于某种信仰的改变……个人的信仰由他自己决定。”垮掉的一代，确实确立了自己某种信仰的准则，在汹涌向前、顽固不化的主流价值系统所支配的铜墙铁壁之外，偷挖了一条越狱的地道，他们从这里不单是离开了围城，还在屁股上安装了火箭发射器，将自己送上外太空。垮掉的主导人物里边，除了“迪安”尼尔·卡萨迪之外，个个都是根正苗红的学院派，凯鲁亚克自己从哥伦比亚大学辍学的，“嚎叫”爱好者金斯伯格是他的校友，也曾被校方一度开除，瘾君子威廉·巴勒斯学历最高，是哈佛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的博士，是写《瓦尔登湖》的梭罗的校友。

（说起来，梭罗拿着斧子去湖边造房子，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垮掉，他是垮掉们的远祖。）这些底色是学院派的作家们，到死都还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为努力的目标，但他们从不拒绝将自己作为生活的试验品，或者说，他们绝对不将文明和教

化，变成自己与肉体、生活隔绝的借口，一个作家，同时得在生活的泥地里摸爬滚打，将自己置身于永不安宁的境地（安宁富足意味着张力的丧失），将即兴的动机，变成活着的新三岔口，不拒绝去往你死我活的境地，不拒绝肮脏、失败、无聊、堕落。

这就是垮掉的魅力，也是《在路上》这本年轻人的圣经的终极教义。

巫昂

2019年11月23日，定稿于杭州满觉陇



译者 | 巫昂

诗人，小说家。

先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任调查记者。2003年起职业写作，出版有诗集《干脆，我来说》《通往阳光密布的所在》和《我不想大张旗鼓地进入你的生命之中》，长篇小说《星期一是礼拜几》《瓶中人》等。

2019年倾心翻译了杰克·凯鲁亚克经典代表作《在路上》，译稿出版前在作家群广泛流传，好评如潮。

个人作品

- 随笔集 | 2001年 《正午的巫昂》
2003年 《从亲人开始糟蹋》
2008年 《厨房中术》《谁都是情圣》
2009年 《换个姿势爱》
2010年 《极品》
2012年 《多情是犯罪》
2014年 《厨房里的思考家》
2016年 《入口即化：巫昂的美食天堂》
- 诗集 | 2005年 《什么把我弄醒》
2012年 《生活不会限速》
2013年 《干脆，我来说》
2016年 《通往阳光密布的所在》
2018年 《我不想大张旗鼓地进入你的生命之中》
- 长篇小说 | 2010年 《星期一是礼拜几》
2016年 《瓶中人》
- 译著 | 2016年 《我永远也得不到贝森老师黑板上的一颗星》
2020年 《在路上》



作家榜

★ 经典文库 ★

送给孩子的完美礼物

来自作家榜®的礼物

“读经典名著，认准作家榜经典文库”

——闭着眼睛买，本本都经典——

亲爱的读者，感谢您选择大星®文化出品的作家榜经典文库。

火遍全国的“作家榜经典文库®”，精选经典中的经典，全部由顶级诗人、作家倾心译注，只为您和您的孩子，提供值得反复阅读和激发心灵成长的全球至高经典。

作家榜经典在高端读者群中口碑相传，创造了一本又一本的畅销奇迹，成为精品经典的标杆品牌，赢得无数家长、老师赞誉“读经典名著，认准作家榜经典文库，闭着眼睛买，本本都经典！”越来越多有经验的读者，书架必备作家榜经典；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因为作家榜经典爱上阅读。

为给您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务，作家榜母公司大星文化重磅推出永久免费的电子书阅读平台“作家榜阅读 APP”，作家榜经典文库所有已出版作品，您均可下载免费阅读电子书。

下载作家榜 APP
百部经典免费读



作家榜经典天猫旗舰店
扫码关注就送 10 元！



如您有任何建议或希望与我们合作，欢迎致电作家榜：021-60839180

《作家榜经典文库 · 中国经典已出版书目》



《作家榜经典文库 · 外国经典已出版书目》



[点击试读](#)